

史家苗



苗 家 史

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

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

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8.25插页8 字数180千

1979年5月第一版

1979年9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 3,600 册

书号：M10140·11

定价：0.68元

前 言

《苗家史》是一本苗族劳动人民的家史。这本家史，共选有二十四篇。它从各个不同的侧面，着重反映了解放前四川省古蔺县苗家社会生活的情景。书中从地租剥削、杂税苛捐、无穷的劳役等方面揭露了剥削阶级的无耻与凶残，反映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与腐朽，也揭示了苗汉穷人心连心，“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”的历史真实。同时，通过解放前后的苗家社会地位的鲜明对比，歌颂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党的民族政策，展示了在党的领导下各民族团结战斗、前进在社会主义大道上的光辉现实。

古蔺，地处川南山区，紧邻黔北，奔腾咆哮的赤水河三面环绕。一九一六年蔡锷讨袁，行军中特为留题的“雷山关”，雄峙县境西南。鸟瞰古蔺全境，万山起伏，林木层层，水库星罗棋布，田园鳞次栉比，显示出川南山区一派富饶的景象。

古蔺又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山区。汉族而外，苗族人口最多，分布在全县九区一镇。他们勤劳勇敢，能歌善舞。明代杨升庵路过现今古蔺县属么尼一带，有诗记述当地土著的习俗：“缙纒缠髻作雕题，铁距穿鞋学马蹄；清晓樵斤探虎穴，黄昏汲甕下猿梯。”从诗中描述的装束看，写的就是苗族。“铁距穿鞋”在古蔺一带沿习至今，一双马鞍形的铁具，用来缚在鞋底，行走山路能防滑耐磨，人们叫它是“铁距马”或“铁脚马”。后两句是刻画人们生活在高山的情状，描写了苗族人民矫捷的英姿。这当

是对古蔺一带苗家的较早的记载。

解放前，古蔺山区交通闭塞，斤盐斗米，兵匪骚乱，土豪横行，人民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。人们常说：“糠菜半年粮，辣椒当衣裳，棕毡作被盖，岩框是住房。”可是，苦难的苗家还不止此。滴水成冰的寒夜，钻在秫秸堆里，这就是床；包谷壳壳联缀起来，这就是衣服；棕毡棕衣也不是容易得到的。在那漫漫长夜里，地租、力役、苛捐、杂税，条条绳索，根根棍棒，齐向苗家挥舞。苦难苗家在不堪设想的困境中挣扎着，英勇斗争着。

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九日，毛主席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到了古蔺，在古蔺转战近两月，经过六十六个区乡，三十八个场镇，开展了打土豪、开仓分粮、开仓分盐、扩充红军等一系列活动。古蔺劳苦大众为红军带路、搭浮桥、送情报、救护伤员，并纷纷参加红军。古蔺广大人民从此知道了天下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，苦难苗家也从此有了希望，党领导的地下斗争从此更加蓬勃地开展。

解放了，党的光辉照亮了古蔺山区，古蔺人民翻了身，苦难苗家出了头。广大苗胞发扬革命传统，艰苦奋斗，为祖国大家庭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。在党的关怀、教育、培养下，许多苗族同志光荣地入了党，有的担任了县、区、社各级领导职务。现在，全县各族人民正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，团结战斗，继续长征。《苗家史》正是反映了古蔺县的这个历史性的变化。

在中共古蔺县委的领导下，参加本书整理工作的，有冯永宽、徐安全、胡世勋、张方正、何世红、丁明昭、熊文正同志。

古蔺县《苗家史》编写组

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五日

目 录

前 言

- 望乡台陶友安 1
- 三代“蛮娃”三代仇熊国金 12
- 从吊绳上活过来的人李成武 22
- 三胎牛儿王炳兴 30
- 锁 链项正江 41
- 等儿坡侯少伦 54
- 交不完的方租李银洲 62
- 死地主抢活人屋杨在宣 74
- 受欺凌的喷呐匠王少安 86
- 血泪碑康 兵 94
- 苦难的苗家女蔡文学 102
- 吃官司三下泸州王典周 110
- 佣人苦侯良才 121
- 盐王 银 130
- 陷 害马丙欽 139

难忘的童年	熊少成	150
我盼红军快回来	古占清	162
斗“黑狗”	杨正发	175
火烧金宝台	侯良德	190
深山猎人	李正举	200
抗 丁	张银阶	212
坚持斗争迎解放	侯成发	221
轿夫的歌	陶向荣	233
我当地下交通员的时候	马杰良	247

望 乡 台

陶 友 安

一架高耸入云的大山叫望乡台，我们二十多户苗族人家散居这山半腰已有百多年了。听老人说，我们原先都住在比较富饶的平坝、谷地，就拿这山下盛产水稻的火比大坝来说，它的开垦，也流有我们苗家数不尽的血汗。那社会，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，把我们先先后后赶到这高高的山上。人们常常怀念着辛勤建立的家园，辨着山势，遥望乡关，年深月久，就给这座山叫了这个名字——望乡台。这是旧社会阶级压迫、民族压迫的历史见证，是反动统治者累累罪行的历史见证啊！

—

一九四二年秋天，我十三岁了。要是现在，那正是念中学的时候。可那时，我这样年龄的穷苦孩子，已经担起了生活的重担。秋收季节，大人小孩通通忙得不可开交。我们要同住在高房大屋里的“野兽”斗，要同岩穴、森林里的害闹^①斗，还要同老天斗。庄稼才开始收割，“主爷孃”^②的狗腿子就到山里串来串去，挨家挨户催租，监收、监晒、监运。一天，那个长了两撇八字

^①害闹：方言，指危害庄稼的野兽。 ^②主爷孃：即主人家。农民对地主的泛称。

眉，眼角嘴角都老是往下掉，使人看了毛森森的狗腿子对我爸爸说：“陶化，把晒干了的这堆谷子，马上背去交了。”我爸爸停下活，撩起前襟揩了揩额上的汗，对他说：“要赶收天呀！活还多，下起雨来怎么办？”他嘴一撇，尖刻的话从他那黄板牙里射出来：“少米这一套。懒牛尿多，苗子心多。管你哪个办，说运就得运。”说来说去，妈妈把藏在楼角草堆里的上好旱菸翻出来给了他，这才见他的眉梢眼角舒开了一点，总算答应了妈妈和哥哥留在田里干活，只爸爸和我去交租。

秋风阵阵，这深山里已经有了些凉意。成片的松柏，浓绿得泛出蓝色。田边、路旁的桐櫬却开始零零星星地掉叶子了。地主何肖氏的庄院在火比大坝，太阳还没有当顶，我们就赶到了。只听见人声、风簸声响成一片，背大口背篋的、挑箩筐的，许多人进进出出。这些人的穿著都一样，清一色的粗麻布长衫，前后襟提了起来掖在粗布腰带上，露出齐膝的麻布裤子，光着双脚。看样子，今天是专门安排收我们苗族佃户的租子。爸爸和我刚把谷子放下，何肖氏就摇摇摆摆地走了过来，劈手抓起一把谷子，眯起眼睛看了看就吼：“哼！还有这么多秕壳。来，给他风过。”几个大汉抢过来，就把我们的谷子倒进了风簸。一个家伙抓住风轮把手拚命摇，另一个家伙把梭板只扭开一条缝。大量的鼓精饱绽的谷子竟从二斗里流出来，有的甚至从风簸那头吹了出去，打在地上唰唰响。眼看放在二斗下面的那个箩筐就要装满了。我心想，这样好的谷子，你们把它搞成了二梁谷，不要算了，我拿回去正好尝尝大米饭。我边想边准备去装。两个狗腿子却把满满一箩二梁谷抬走了。“嗨！我还怕你们当真嫌这谷子不好咧！”我心里暗暗地想。“不对，他们并没有过斗，迳直把粮食抬进一

间仓房去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”我走到爸爸身边提醒他说：“斋①，那箩谷子没有过斗，他们就抬进去了。”“唉！”爸爸长叹一声，“年年无数都是这样，把许多好粮当成了二梁谷，不抵租，又不准我们拿回去。”

“天下那有这个道理！”当第二箩二梁谷刚流满，我抢上前去就往自己的背篋里装。才撮得一撮箕，何肖氏跳过来就给我一巴掌，“你小苗子要干啥子？”我愤怒极了，一手抓住箩筐，一手指着何肖氏，“你们把这样好的谷子当成二梁谷。二梁谷就二梁谷，为啥又不让我们拿回去，又不抵租？你不是活抢人！”何肖氏暴跳如雷，冷不防她飞起一脚踢在我胸上，我立即倒了下去，头部撞在地脚石上，耳边隐隐地响着地主婆的骂声：“陶化，你这个胎娃儿，一点规矩不懂……”

是什么大滴大滴的酒在我脸上？我睁开眼睛，才知道已躺在自家床上，妈妈正俯着身看着我。她满脸泪痕地问：“儿啊！好些了不？”我拉着妈妈的手说：“我不痛，你不要难过。恨只恨我人太小，又没防备，要不……”爸爸掉转身来望着我说：“咪朵②，你也该懂点事了。这世道没有我们讲理的地方，谁给我们作主啊！乡长张召南有枪有炮的，就袒着何肖氏他们。今天我去找他评理，他捧着水烟袋，瞧也不瞧地说：恶佃欺主是大罪，姑念你陶化人还老实，回去好好管教你儿子。至于何肖氏那面说你儿子使她闪了腮，你去给她陪个小心，何肖氏是菩萨心肠，会饶过你的。”我又气又恨又急，摇着妈妈的手说：“妈妈、爸爸，我们不做何肖氏的地了。这么大一匹山，我们自己挖来种。”我

①斋：苗语，即爸爸。 ②咪朵：苗语，即么儿。

这个主意，妈妈象没有听见，她只把身子俯得更低一些，细心地拭去我后脑伤口浸出来的血水。听到我这个话，爸爸身子一震，脸色顿时就变了。只见他颤抖着双手又装上一袋烟，把烟杆伸进火圪里点燃，巴嗒着，断断续续地说：“开荒，开荒，人死财光。早先，在你爷爷手里，我们家住在隔这里三十多里路的葫芦营坝子里，你爷爷租种肖瞎子两石租子的水田。那时，全家就是你爷爷、祖母、你二叔和我四个人过日子。每年把两石租子交了后，就剩不了几颗粮食了。年年月月靠挑煤炭、做蕨巴卖，换点粮食拌和蕨渣野菜过活。眼看一家人饿得皮包骨头，你爷爷累死累活，白天不放排^①，晚上赶月亮，开了一片荒土。据说，开生荒，三年不上粮。心想总可以吃两年饱饭了。谁知庄稼还没有黄，肖瞎子就来收租了，还说生荒肥过熟土，租子定得格外高。两三年后，生荒成了熟土了，租子却一颗不减。年复一年，我们还是吃不上一顿饱饭。”爸爸说到这里，喘了喘气，接着说：

“有一年遇上天干，包谷挂不起包，尽是火闹脚^②。田里干得起火，秧子栽不成。那黑心肝的肖瞎子咋个说也不减租子，叫几个狗腿子来把我家仅有的几颗吊命粮食全部扫光，几只鸡也抢去了。唉！谷黄米熟的时节，我们连一颗粮食也没得下锅。你爷爷去找肖瞎子，被他家打了出来，回家的那天晚上就死了。我们三娘母围着尸首直哭。大洞小眼的屋顶刚透进朦胧光亮，你祖母叫我去请几个人来帮忙。等我回来，听见你二叔在屋角角那里哭，我走过去一看，天啦！你祖母吊死在那里了……”妈妈的泪珠一串串掉在我脸上。爸爸没有哭，他两眼喷出火，“那时我才十二

①放排：歇气的意思。

②火闹脚：包谷杆的茎脚象被火烧过一样干枯。

岁，你二叔六岁。从那天起，我就牵着你二叔到处讨口。有时，太阳打阴坡了，还没得早饭吃。肚皮饿得痛，我们却从不走向那些高房大屋。那里的狗凶，人更凶，绅粮们的心比狼还狠。不久，肖瞎子连饭也不准我们在那一带要了，把我们撵出了葫芦营，在火比大坝又流浪了一年多，才来到这望乡台半山定居下来。”

还是爸爸来到望乡台的那年，在屋旁栽了棵柿子树。长大后，年年都结出又红又大、金光闪闪的大方柿。何肖氏看了眼红，对爸爸说：“这柿子肉多、个大、味甜，张乡长都说好。今后你们不许糟踏，一熟透就给我摘了送来。”她看我在旁边露出不满的样子，不等爸爸开口，又说：“要招呼好你小的。山上有的是野果子嘛。”这年，又到了柿子黄熟的季节。阵阵秋风中，象梧桐一样不经冷的柿树叶飘零了，裸露出黑色的树枝和那上面一串串红似喷火、光亮耀眼的大方柿。瘦得皮包骨头，年仅两岁的弟弟友兴在树下站了老半天了，他双手接着肚子，仰起脸不眨眼的看着树上的大方柿。见我走过来，他哭闹起来，非要我摘个柿子给他不可。这时已经十四岁的我，脑子里闪出了何肖氏的魔影，但看见弟弟那样子，我什么也顾不得了，几下就上了树。说也凑巧，何肖氏恰好从大路那边走了过来，一下看见，便破口大骂：“你这可恶的小苗子，还敢偷我的柿子！”我说：“这树子是我爹栽的，关你屁事。”何肖氏一下暴跳起来：“哟，你当真弄恶，老子今天非打死你不可！”说着从柴堆上抽了根锄把粗的长棍就向树下奔来。友兴吓得哇哇哭。眼看棍子就要戳在身上，我慌忙把手里的一个大方柿，对准何肖氏的头顶狠狠砸去。她恰好仰起脸来瞅，一下挨个正着，熟透的柿子在她脸上开了花。她惊叫一声，跌坐地上，用手一抹，黄的果汁，红的鼻血，满手满脸。

趁她这一愣，我吱溜一声梭下树，箭一样往林子里跑去。何肖氏爬起来，眼看追不上，没人性的东西，竟对准友兴的头上就是一棍。随着一声凄厉的惨叫，友兴倒在地上。在屋后刮藤的母亲闻声跑来，连忙抱起友兴，雨点一样的乱棍又落在我妈身上。爷爷赶来了，在附近田里做活的几个苗族青年也跑来了。一个青年猛地从地主婆手里夺过棍子，厉声喝道：“你为啥乱打人？”何肖氏看看一双双愤怒的眼睛，悻悻地说：“哼！我看你们敢咋个。惹烦了老娘，望乡台也住不成。这笔帐慢慢算，今天老娘还有要紧事。”怒骂夹着嘲讽把何肖氏送下了望乡台。

二

在旧社会，我们苗家从平川大坝被撵上深山野箐的望乡台。祖祖代代不知流了多少血汗，在山上开起了坡土，改出了梯土，溪边坪地造起了水田；屋前屋后种植了桑麻果木。可是仍然跳不出贫困的罗网，年复一年，代复一代，总是挣扎在死亡线上。每年秋收刚过，镰刀爬上墙，碗里无饭装。寒冬到来，望乡台上的蕨根就是一家大小的口粮。山野绿了，春天来了，就靠野菜充肠。在那长天老日的夏季，常是灶里没有火星子，小孩饿得哭，大人还得勒紧腰带下地干活。记得那年夏天，伏旱逼人，田里裂口，土里扬灰，庄稼枯萎。一天中午，爸爸和哥哥正在大毒日头下，面对面站在田边，扯着那根系在桶上的绳索，一俯一仰把水一桶一桶从沟里岸到田里。病刚好的哥哥，早晨只喝了半碗野菜糊糊，这时觉得耳朵里嗡嗡响，两眼发黑，浑身打颤。爸爸见他脸色不对，连忙叫声“歇气”，走过来扶他坐下，问他哪里不好。

哥哥说：“没有不好。”叫他回去休息，哥哥说：“戽水要紧。”爸爸叹口气，摸出烟袋烧烟。“八字眉”狗腿子摇着蒲扇从那边过来了。不知哪家的鸡又遭了殃，你看他边走边挑牙缝。“陶化，享福啊！你听明白，就是庄稼无收，租子也是颗——粒——不——少。那天张乡长说，越闹灾荒，越有名堂，只要下个手，穷骨头砸得出油。”“八字眉”说罢，摇扇打扇，大摇大摆地走了。哥哥一下站起来说：“戽水喽。”爸爸迟疑一阵，长叹一声，走过去拉着绳子那一头，两人又一俯一仰地戽起水来。白花花的溪水倒进田里，萎蔫的庄稼慢慢苏醒了，舒服地伸起了腰，微微摆动着。哥哥突然感到天旋地转，只来得及惊叫一声“爸爸，丢……”就一头栽到溪里。爸爸好不容易才把他背回家里。半天，哥哥睁开了眼睛说：“我只觉得心头慌……”妈妈跑去邻家要来一个野菜粑，掰了一块放进哥哥嘴里，还没有咽下肚，只见他眼睛往上一翻，头部无力地向旁边一倒，就永远离开了我们。不久，我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也相继被饥饿夺去了生命。

地主的心肠比蛇蝎还毒，我们苗家的灾难比牛毛还多。正当我成了家里的一个得力人的时候，何肖氏串通乡长张召南抓我的壮丁来了。一天，保长肖聚林闯进我家，对爸爸说：“你家友安中签了，叫他收拾一下，七天内到乡公所报到。”爸爸听了大吃一惊，许久才回过神来：“保长，我那友安才十六岁呀，这……不够壮丁年龄啊！”肖聚林冷冷地说：“那不关我的事，这是上边的通知。”“上头叫咋办我就咋办，既然抽到你了，你就犟不脱。拿不出人来就拿钱去抵。”

“拿钱？”爸爸感到奇怪，随即问了一句：“要拿好多钱？”

“三千元买一个壮丁。你出钱，乡上可以代你买。”

“哦！”爸爸象明白了什么，一屁股塌在本墩上，半天没有动弹。他想得很多，要是没有这孩子，一家老的老，小的小，往后的日子就不用过了。再说才给友安娶了亲，小两口挺和气。当壮丁是个啥结果啊！对门侯二顺去年被抓去，半路上官长打断了他的左腿，至今还躺在床上；同时被抓去的陶三星，还没有出川就被活活折磨死了。怎能让友安去送死啊！不能，决不能。可是三千元又在哪儿出呀！没有钱，狗乡长是不会放过我们的。左思右想，爸爸决定还是走借债这条路。

爸爸跑了几几天几夜，找遍了亲戚朋友，凑得一千元钱，拿到保长那儿。保长接过去数了数，隔桌子就甩了转来，板着铁青的面孔说：“哼！一千元。我不是给你说了吗，这是上头定的价，三千元，三千元，你懂不懂？”

“保长，实在借不到呀，你行行好嘛。”

“行好？我行不了这个好。只有两天期限了，你自己看着办，到时候不要怪姓肖的。”稍停，肖聚林又说道：“嘿嘿，借不到？找你主爷孃嘛。”

爸爸回到家里，长吁短叹，想到只有两天时间了，明知何肖氏的债不好背，也只得睁起眼睛跳进这个火坑。

三千元装进了乡长、保长的腰包。何肖氏放了一笔阎王债。可是官僚、地主的胃口是永远填不满的。从这次起，年年都说我中了签。家里负了重债，一家人流着泪把仅有的一条黄牯牛也卖了，帐还是还不清。眼看陷入了绝境，这年的壮丁又落到我头上。我们再也没有东西拿给这些豺狼了，我只得跑到望乡台山顶上的一个岩洞里藏起来。保长上门要人，几次都扑了空，竟把我六十多岁的爸爸抓到乡公所吃刑法，还扬言：“抓不到陶友安，就把他

爹送到县里去。”

我在山洞里住了十几天，带来的几个菜粑早吃完了。白天就梭到山上掘点野菜，晚上，一个人在岩洞深处守着火堆。饥饿、担忧折磨着我，想着六十多岁的老父老母，幼小的弟弟，正怀孕的妻子，一岁、三岁的儿女。我怎能离开他们啊，必须回去。一个大雾迷漫的傍晚，我梭回家里，正商量如何救出爸爸，料理生活。一群如狼似虎的乡丁扑了进来，把我五花大绑地抓走了。

破茅屋里，哭声震天，我母亲哭得死去活来，第二天便滴水不进。第三天，我爸爸拖着伤痕累累的身子回来，可是我的母亲已经含恨撒手去了。

在饥饿和悲哀的煎熬中，我妻子生下一个不足月的婴儿，不到三天，她母子双双惨死。我大的那个儿子不久也饿死了。短短几年间，万恶的旧社会，凶狠的地主、官僚、恶棍残害了我家八条生命，弄得家破人亡。那时候，真是：

望乡台上雾漫漫，
苗家苦难说不完。
种田的没有饭吃，
绩麻的也无衣穿。
天灾疾病年年有，
更有抓丁虎狼捐。
当牛作马难活命，
十有九家断炊烟。

.....

三

革命的疾风暴雨迅猛异常，肖聚林、何肖氏、张召南等丑类哪能阻挡革命的洪流。一九四八年底，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打响了。被强迫拉进国民党反动派部队的我，一个备受折磨的苗家儿子，终于投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怀抱。从此，我在党的领导下，成为一名光荣的革命战士，为了我们苦难深重的苗家，为了千百万受剥削压迫的阶级弟兄，为了崇高的革命事业，勇敢战斗。一九五〇年七月一日，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这是我永远难忘的一天。一九五一年，为了支援横遭侵略的朝鲜人民，为了保家卫国，我离开了祖国，踏上打击侵略者的战场。在战场上，我光荣负伤，后来成了残废。

一九五五年，我复员了，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——望乡台。啊！变了，家乡变了，苗家血泪斑斑的望乡台变了。这究竟是不是我的家乡？那磅礴的山势，那山脊上衬着天幕，怪兽剪影似的巉岩，那盘山古道……这些多次出现在我梦中的景象，分明就在眼前。那一层接一层的绿油油的梯田，彩带样的绕山渠，粉墙青瓦的幢幢房舍，尤其是那爆发出阵阵儿童读书声、歌声、欢笑声的学校……这哪里是我记忆中的望乡台。这些是我那时做梦也不敢想的啊！爸爸好象比九年前还年轻了，深情地对我说：“老二啊！没想到我们还有今天。这都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给我们带来的啊！要是你妈妈他们几个还在，那该多好啊！他们没有过一个一天好日子，使人想起这些来肝肠都要断啦！”

一九五六年，望乡台建起了高级社，一九五八年实现了公社

化。道路越走越宽广，我们越干越起劲。就在公社化的这年，那在柿子树下挨过何肖氏毒棍的友兴弟弟被批准入伍，胸前红花映着他的笑脸，男女社员敲锣打鼓，吹起悠扬的芦笙，把他送到区里。

山乡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农田基本建设，农村面貌起了巨大变化，在望乡台顶上，我们经过一番努力，又修起了一座水库。看管这水库的任务，到底被我排除了很多“干扰”争取到手了。每天，我扛起锄头，绕水库检查一周，就开始一锄一锄，一筐一筐给堤坎培土。天天如此，年年如此。我要让这水库一年比一年蓄更多的水，要让这水流向更远更远的地方，灌溉更多更多的土地。同时，也让美好的歌声响得更远更远……

望乡台上苗寨美，

泉水淙淙松杉翠。

秋来阵阵稻谷香，

月夜声声芦笙醉。

歌唱今天望乡台，

不忘苦难旧社会。

日子越过越香甜，

民族团结万万岁。

三代“蛮娃”三代仇

熊 国 金

在旧社会，我一家三代都当过“蛮娃”。这“蛮娃”，是那时汉族地主对苗族小长工的一种侮蔑的称呼。当“蛮娃”的苦处，真是几天几夜都说不完。

我爹说，清朝末年，古蔺地区闹旱灾。我们袁家沟一带，田土龟裂，野地生烟，草根挖尽，树皮剥光，田边路旁死尸狼藉。再也看不到茅屋上的炊烟，只有盘旋低飞的乌鸦、两眼通红的野狗在争食路边的尸体，时时发出阴森森的聒叫声和猎猎的吠声。

爷爷那时只有八岁，家中就剩下他一个人了。他身披破麻片，手提一个砂锅，只身离开袁家沟，走上了逃荒的道路。那时候已是严冬，北风呼啸，雪霰满天。爷爷走不动了，用草绳把砂锅吊在脖子上，双手着地，在雪地上爬行，脊梁上都铺起了一层白雪，辗转来到石板田，已经是大年三十了。地主老财正张灯结彩，美酒肥肉度年节。爷爷讨得半碗包谷和几叶青菜也算过个年。

开了年，我爷爷进了石板田大地主赵志高家当“蛮娃”。

爷爷有了个落脚的地方，心想日子将会好过些。那晓得开头一天，赵志高把爷爷叫到面前，横眉竖眼地说：“熊吉三，今天起你就是我家的蛮娃子了。先交五十只羊给你放，早晨晚上要扫地抹桌端汤送水。少了一只羊，我剥你的皮，好吃懒做，我打断你的腿。”

爷爷每天天开河口^①就得起来，打扫干净羊圈和赵志高一家的住所，然后赶着羊群上山；天黑回来，还得侍候赵志高一家老小洗脸洗脚，端汤倒水，累死累活，稍不如意，不是打就是骂。

一天，爷爷正要赶羊上山。地主家么少爷挎个书包，站在门口望着泥泞的道路发愣，见了爷爷，他把手一招：“喂，熊吉三，揹我上学去。”爷爷想，你十多岁的人了，长得肥，穿得厚，站起蹲起都是一大砣，我一个八、九岁的瘦小个，怎能揹得动你，便说：“我要放羊。”狗崽子大怒，骂道：“你这苗杂种！老子叫你揹你不揹，等我告诉老爷，看不把你苗骨头捶绒。”我爷爷听他骂得太毒，也回骂他：“好个野杂毛，你爹欺负我，你狗日的也要欺负我！老子今天就是不揹你。”边骂，边赶羊上山去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爷爷正在打扫羊圈。赵志高几步跨过来，凶神恶煞地说：“熊吉三，你数一数我的羊还有多少只？”爷爷正愣神，狗地主在栏栅上抽了一根刺棍，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打，边打边骂：“交给你的羊子为什么少了五只？”当时活蹦乱拱的羊子一下难数清，可怜爷爷直被打得死去活来，还得一蹶一瘸上山去放羊。后来，长工大哥告诉爷爷说：“小弟，你放的羊子没有丢啊！”

苦难的岁月，一年一年过去，爷爷已是十六、七岁的人了。秋去冬残，看看又是年关。爷爷想，从娘肚子落下地就没穿过一根新纱，在这里放羊八年了，总可将工钱买块布缝件衣服了吧，于是去找赵志高说：“大公^②，我在这里七、八年了，请给算算

^①天开河口，即刚天亮的时候。 ^②大公：当时苗族佃户对地主的泛称，即大爷的意思。

工钱，我想缝件粗布褂子过年。”头戴六瓣缎子瓜皮帽，身穿黑色长棉袍，两眼眯成一条线，面团颈粗，活象头大肥猪坐在太师椅上的赵志高，瞟了爷爷一眼：“嗯，熊吉三，你吃老爷这几年饭，骨头长硬了不是？你还想得怪哩，我没有找你算账，你还找我算起账来了。”“老大！”他扭头喊了一声，“把账本拿来。”赵志高翻开账本，边指边说：“熊吉三每年工钱三吊。第一年丢失羊子五只，第二年损失八只……每年伙食钱……两相抵销，尚欠三吊。”爷爷不识字，在阴暗的厅堂里，只看见账页上红黑驳杂，那分明是穷人的血。拚死拚活干了八年活，倒欠三吊！爷爷实在想不通，收拾起全部家当——一根秧毡①，一个沙锅，满怀悲愤地走出了赵家大门。

这天中午，爷爷来到河坎上②，眼前一座四合头的大瓦房，朝门大开，里面传出嗡嗡的人声，飘出阵阵酒肉气味。爷爷走近朝门口，探头向里看去。冷不防被一个家伙走过来一把抓住，厉声说：“走，三老板叫你。”不等爷爷回答，已被拉到正厅阶檐坎下。厅堂里踱出一个穿绸着缎的人来，他手捧水烟袋，翘起拿着半截纸媒③的那只手，指指点点地问：“你是赵志高家蛮娃子？”爷爷点了点头。

“你偷走他家五匹小布，三套衣服，拿到那里去了？”

爷爷愤怒地回答：“我人是穷，从来还没有干过那些事。”

“赵志高四处放信捉你哩，你别怕，只要给我骆润堂当蛮，保你无事。”爷爷明白了，这是诬陷，是威逼，是圈套，但哪有说话的地方呢，且住下再说，便答应了。

①秧毡：用裁剩的秧子或秆杆编织成的被盖。 ②河坎上：小地名。 ③纸媒：烧烟用的纸捻子。

骆润堂同赵志高一样狠毒。爷爷帮到十一年上，说了一门亲事。骆润堂把爷爷叫去，做出十分关切的样子说：“熊吉三，你已经三十来岁的人了，我也望你成个家。懂不懂？我们汉家有个规矩，叫做‘宁可停丧，不可停双。’就是说，在自己的屋子里任何外人，即使是亲戚，也决不能让他夫妇在这里同房。你要娶亲非得找个房子不可。这事么，我不成全你，谁成全你？我有一间草房，离这儿不远，就把它租给你。你十一年的工钱用做押金还要差点，看在主仆情分上，那就算了。你结婚后，两口子好好孝敬孝敬老爷就是了。”那是间什么样的草房啊？茅草棚棚篱笆门，风吹雨打难住人。十一年的工钱还不够？！又有什么法子可想呢？爷爷就在这草棚里成了家。从此，祖母接替爷爷担起了骆润堂家的杂活，爷爷则一年到头给他家当轿夫。

祖母终年如牛似马惨遭地主的折磨，不到十年时间就得了一身重病。骆润堂怕她死在他家里，腊月十四，硬逼爷爷把奄奄一息的祖母背回破茅屋里。那时，爹已八岁，还有三个兄弟，全靠爷爷、祖母带点残汤剩饭和爹爹讨乞维持生活。家里米无一粒，钱无一文。祖母背回来放在床上——潮湿的地上垫几把谷草，放一根秧毡，这就是我们的床——爷爷半句话没说，背靠墙坐在地上，两手抱着头，只是叹气。爹四弟兄，一个个瘦猴样，围在祖母身旁。雪从破屋顶飞进来落在祖母身上。忽听得祖母微弱的声音：“大兴，我冷呀，把秧毡给我搭上来点。”一阵呻吟后，又说：“大兴他爹，我想吃药呀！我不能死呀！我去了，你们的日子更难呀！”爷爷不做声，却再也禁不住那眼泪簌簌洒在面前的谷草上。外面传来阵阵鸟噪声，屋里光线暗下来，天已黄昏了。祖母忽又挣扎着说：“我也糊涂了，家里哪来钱吃药呀！大兴他爹

你去搞点苦楝树皮来熬给我吃，我心里火烧一样地难受呀。”爷爷跌跌撞撞冲了出去。骆润堂的狗腿子突然来到门外吼道：“熊吉三，熊吉三！明天一早抬三老板去镇龙山哟。”天黑了，爷爷端来了苦楝树皮水。祖母边喝边断断续续复述了那狗腿子的话。爷爷说：“大兴他娘，我怎么忍心丢下你。这一去再快也得四天，我不在眼前，你……”爷爷说不下去了。外面的雪下得更紧，打得包谷杆编的壁头唰唰作响。祖母又慢慢说：“大兴他爹，你还是去，三老板不是好惹的呀！你在家也救不了我的命……”爷爷跌坐在祖母脚边，心里发闷：“同样是人啊！为什么穷人这样苦？生不像生，到死还捏在老财的手心里？”远处鸡啼，爷爷猛地拭去脸上的泪痕，朝骆润堂家走去。

爷爷走后的第二天，祖母已是滴水不进，躺在床上昏一阵，醒一阵。突然她伸出瘦如柴棍的手向周围摸索着。爹走过去问：“妈妈，你好些了吗？”祖母已不能说话了，直把手指向屋外，两眼透过破窗盯着那渺茫的天边。

腊月二十，爷爷急急忙忙回家来了。一进门，看见祖母直僵僵地停放在垫着几把谷草的地上，爹四弟兄围着哭个不停，爷爷跺脚捶胸，嚎啕大哭起来。

家里生活更艰难了。爷爷忍痛让二爸去古蔺甘家当“蛮”。三爸去蔡家沟罗家当“蛮”。爷爷恨透了骆润堂，死也不愿进他家门，打算带着我爹和么爸出外帮人。不料还没有来得及走，骆润堂听到风声，立即派狗腿子来我家，说我们欠了他房租五十吊，哪能一走了事。爷爷怒不可遏，跳起脚骂道：“三老板，骆润堂，你还有点人心没有？我熊吉三家帮了你二十年，穿的身上，吃的肚里，人都累死囉，还说我欠你五十吊钱，我二十年的气力喂狗

啦！”来人见爷爷怒气很大，改口说：“你要走，也得把这个大点的孩子留下，你有话自去找大公讲。”一个狗腿子过来抓住我爹。“找骆润堂讲？骆润堂不懂人话！”爷爷无法，牵起小么爸边骂边走了。

正是大年三十，爹被抓进三老板家。骆润堂听几个狗腿子一说，拉过一根马鞭就给我爹一顿乱打，边打边骂：“你家那块老苗骨头还硬，今天先给你这个小苗骨头一个下马威，你是老子五十吊钱买过手的蛮娃子，懂不懂？”爹被打得滚去滚来，始终咬紧牙关不哭一声。

爹在骆润堂家，成天闷声不响，停下活就想祖母，想远走他方的爷爷，望着层层山峦出神。爹从没有叫过骆润堂一声大公，碰着他就绕开，有时爹那眼光叫骆润堂见了打寒噤。一次，骆四少爷从高坎子上跌下去摔伤了，却怪爹掀的。骆润堂给爹一顿毒打，爹照样是打死不哭，打死不说。骆润堂打得气喘嘘嘘的时候，发现爹那脸上突然闪过一丝平时从来看不到的笑影。骆润堂受不住了，给爹说：“熊大兴，老子看见你就心烦。你做的活还不够你的伙食，算白养活你五年。生就一副舅子命，要当姑爷万不能，你还是走你讨口要饭的路去。”爹头也不回地迳直走了。

“你骆润堂咒我讨口，老子偏不讨口。”爹气愤地说。以后，他一边帮人打短工，一边寻找我爷爷。来到中坚埭^①打听到爷爷两年前死在这里，么爸不明下落。

三老板家的老长工杨老么很同情我爹，他多方设法，人托人把我爹介绍到河坎上老财赵华丰家帮长年。赵家排场不如骆家大，

^①中坚埭：小地名。

对穷人则是一样的刻薄。他家伙食分三等，赵华丰两口子吃净大米的雪花饭；少爷们吃大米、玉米混合的所谓桂花饭；长工们吃的是糠面、秕壳、蕨根和菜。有年冬天铲田坎，一清早，赵华丰发给每个长工两个蕨根拌豆渣做的粑粑，就催下田干活。爹把粑粑揣在怀里，心想等下再吃，免得像往天肚子熬不到下顿饭就饿得难受。谁知由于衣衫烂朽，下田铲了几锄，“咚、咚”两声，粑粑落到水里去了。豆渣粑落水，真是干瞪两眼，捞也捞不起，就这样直饿到天黑。

为了把再不能蔽体的衣服换过，爹在十分劳累中，还起早贪黑，采集了一筐木瓜，去场上卖得三个毫子，回来交给赵华丰，托他买截小布。赵华丰满口答应了。事过几天，赵华丰十分生气的样子找我爹说：“你害了我啊，那几个毫子是假的，我险些为这吃了官司。”也不知他说的是真是假，总之，爹爹多少血汗又白白流走。

在赵华丰家再住不下去了。爹辗转来到流砂岩，在一些穷朋友帮助下，佃了赵子明两石租子的土地耕种。这是一九一八年的事了，在这期间，爹有了一个家。

当长工难，当佃户也难啦。爹和妈一背太阳一背雨地做活，总是交不够地主的租。妈妈被迫去古蔺城周围卖短工，一去就是三年。我爹退了赵子明的佃，四处流浪，找一碗，吃一碗，哪里黑哪里歇。幸好穷朋友们帮助，爹学得一手吹唢呐的技艺，每逢人家婚、丧、寿、节就同一班吹手去卖艺。平时则帮点短工，慢慢挣出了一个眉目，才把在苦难中煎熬的妈妈找回来。爹把千辛万苦积攒起来的一点卖艺钱，再找一帮吹手借一点，向赵子明佃了石屹闹的几石土地耕种。就在荒山上，土地边的一个猪嘴窝棚里，我

出世了。爹照常有时在家种地，有时外出卖艺。爹爹的唢呐渐渐吹出了名，那激越的声音，有时高昂尖锐，有似振臂疾呼，有如射向老财们的支支利箭，点燃起穷人的万丈怒火；有时旋律舒徐，音调凄婉，似在诉说这人生的苦难，倾泻穷人心里的哀怨。

我八岁那年，有一天，地主婆赵何氏做生，硬要把我爹拉去吃寿酒。“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总是没有安好心，去就去罢，看他搞个什么鬼名堂。”爹想着，大步跨进了地主的门。狗地主赵子明皮笑肉不笑地打招呼说：“熊大兴你来了！你来，一则给你么婆祝寿，二来有件事给你商量。”

果然，名堂来了。爹直视着长有一个蒜头鼻子，一张猪一样的翘嘴巴，两眼闪着凶光的赵子明，说：“有话你只管说嘛。”

赵子明“嗯”了一声说：“你两口子种我的地，你不时还要外出吹唢呐，为了减少你的拖累，加之我家也缺个佣人，把你那小崽熊国金弄过来跟我做算了。穿的吃的都比他在家强。这真是两得其便的事……”我爹越听越气越恨，千仇万恨涌上心头，不知他后面还说了些什么，直到“你儿时叫他过来”这句话跳进耳里，爹才从沉思中醒过来，强压住怒火冷冷地说：“这事还得问国金妈商量。”掉头就走了。

回到家里，爹提起这桩事，有如晴天霹雳震撼着妈妈，多少往事浮上她的心头，辛酸、悲痛、深仇大恨交织一起。妈妈坚定地说：“国金他爹，孩子不能去！要死也死在家里，死在一起。”正在这时，狗腿子闯上门来要人了：“熊大兴你两口子商量好没有？大公叫我来要人囉。”

妈妈虎地站起来，一把将我拉在身后，厉声说：“我的小孩不让他离开我，要老命有一条。”

狗腿子张牙舞爪说：“别不识好歹，老子是奉命而来，拉也要把熊国金拉去。”这时我在妈妈身后高叫道：“我就是不去。”狗腿子冲过来抓我。爹见这情景，再也按捺不住怒火，顺手摸过柴刀高高举起，怒吼一声：“你敢动手，老子劈死你！”狗腿子吓得脸发黄，打着哆嗦夹起尾巴走了。赵子明并不死心，但在倔强的我爹面前也只得略作让步，后经多少人从中周旋，要了许多手段，议定我每年给他家服三个月的劳役。这样，我又是第三代沦为地主的“蛮娃”。

每年这三个月，狗地主不放松我一天半日，总想把我的血连骨头里的油也吸干。记得我十二岁那年，赵子明给我定的三个月活路是：措够他全家一年的用煤。狗地主家住在海拔一千五百多米的大山上，全家十几口人，一年大部分时间同时烧三炉煤火，要多少煤才够啊，一斤一两都要我去二十多里远的袁家沟措回。那年头，产煤地的农民都是利用冬闲挖点煤卖，除了冬季是买不到煤的。十二岁的我，每天不见亮就起身，披着几块破麻片顶风冒雪，在山路上行走。那雪把小路掩盖了，一失脚就要跌下深涧。逢上下凌那就更难了，莽莽山野全是玻璃的树，玻璃的草、玻璃的路，矮小茅屋前一排排上粗下细的冰棍，从屋檐直拄地面。严寒把雀鸟也不知赶到那里去了。周围一片静寂，只不时有冰枝冰草的断裂声。我措着一大背煤炭，溜溜滑滑行走山野间，开始还有点汗出，头上冒出热气。逐渐，早上吃进肚里的一点豆渣蕨根粑消化尽了，只觉得寒气袭进心里，血液都快冻结了，心慌气短，头昏目眩。有时几步坡路也要挣扎半天才上得去，往往上去一步，滑下来两步，跌在地上，桐油凌^①又滑又硬，一身骨头都

^①桐油凌：路面结冰，滑得象抹过桐油一样。

摔疼。我光着的双脚上冻裂无数血口，每一用力，血口撕大，痛得钻心，一步一步，殷红的血印在洁白的雪地上。

已经挨近年关了，好容易回到家里。妈见我折磨得不成人样，一面换下我血糊糊的衣服，一面安慰我说：“国金，总算又去一年了。不得好死的赵子明不把我们当人，总有一天他要遭报应的。我们那头猪已有百多斤了，那天我同你爹商量，我们祖祖辈辈没有杀过过年猪，今年破个例，过几天把它宰了，好好给你吃几顿。”在妈妈身旁，我的心欢快地跳动起来，拉着妈妈说这说那。我说：“妈妈，有天晚上，我在赵子明家马房楼上做了一个梦，正梦见我们家杀猪过年。妈妈，梦可灵验哩！”

那知就在这时候，由地主婆赵何氏出面，估倒要加我家的顶首^①，硬把猪儿抬走了。

一天，爸爸外出吹唢呐回来，狂喜地拉着我的手说：“国金，国金，你妈在哪？”妈妈闻声从屋后出来，爸爸一把也拉起妈妈的手说：“解放了！解放了！毛主席共产党的队伍来到古蔺了！”不久，工作队进了村，我很快学会了“苗家要出头，摆脱那苦和愁……”的歌子，成天不离嘴地唱着。

解放了，我们一家在共产党、毛主席的领导下，同汉族佃户一起，斗倒了地主，翻了身，作了主人。一九五六年，我这个旧社会备受欺凌的苗娃子，光荣的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，还担任了龙美公社付元大队党支部书记。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，我们苗家以主人翁的姿态，同兄弟民族团结战斗，努力建设新山区，日子越过越香甜。

^①顶首：在古蔺一带喊押金叫顶首。

从吊绳上活过来的人

李成武

解放前，这牛心山一带的庄稼人全是云庄大地主、大恶霸曾庶藩的佃户。我爹和么爸是做庄稼的老把式，我和弟弟老棒与么爸家老宗那时也正是得力的时候。由于我们的血汗不停地浇灌，荒地变成了熟土，薄田变成了肥田，地里的粮食一年比一年出得多。可是，哪够得上曾庶藩的地租加得快？我们家的日子一天比一天艰难了，到头来家破人亡，逼得我投环上吊。

无情的地租，压得爹喘不过气来。他老人家枯瘦如柴，整天愁眉苦脸，闷声不响，常常遥望着云庄的上空出神，两眼象要喷出火来。

一九三〇年，爹一病不起。我们一家人守在床前，声声哭着。爹慢慢睁开眼睛望着么爸说：“你要照看我那两个娃娃。”又转身对着妈说：“他喃^①，苦了你啊……”妈妈伤心得乱扯着自己的头发号啕大哭。忽然，爹举起手指着墙上破烂的牛肋巴窗子，两眼发直，震颤着病弱的身子叫道：“曾家加租的人从那里进来了。成武、老棒，拿起扁担来给我把他狗日的打出去……”山风呼呼从破窗子吹进来，天阴沉沉的，爹饱含着对地主的深仇大恨永远离开了我们。

^①喃：苗语，妈妈。

爹死后，日子越发艰难了，接着又遇上灾荒，不几年，我母亲、幺婶和幺爸家的小兄弟先后饿死。我弟弟老棒和幺爸家老宗又被拉了壮丁，一去杳无音讯。这时幺爸越渐衰老，我开始当家。

一天，甲长派人来说：“云庄下来了人，叫你去一趟。”

走进甲长家，曾庶藩的狗腿子马占成正同甲长在那里喝酒。见我进去，马占成转过脸望着我说：“李成武，大老爷传下话来，加你二十万元顶首。”

我说：“这年头，家里的人死的死了，拉的拉走了，我还没有理上路，哪来的钱啊！”

马占成放下手中的酒杯，把背在身后的手枪挪到前面来抱在怀里，鼓起眼睛撇撇嘴：

“不要哭穷，管你上路没上路，识相点好。三天内交不清，我派人来催。”说罢便扭过身喝他的酒去了，把我忘了似的。

曾家那支催租催债的队伍，开到哪家，那家就倾家荡产。十几个有时几十个人一来，就大摇大摆地住下，见啥吃啥，见啥拿啥，见猪就杀，见牛就牵，奸淫掳掠，刑讯勒索，无恶不作，每人每天还要烧几盒大烟。起身时把账一算，老账分文无减，又增加一大笔新账。他们跟土匪一样凶。“派人来催”，话虽一句，就如同把刀搁在我一家人的脖子上。强压怒火强忍泪，我把牛出卖了，又承认加五的利息，人托人借了点钱补足，才把这忽然从天上掉下来的横债偿了——我心里恨透了曾庶藩。

可是，对曾庶藩的“债”永远也偿不清啊！接二连三的加顶加租，逼得我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那年头，我们都是提心吊胆地熬着日子，“曾家一声传呼，不失牛也要抬个猪。”偏偏曾家又点到我头上了。他哺象生离死别一样把我送出家门，连连叮嘱

“不管怎样，早点回来。”

到了云庄，师爷曾永三出来见我。他摘下鼻梁上的眼镜用手绢擦着，一面装做商量的口气问：“你家做的地方有人要做，你愿加租还是愿把地方让出来？”还说：“老爷念你是老佃客了，才把话说清楚，让你自己选条路走。”

我一听，象冷水浇头，一直凉到背心，眼泪涌出来又被怒火烧干。我盯着曾永三说：“曾师爷，你先生想想，二石五斗租在我爹手头就加成了三石五。我爹累死了，轮到我手里，又加了五斗。你们还要加，这日子叫我们怎么过？”

曾永三避开我的目光，不耐烦地说：“这是老爷的意思，你跟我囉嗦有啥用？你要不做，我只好禀过大老爷，你尽管搬起走！”

“那我就找大老爷说说。”我提起脚朝内厅走。

两个狗腿子把我拦住，连声吆喝：“不准乱拱，芝麻大点事也想见老爷！”

我气得浑身打颤。曾永三转了个弯：“李成武，念你是老佃，给你留个余地，回家去商量商量，明天扯回销。”

我从曾家出来，只觉得天旋地转，心里有无限的委屈，燃烧着万丈怒火：“曾庶藩，曾庶藩！你长的是狼心，是狗肺，你吃人不吐骨头。豺狼虎豹都打得尽，你加租加顶没有个尽头，你比豺狼还狠毒啊！”我心里发愁：不做地方我们吃啥？逃离云庄吧，哪里又有我们安身的地方？哪里的财主又不张着血口吃人？这个鬼世道，我们怎么活下去啊！

我昏昏倒倒回到家里，只觉得耳朵里嗡嗡响，心里象一团乱麻。孩子他喃端上饭来，我一推，就躺在床上，但怎么也没法入

睡。她猜出了几分，关心地问我：“娃娃他斋，你怎么不说话啊？是不是为了加租的事？”我本想瞒着她，让自己一个人承担这个打击，但想想这也办不到，经她一问，我怒不可遏地说：“狗杂种又加我们的租，问我愿加还是愿走。”

孩子他喃伤心地低下了头，又仰起满是泪痕的脸劝我：“他斋，加就加吧，拖儿带女的了，不做地方往哪里去讨口？”

第二天，我被两个狗腿子押到云庄，估倒打了手印，硬加了租粮五斗。

加租没有个数，云庄的昧心账就更是个无底洞，想什么时候算就什么时候算，算多少就是多少，非把你整得家破人亡不可。

一九四四年的年关，有钱人家正忙着杀猪宰羊，煮酒，春汤元面^①，可我们连包谷面菜糊糊都是有上顿没下顿。偏在这时候，曾庶藩的狗腿子马占成把我叫去说：“大账小账，三十晚上。你还欠有租呢！”

我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，一时找不到恰当的话，又气又急地说：“我今年的租子不是交清了吗？”

马占成吼我几大声：“今年交清，你去年交清没有？黑字写在白纸上，未必还有假？”

掌柜何青云坐在一旁，指缝里夹了一支笔，他翻翻簿子，敲得算盘“嗒嗒”响，口里神唸鬼唸：“二斗三，三斗二，五斗五。”然后抬起头望着我：“李成武，你尚欠租一石一。”

我的天啦！我不识字也不会记数，他说一石你不敢说九斗。逼得没法，把过冬粮背去交了还是不够，只得含着眼泪被迫接受一

^①春汤元面：古商一带汤元面不用磨子推，而是用石碓春。

斗还两斗的重利，到处去借。东挪西借还是交不齐这昧良心的租外租。第三天，曾家来了两个狗腿子坐地催收。一个是马占成，一个姓刘。他们一进屋坐在凳子上就哈欠连天，眼泪鼻涕长流，二话不说，连喊“拿烟来，拿烟来，老子瘾发了。”我们正没好气，家里的一条黑狗摇头摆尾进来，打个旋就要在我女人脚边睡下。我女人狠狠一脚踢去，骂道：“你这餓不饱的瘟狗，滚出去！”姓刘的狗腿子一下站起，呲出两颗金牙，正要发火，见是骂狗，又一屁股坐下去，直喊：“拿烟来。”

我说：“我家锅盖都揭不开了，哪有烟啊！”

马占成从怀里摸出个骨头盒子，拈出两粒羊儿屎一样大的烟泡子，给了姓刘的一粒，转过来望着我说：“半升米一颗，在你家吃了多少，都算在你的账上。”

烟泡子吞下去，他们的精神来了，又吼又骂，房间里翻一阵，又去捣檐坎上的鸡笼。隔不多久他们又象吞了回烟泡子，也不知是真是假。逼得我实在没法，只得把一家人挨饿才保下来的一头牛牵去抵了。

庄稼无牛空起早。由于没有牛，人家的土犁完了，我家的土还是一块板。好在我还会点木工活路，到处帮人装犁头换牛工。苗家汉家同胞一下子牵来几条牛，总算转换着把土犁完，下了种。

一九四八年，曾庶藩住在古蔺城里，派我措粮去。回来时，他叫我带封信给何师爷。我在回马司途中，碰上了曾庶藩的小老婆。她在滑竿上坐起问我：“你是措粮进城的？大老爷带得有什么回来没有？”我说：“有封给何师爷的信。”她拿去撕开看了又还我，并说：“到了马司，立即交给何青云。误了事，我撕你的皮。”

第二天，何青云派人把我从家里抓去，突如其来地问我：“李成武，你愿挖目宰手，还是愿罚？”我摸不着头脑，只好说：“师爷有话明白说，你吼些啥子啊！”

“吼些啥？送信是这样送的吗？信为什么撕开了？”

“你师爷灯笼高挂，信是太太在路上撕开看过。我大字不识一个，撕它做啥子？”

何青云不由分说，一个劲地要罚我，当即把我扣留下来。

就在我被私刑监禁的那天，一群狗腿子硬拉走了我家后来拚死拚活养起来的一头牛。在那个时候，天是财主的天，地是财主的地，衙门是财主的衙门。我们穷人是有理三扁担，无理扁担三，有苦无处诉，有冤无处申啊！

拖了一身债才喂起的牛被抢走了，家里的日子更加艰难。么爸忧愤交加，老年人怎经得起这接二连三的打击，便被活活气死了。家里一口薄棺都办不起，只好用柏树椴枝裹住么爸，相帮的穷亲友在山包上砍了根杉树儿做杠子，抬去埋在我爹坟边。

没过两天，狗腿子刘步云霄天风火地把我抓到云庄，劈头一阵大骂：“李成武，你好大的狗胆，公然砍起老爷的树子来了。”

我说：“人死要埋，下葬要抬。我么爸给老爷当了一辈子佃户，用根小杉儿有好大个事？”

刘步云一拍桌子：“呸，看不出你的嘴还这样硬，非罚你八十万元不可，少一个也不行。”

我不服。他们把我吊起打。打死我也不求饶，一直把我折磨到天黑才放回家。当我拖着伤痛的身子走出云庄大门时，刘步云一个劲地吼道：“李成武，识时务点，按时把八十万元交来，迟一刻，少一个，有你一家吃的苦头……”

天旋地转，冷风飕飕，天是那样的黑，云是那样的稠。我不知是滚还是爬，好不容易才摸回家。孩子他喃见我一身血污，便一下惊呆了，等她回过神来，忙问我：“他斋，出了什么事啊，你怎么不说话？”

我躺了好一阵才回过气来。我说：“他喃，为了那根小杉树儿，被他们吊打，被他们敲榨，罚我八十万元。我实在找不出这笔钱。你们拖得走，好好带着几个娃娃……我去找我自己的路……”

孩子他喃又是愤恨，又是伤心，又是耽忧，揪心裂肺地哭道：“他斋，万万寻不得短见，万万不要乱想啊！天打雷劈的曾庶藩总有个报应，我们的苦日子总有个尽头。”她哭着，又忙给我端汤送水，调护我的棒伤。

这一夜我想得很多。爹死时的惨景，又出现在我眼前。他老人家吃了一辈子的苦，一心一意要让我们过两天好日子。哪知道他至死没有办到，我也没有办到。我们的血汗都流到哪里去了，这难道是我们命中注定的吗？我想到他喃和幼小的娃娃，我要是死了，他们孤儿寡母怎样过活啊？我眼前又出现了他们讨口要饭，风雪中奔走在山路上的情景。我不能忍心丢下他们啊！我不能一死了事啊！可是，我要是不走绝路，家里猪牛都被敲光了，粮食颗粒净无，两手空空，借无处借，躲无处躲，逃无处逃，交不出钱抓回云庄，又将受多少屈辱，多少毒刑；不明不白整死了，孩子他们一样没人管啊！云庄整佃户的刑法，谁个不知，哪个不晓，岂止吊打，还有戴桐油草帽、揸火背篋、踩杠子、刁脚筋、猴子搬桩、仙人指路、灌水葫芦……多得数不清。把人整死了，拖到癞子岩深洞一丢了事。我越想越恨，一股怒火从心头燃起。我欠身

摸摸床头的捞刀，心想乘夜去同曾庶藩拚了。可是伤痛的身子不听使唤。万恶的世道，万恶的云庄，硬把生路给我断绝了。

天亮了，孩子他喃见我好象平静了些，叫大娃侍着我，喝了碗菜糊糊就挖地去了。这时候，天空乌云低垂，把牛心山都遮去了半截，冷风细雨从破窗口扑进来。我继续着彻夜翻腾的心思。抓住窗棂，忍着浑身剧痛，我撑起身子，隔窗目送他喃。晨风吹动她早白的蓬乱的头发，破衣烂裳一片片一缕缕在风中颤抖。我一阵心酸，眼泪扑簌簌直滴。孩子见我望着窗外出神、流泪，连叫着“爹，爹，睡好。”我又躺了一阵，估摸他喃已去远了，就对大娃说：“你妈身体不好，去帮她挖挖土。”孩子刚一出门，我连忙把门关上，投环上吊了。

好象在无边的水里漂着。头象涨大了，憋得眼珠都要迸出来，眼前许多金星乱窜，随着便是两耳轰轰作响，又象落入无底的深渊，只是下沉着、下沉着。忽然，听到了遥远的哭声，有一个细小的声音不停地叫着……我终于挣扎着睁开眼睛，活过来了。原来，孩子他喃到底不放心，去不多远就往回走，正碰上我支开的孩子。她慌忙赶来，连哭带叫，隔壁么公提把斧头把门砍开，很快地把我从吊绳上解了下来。

万恶的旧社会、万恶的地主逼得我上吊，这深仇大恨我永远忘不了。

解放了，推翻了三座大山，镇压了恶霸地主，我们翻了身，过上了幸福的生活，叫人怎不从内心发出呼喊：毛主席好，共产党好，社会主义好！

三 胎 牛 儿

王 炳 兴

每当我从公社到各个生产队去，总爱去看看他们饲养的那些膘肥体壮的大水牛，摸摸那些油光水滑的小牛犊，有时还要跟它们说上几句话。我喜欢牛，这不仅因为人们一般地称它为农家宝，而且这中间还有一段辛酸的事儿，使我终身都不会忘记。

记得我十岁那年，我们一家六口，住在尖山子脚下一个三叉棚里，租种富农马泽高的地。家里穷得象山里的石头，没有一点生机，喂不起猪，更没有喂牛。那年碰上春旱，坡上的竹子都干死了，直到芒种时才下了点雨，家家户户生产都艰难。爹是一个三天不说两句话的老实庄稼汉，没有办法，还是要请人拉一把，走东家，跑西家，想换工租牛。但一连跑了十几天，也没换得一个牛工。错过了季节，秋天只收了几背秕壳。爹愁得话儿更少了，一天到黑躬起背背闷头干活路。妈说租还没交，六张嘴要吃，应该想点办法。一家人正在焦心的时候，马泽高却逼上门来。他跺脚伸爪地骂我爹不喂牛，把地给他做荒了。他还说，不管如何，租子是一颗也不能少。从不开腔的爹突然憋出：“要租谷没得，要命有一条。”

“哪有种地不交租的，给我找！”马泽高一吆喝，几条狗窜进屋，乒乒乓乓，把能值几个钱的东西甩出来，仍然没有找到一颗粮食。马泽高一张猴脸象遭雷火爆了，吼叫起来：“给我滚，

我的地不能再给你种。”我们家被洗劫一空，祖祖辈辈的庄稼汉，不能种地了。闹到半夜，我们不得不离开那三叉棚。爹一头挑着弟妹，一头装了全家唯一的秧毡被和几件破烂，妈背着几个破碗牵着我走路。天下土地数不清，我们家却找不到一块栖身的地方。从此，我们一家流落在石宝寨的青石板上，靠帮人下力，找一碗，吃一碗。十一岁的姐姐拿起打狗棍去讨千家饭，一去就没有音信，急得我爹妈不知在梦中惊醒了多少回。

在外面流浪了一些日子，后来我们又回到了原来居住的地方。在饥寒熬煎中，我长到十四岁，有了力气，也学会了种地。家里凑了几吊钱，又租下尖山子富农马泽高两石坡坡土。我们家又种地了。自己没喂牛，要犁地得先给有牛的地主、富农干五天活，才能换上一个牛工。

六月的一天，天空没有云丝丝，没有风芽芽，太阳象一团火，烤得大地冒烟。天刚亮，爹就上后山坡犁地去了，妈到亲戚家借粮。晌午过了，我肚子叽哩咕噜直叫唤，仍咬紧牙，背了满满一背牛草，提着半沙锅糠搅的野菜汤，头顶骄阳，脚踏滚烫的坎坷山路，一步一喘地爬上那片坡地，却不见爹和牛的影子。喊了几声“斋”，也没人答应。我撂下背筐，提起沙锅，急急忙忙转过山嘴，才发现爹倒在犁头旁。没见牛，只见地上一滩殷红的鲜血。我慌了手脚，扑过去哭喊着“斋”。爹面如土色，嘴角还在淌血，浑身象烧红的铁板一样烫手；他那筋暴暴的左手握着牛鞭，右手无力地撕扯着胸前的破麻衣。我把爹背到一棵大树下，扯掉他拴在腰杆上的草绳，解开汗水湿透的破麻衣，哽咽着呼唤爹，轻轻擦拭他嘴角冒出的鲜血。他微微地动了动嘴唇，艰难地说：“……牛……牛……”以后再也没有声音了。

爹死了，我们一家的日子更难熬。我们一背太阳、一背雨，抬轿、背煤样样干，糠菜当粮，海椒当衣裳，一心要积攒几个钱，买上一头耕田的牛。

五年过去了，弟妹在饥寒中也渐渐长大，妈妈累弯了腰，还是不能添上一条牛腿。

一次，我给富农何奉三家背煤，累了大半天刚放下背篋拐把^①，又叫我牵牛喂水、吹凉风。这时，我家的老板、当了掌管四个甲的甲长的马泽高，手摇蒲扇，哼着小调，面带几分笑地朝我走来。“咪子，牵牛喂水呀？”一听呼我的乳名，新恨旧仇马上涌上心来，我使劲地吐了一口口水。他走到我面前，“嘿嘿”笑了几声说：“你想自家喂牛吗？”我有点动心，嘴里只是淡淡地说：“做庄稼的，都喜欢牛嘛。”

“你几娘母种我那地，没牛犁，也真够累的。”他扇了几下蒲扇，做出一付悲天悯人的样子。

“我会买牛的。”

“买牛？”他那鹞子眼睛眯成一条线，“你我老主老客的，不瞒你说，我家要起的牛有的是，去牵一条回家喂就是了。”

“要啥子手续？”我怕上当。

“地方都舍得给你家种，一条牛算啥。何况牲口还要你们经佑。”他说的怪好听。我心里痒痒的，又想，恐怕没得这么撒脱：“要办个手续吗？”

“你就是不开窍。这点小事还需要动笔墨？”

“啥子条件？”我抱着讲死了上船的态度。

^①拐把：山区交通不便，搬运东西全靠人背。拐把系用弯木做的丁字架，路上用以顶着背篋歇气的一种工具。

“好好好，这样吧，你牵一条母牛去喂，工本算是我的，以后下了崽，第一胎归你，第二胎给我。”他毫不在乎地说。

“要得嘛。”

“以后把庄稼做好，腿脚勤快点就行了。”他又“嘿嘿”两声，摇起蒲扇走了。

我把何奉三的牛牵回去，晚饭都没吃就回家。我把马泽高拿牛给我们分喂的事告诉妈和弟妹，一家人都很高兴。弟弟手舞足蹈地说：“喂牛的活路我包了。”

第二天，我起个早就去马泽高家牵牛，还在敞坝^①边，他就打招呼：“你来得正巧，我今天要到皇华乡办点急事，你就在这里吃早饭，送我一程。”一听是要我抬滑竿，心里凉了半截。他象看穿了我的心事，忙说：“昨天说的事，等一会叫放牛的给你家牵去。”

天快黑了，我汗流夹背地回到家，弟弟气鼓鼓地对我说：“一条风簸架架有啥子用！”我去打开圈门，牵出牛来一看，果真是四条腿撑不住一身骨架。“狗食的，心好狠！”我没法，打开牛口看看，还好，才六牙，不算老，是头母牛，便安慰弟弟：“不要紧，只要不是‘漂沙^②’货，经佑仔细点，就会长壮下崽的。”

这以后，每天早晨天刚麻麻亮，我们就牵着它上山吃露水草，早饭后赶回牛圈喂，再累也要割上两大背青草，半夜还起来添草料。入冬后天冷，就给它喝温热水，还把我们盖的秧毡被给牛儿盖起。冬去春来，牛长起了膘水，能拉犁耕地了。那年庄稼种得及时，加上风调雨顺，秋收后交了租，还剩下几颗粮食，一

①敞坝：即院坝。 ②漂沙：农民叫不育的母牛为漂沙。

家人脸上有了笑容。

第二年春天，母牛下了崽，全家老小欢喜好几天。妈妈特地为我们煮了一顿没加菜的大米饭吃。她还常把我们吃的包谷粉搅的野菜汤，加一撮盐，象喂小孩子那样喂小牛儿。小牛犊一身黑绒毛，长得油光光的，我弟弟给它取了个名字叫“黑子”，常逗它玩耍。上山捡柴割草，小牛儿都爱跟着他跑。时间一久，小牛犊只要听到他咳一声，或打个口哨，就“哞、哞”地叫着跑到他面前，要是他叫声“黑子，上山去。”它就会“哞哞”两声，扬起四蹄，翘着尾巴跑上山去。有时候，弟弟遇到不顺意的事，和小牛儿说上两句话，他心头就象开朗得多。

我是家里的老大，挑着全家的生活重担。看到小牛儿长得逗人爱，常常在心底盘算往后的日子。盼着牛犊快些长大，教会它拉犁耕地，年年种出好庄稼，一家人就有吃有穿；要是四邻没喂牛的穷苦人犁地，我决不要人家用五个人工来换一个牛工。我夜里躺在床上，梦中都笑醒了好几回。

秋末的一天早晨，金风习习，云淡天高。我扛起犁头，弟弟牵着体壮腿粗的“黑子”，迎着朝阳，唱起盘歌^①，愉快地上山了。尖山子今天也象矮了半截，几只山鹰在晴空中盘旋。我来到一块收了庄稼的坪子土里，又检查了一遍枷担、耨索。弟弟打个口哨，“黑子”驯服地让他套上犁。他牵着鼻绳，我扶着犁。“走”、“踩沟”、“转”，我俩正兴致勃勃地教“黑子”试着挂犁，忽听一声吼叫，“黑子”受惊，猛地一跳，差点把弟弟撞倒了。我“喔喔”两声，它才竖起大耳朵，站着不动了。

^①盘歌：即山歌、对歌。

“王老大！”马泽高领着一个陌生人来到地边，大声叫我。

“啥子事？”我冷冷地问。弟弟满脸不高兴地望着，手里抓着牛鼻绳。

“二爷这儿天手头有点紧”，马泽高说了半句话，干咳两声，装做为难的样子。我心里嘀咕：“他是要加租，还是要加顶？”嘴里没说，想听听他到底要说什么。只见他向那个陌生人不显眼地打了个手势才说：“我俩分喂的小牛犊，卖给这个李老板了。”

“啥子？早说过的，第一胎崽归我呀。”

“哎呀！你别急，我们老主老客的，听我给你说……”

“你说话算数不？”我打断他的话。

“王老大，你扳啥子！”他有点不耐烦了，“上半年政府派下的枪枝子弹费，折合粮食三斗，户口费两斗，我都给你付了。想到你是我的佃户，粮食是庄稼人的命根子，在那青黄不接的时候，没有叫你拿。现在二爷急需点钱用，你还不能通融一下？我的大牛在你家喂起，第二胎你要不是一样吗？”

“没得那么安逸！”我硬梆梆地赏了他一句。

“老弟，马二爷说得在理。”那个李老板在旁边帮腔，“不要任性，免得伤了你们老主客的和气。”

“你晓得啥子！是他找到跟我分喂，当时讲死了，第一胎崽儿归我。”

“再说也没用，我已把牛款付给他马二爷了。”

马泽高不管我同意不同意，朝那个姓李的咧咧嘴：“牵走吧。”我弟弟听说要牵走“黑子”，一声呼哨，牛儿一股劲地跑到坡上林子里去了。那个姓李的牛贩子呆了，马泽高跳起脚吼：

“小苗呵，你搞什么鬼？好话在先，不立即把牛儿找回来，就马

上交五斗粮食。你们别不识抬举！”马泽高软硬兼施，我们辛苦一年多养的这头小牛，给白白地牵走了。

弟弟伤伤心心地哭了一场。妈听说小牛被牵走了，顿时气得昏了过去。

第二年，老母牛又下了一条牯牛。我们一家又喜又忙，暗地作了准备。从小牯牛下地那天起，就把它关在圈里，不让人知道；只等会吃草了，就牵到远处亲戚家喂养。哪晓得牛儿下地还不到一个月，马泽高就带着两个保丁，威风凛凛地来了。看着那架势，我们捏了两把汗，不晓得又要遭啥子灾殃。一拢敞坝，只见他满脸杀气，劈头一句就说：

“王老大，你中了！”

“二爷，啥子重了？”

“不要装糊涂！前方打抗战要人，你家两个男丁，要抽一个去当兵；要不去，就现交一石黄谷的壮丁费，保上请别人去。两条路摆起，任你走一条。”

这一雷打在我的脑壳顶顶，心想：“我是家里撑门户的，要是我走了，家里怎么活啊！这年庄稼又欠收，交了租没剩几颗粮食，又哪里能现拿出一石黄谷？”我闷了一阵说：“两条路都不能走。”

“你说得轻巧，不出人，又不出钱。现在而今是有人出人，有钱出钱。”

“我家是啥底子，你这个老东家还不清楚？”

“我有啥子办法？你去给上面交差嘛！”说了五百箩筲好话，他才勉强答应我不去当壮丁，但要立个字据，第二年秋收交清这笔壮丁费。

他把事先准备好的纸笔墨砚摆起，摇了摇脑壳，把条子写好，就叫我盖上箕斗印。他一本正经地唸了一遍字据，还特别说了三次：“一石黄谷折合市价二十块，加三成利息，本利共还二十六块。”

尖山子高有个顶，苛捐杂税可没个完。我们去年付了枪枝子弹费、户口费，今年又欠下壮丁费。欠了债，一家人象掉进了枯井，四面无路可走；但我们不能等着死，要找出路活下去。

家里没有笑声了，妈妈额上又添了几根深深的皱纹。她下了狠心，叫我背一斗粮食去卖了买回两头小猪，准备喂到明年长大了还债。弟弟妹妹也每天阴着脸，起早摸黑挖蕨根，找野菜，讨猪草^①，割牛草，给人背煤炭，不声不响地分担生活重担。我更象一头牛，吞草根，咽糠菜，拚命干活。一家人累死累活，总算又熬过了严冬，度过了春荒，换得一季好庄稼。牛儿、猪儿还争气，长得壮壮实实，给我们添了几分欢喜。

谁知秋收时，头天给马泽高送清了租子，第二天一早他又带起人来。他手提大叶子烟杆，一拢敞坝就高叫：“王老大！”我忙迎上去。

“去年那笔款子准备好了吗？”

“后天才赶场，我们卖猪儿。”

“要现成的，哪个等你卖猪？”两个保丁贼眉贼眼地溜到一边。

“马二爷，家里确实确实没有现钱。”妈在一旁说。

“少废话，牛儿不是在圈里吗？”马泽高的鹞子眼睛直盯着

^①讨猪草，即割猪草。

我。

“这一胎崽该我们的。去年他们两个都在场。”

“我不管那些。”他摸出我盖了手印那张纸条抖了抖，呲着凸牙说：“这上面写得明明白白，秋收时用小牛偿还。你不送去，还等我上门来？”

“不对。”

“马二爷还会说假？”一个保丁讨好地说。

“我记得清楚，一石黄谷折价二十块，利息三成，本利还二十六块。”

“你自己拿去看看。”他把条子晃了几晃，“白纸黑字，有你的手印，还想赖？”

我认不得字，心头火辣辣的。马泽高向两个保丁挥挥手：“牵牛！”我呼地站起来，眼里喷火。

“懂事点。”马泽高不怕牛粪打脏绸裤衫，钻进牛圈，拽着小牯牛的笼头绳往外拉。

“你讲不讲道理？”我们一家人围着他。

马泽高不理睬我们，向两个保丁吼着：“你两个瘟猪！”两个家伙一齐上前把我掀开，“我们去年在场，是是……是用小牛抵还壮丁费。”马泽高逼着我们立即交利钱。看看要闹僵，一个保丁向马泽高挤挤眼，随后一手拉着我说：“马二爷有苦衷，乡上又逼得紧，你就把那对猪给二爷撵去，付清利息，还有剩。”马泽高趁势下楼，“我拿半边老牛给你们喂，它还会下第三胎崽的。”

“二爷这办法好，使你们还清了债，还有了半边牛，真是老主客有交情。”保丁说。

我看穿了他们的圈套，无论怎么说，小牯牛和猪是保不住了。心想有了半边老牛，下了第三崽归我，总没有拐扯①了。我强压下怒火，答应了。妈用苗话给我说：“忍口气”就进屋去了。马泽高见我们没有怎么多说，又做人又做鬼，放了一阵屁，牵起小牯牛，保了撵猪，闹嚷嚷地走了。

这回气得妈吐血，病倒在床上三个月起不来，真是祸不单行啊！

牛儿下地跌几筋斗，就能站起来走路；我们一家跌了几筋斗，也要挣扎爬起来。妈的病好些了，刚能起床下地，就理起活路干。弟妹虽还没成人，却完全能顶一个劳力干活。一家人拚死拚活，终年劳累，仍然不得一饱。一胎两胎牛儿没到手，都把希望放在第三胎。我们把老牛喂养得更好，后来果然又下了一头小牛。小牛犊长到半大，庄稼快要收割了，马泽高这条喂不饱的狼又找人传书带信说，要加我们的顶首，不然，不等收庄稼就要我们搬家。我们没有理睬，他家狗腿子又跑来说：“只要把小牛牵去，就可以不加顶，或者秋后再议定。”最后，他还横眉瞪眼说：“马二爷说的，他说话算话。”

“你不要狗仗人势。他马泽高说话算数就好。这第三胎小牛儿，我是不给他的。”

“加顶，搬家，到时你莫后悔！”

“收了庄稼又加顶，天下哪有这个道理？”

“有地就有理。”

“不要兴坏了规矩。”

①拐扯：扯筋说假话的意思。

“听不听由你。我是吃人酒饭，听人使唤。”狗嘴巴倒出几句屎，夹起尾巴走了。

当天下午，马泽高又带起两个保丁和头一次来的那个牛贩子，气势汹汹地跑到我家，大声武气地吼道：“小牛儿我已经卖给李老板了。另外请了两个兄弟一路来，每人你付两块钱的草鞋钱。顶首款子嘛，过两天二爷空闲了再来找你算账。”根本不听我们申说，第三胎小牛儿被马泽高明火执杖地抢走了；两个保丁把我们家吊命的一升包谷，两只鸡也抢去作了草鞋钱。

世上没有不吃人的狼，人间没有不整人的财主。马泽高把我们家养的三胎牛儿都抢走了，榨干了我们的骨髓，又派人来抢收庄稼。租子要按六成交。三下五去二，报了一串串款项，把剩下的四成也榨去了。又要加我们双顶，我们拿什么来交？

一家人走投无路，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，冒着凄风苦雨，又不得不含恨离开了尖山子。

锁 链

项 正 江

在那吃人的旧社会里，官家豪绅似虎狼，地租徭役重如山；苗家累断筋和骨，锁链重重挣不断。

一九三〇年，我在苦水中已泡了十七个年头。父亲是个老好人，不多言，不多语。一家六口的生活重担，开始落到了我的肩上。这时，我家租种马宪廷和马泽安的地。头年国民党反动政府强迫农民种鸦片烟，割烟后又下禁烟令，鸦片烟全被没收了。我们再没有东西可以换钱买吃的，只有嚼草根，咽糠菜，勒紧裤带种庄稼。第二年春天，乡保长带起人漫山检查，寻机对庄稼人敲诈勒索，弄得一个个惶惶不安，提心吊胆过日子。

一天，我跟爹在岔崂弯翻土，三弟哭哭啼啼地跑来说：“妈被查烟队的人抓去了！他们说是在我家的一块油菜地里，发现两根鸦片烟秧子，便不问青红皂白就把妈弄走了。”听到这个消息，我们都气得打抖，爹连声叫苦。我丢下锄头就朝牛滚幽高朝清保长的家跑去。还在屋门口就听见高朝清恶声恶气地叫喊：

“政府去年就颁布了法令，你家竟敢私种鸦片！这还了得，必须罚款！”我跑到坝子边，喘了喘气，就高声说：“你不能平白无故冤枉人！”

高朝清正在那里作威作福，冷不防我闯了去。他愣了一下，见没有多的人，我又是一个半大孩子，便骄横地指着骂：

“你小杂种还敢狡辩！”顺手从一个清查队员的手中夺过两根鸦片烟秧子，“这，你还能抵赖得了？”

“你不能抓到黄牛就是马！”

“胡说！保长还冤枉你家？”一个尖嘴缺牙巴的家伙吼着。

“谁晓得你们从哪里弄来的！”

“石磅坡那块地是不是你家种的？”缺牙巴又开口了。

“我们那块地是种的油菜！”我心中有了底，更大声地叫起来。

“你小杂种扳啥子？”高朝清一翻白眼就骂人。

“保长，你做官要详情嘛！我家要是种鸦片烟，就只有那两根吗？”妈忿忿地说。

“少说废话，交清四十块罚款你就走！”高朝清不理睬，转身又对一个保丁说，“把她看起来！”

山区春天的黄昏，冷凄凄的。我心中燃烧着怒火，又气又急。那“交清四十块罚款你就走”的斥责声，象一根无形的鞭子，抽打着我。摸回家里，伯、叔们早已赶来，没等我歇口气就急着要问个明白。爹急得在黑洞洞的屋角里叹气。

一阵汪汪的狗叫声，马泽高打着火把来了，在坝子里就老远吼起：“死绝啦！”

“请屋里坐。”么爷摸到门口向马泽高打招呼。

“过桥灯①都没点一盏？”

“老大，把灯点起。”么爷喊我。

桐油灯燃起了，惨淡的灯光射在爹又黄又瘦的脸上。马泽高

①过桥灯：旧社会死了人，在停尸板下点的灯。

在昏暗的屋里坐下，厉声问我爹：“项银三，你就是这样一声不吭？”

“唉，是真的，我家没种鸦片烟。”爹咳嗽了好几声，好容易才憋出一句话来。

“鸦片烟稔还能有假？现在我不是来断理，是要你们想办法，把款子凑齐送去！”

“我们种的地你都清楚，应当公道点。”我插嘴说。

“老大，你不要无话找话说。夏种季节转眼就到，现在是赶紧想办法把人赎回来，长麻吊线下去，庄稼种不好，秋来交不够租，你们怎么过日子？我还替你们着急哩。”马泽高说着还假惺惺叹了口气，装出一付“菩萨心肠。”

这天晚上，由马泽高一个人说好说歹，最后还是要钱。我气得跳起来：“真是活抢人！”

“你小子别耍横！不看在近邻的面上，请老子也不来。”马泽高被我戳痛了，转身又对我爹吼道，“项银三，你不要装猪吃象的，快点打定主意！”

“这个办法不好想啊！”伯伯代我爹说话了。

“我不管你的，主意靠你家自己定。我说的那个数，还要等我回去说通了才算数。不要让我一把好粉擦到了后颈窝。”说着话，气冲冲地拉开门走了。

一股冷风扑进来，桐油灯熄了。我不禁打了一个寒噤。关上门，我躺在床上，大半夜没睡着。么妮^①醒来哭着要“妈”。

第二天，天刚亮，马泽高又来了。一拢就高喉大嗓地说：

^①么妮：最小的妹子。

“保长真是个通商量的人，他满口答应，跟乡上通关节，少交几块罚金。也顺便叫我给你们说，‘以后听话点就行了’。”

“他家咋个拿得出三十块大洋？”么爷急了。

“这样吧，打个欠条也行。保长说，不交现款，就每年交一石二斗包谷的利息。”马泽高又盯着我爹说。

“天啦！”爹仰天长叹一声，脸变成土色，差点倒下去。

“嘿！”马泽高不耐烦了，从衣袋里摸出张纸来，说，“欠条条子都写好了。项银三，你盖个手印就是。”

我不懂得厉害，心想不拿现钱，盖个指拇印有啥子要紧，伸手就要盖。伯伯的脸陡地一下白了，气得话都说不出来，一把拉住我。马泽高阴险地笑了笑说：“你还不顶用。”逼着我爹按了手印，才对我说：“跟我一路去保长家，接你妈回来。”

到了高保长的家，马泽高一个人跑进火儿屋^①，叽咕了一阵。高朝清头带呢毡帽，身穿长夹袄，手提叶子烟杆钻出来，站在门槛里连连打呵欠。马泽高跟在后面，搓了搓手，讨好地说：

“保长，还要跟他们说啥子吗？”

“项老么，你跟这小东西来也好，看在马泽高的面上，写个欠条，我姓高的通商量，乡上我去费点唇舌也没啥。马泽高为你哥哥这桩事，起早摸黑，风吹雨淋，还要跑路，受累不少……”高朝清打了个顿，狡黠地眨着三角眼，打量我和么爷。

“辛苦了。”我不晓得该说什么好，么爷先说了话。

“辛苦倒没得啥，为乡邻办事嘛。我看，还是该表示点心意，拿两块钱买草鞋算了。”

^①火儿屋：专门烧火向的屋子。

“我妈呢？”一心想着妈，没管他保长说些啥。

“刚才说的，你们听到没有？”高朝清只顾说钱的事。

“记得了。”还是么爷替我回答。

妈从一间冰冷的黑屋里放出来，我赶忙扶住。一夜工夫，她瘦削的脸上，又深深地刻上了几条皱纹，只有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，仍闪着仇恨的光。

回到家里，妈病倒在床上一个多月起不来。

为了给妈治病，为了还债，为了一家人活命，爹的话更少了，和我更加拚命地干活。除了种地，还睡半夜起五更地背煤卖。我又跟人学割漆，只要是下力能挣钱，再苦再累的活我都干。一家人干的活比牛马还累，吃的比猪狗还差。

弟妹在艰难生活的熬煎中渐渐长大，爹妈在劳累折磨下渐渐衰老。苦难遭遇把我磨成寡言少语的性格。生活逼得我学得一身好庄稼活，打猎、割漆，挖煤样样能做，更使我认识了那些绅粮、官家都是吃人的狼。一家人舍死忘生干活，花了两年时间，才把那笔黑心款子交了。可是，前山撵走了虎豹，后山又来了豺狼。老板又加租加顶来了。

一年，刚刚交完租，老板马宪廷就对我说：“我的地租给别人了，你趁早另找主子。”我没有求情。第二天，他又叫管家来说：“衣是新的好，人是旧的好。你家做他的地多年了，多交几个顶首，说几句好话，不就行了吗？换主搬家，人地生疏，很不方便啦！”这些话，再明白不过了。我们忍痛卖了两斗粮食和一头猪，了了这回事，继续种下去。没过一个月，说他家要盖几间牲口房，过年以前，非送一千二百捆茅草去不可。为了种地，一冬三个月，我几弟兄，镰刀都割烂几把，才交清了茅草租。开春

不几天，苧麻才长出嫩芽，又跑来说他家要做鞋穿，要我交五斤上等麻皮去。我家两块麻地，头道、二道收来交了麻租，一丝没剩。这一年，我们连麻布衣都做不了一层。地里的叶子烟才长起四五层叶子，老板叫人给我说他没得烟抽，收了烟要交三十斤去。除了这些额外租，每年还要无偿地给他家做一百二十个工。象砍柴、背煤、碾米等下力活，都得有喊必到，粮食租仍是一颗不减。

我们一家分居后，加租加顶还是象影子一样跟着，搬到哪里都一样。我干活能抵一头大牯牛，到头来还是两个肩膀抬一张嘴。妻子病饿交加，无钱抓药，年纪轻轻就死了。我只好背上不满四岁的儿子又回到父母身边，捆在一起。妈常常提起我的亲事：“正江，再穷再苦，你还是该再成个家呀！”

一九四二年，说合了一门穷亲，准备秋后娶过门。一家人，口中不吃肚中挪，妈出门不打空，拣柴、割猪草，细心地把一条窈窕猪儿喂到了一百多斤。她满是皱纹的脸上有了一丝笑容。妈正为我娶亲忙着，不料恶主人又在打鬼主意。

那天，我正和上草筋泥，在一把一把地塞四面透风的土巴墙。马伯齐一到门前，狞笑了几声，尖着嗓子下流地说：

“项老大，又要娶婆娘啦，忙得好快活呀！”

“主人家，你坐。”我甩了几下手上的泥巴，捧一个树疙兜做的凳子过去。

“老大，今天我特地来给你说，”他斜了我一眼，没有坐，一只手插在衣襟里，继续慢吞吞地说，“你另找地方做吧！”

“老板，别笑耍我，今年我们的租子交齐了的嘛。”我一怔，又马上直杠杠地说。

“我又没问你要租子。”

“地方我们还是要种哟！”

“这两年，呃，确实艰难啦！要用几个钱，就只望着祖上留下的这点地方。”他装出一付为难的样子，抖了抖一双肥嘟嘟的爪爪。

“我们做地方，交了顶，拐了租的嘛！”

“早先那几个顶首，能做一辈子？我还有事，你们商量商量吧。”马伯齐着重地说了最后一句，摆摆手走了。

第二天，妈一早就找人去说情。结果勉强答应：要不搬家，就立即交一百块钱顶首。那年月，亲戚朋友都一样穷的慌，借也无门，无路可走，只好把那头一百多斤的肥猪给老板抬去。老板算盘儿拨，只能抵四十块，但还差一大截。说了很多好话，才让我们暂时住下去。在我过酒^①那天，马伯齐派他的管家守在我家，刚把穿鞋^②的接拢，就当众骂：“你有钱娶婆娘，为啥赖着不交顶首？”亲友们都无比气愤，管家见势不妙，马上又改了口，“都是人生父母养的，老大娶亲，应该高兴。我也是没得办法，端人家碗，听人家唤。大家别多心，老板的意思是要你家把顶首马上交清。”一个要交，一个没有，最后，硬把收的几个“人情”^③全部清点走了。

冬去春来，一大家人吃了上顿没有下顿，也挺着腰杆把庄稼种下去。我又跟人合伙上山割漆，爬山岩，钻刺林，一连五个月起早摸黑，抗漆毒，斗凶兽，忍饥受累，一刀刀割，一滴滴收，到晚来，手指伸不直，腿抬不动，眼发花，说话轮不转舌头，但

①过酒，即结婚。 ②穿鞋的，即妻子。 ③人情：送的礼钱。

心里总也燃着希望：有了漆，就能变钱买粮食。哪知一结帐，交了老板的山本费，只剩下七十斤漆。我刚准备背去卖，保长夏平舟带起人抓壮丁来了。那天早饭还没熟，灶里的柴燃得满屋烟雾腾腾。夏平舟一来就堵住大门，妈站到门口应酬。我趁势爬上竹楼，只听夏平舟问：“你老大哪里去了？按规定他该去当兵。”我顾不得再听下去，从房顶上亮洞钻出去，梭到后檐，跳上山就跑了。那来的一伙闹腾了一阵，没抓住我，却把我一个有残疾的叔爷抓去作人质；要是不把项正江交出去，就得拿一石黄谷去请壮丁来抵。我暗地回家时，一家人正急得团团转。左思右想，又不得不把我辛勤劳累半年的那七十斤漆卖了，把叔爷赎出来。

后来，我带着妻、儿又跟老父老母分居。租种大团总的儿子邱齐伯的地，帮他当牛做马，心想借此能躲过壮丁。可是保长夏平舟仍不放松，非抓我不可。家里实在呆不下去，我又跑到尖山子去帮刘思其烧硫磺。

天下老鸱一般黑，世上财主一样狠。说起烧硫磺，就象人们说的：“早晨天不见亮就动工，晚上月落山梁才上床；挖矿砸破手和脚，烧磺烟火鼻眼呛；一月工价拿过手，饭钱开了就精光。”我舍命地干活，人家吃干我吃稀，总想每月能剩下几个拿回家。苦点累点还不算啥，可是受人欺侮盘剥，真把人气死。烧磺地界的保长马福舟要承头邀会，每股一个月上两斗包谷。他派人来找我几次，明知这件事烫手，又不敢不答应。从四月到十月，我已上会六次，第七次该轮到我收了。

十月十三是会期，我丢下工没做，还请了两个穷哥帮忙，高高兴兴地一路去马家背粮食。心想：这一石多粮食背回家，加些糠糠菜菜，妻、儿也能勉强糊口到明年了。

到了马福舟的家，没等我开口，他就带有几分气：“项老大，我那天就要找你，今天来得正是时候。”

“保长，今天我来背粮食。”一心想着该我收会的事，便直截了当地说开了。

“背啥子粮？”马福舟眼睛一眦，厉声反问，把嘴都扯歪了。

“这次轮到我收会了。”我提醒他。

“你收？想得倒安逸！”

“保长，不是我想的……”

“告诉你！各股的粮我已收了，就是不能给你。”

“给哪个？”

“给我！”马福舟用右手食指点一点他那勾勾鼻。

“你是会首，头一个月你就收了的哟！”

“你听到：大半年来的壮丁费，都是我当保长的给你垫起，该不该还给我？”

我气得话都说不出来。马福舟扫了我和两个穷哥一眼，又口沫四溅地嚷道：

“你别知恩不报，壮丁款要我给你垫，好话要我给上头说，你还要跑来收会。”

“哪有那么多壮丁费？”我气得火星溅，一下站了起来。

马福舟见我这架势，忙退了几步，举起手头的大烟杆。去帮我背粮的王大哥往中间一站，忙劝解道：“话冷了再说，帐慢慢算嘛。”他示意要我坐下，又转身说：“请保长算算看，如能剩下几颗粮，也好让他背回去，屋里还有两张嘴等米下锅哩。”

“喏！你也帮苗东西说话。好嘛，我是有帐的。马上算给你们听。他边说边在衣兜里摸出一本簿子，翻了几篇，又得意地念

道：“尖山子刘思其家烧硫磺的项正江，四月份欠壮丁费三斗，五月份该交两斗……到十月份止，共一石五斗。”念到这里，他抖了抖帐簿又说，“听清楚没有？”

我的脑壳嗡嗡响，睁着两眼张不开嘴。两个穷哥也气得一时找不到话说。马福舟哼了一声鼻子说：“扣去你收会的一石二斗，还差三斗。这三斗，你多久给我背来？”

“不能只凭你说了算！”

“你自己看看，一笔一笔，写得清清楚楚的。”马福舟一拍帐本，气势汹汹地塞到我面前。我没跨过学堂门，只见簿子上密密麻麻的，哪晓得他写些啥子，气得心里象猫儿抓。

“马保长，壮丁款我们穷百姓出，那会粮该老项收，要分开……。”帮我背粮的黄大哥说话了。

“你少管闲事！”马福舟一挥手打断黄大哥的话，“这壮丁款该不该拿？嗯？”

“这会粮该不该我收？”马福舟一问，倒启发了我，也反问道。

“今天，我们两个正算，一五一十的交清楚，别鬼扯！”

“桥是桥，路是路。”

“少囉嗦！欠下的三斗给你记上，年前交清楚，我们好说话，要不你还得去当壮丁。你在我保上平平安安地过了大半年，不要吃饱了不晓得放碗！”马福舟说完，转身就走。

我劳累半年多，饿肚皮省下的血汗粮，被马福舟这只烂心肝大嘴老鹅啄去了，倒转来还说欠他三斗。十月一完，硫磺厂老板停火不办了，我空着两手，离开尖山子，顶着寒风，回到窝窝头。妻、儿在家已断炊了，眼巴巴地望我能送回几升粮食，盼来

的却是我的两只空手、一副愁容。妻子听我把收会的事情一说，她簌簌地淌着眼泪，叫声“这世道，真不让我们穷人活命啦！”五、六岁的儿子，瘦得来象一根藤藤，扑在我怀里睁着一双大眼睛问：“斋，‘这世道’是哪个？”这叫我怎么回答呀！不管儿子懂不懂，我还是解答他提的问题：“就是那些保长、绅粮。”他一听这几个字，周身起了痉挛，更紧地贴着我。儿子幼小的心灵，早已受到创伤了。

山头既然扳不倒，可苗家总是要活命啊！我不能让一家三口躺下饿死，一定要顽强地活下去。每天，鸡叫头遍我就起身，去石宝寨背煤卖；妻子上山找野菜，挖蕨根，儿子也象懂事地背个小夹背，跟着他妈妈上山割猪草，也能换回半碗包谷米。好歹熬过了一冬，我又硬着头皮向主人家邱齐伯借粮。

这邱齐伯是个二十零点的年轻人，上过几天洋学堂，虽然早已子承父业，在家经营土地吃收租饭。表面上看，平时对佃户说话还显得和气。过了旧年第三天，我把家里唯一的一只母鸡抱去，托辞说去给他拜年。到了邱家，我烟都没烧一锅，就给挑了满满一缸水，背了几背煤渣去和稀煤来堆起。他见我象条牛一样，一声不响地给干活，特地招呼我说：“你也歇一会儿，喝杯茶嘛。”我便趁机对他说：“少东家，去年受灾，收成不好，开春来我家里生活有些恼火。”

“这个我晓得。你是不是想借粮食？”

“少东家，你真摸透了我的心。”

“你我主客，还有不了解的。不过，不过你也晓得，我家的粮食不想借给人，免得人家说我想他利息。不过，哪家佃户缺粮，我还是愿意接济一点。”他说得很随和。

“少东家心好。”我不晓得该怎样说才好。

“虽说不要利息，要吃我家的粮食，还是有个条件的。”他看了我一眼，稍稍提高了声音。

“啥子条件？少东家说说看。”

“我家的老佃户都晓得：这一带地方土多田少。就是借给一斗粮食，要在所种土地上开垦两石水田。”

“啊？……”我吓了一跳。

“秋来新田收割了，粮食要给我一半。”

一听是这样，我更不好开口了。

“怎么样？”邱齐伯闪了几闪狡黠的眼光。

“条件太……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我就是一条牛嘛，拉犁也要换口气呀！”

“难道要我白送粮食给你吃？哼，不要你的利息，也不要你还本，你去问问，别处哪有这样的好事。”邱齐伯有点不耐烦了。

那年月借债，少也是借一斗，秋来就要还两斗、三斗。一转念，现在借也无处借，顾不了许多，就咬着牙答应下来。

给他干了一天活，饭都没叫我吃一顿。绕了几个大圈圈，拐一斗做饲料的包谷就打发我走了。临出门时，还叮咛说：“你可要记着，不要吃了粮不管事，忘记了开新田！”

从此，我是月亮当灯风当扇，不分白天黑夜地开田，有时妻子还帮着背石头砌田坎。锄头挖烂几把，青桐棒撬断无数根，汗水不知流了几斗，手上老茧重老茧，累死累活，开了两石足足的新田。碰巧那年雨水好，插上了秧。儿子也天天上山割青草沤肥下到田里。老天爷不负苦心人，稻禾长得起蓬蓬。一家人伸着颈

子，盼来了秋收时节。

开镰收割了，邱齐伯不动声色地窜到地里来。他在几块新田边转了一圈，先说了我没辜负他的好心，后说：“今天开始就收一块分一块，免得以后麻烦。”随后就派来管家守着收，一筐一背，二一添作五，摸黑都要给他送去。

种了两年，邱齐伯嫌分粮麻烦，就把新开的田算在租地面积内，每年交固定租子，紧紧把我锁住。一家人，长年累月，在饥寒中熬煎，在死亡线上挣扎。

一声春雷天地震，砸碎锁链得翻身。

解放了，苗家获得了新生。

一九五〇年，群众选我担任了联防队长，苗家翻身作主人，掌握了枪杆子。在火热的阶级斗争中，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在党的培养教育，为人民服务的二十多年中，我才深深地懂得了：旧社会里，穷人为什么世世代代受穷受苦受压迫，我为什么逃出虎口又掉进狼窝，地租、劳役紧紧地把我锁住的道理。这是刀把子、印把子没在我们劳动人民手中啊！

一九七五年，我从区粮油站退休回家，幸福地度着晚年。要不是毛主席、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，建设社会主义，哪有我们的幸福日子啊！要不是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“四人帮”篡权复辟的反革命阴谋，又哪有我们的今天啊！真是，爹亲娘亲，比不上毛主席亲；河深海深，比不上共产党恩情深。

现在，我一家十二口，不愁穿，不焦吃，到年龄的孙儿们都上学了。我常对儿孙们讲过去的苦难，教育他们永远听共产党的话，走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路，跟着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，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努力作贡献。

等 儿 坡

侯 少 伦

在热火朝天的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高潮中，我们跌马苗寨的山山水水同其他村寨一样，也在迅速改变着面貌。几年工夫，我家背后那片荒坡就变成了一片郁郁葱葱的杉木林，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，真是喜人。只有杉林深处过去的那堆坟包，还残留着。

这个坡，早年叫等二坡。赤水河到么尼的大道从坡上盘旋而过。坡的高处，上可仰望高耸云天的雪山关，下可遥看滔滔东去的赤水河。早些年，我们寨子里的牛羊都在这里放牧。一九三七年，抗日战争爆发以后，国民党反动派假借抗战、疯狂拉丁，这里就成了老人们含着眼泪盼望儿子归来的地方，也是被气死的老人们的葬身之地。一天又一天，没有几年，这坡上的坟竟堆起了三十几座。后来，我们寨里的人都叫它“等儿坡”了。我爷爷和母亲的坟也在这里。

记得那一年，弟弟十三，我十五。一家五口，老的老，小的小，多亏一条得力的黄牛，耕着五亩薄地，糠菜半年粮，勉勉强强过日子。

一天傍晚，一家人正围着板凳喝玉米稀饭。突然，保长带着一群乡丁堵在我家窝棚前，保长笑嘻嘻地说：“哟！大热天，稀饭解渴啊！”爷爷和父亲起来应酬，保长却拍着我父亲光着的膀子说：“嘿！挺结实嘛，侯老三，你中签了，要远走高飞囉！”

爷爷不解地问：“保长，中什么签呀？”

“什么签？壮丁签！”保长回答说。

“噹”的一声爷爷手中的碗落在地上。他声音颤抖地问：“保长，你们不是‘三丁抽一’吗？”

“哼！侯老三加这两个娃娃是不是三丁？”保长指着我和弟弟说。

“他已经四十好几了，我的两个娃娃才十几岁啊，保长……”

“老和小，就不算丁？给我捆起来！”保长没让我母亲说完就露出了凶相。

父亲指着保长愤怒地说：“你们太不讲理！”

一群乡丁立即拥上，把我父亲捆起就走。

父亲被押走以后，每天每天，爷爷站在等儿坡上望着赤水河。他的泪水啊，一直不停地流淌。

几天当中，爷爷三下赤水河，但都没有见到我父亲。过了十天，乡上带信来说：“今天可以去会人啦！”爷爷和母亲连饭都顾不得吃，急忙赶到赤水河乡上。

一个狗腿子问爷爷：“想儿子吧！”

爷爷只是流泪。

“想长期和儿子在一起吗？”

“家里全靠他呀！没有他，我们一家怎么过啊？”爷爷说。

“哦！是这样，我可以给你说说看。”狗腿子出去一会儿又回来，对爷爷说：“我们乡长看在乡里乡亲的面上，在县上派来的长官面前再三说情，总算转了点弯。不过，车马费呀，草鞋钱呀……只需两百吊钱就够了，你都是知道的……公事么！”

爷爷和母亲尽管知道家里十分艰难，但还是答应找钱去领人。

爷爷拄着拐棍，转遍了附近的寨子，第三天才以每年两石粮食的利息，在一家地主那里借到这笔钱。

父亲被接回来了。为了还清欠债，全家起早贪黑，历尽了千辛万苦，把收得的粮食几乎倒光才算还清。家里尽管没剩几颗粮，但一家老小总觉松了一口气。

第二年春播大忙时，我家已经断粮。但我们吃草根，吞树皮，忍饥挨饿，还是把种子撒下地。爷爷在家辛辛苦苦喂了一头猪，心想只要能喂到冬天，一家人好歹也可吃上几片肉。

天老爷象长了眼，这年风调雨顺，一转眼，地里的包谷背包扬花了，圈里的猪儿也慢慢长大。全家人的脸上开始有了笑容。

但阴云又很快来到跌马苗寨，落到我们脸上。五月端午，全寨人正准备过节，没料到狗保长带着乡丁扑进寨来。年轻人个个惊惶逃走，父亲年岁大，刚跑到寨边就被乡丁抓住，一阵枪托之后又被抓走。等爷爷赶到等儿坡时，只能望见父亲远去的背影。

父亲被拉走了，爷爷气病了，母亲整天泪水擦不干。我和弟弟经常东躲西藏，不敢落屋。爷爷几次要去看父亲，但不能走远路了。母亲呢，行路难呀，出门不晓得东西南北，又要照顾老和小。爷爷只好每天站在等儿坡看看，望天叹气。

父亲亲手种的包谷已经熬成稀饭，端在我们的手中，但谁也吞不下，全家都惦记着父亲。

一天，保长带信来说，这批壮丁不送前方了，叫我们带上三十块钱，一斗五升包谷去领人。爷爷气愤极了，冲着带信人说：“钱，钱，钱，哪来这么多钱？人，我们不领了！”

当天晚上，我们正在焦急不安，忽然，父亲闯进门来。看着父亲肩上的茧疤，褴褛的衣裳，消瘦的面容，一家三代禁不住鼻

酸泪涌。正在这时，保长又象恶狼一样扑来，用文明棍①踩着地说：“你这苗子好大的胆，竟敢赖账逃跑！”

父亲猛地起来质问道：“我赖谁的账？”

“公家的！”保长瞪圆眼睛大声吼叫，“你吃了公家几个月干饭，该不该给伙食钱？国家培训你几个月，要不要给培训费？”

爷爷、母亲一听，气得脸铁青，一齐上去指着保长质问：“你们实在太伤天害理了！平白无故抓我家的人去川滇公路做苦工，该不该给工钱？你们不但分文不给，反而来要饭钱，这是哪里的规矩？几个月来差点没把人整死，还要什么培训费！”保长恼羞成怒，一棍把爷爷打倒在地，吆喝乡丁动手，连拖带拉把父亲抓到乡公所。三天带来三次信：如果再不拿钱把账结了，便要送到县上去。爷爷左思右想，如果把人弄到县上就更费周折，还是赶快设法要紧。因此，爷爷勉强撑着身子又去东筹西借。两天很快过去，眼看只有最后一天期限了，还差十块钱。怎么办呢？家里能值钱的只有那头耕牛和一头猪。爷爷想：牛是万万不能卖的！离了它，庄稼怎么种？只有卖猪。于是，爷爷忍痛把他一手饲养的猪廉价卖了十块钱，连同一斗五升包谷背到乡公所，才把父亲领了回来。

我十九岁那年，国民党拉丁更凶了。我兄弟俩只好日躲深山，夜宿岩洞，眼睁睁望着生产没法搞，只有躲躲闪闪做一点算一点。

一天，我和弟弟在山上砍柴，突然被一群乡丁围困，弟弟侥幸跑脱，我却被他们抓住了。我被丢进了曾经关过我父亲的那间牢房。十来天以后，乡长派人给我家里说：“想儿子吗？有钱有物都可以！”父亲收紧了额上的皱纹：老父病在床上，穿鞋的

①文明棍：即手杖。

又得了一身伤寒病，吃药都没钱，现在虽有两斗包谷，但那是吊命的呀！借吗，这年头到哪里去借？即使有，那利息比吃人的老虎还凶啊！看来只有让儿子……，父亲不敢再往下想，只好摇摇头说：

“除了我身上穿的几股烂麻布襟襟，家里是什么也没有了。”但来人却说：“侯老三呀，你这人的脑筋就是不开窍，你家里不是……嘿嘿……还有几亩地吗？乡长说，只要写张当约①就可以把人换回来哪！”父亲哆嗦了一下，忿恨得说不出话来。母亲气极了，断断续续地说：“你们好黑心呀！这地，可是我家的……命根子啊！”

“要人要地，随你们的便。我不过说说，关……关我啥子事……再不领人，明天就要押走。”说完，过话人②一甩手走了。父亲急忙找爷爷商量，可是一直挨到深夜，还是没有主意。最后在乡上，我父亲被硬逼着在“当地五亩……”的字约上按了手印。

当天，父亲急急忙忙赶回家。母亲听到家里唯一的几亩地已经完了的时候，她睁大了眼睛，爬起床，全身发抖，叫父亲扶住，再去看一眼那祖祖辈辈开出的几亩土地。到了地里，她用颤抖的手抓起泥土，摊在手心，睁大眼睛看了又看，豆大的泪水滴滴在泥土上。母亲紧紧捧住泥土，硬要上等儿坡，父亲只好扶着她一步一停地走啊走，到了半坡，母亲再也走不动了，喃喃地说：

“我……我的……地……我的……孩子啊！”

第二天，我象离了笼子的小鸟，飞样地回到了家。只见母亲躺在几根松棒搭成的灵床上，脚下一支松明灯，闪着惨淡的火苗，她手里还紧捏着一把泥土。我呼天喊地哭着：“妈妈，你的儿子

①当约：把地抵当给别人，写的约据。 ②过话人：带信的人。

回来了！”可是回答我的，只有呼呼的北风。

又隔了些日子，爷爷的病一天天加重，一家人急得不可开交。就在这时候，抓壮丁的风声越来越紧，寨子里鸡犬不宁，人心惶惶，我们一家人更是提心吊胆。一天中午，只见远远的有一伙乡丁向我们这个寨子窜来。忽然一个声音在山包上响起：“拉壮丁的来了！拉壮丁的来了！”全寨青壮年听到喊声，都纷纷躲进了深山老林。只听“砰”、“砰”两声枪响后，乡丁们已围困了寨子，但狗杂种们扑了个空。保长拿着一根断枪，穷凶极恶地对我父亲说：“侯老三，你有吃雷的胆子，支起小苗子通风报信，放走了壮丁，误了大事，这还了得！这枪，噯，噯……就是为此事打烂的，看你如何扯回销①！”

父亲回答说：“枪在你们手里，你们的手指要弯，它才响呀！你们自己打烂的，与我啥相干？”

“哼！你还嘴硬，给我捆起来！”保长骂着，把手里的枪杆狠命向父亲砸去。父亲抓起一根板凳，正要同保长拚命的时候，却被强盗们挡住了。

这以后，我和弟弟就有家不能回了。

父亲又一次被关进了乡公所牢房。这次，他被鞭抽棍打，受尽了折磨。乡保长估倒要牵我家那头牛，说是用作赔偿枪枝弹药和放跑壮丁的罚款。爷爷从病床上爬起来，拄着拐杖走到牛棚前，看着那些比豺狼还凶的恶人要抢老黄牛，他气得身子打抖，那牛也发出了“嗷嗷”的恨声。牛被拉出了院坝，爷爷眼里的怒火烧得通红，忽地昏倒在地上。

①扯回销：即答复的意思。

我和弟弟听得父亲带着满身伤痕回来，家里唯一的牛儿也被抢走，心里急死了。晚上，我们摸黑回家看看，父亲抚摸着我和弟弟说：“家里实在呆不住了，你们自己去逃生吧！”父亲哽咽着，爷爷在病床上抽泣。

高高的跌马苗寨能够万木丛生，可是偏偏没有我们苗家儿女安身的地方！

我们告别了爷爷和父亲，告别了养育自己的土地，走上了不知去向的山岗。回头望去，远远地还看得见等几坡上爷爷和父亲的身影。

半月之后，弟弟在金尼乡落脚，给一家地主当长工，我逃到中沙乡租了地主的两亩地耕种。没有料到，中沙、赤水两乡的乡保长串通一气，又来抓我的壮丁。

腊月二十，我正在半岩上砍柴，忽然岩下出现一大群乡丁，为首的就是我老家跌马苗寨的保长。我正想躲藏，不料他歪着脖子骂开了：“侯苗子，我说你跑到天边，也逃不出我的手掌！快下来，跟老子走！”我站在半岩中，上、左、右三方全是悬岩绝壁，下岩的唯一一条小路又被保丁把守了。我只好硬着头皮往下冲。终因人单力弱，又一次落入了罗网。

当天，我被捆到三十里外的纳盘乡上。腊月二十九那天下午，看门的乡丁突然告诉我，说我父亲来了，我真是惊喜交加。父亲对我说：“你爷爷几天前就大烧大热，又听说你被抓了壮丁，心里又恨又急，病情越来越重。今天早上才打听到你的下落，我赶了来……”父亲的话还没有说完，乡丁就把他叫出去了。

父亲被叫到乡长面前，乡长问：“你是侯少伦的父亲吗？”

父亲点点头。

“今年收成如何？”

“我家土地抵债当出去了，只打猎。”

“打了多少野物？”

“家里有病人，半个多月没有上山了。”

“喂猪没有？”

“乡长，人都没得吃，哪里还喂得起猪？”

“喂鸡没有？”

“有一只，是准备给老人熬药吃的。”

“想你儿子回去吗？”

“怎么不想！”

“那好，明天过年，我这个人逢年开大恩，你马上回去，带上一腿山羊肉，加上那只鸡，明天就可以接你儿子回去了，一家人团团年嘛！”

父亲强忍着深仇大恨，咬着牙，答应回去提鸡。山羊肉暂时没有，说退后几天再送来。乡长也就勉强答应。

第二天中午，父亲把鸡提来了。我才走出了牢房。

一路上，父亲催着赶路，说爷爷已经汤水不进，病情十分严重。我们三步并作两步往回赶，到家时已经黄昏。推开门，我马上跑到爷爷的床前，但不见他老人家的影子。问问近邻，也说不知道。我和父亲打着火把遍山找。来到等儿坡，在我母亲的坟前，蓦地看见爷爷倒在那里，两手向前伸着。我急忙跑去扶起爷爷。

“啊！”我不自主地惊叫了一声，“爷爷，爷爷啊！你的孙儿已经回来啦！”在漆黑的除夕夜空中，我凄惨的哭声没有尽头……

大年初一早晨，在等儿坡我母亲的坟前，又垒起了爷爷的一座新坟。

交不完的力租

李银洲

地租重如山啊，
劳役多如毛！
顶首加千遍，
拉罗①象狼嚎。
千人血汗被喝尽囉，
大人娃儿命难逃。
苗家世代受苦难，
何日砸烂这铁牢！

这是解放前的一首苗寨山歌，它是我们苗家血泪斑斑生活的真实写照。

我的老家早先在红沙梨子坳。那时候，爷爷租种大地主王兴田的地。年年辛勤劳动，年年交不清地租。爷爷有一手石工好手艺，砌坎、垒埝、修桥、打磨，样样行。有一次，王兴田对我爷爷说：“你欠的租子，交不清粮租就交力租吧，将就你有气力，又会做石匠活，帮我垒田改土，抵欠租算囉。”就这样，爷爷和一帮穷乡亲，开山取石，不知打秃了多少根钻子，换过多少把手锤，也不知抬断了多少根杠子，磨破过多少次肩膀皮，用石头把

①拉罗，苗语，即财主。

古家沟锁起来，先先后后造了大大小小几十块梯田。

梯田垒成了，爷爷的头发渐渐白了，眼睛昏花了，气力衰竭了。王兴田眼看从爷爷身上再榨不出什么油水，就硬撵爷爷搬家。爷爷被逼得无法，带着奶奶离开了梨子邨，跑到贵州的石角闹，租种大地主张福贵的地。

有一年腊月，呼呼的北风吹得人浑身发抖，雪象筛糠一样往地上洒，穿篱漏壁的破草房在风雪中直是摇晃。爷爷年老体弱，又冷又饿，坐在火塘边。张福贵的狗腿子满嘴酒臭地闯了进来，吼道：

“老苗头，你怎么稳起？今天张二公接大少奶，喊你快去抬彩礼。”

爷爷说：“我家老的老、小的小，大风大雪天，实在没合适的人去。”

狗腿子把眼睛一眯：“那个管你那么多？有话你去对张二公讲。”

爷爷颤抖着走拢张家大门，张福贵愣起一对牛卵眼，指着我爷爷骂道：

“老苗头，你安心臊我的皮？还不快点来抬起东西走？”

“我这把年纪，腿脚都不灵活，怕误了你家喜事。”

“少废话，抬不起滑竿、轿子，你就抬轻的。”张福贵边说边把一对礼壶^①塞到我爷爷手里，用手推了一把，“快去撵接亲的队伍。”

风，吹个不停；雪，下个不止。难走的山路盖上了厚厚一层

^①礼壶：接亲时用作盛酒的锡壶或铜壶。

雪花，一些沟沟都快要填平了。

第二天下午，接亲的队伍回来了，却不见我爷爷的影子。乡亲们说，昨天在路上就没有看见他。奶奶慌了，拉着当时还年幼的爹，沿路找去。结果在一个树林里找到了，可是爷爷早已活活冻死了。

张福贵倒咬一口，说冲了他家的喜，硬逼着奶奶赔偿他那对礼壶。奶奶有冤无处诉，只好带着年幼的爹，逃到芦竹山下，去帮大地主谢海秋。

在苦难的岁月里，爹成了家。

家里除了爹妈给地主种地、服劳役外，我和弟弟从四、五岁起，也要给地主捡柴、割草。

谢海秋是个大地主，又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清乡司令。他既当官，又当匪。他规定地租不收粮食，要收鸦片烟，硬逼着我们改种鸦片。到时候，他派人把他的六成烟租从地里割去，我们应得的四成还没有到手，他又暗中勾结乡长韩定轩来催收什么烟税、厘金税、护种捐、团防捐……一年累到头，结果还是两手空空。

转眼我已经十五岁了。爹妈用他们勤巴苦做积攒的一点钱，给我办亲事。

妈对爹说：“孩子的喜事，还是要请人看个日子，取个喜庆。”

爹说：“简单点算了，听说韩乡长家要娶儿媳妇，将就他们的日子办吧！”

妈想了一下说：“也要得，他们选的日子，想来我们也是吉利的。”

事情就这样定了。

在简单办过喜事的第二天晚上，夜已深了，我们一家人都已睡下。隔几根田坎那边，韩乡长家娶儿媳的热闹声，还听得清清楚楚。突然，汪！汪！汪！一阵狗叫，紧接着“嘭”的一声，我家的大门被踢开了，一、二十个匪徒扑了进来，满屋乱抄乱翻，只差没把茅草房抬了起来。凡是他们看得上眼的东西，都被抢走，坛子里的几升米，也倒进了他们带来的大口袋。一个满脸络腮鬃的土匪，象狼嚎一样逼着我爹：

“你家的银元、粮食藏到哪里去了？快给老子拿出来。”

“藏到哪里去？银元在谢司令的钱庄上，粮食在韩乡长的仓库里。”

“啪”的一声，爹被打了一个耳光。

那土匪又说：“你在这里不说，换个地方叫你说，我不信你刚接儿媳就没有钱、粮。”他喊了一声“捆起走！”爹就被这帮匪徒拉毛子^①带走了。

隔了一天，有人带封信来，我们认不得字，妈和我赶忙拿着信去找韩乡长，正好谢司令也在韩家。韩乡长把信看了一下，掉头又看了看谢司令，然后对我们说：

“你爹有下落了，要你们去换人。”

妈听了一惊，忙问：“换人！要哪个去换？是银洲还是要我？”

韩乡长冷笑一声说：“哪个要你们去换？”他拍了拍信纸说：“要你们拿三百块大洋去把人换回来。”

我一下傻了眼说：“不说三百块，三块也难啊！”

^①拉毛子：被匪徒拉去作人质，受害者的家属要用钱或物资去换才能把人取回。有的地方叫绑票。

妈两眼饱含着泪水说：“这不是逼着牯牛①下儿吗？”

谢司令在一旁眯起眼睛说：“你们还是快回去想想办法吧！把人换回来要紧。”

我妈接着说：“谢司令，韩乡长，在你们眼皮底下出的事，你们不能不管啊！”

他们两个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装模做样地叹气说：“这事不是我们不管，我们弄不清头绪，无法管，也不好管啊！”

回到家里，妈对我说：“完啦！只有等着去抬你爹的尸了。”

汉族、苗族的穷乡亲们听说后，你半块钱，他一升米，都勒紧裤带为取我爹凑钱。十天、二十天过去了，钱还没凑到一半。一天，天刚亮，一个头部黑糊糊的，衣裳烂成襟襟的人扑进屋来。定睛一看，啊呀！是我爹，偏偏倒倒要跌下去，我和妈赶忙上去扶住他，爹一下子昏过去了。

爹遍身是伤，头发被烧焦了，满脸都是果子泡，有的已破皮，正在流血水。胸口上有几处铁烙的伤痕，手上脚上都是绳子捆的印。过了好一阵，他才醒过来说：土匪弄我去，等了二十多天不见你们拿大洋来取，就把我朝死里整，三番五次地打、吊、烧，脱光衣服，推我睡荨麻，把我整昏死了好几回。幸好昨晚有个象是煮饭的，悄悄掀开门对我说：

“苗老乡，你快跑。”

“大哥，你贵姓？”

“苗、汉穷人都一样受难，你就不要问了。”

“你们是哪一股的人马？”

①牯牛：农民一般叫公牛为牯牛。

“风吹坝的张老摇，你知道了也奈何不得。”

啊！张老摇，是韩乡长的拜把兄弟，是谢司令收编的队伍呀！

在那个官、匪一家，遍地豺狼的世道，我们到哪里去伸这个冤啊！

芦竹山下我们是不能再住下去了，乡亲们也劝我们将就大家凑的一点钱，换个地方佃点地种。

爹带着一身伤，又带我们回到了红沙。

回到红沙，佃了地主王玉生的地。

不久，爹因伤势过重，含恨死去。

逃出了魔窟，又陷入了狼坑。爹死后，地租、顶首和劳役，一齐压到了我身上。

王玉生的地租照样是铁板租。交不够就算欠租，利滚利偿还。有一年天干，眼看收成不好，王玉生带着狗腿子，提着大斗，到田里对我说：

“李银洲，今天我跟你来个现打现收，谷子打下来，过了斗，你就往我家挑。省得你往回搬以后又给我送，多跑路，又费时。”

我一听，知道他是怕歉收，到田里来抢收租子了。我说：“刚打下来的湿谷子，不好算啊！还是等晒干了，给你送去吧！”

王玉生露着他那满口被鸦片烟熏黑了的焦牙，笑了笑说：“那就不必囉！我自己叫人晒。”他鬼眼儿转又说：“湿的先就按五成折吧！”

我心头一凉，“天呀！再湿的谷子也不止五成啦！今年虽说天干，谷子有点影响，无论如何也得折个六、七成。”

王玉生一下跳了起来吼道：“你不要太不知趣了，湿的拿去请人晒，工价该不该你付？嗯！至少算一成，稗壳风净算一成半。我给你算五成，还是便宜你了，我都吃亏一大节。”

这一来，累死累活的血汗，全都装进了王玉生的大斗，我们只从田里拖回了几堆谷草。

王玉生不但在地租上盘剥我，而且在顶首上也不断地设圈套、编套套进行压榨。

从芦竹山迁回来，佃王玉生的地时，我们把乡亲们为救我爹湊的大洋全部作了顶首。隔了两年，王玉生找我说：“眼下大洋行市不稳，往下跌，你交的顶首全是大洋，为了不亏你，我给你折成粮食算了，粮价即使变，斤头在。”他没等我答话，就拿出一张写好的新佃约，端出一个连盖盖都打开了的印泥盒子，逼着我盖指拇印。

又隔了两年，王玉生说：“现在国民政府禁止拿粮食当现金交易，要用法币，你交的顶首原折成粮食，违反了规定，找你来，就是把粮食折成法币。”说着，他又拿出一张新佃约，指着说：“以这张字据为准，过去的不作数。”这次，他连指拇印都没叫我盖，说：“我们都是多年的老主客囉！不消盖，我王玉生信得过你李银洲。”

一折、二折、三折，我交的顶首，由大洋折成粮食，粮食换成法币，法币又变成关金券，关金券又兑成金元卷。折过来换过去，佃约也不知换过多少次。有一次，王玉生找我去说：“李银洲，你交的顶首，买杯茶吃都不够茶钱，你要想办法哟。”

事隔不久，王玉生又把我喊去。他睡在烧鸦片烟的床上，眼睛半睁半闭地说：“那顶首，你加还是不加？加，就赶快交来，

不加，你就搬起滚。”

“这两年收成都不好，交了租，我一家连糊口的都没有，哪里还有钱来作顶首，主人家也要替我们当佃户想想。”

王玉生火了，一下从鸦片烟床上跳起来，说：“我替你想想？你就不替我想想！我鸦片烟账都背了一大碗，不加顶首我拿啥来开销？”他接着又说：“你没有钱，就拿东西抵，也行嘛。”

“吃的在肚子里，穿的在身上，一年四季，一双脚连草鞋都没有套一双，我有啥子东西抵哟！”

“没得东西！你那条大黄牛呢？”

轰的一声，我头上象响了个大炸雷，把我震得昏了过去。我又气又恼地说：“我一家几条命，都拴在大黄牛身上，靠它犁田做庄稼。你把牛牵了，我们还活不活命？”

“嗨！牛抵了顶首还是让你喂，由你使，我王某晓得关照你。”顿一下，他又说：“就这样定了，明天找人写个条条，红疤黑迹立个凭据。”

不知什么时候，王玉生走了。我回过神来，只觉得四周空荡荡的，静得怕人。

王玉生把大黄牛牵走了，他把我家盘剥得一千二净。牲口没有了，地也无法种，王玉生硬说我人懒，荒了他的地，便估倒把地抽回，把我一家撵走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另一只吃人的狼早又向我张开了大口。

地主王玉如，就是那个用开石造田的劳役，压榨了我爷爷一辈子的老地主王兴田的儿子听说王玉生夺了我的佃，便把我找去，说：“李银洲，我看你穷得可怜，来，我划点地给你婆娘种，拖养你那几个娃娃。我不要你的顶首，但除交地租外，你要随喊

随到，到我家干点力气活。”

从此，王玉如对我的“可怜”，就是对我设下的一个无底的陷阱。

王玉如在红沙开了一个槽房，要用大量的水，就给我立了一个水租。不管是炎热的夏天，还是风雪严寒的冬季，一年三百六十多天，都要给他的槽房挑水。那个能装几十担水的大黄桶，要经常装得满满的。我也记不清挑断了多少根扁担，挑烂了多少担水桶。王玉如烤出的酒，变成粮食装进他的仓库，变成大洋装进他的柜子。

王玉如在大麻窝有一块两亩多地的菜园，给我立了个菜租。犁地、栽种、施肥、薅草、除虫，直到收获，都要我干。每捋一次菜，那一百多斤重的大粪桶，就要挑五、六十挑。我和妻子，还加上几个穷乡亲，汗流浹背要忙好几天。一年四季种菜出力，可是我连一片菜叶子也吃不上。

王玉如一家烧锅煮饭要用柴，就给我立了个柴租。特别是接近年关，还要冒着大雪大凌到四、五里外的沙子坡、双沟去打柴，供他家过年使用。一天上午，王玉如躺在他暖和的鸦片烟床上，过足了瘾，把我喊去说：

“天冷不好做其他活路，去，上山砍柴，比躲在你那烂草房里热乎嘛。”

“雪都封山了，路又不好走，脚僵手冷，不好砍啊！”

王玉如“呸”的一声，说：“你的歪歪道理还多哩！大雪、天冷，只吓得倒懒汉，还不给我快去。”他一边说一边去取那挂在门背后的马鞭。

我一看势头不妙，赶快退了出来，边走边恨：“你不懒，你

咋个不去砍一回柴？你睡在烧着火盆的屋里，还穿着大皮袄，当然不冷。我李银洲身上只有一层麻布，还光着两只脚板呐！”

我背起背架，提着斧子上了沙子坡，好不容易砍到黄昏，才背了一大背柴回来。刚放在柴房外边，王玉如象只耗子一样不知从哪里钻出来，偏着头看了看，又用脚踢了一下，冷笑一声，张口便骂：

“狗日的偷奸耍猾，一回就背这儿块柴，想吃鞭子啦！”

我不禁怒火攻心，直杠杠地顶了回去：“说话不怕牙巴痛，不下力气哪知柴块重，这又粗又长又湿的几块大青桐压在身上，少说也有一百五、六十斤重，要让你背，把尿挣出来，你也背不起。不信，试试看！”

王玉如听了，狠狠盯了我一眼，“你，你……给我滚！”

王玉如的槽房烤酒要用煤，冬天他家烤火也要用煤，于是又给我们立了个煤租。从红沙到小堡、排楼去背煤，来回差不多五十里。他限定每人一次背两撮箕，共一百二、三十斤。凡是他的佃户，都有这项煤租。一些妇女、娃儿、老人，都是早晨去，晚上回，背着煤一路走，一路哭。项仲林是个快六十岁的老人，家里只有一个烧锅的老伴，也是五十多岁的人，又是个小脚。项仲林去背煤，由于人老力气衰，只好把煤分作两背，分几段路程转运，他老伴摇着小脚去接他，快运到槽房时，又赶快把煤倒给项仲林一个人去交，怕被王玉如发现，就要估倒交两个人的煤租。有一次五十多岁的项仲田去背煤，气力不大好，累得火星冒，说了几句不满的话，不料被王玉如听见，招来了一顿马鞭，打得项仲田一身是伤。打在项仲田身上，疼在我们穷人的心上。我们把这桩桩仇，笔笔恨记在心里，“黑心烂肺的狗老财，不得好死，

总有一天，老子要同你老账新账一齐算。”

王玉如一家人外出，不管到哪里，不坐滑竿就坐轿，给我们立了一个轿租。除了抬他一家，连他家来去的亲友，都要我们抬。有一次，穷乡亲张开权抬王玉如去古蔺县城，滑竿上除了躺着王玉如这头死猪外，还放了一只很重的箱子。路程七十多里，逼着下午就要到。天气热，滑竿又重，张开权累得喘不过气来。他走到打岩，就屙起了血尿，王玉如还扬起马鞭，不停地逼他加快步子。回红沙后，张开权就一病不起，又无钱医治，三十多岁的人，一条命活活送在王家的轿租上。

王玉如喂了一匹马，在我的头上就立了个马草租。隔一天要给他送一背马草，规定要一百斤，而且要好草、嫩草。春天、夏天还好办，冬天真叫人作难，跑遍杨柳湾，走遍马草沟，也割不齐这一背马草。有时跑上十来里路，才能凑足斤头。

一次，王玉如要到扎西办鸦片烟，他对我说：“这次到扎西，我要骑马，马走到外面还是要吃草，你就跟着马在路上交草租算啦。”这样我又成了王玉如的马伕，给他牵马上扎西。第一天晚上宿庙坪，王玉如骂我：

“你这笨蛋，只割得来马草，却牵不来马。人走在前头走得不均匀，马也跟你走得快一阵慢一阵，老子在马上骨头都抖散架了。”

第二天上午到了扎西，他饭都不给我吃，就叫我牵马往回走，我说：“我还没吃饭哩！”他把马鞭子一扬说：“牵马牵得不好，没有给你吃顿马鞭子就算饶了你，你还想吃饭！”

我强按怒火，牵着马往回走，路上摘了些野果、红籽哄肚子。

第三天天黑回到红沙，王玉如的老婆看见我就吼：“马都饿得叫，你还不快去割草，把马饿坏了，小心你挨鞭子。”我大声地说：“你只晓得马饿，就不晓得我人比马还饿。我是人呀，不要做得太绝了。”

王玉如的这样租，那样租，多得安不上名字。总之，他想要什么租，就向我要什么租；取不起名字就统统叫力租。

地租、顶首、水租、力租……象一条条毒蛇，把我们死死地缠着。

红太阳从东方升起，一九四九年底，古蔺解放了。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，彻底砸烂了千年的铁锁链，我们穷人翻身了，苗家翻身了。

党和毛主席教育我懂得了革命道理，我挺起腰杆和乡亲们一起起来闹革命啦！大家选我当红沙乡农会主任，向地主、官僚展开了斗争。大地主王玉如，没有等到我们清算他的罪行，就畏罪上吊自杀了；王玉生在清匪反霸中，也得到了他应得的惩处。

从清匪反霸到土地改革，由互助合作到人民公社，共产党、毛主席指引的金光大道越走越宽，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。我虽满七十岁了，但为革命种田我还是劲头十足，一年还出三百个工。想想过去的苦，看看今日的甜，我常教育我一家后代，要幸福不忘毛主席，牢记血泪仇，永跟共产党，革命不回头，把我们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建设得更加美好。

死地主抢活人屋

杨在宣

我们这里有一匹山，名字就叫大山。这大山，耸入云天，山势自西向东绵延十多里。早年，山上岩高坡陡石头多，土地又瘦又薄，但处长满荆棘，郁郁葱葱的柏树你挨我挤，有的有合抱粗。林中不时有野猪、豹子出没。这里长年云雾缭绕，但雨水却很少，吃水要到一里开外的青桐坡去背。

听爹说过，我家从祖祖那一辈起，就租种地主罗锐甫家的地，住在这大山上的柏香坳口。祖祖搬到这里时，只有几堵半截土巴墙的茅棚，晴天遮不住太阳，大雨天，屋里便落小雨。荒坡上，没有巴掌大一块田，只有零零星星几块屎不生蛆的土。罗锐甫家的上几代就是刁钻刻薄、十分狡诈的地主。凡是种他家的地，不管天干水涝，租子一颗不能少。传到他的老子，整人更凶也更精了。这家伙是一个干筋筋，颈子长，鼻子弯，嘴巴尖，吃喝嫖赌抽大烟，肋巴尖上挂算盘的人。暗地里人们给他取了个绰号叫“饿老鸱”。当上他家的佃户，犹如进了阎王殿，就是不死也要脱掉几层皮。整垮一家后，“饿老鸱”又花言巧语一番，哄骗那些无路可走的穷苦庄稼人，给他当牛做马，累死饿死在这鬼都不生蛋的地方。

我们家几代人在这大山上，种田帮人，安山打猎，洒尽血汗，累断筋骨，养肥了地主；而自己只能半饥不饱，苦度日月，

只剩人没被“饿老鸱”啄食掉。

一代一代历尽千辛万苦，总算盖起两三间遮雨避风的茅屋，并在房前屋后，培植上绿竹翠柏，桃木李果。屋当门半坡上有一条到马司的捷径，常有不怕坡陡路窄的人过往。不管是汉族、苗家的穷苦人经过这里，都爱到我们家坐坐歇口气，喝碗凉水，烧锅山烟^①，摆摆龙门阵。而那些地主老财，是从来不会在这条山路上踏个脚印的。就是罗锐甫家收租，也只派狗腿子公鸭嗓来催交。在那吃人的世道里，有不少人常称赞我们的住地——柏香坳口是一个好地方。

爷爷在世时，曾看见两个风水先生跑上大山，转了几天。不久，就传说这大山上有一块宝地，谁要是葬上了，将会儿孙满堂，做官发财，有享不完的荣华富贵，受不尽的功名利禄。那些有钱有势的人，纷纷带起风水先生进山来找宝地，还引起过狗咬狗的斗争。罗锐甫的老爹，那只“饿老鸱”，凭仗权势，也带起一帮狗腿子上了大山。大山上早有不少地方插了标记，他一见暴跳如雷，叫狗腿子把那些标记统统拔了，插上自己的木牌子。忙了几天，“饿老鸱”下山时跑到我家恶狠狠地对爷爷和爹说：“你们住在这里，给我守住大山，不准人找阴地，要是发现有人来找，立即向我报告。”最后，还假惺惺地说：“你们要是看管得好，每年就减两成租。”从那时起，我们家种的地上，有好几处被财主插上了阴宅的标记，硬说是龙脉，不准动土，栽种面积越来越少。虽然偷偷开了几块生荒地，收成还是年年减少。

隔了几年，那两三间茅屋挤不下一大家十几口人了，再苦也

^①烧锅山烟：即抽一袋自己种的烟。

应该有一个窝窝。爹妈起早贪黑，割茅草，扯葛藤，砍竹竿，跟人换工，亲友帮忙，好不容易才盖上了两间矮小的茅屋。爹妈带着我和妹，一家四口与老一辈分居了。盖房那年天旱，包谷大半没背包包就烧得燃，豆豆果果有的不够还种。我们一家是“秋来镰刀爬壁头，蕨根葛头来糊口，铁板租子是铁板，压得全家泪长流。”

罗锐甫的管家，就是那个公鸭噪，已经上门催了几回租。爹妈跑了几天才借回两斗粮食。一天早晨，爹妈饿着肚皮背粮去交租。这时我才七岁，也找来一个夹背儿装了一升，给爹妈减轻点担子。一路上，爬坡上坎，又累又饿，把吃奶的力气都使完了，才到了“饿老鸹”家。

“饿老鸹”见我们是背粮去，叫公鸭噪给我爹倒了一碗冷茶。那张猴儿脸露出一丝阴险的笑，“饿老鸹”嘴一张，冒出：“老闫，修新房子啦，恭喜，恭喜。”这声音比豺狗叫唤还难听。爹不得不应酬了一下。我们茶都没喝完，“饿老鸹”的魔爪早使劲地插到背篋里去了，抓起一把包谷左看右看，又放到岩鹰鼻子前闻了又闻，尖嘴巴都扯歪了，忽将一把包谷撒到我爹的脸上，一手抓住他那装有铜嘴铁锅的大叶子烟杆，指着我爹恶狠狠地说：“你就拿这种烟熏火炕的臭包谷给我？”

“这还是借来的。”爹为难地说。我瞪了老东西一眼，把地上的包谷一颗一颗地捡起来，真想夺过烟杆揍那“饿老鸹”一顿才解恨。

“我的地喂大了你家几辈人，又修房盖屋，你们就这样昧良心！”“饿老鸹”数落我爹。

“你不要，我们就背回去！”爹也发火了。

“放着，我拿来喂猪也要得。”老地主忙改了口，象镶在岩框里的眼睛闪了闪说：“今年算了，看在几辈人的老主客面上。回去把我那山上的阴宅看好。”

“大公说得是。”公鸭嗓向“饿老鸱”点了点头。

“我家几张嘴要吃饭，没有那份闲心！”爹没好气地说，“走，我们回家。”他把几个背篋重在一起背上，牵着我的手，我们愤愤地离开了虎狼窝。

两岁的在妹瘦得皮包骨，常扑到妈怀里哭喊：“妈妈吔，我饿呀！”“咪采^①，乖，明天妈就煮干饭给你吃。”一天又一天，还是只有吃草根，吞树皮，能吃上一顿包谷粉粉搅菜，妹妹也就高兴了。我每次拣柴、挖野菜回来，不是给妹妹采几朵山花，就是摘点栽秧泡、毛刺榴、红籽^②回来，哄她玩，香她嘴，免得她缠到妈做不了活路。

一天，爹帮人干了一天活，累得伸不直腰，天黑了，才气喘吁吁地回家来。刚才学会走路的在妹，尖声尖气地喊着“斋”，歪歪扭扭地扑上去。爹脸上掠过一丝苦笑，把妹妹抱在怀里，边取挂在腰杆上的篋篋儿，边叫我拿碗。在妹连连叫“斋，我要吃饭。”“慢点，等哥哥拿碗来，你们一个吃几口。”我一看是包谷米和干板菜^③做的饭，心里就高兴。我们家就连这样的饭，好久都没有吃过了。爹妈看我们大口大口地吃得香，蜡黄的脸上更添了一层愁云，眼里滚出一串热泪。

这天晚上我睡得又香又甜。

“嘎儿啦啦——”一声惨叫把我从梦中惊醒。我一骨碌翻身

①咪采：苗语，即小女儿。 ②栽秧泡、毛刺榴、红籽都是野菜名称。

③干板菜：即晒干后的老青菜。

坐起来，紧紧地搂着爹，心儿象打箩柜，叮咚叮咚跳。爹屏着呼吸，静静地躺在床上听。

“斋，啥子叫唤？”

“狗。”

“是豹子咬牠吗？”我最喜欢家里喂的那条花狗。

“不是。”

听到爹安祥的声音，我放心了，胆子也大了，便朝牛肋巴窗洞望了望，黑糊糊的，天还没亮。

远处，隐约传来锣鼓、唢呐声。突然，屋后一阵急切的喊声：“杨老闰，……杨……杨苗子！”

屋里黑漆漆的，我身上起了层鸡皮疙瘩。爹摸着我的光溜溜的脊背说：“不怕。这是罗家那条狗，睡吧！”我迷迷糊糊的，又听到爹自言自语：“苗家没作亏心事，不怕半夜鬼叫魂；任你狼嚎虎啸急，不等天亮不开门。”妈喃喃地说：“再听听，究竟有啥子事？”

又是一阵急促的喊声，爹还是没有答腔。那破响篙儿响得更急了：“杨老闰，你还挺起干啥子？大公昨天早晨就升天了，你还不快去帮忙，实在没有良心！”听口气，公鸭噪比死了他亲爹还急。

“早该死了！”妈在床上小声地说了一句。

“升天了，就好嘛！”爹大声说着话，翻身起床下了地。

“爹，啥子飞到天上去了？”

“‘饿老鸱’死了。”

一听说是那个干筋利爪、象个僵尸鬼的老地主死了，我心里真高兴，跳下床就朝门口跑去。天亮时的山风冷飕飕的，我打了

两个寒噤。我家那条花狗跑得远远的，还在阴一声阳一声地叫。在这柏香林中，天亮得更慢，看不清公鸭噪今天是啥面目，只听他哈声哈气地说：“罗锐甫乡长说的，他‘老人生前就定下了，归天后要在你家立（Kú）。””

“你在说梦话不是？世间哪有死人立活人屋的？”爹气冲冲地说。

“风水先生观了天象，对了甲子，要在今天巳时‘落井①’。挖‘金井②’的马上就到，你也算一个。”

“我今天要去帮人，找碗饭吃。”

“你不要装疯迷窍的。快点搬你家的东西！”公鸭噪嘎嘎叫。

“你不要狗仗人势。怎不把死尸埋在你家屋头。”

“杨苗子！你别出口伤人。我只不过是传达乡长的话。”

“他咋不搁在自己屋头，一家人陪倒？”爹气呼呼地说。

锣鼓、唢呐，吹吹打打，闹麻麻地从坳口那边响过来了，公鸭噪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：“杨老闰，你别磨牙，误了乡长的大事，叫你吃不完兜起走！”这时，被罗锐甫逼来挖“金井”的人到了。中间有一个穿戴特殊的人，肩膀上挎着一个布口袋，到了土坝子头，也没跟其他人打招呼，就朝我家房前屋后张望。公鸭噪忙迎过去：“先生你先歇一会儿。这房子，这房子还没有拆。”

我一直站在门口，听说要拆房子才跨出门来。天已经大亮，看清了那个挂布口袋的脸面。他苍白的左脸上有几个大麻子窝窝，右下颏有一撮黑毛，眼睛肿泡泡的。公鸭噪见这人不说话，翻了几下白眼胆就叫开了：“乡长说大公生前就定了，要在他家

①落井：下葬。 ②金井：挖埋人坑。

立，那就快拆房吧！”

大家都站着不动。

风水先生皱了皱眉头说：“等乡长来了再说。”

爹没理睬风水先生和公鸭噪，只顾和那些来挖“金井”的熟人说话，请他们坐。我忙着端出板凳。

“怎么还在打堆堆，这阵了，还没动手破土？①”一声吼叫把大家的闲话打断了。

公鸭噪和风水先生一愣神，忙向一个披麻戴孝的迎上去：“乡长，有点不好办。”

“啥子事？”肥猪样的乡长恶狠狠地问。

“神灵宝地原来是这家的屋基？”风水先生反问道。

“嗯。”

“老人生前定的？”

“拆”乡长把手一挥，两只充血的眼睛眯得有铜钱大，象一条打人牛。“杨老闰，大公魂归西天，香骨要立这屋基地。现在就拆！”

“乡长，不行啦。”

“啥子不行！”

“那个地方嘛！”

“嘿！我的地方，还要你来安排？说拆就拆，马上动手！”转身又向大家吼道：“你们望到干啥子，还不动手给我拆！”

大家交头接耳议论纷纷，就是没有一个人动手拆房子。公鸭噪嘎嘎乱扑腾，风水先生傻了，罗锐甫抓耳搔腮团团转。

①破土：挖土。

一阵嚎丧声涌着八个人抬的丧①过来了。前面四个乡丁提着夹板枪开路，还有十几个耄木板的前后左右忙。后面十个乡丁扛枪护灵，锣鼓、唢呐队紧随，再后是一长串嚎丧队和他家送葬的一大串孝子……

妹妹吓得哇哇哭，紧紧地贴在妈妈怀里。

罗锐甫滚过去扶丧护灵忙了一阵，又对逼来挖“金井”的人吼开了：“你们吃饱了动不得吗？”还是没人理睬。风水先生向罗锐甫说了句什么，他就象一头受了伤的野猪乱咬起来：“杨苗子，耽搁了时辰，老子可不饶你！”

“我们一家活人要立房子！”爹气急了。

“我这大山上任你修！”

“找碗饭吃都艰难，还能修房造屋？”爹不听他那套。

“杨哥，我看你也是懂道理的。”风水先生奉承了一句，狡黠的眼光一闪，又说：“好汉不吃眼前亏。不瞒你说，这个屋基是一个阴宅，葬福气大的人有用；住阳间人是不吉利的。”

“谁信你那一套！”

妈哄着在妹没哭了，忙向风水先生说：“先生，你给老东家另外找块阴地吧。拆了房子，我一家到哪里去避风雨哟！”

“我有啥子办法。你们亲耳听见，刚才乡长说这地是他爹早年就看定了的。今天我只给指点拨‘迴头②’，掐算垒坟第一锄该那个时辰动，你们还是快搬东西，不要误了时辰……”

“少跟他们囉嗦了！”罗锐甫一听“时辰”两个字就咆哮起来：“上！”

①丧：这里指棺材。 ②拨迴头：即用罗盘指方向。

十几个家伙不知所措，抱着枪，挤在那里东张西望，究竟“上”哪里，搞不灵醒^①。罗锐甫气急败坏：“饭桶！拆房子！”几个乡丁才清醒过来，威逼大家爬房。爹妈去阻拦那两个爬房的乡丁，爹被推得老远，妈的腰杆上挨了一脚尖，顿时倒在地上起不来；在妹从妈怀里滚出去，好久才哭出声来。我扑过去要抱妹，要救妈，狠狠地咬了踢我妈那个乡丁一口。他一把抓住我，正要下毒手，被逼来挖“金井”的穷苦人见了，大吼一声：“不准打人！”接着就把我们一家护到一边，一个个牙齿咬得咯咯响。

罗锐甫横眉瞪眼狂叫：“不要管他们，先拆房子！”那些乡狗狗儿^②、保长、嚎丧的、送葬的，象蛆一样乱拱，有的爬上房顶，有的钻进屋里，茅草竹竿、锅盆碗盏、罐罐罐罐，稀哩哗啦被摔得满天飞。

“埋死人，也该给我们活人留条生路啊！”妈呼天抢地，向罗锐甫扑去。

“老子今天跟你拚了！”爹在那甩出来的一堆乱糟糟东西里，拖了一把捞刀^③，猛地向罗锐甫砍去。

这肥猪见势不好，往一砣大石头旁边一蹿，躲过了爹那一刀，连纵带跳翻上了一个坎坎，丧魂落魄地大吼起来：“快！快把他捆起来！”

我爹用力过猛，一刀没有砍中，却碰得石头火花飞溅，“咔嚓”一声捞刀把断了。冷不防，被罗锐甫的兄弟、保长罗光普，从背后一个黄桶箍死死地箍住，接着又上去两个乡丁，一下把我爹按倒在地。

①灵醒：即清醒。 ②乡狗狗儿：即乡丁。这是一句骂人的话。 ③捞刀：古时一带喊砍柴刀叫捞刀。

“唉哟！妈呀——”一个乡丁的手被爹咬得鲜血长流。

罗锐甫从坎坎上跳下来，顺手拖起一杆夹板枪。眼看这条恶狼要下毒手，被逼来挖埋人坑的穷乡亲一齐吆喝着。那吓得目瞪口呆的风水先生被吼醒了，脸青面黑地跑过去拉住罗锐甫，断断续续地叫喊：“乡长，不能，你是埋老——老先生，快到了，时辰快……”

罗锐甫听到“时辰”两个字，就象被牛角蜂螫了嚎叫起来：“把这个杂种拉过去！赶快给我拆了，挖‘金井’，别误了大事！”

我爹被五花大绑拖走了。他嘴里一个劲地骂“棒客①！强盗！”

妈也被拉到一边，又哭又骂：“你断子绝孙的罗锐甫，叫你不得好死，死了，猪拖狗嚼；‘饿老鸱’呀，你活着抢我家的东西，死了也不放过，还要抢我家的屋……老天呀，你怎么不长眼啦？看见我们苗家受灾难，你就忍心……”妈直哭得天昏地暗心肝裂。

无奈罗锐甫人多势众，把我们一家赶到一边动弹不得。我多想有几支弓箭，统统把他们射死；或变成一只岩鹰，叼起一把火箭，飞到罗锐甫的家，把他的房子统统烧掉……

那些穷苦人，满含着悲愤都来劝解我爹妈。

风水先生捧着圆盘盘，跑上跳下，左旋右转，忙了一阵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向罗锐甫卖乖：“恭贺乡长，禅龙宝地，坐北向南，日照四时，人财两发，红火万世。”

“不敢不敢，祖宗有德，早定阴宅，魂归西天，子孙守业，

①棒客：乡里人叫土匪为棒客。

共享乡里。”罗锐甫被风水先生吹得象灌了几碗猴孙儿尿，唔哩哇啦也卖弄一番，随手把箍在脑壳上的孝布、长麻都甩掉了。

风水先生施起久跑江湖的惯伎，讨了罗锐甫的欢心，又装模做样地大声说：“留下半间房屋，佃户守坟居住，免遭牛羊践踏，永保棺木不腐，子子孙孙享福。”又假惺惺地转身向我爹妈讨好：“老杨哥，大嫂子，我给说情，房不拆完。你陪着老主人，可免灾息祸，六畜兴旺。”

“不要放屁！”爹鄙弃地吐了一口口水。

我眼里燃烧着怒火，心里暗暗骂道：“都是一伙吃人的狼。”眼咕咕地看到那帮乡狗狗儿，把我家两间房子拆了一间半，推倒三堵土巴墙。那些被逼来挖埋人坑的穷苦人，不知几时，已阴一个、阳一个地钻进柏香林不见了，只有那些乡丁、保长还留在屋基里，呼哧呼哧地挖坑坑。

罗锐甫一帮人埋了“死老鸹”，大部分走了，他跟那当保长的兄弟、公鸭嗓和几个乡丁留在最后，把我爹松了绑，拉到新坟堆前，指着老爹鼻子说：“杨老闯，现在我服孝，不跟你一般见识。从今天起，你四时给我看坟山。倘有牛羊践踏了……”

“我自己的事都管不了。”爹不等他说完，就顶了回去。

“又不是要你作揖磕头、烧钱挂纸！”他那保长兄弟罗光普抢白起来。

“不跟他说那些。若有牛羊践踏了坟墓，加上今天那一刀，我再找你算总帐！”罗锐甫一摆手接过去，喊了声“走！”几条狗就簇拥着他两弟兄直奔山下。

“呸！关老子屁事！”爹咬牙切齿地骂着。

我们家遭了这场劫难，日子更不好过了。

几代人住在这大山上，被榨干了骨髓，落得这样一个下场。离开这吃人的鬼地方吗？在“老鸦有树桩，苗家无地方”的世道里，我们穷苗家又能往哪里走啊！爹妈心都焦碎了，找不到一个安身之地。但又不愿意住那扯得乱糟糟的半间破茅屋，守那死老鸹。

爹妈不愿倒下去，悲愤燃烧着希望，又砍来木头，在那石榭榭里栽上桩，搭了几根棒棒，盖几捆茅草，挤下一家四口。我们要顽强地活下去……一直熬到了日出东方红，翻身见太阳。

受欺凌的唢呐匠①

王少安

早晨，每当红太阳刚刚升起，朝霞染红杉木林的时刻，我不管是赶着牛儿上山放牧，还是同社员们一起下地劳动，听见杉木河的流水声，它就象一支赞颂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、向着四个现代化阔步前进的动听歌曲，使人浑身舒坦，精神振奋。可是在夜深人静时，这杉木河的水声，有时又象唢呐的呜咽，一下把我带回四十多年前的苦难岁月里去了。看看现在，想想过去，使我更加热爱新社会，痛恨旧社会。

我家从爷爷的爷爷起，五代人都吹唢呐的。在旧社会，说起吹唢呐的，在三教九流中也是最下等的人，跟讨口要饭的叫化子的社会地位差不多。就是在我们苗家中，稍稍能找到一碗饭吃的人，也不愿意学这一行。那时，我爹除种地外，还会做石匠活，会杀猪，也会吹唢呐。尽管会干这些，一家人还是穷得没法生活。

我十来岁时，常常捧着爹帮我改小了的唢呐，在屋里火塘边，或在晒坝的月光下，跟着爹学习吹奏。他总是耐心地解说一阵指法，又讲讲吹奏的方法，先吹几遍，我模仿着练习，一遍又一遍。但唢呐的调调太多，没有写在纸上的谱谱，全靠爹口授，

①唢呐匠：即吹唢呐的人。

我边听边念，死记硬背。常常练得口干舌燥，眼冒金花，耳朵嗡嗡响。有时实在累得不行了，我向爹说：

“斋，不练了吧。”

“寿寿^①，为了混饭吃，不学会不行啦！熬着再学一调就歇气。”爹总是苦笑着鼓励我。

日子长了，喷呐里常常流出带血丝的水珠儿。

练啦，练啦！起早贪黑，练了几年，我能跟着爹上场吹奏了。

从此，我也就成了喷呐匠。这喷呐匠又叫吹鼓手，都是对于我们这一行的穷苦人的侮蔑称呼。也有个好听点的称呼，叫做“礼乐师”，不过，都不大叫它。

记得我十五岁那年，玉母寨的大绅粮李世文，仗着当乡长的权势，扯旗放炮做大生。他老早就派人四处传话，让人们去给他祝寿。李世文在做生前三天派人把我们六个喷呐匠找去，答应吹奏五天，给一斗包谷做工价。一到他家，他那个混名“肉罐子”的弟弟李世成，一天到晚，响着破嗓，要我们从早到晚不间断地吹奏。

李世成这个家伙，平时游手好闲，常常在赌场、窑子^②、鸦片烟馆进进出出，再加上他又笼络了一批靛鱼尾鞋^③的无赖，成天提劲打把。谁都恨他，但又把他没办法。这回他登场迎亲接友，指挥礼乐，一切由他指派。

连续三天的早鼓、晚鼓、迎客、送友、摆酒设宴、起床洗脸、洗脚睡觉、收碗打扫，都得按“肉罐子”的铺排，吹奏穿衣

^①我的乳名。 ^②窑子：指妓院。 ^③靛鱼尾鞋的：指社会不务正业，依附权贵仗势欺人的流氓精神。

调、大箩筐、将军令、猪背柳、割韭菜、十杯酒、绣荷包、礼请、瞒天过海等数十种调门。翻来覆去，不准停歇。一天到晚，我们被整得精疲力竭，到头来只给吃两顿冷饭剩菜，半夜过后才能在马圈楼上滚草打个盹。可刚合上眼皮，鸡才叫头道，“肉罐子”又叫魂似地催我们起来吹奏，大家真是满肚皮气。

第四天是生日，李世文的至亲贵友来得特别多，李世成滚得更圆，我们也就更加喘不过气。晌午了，我们还没吃早饭。几个帮忙的厨师，看不过意，给端来两碗饭。我端着碗才咽了两口，李世成滚过来，开口就骂：“你们是饿死来投胎的？还没摆席，就先胀起来了！”

“我们还没吃早饭哩！”爹和几个年长的没开腔，我端起饭碗满有理地说。

“你娃娃还敢对嘴。把碗搁倒！你们眼瞎了吗？客人正在光临，还不赶快吹‘迎亲调’！要是大爷知道你们怠慢了客人，叫你们有好受的！”乒乒乓乓又把我们撵到门口去迎客人。

这一开台，直吹到摆完酒宴，太阳落坡，近的客人都走光，才稍停片刻。大家都巴望能吃饭了，我恨不能立即一口吞下三大碗，于是我随口说：

“我们还是该吃饭囉！”

“你他妈的饿死鬼，真是喉咙管里伸出手来！”李世成这个恶鬼，不知几时又滚到大门口来了，一听我的话，就大声喝斥，“你没看到他们在说‘吉利子^①’吗？还不再给老子吹一调！”

我这才注意到那些穿襟襟、挂纽纽的讨饭人挤在大门侧边，

①“吉利子”：说吉祥如意或恭维的话。

为讨口残汤吃，不知在说些什么。我十分同情他们，也更燃起我心中对财主仇恨的怒火，不顾肚皮饿得叽叽咕咕叫，便向几个同伴使了个眼色，大家把喷呐举到嘴边，就象大河决堤，哗啦哗啦倾诉起我们的怨恨来：

“东也拿，西也拿，
财主是穷人的死冤家；
他们吃酒肉，
我们当牛马。
老天怎不长眼睛，
五雷轰顶把他炸！
神灵怎不来显圣，
举刀挥剑把他杀！”

一曲完了，那“肉罈子”露出一丝丝儿笑，又对我们说：“再来一调。”

看来这家伙根本听不懂我们穷人的歌，大家觉得出了一口气，又会意地来了一调：

“文也拿，武也拿，
乡长是恶霸。
常走螃蟹路，
今天装菩萨。
扯旗做大生，
蒙汗药一把。
几碗烂酒菜，
赚钱变戏法。”

一些乡邻慑于李世文的权势，想方设法才凑了点礼物来“祝

寿”，听到我们吹的唢呐，觉得十分称心，都陆续地到坝子来了。有的点头向我们表示快意，有的话中有话：

“吹得好。再来一调，‘祝贺’乡长大寿大福。”

李世成这东西听到称赞，更得意起来，抹了一把猪肝脸，又敲响了破锣：

“大家助兴，再来一调，你们也好坐席了。”

一个眉须斑白的穷乡邻站在我背后，轻声地提醒我：“可别漏汤汤①哟。”随着又提高嗓门，“对，再吹一调，他们好吃饭。”

我爹先奏了个预备，我们几个随着他的指挥又吹奏起来：

“一把唢呐两尺长，
累死累活唢呐匠。
财主设宴待宾客，
我们含恨奏乐章。
今天吹曲‘水波云’②，
祝他早死早发丧；
‘八句赞’变一节，
听来象支‘满庭芳’。”

我们特地把“今天吹曲‘水波云’，祝他早死早发丧”重复了一遍才停止。那李世成皱了皱大蒜鼻子，好似听到了什么不祥的声音，在人群中间滚了两圈，想找岔子，又说不出个道道来。穷乡邻都为我们捏一把汗。那狗东西不耐烦地哼了一声走了。

到第五天晚上，约莫三更天气了。李世文还在他的正房大厅

①漏汤汤：露马脚的意思。 ②“水波云”、“八句赞”都是唢呐曲调名，要死了人寸奏。“满庭芳”：办喜事吹的唢呐调。

中，陪着从四乡来的乡长、团总、保长和几个有势的绅粮，划拳行令。那“肉罈子”滚进滚出，还在叫喊上菜、烫酒、添汤。每上一道菜，烫一壶酒，都要我们吹一曲。大家冷得发抖，疲倦得眼皮都睁不开，可是他还一个劲地催我们吹，不时还骂：“拿给你们几个吃饱了，为啥还吹得有气无力的？”在上另一道菜时，我们见“肉罈子”滚进大厅去了，在吹“割韭菜”时，中间丢了两节，刚把唢呐离开嘴唇，他就转来指着我们吼：“你这几个苗东西，吹唢呐都要偷懒耍滑头，我要叫你们晓得厉害！”

“我们没有偷懒哟！”见那一伙子花天酒地，还要我们吹唢呐开心，一股无名火早就要爆炸了，我忍了又忍，才不冷不热地冒了一句。

“这个普通的调调，能哄得过老子？刚才吹的‘割韭菜’，为啥中间要少吹两节？”狗东西抖着身上的肥膘叫开了。

“我们补上嘛。”一个年老的缓缓地说了一句。

“补了也不算数，老子要扣四升包谷的工钱！”

“添汤！”大厅里传来呼唤声，他才滚起跑了。

这一夜，那些豺狼、蛇蝎闹腾到鸡叫二遍，才叫爹唤娘地收了场，一个个东倒西歪去挺尸。我们被硬扣去四升包谷，撵出了门。

五天五夜，我们没安稳地睡过一次，没吃过一顿热饭菜，汗水流了几大背，嘴唇裂起血口子，仅仅少奏了两节，就被扣去四升包谷。我和爹分得两升背回家，很久都提不起精神去干庄稼活。

我决心不再干吹唢呐这样的低贱活了，常跟着爹去做其他手艺。可是人家都知道我和爹会吹唢呐，所以每逢官家、绅粮的婚丧嫁娶，奉神祭祀等等，我们还是要被逼去活受罪。

一九四二年秋天，懋溪的大地主李炳军娶儿媳，叫去十个“礼乐师”，从四川到贵州的大坝去接亲，翻山越岭，过河渡水，来去一二百里。路途中，为要显示他李家的富豪，有人缘，有气势，就是爬坡上坎，累得上气不接下气，也要逼着我们吹奏。到了女家，一直要吹个通宵。打回转时，也不准停息、间断。到了李家拜堂时，更逼得我们慌，在震得耳朵发麻的鼓乐声中，还要叫我们提高唢呐音调，只差点没把唢呐管管吹破。我们气极了，正当那一对男女在四礼八拜的时候，大家给他来了一曲“埋人调”；他们端起披红的喜盘请长辈、至亲的礼钱时，我们立即换了一个“吊孝令”；当一大群人簇拥那花花公子引领新娘入洞房时，我们又起劲地奏起了“哭丧调”。只是在吹奏这一串调调时，多少从中略去一节两节，换上一点花梢点的。可笑财主是蠢猪，居然被我们瞒过了。

这李家院子是上中下三重院坝，摆酒宴时，他家的显贵亲友摆在大厅内，吃山珍海味；上坝设平常亲戚席，摆九大碗，中坝是其他客人，酒菜又次一等。宴席摆了一回又一回，唢呐吹了一遍又一遍。不过，有了一些经验和教训，常换调更曲，吐一番苦水，泄一通怨气，诉一段仇恨。这中间也多少夹杂两支带喜庆色彩的“采茶”、“十杯酒”一类的调调，遮掩真意。直到天快黑了，我们这些“礼乐师”才能在下坝吃点残汤剩饭。

这次，我们整整劳累了七天七夜，狠心的财主只给了每人一升半粮食的工价。

后来，我虽多次赌咒发誓再不干这种又低贱又苦的事，但那些官家、绅粮每逢旧历年节，承头组织耍灯，粉饰太平的时候，我还是脱不了手。不管落雪下凌，半夜三更，都得披着破烂的麻

布片片，去跟那些穷苦的唢呐匠一道，从正月初一起直吹到元宵节。

盼星星，盼月亮，终于盼来了恩人毛主席、救星共产党，救了苗家唢呐匠出火坑，翻身当家作主人。

我现在身体还很结实，每天都参加集体生产劳动。一家老小，儿孙满堂，九口人有吃有穿。我决心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，为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，继续新的长征。

血 泪 碑

康 兵

我家大门对面的坟山上，有一块耸立的石碑。碑后一条长长的石埂，把坟场左右分开。石埂的左边，横七竖八地摆了几座坟墓，全是些乱石垒成，荆棘丛生。我的曾祖父和祖父的坟就在这石埂的左侧。石埂右边的几座坟墓，却所向一致，坐南朝北，排列整齐，全部用细钻长条青石精心砌成，大多还立了墓碑。

旧历正月初七那天，父亲领着我们去上坟——按照我们苗家的风俗，悼念我们的祖先。在致哀之后，我信步转游在坟山上，来到石碑前面停下来，碑文还清晰可见：

迺启者兹因昔年苗汉祖坟同葬连处
至后苗汉子孙于祭之日恐黑白不
明故向地保人员讨论解决故立界
限碑为记

左为苗坟右为汉坟

民国三十一年壬午岁三月上旬吉旦 立

我念完这碑文，心里大吃一惊。

记得在我童年时候，曾经多次随同父辈上山，为祖祖上坟，也曾多次在这座石碑前站过，还爬到碑顶上耍过。可是，那时我们老鹰岩苗寨的干人，全都是些睁眼瞎子，上边刻的那些字，一个也认不得。今天，当我第一次细看碑文时，差点把人的肺都气炸！

我问父亲是怎么回事？

只见他先是一声长叹，脸色忽然变得铁青，接着就陷入了深沉的回忆之中，过了好一阵，他才颤抖着说：事情还得从你祖祖这座坟墓说起。

你祖祖去世已经整整三十六年啦！这块界限碑也立了整整三十六载！它可是树在我们苗家心头的一座血泪碑啊！

很早很早以前，我们苗家住在赤水河边的平川大坝，后来被官家撵上雷山关下的绝草岩，种着“官地”，服着那无穷无尽的“搪伏抵马”^①的苦差，世世代代，受尽了煎熬。

你祖祖为了逃避那服不完的苦差，带着我们半夜三更逃出了绝草岩，来到这老鹰岩上安身，租海螺堡大地主周小猫的土地做……

我十六岁那年，挨了一场秋旱，草木干死，禾苗枯焦，不仅家里颗粒无存，还欠了周家一大笔租子。你爷爷和奶奶忧愁得不可开交。为了生存，于是想到了自己开荒。为这件事，一家人商量了好半夜，才决心悄悄地到官地上开点荒，种点菜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天还没亮，除留下你祖祖一个老人守家外，其余都顶着露水到大塘的官地上去开荒。直累到天黑了好一阵，我们才顶着满天星斗回家。

一家老少，起早贪黑，披星星，戴月亮，苦熬苦做，一个冬春开出了一石多粮食的生荒地。秋后粮食全数交了租，全家就靠荒地收的粮食度日子。冬天，我们又继续开荒。从第二年起，每

^① 搪伏抵马，明清时代，封建统治者，把一定的土地划归朝庭直接掌管，交给人民耕种，平时免交皇粮，但要接送来往的朝廷命官，官家兵马，服无偿劳役。苗家称这种剥削方式为搪伏抵马。

做一个工，你奶奶就在皮纸上用香烧个小孔……开啊，开啊；烧啊，烧啊！时间一久，一张张皮纸上，一个挨一个，全是密密麻麻的小洞，象米筛一样，算来先先后后将近三十年。大塘周围那几十石地方，每一寸土地上都洒满了我们一家人的汗水和血泪。可是边开边被周家霸去做了顶首。年复一年，新开的生土变成了熟地，熟地又变成了水田，这些差不多都姓了周。到头来，我家仅剩下了两石包谷地。

就这两石包谷地，富农段云奎早已眼红，想占去同他的地连成一块。地是穷人的命根子，不管段云奎怎么说，爷爷都一口回绝了。

段云奎看明的不行就暗想。每年整田，段云奎就把田坎不断向我家地里扩展。你爷爷气愤不过，同段家争吵了好几回，有一次差点同段家打起来。后来段云奎当了保长，仗着有钱有势，竟指使人抬起大石头，在我家地里砌了半截田坎，硬占去了两斗包谷地。

过了几年，家里人先后结了亲。人口增加，土地减少，日子越来越困难。幸赖一家人起早睡晚，勤耙苦做，加上雨水好，有了点收成，生活也就略有些好转。家中还喂了头肥猪，都满心欢喜，巴望宰了过年猪，安安稳稳过个年。

那年腊月，红军长征经过海螺堡。穷人听说红军为穷人打天下，巴不得红军早点来。可那些地主老财，都吓得屁滚尿流，东藏西躲。腊月二十三，周小猫扶着他的老子，丧魂落魄地窜来我家猪圈楼上躲起，发现了我家那头大肥猪。红军一走，周小猫立即派他的管家来估倒加顶首，抢走了那头肥猪。

第二年正月初，听说红军回来了，周小猫和他老子又来我家躲，不料老地主被我家的狗咬了一口。这老狗是个半条命，红军

走后不几天，他就死了。

老地主一死，周小猫硬说是我家放狗咬死的。他支使狗腿子撵上门来，要我家出钱给他老子买棺木。保长段云奎也跟了来。

段云奎对你爷爷说：

“康大哥，都是乡里乡邻的，我劝你还是委屈点，出点钱……”

你爷爷气得脸铁青，没有答话。段云奎以为你爷爷心在动，于是又翻起了嘴唇皮：

“康大哥，我晓得你手头紧，看在乡亲份上，我家给老人留的两副棺木，随便你去挑一副。至于价钱嘛，段某决不会为难……康大哥，反正我还想买点地，干脆……”段云奎打了个顿，将吞了回去的话又吐出来：

“干脆将大塘那点地抵给我，再补你一点钱，如何？嘿嘿……”

我在一边听着，不禁怒火直冒。正要开口，忽然你爷爷恨恨地说：

“承保长的情，用不着你费心。”

你爷爷越说越气，指着周家的狗腿子质问段云奎：

“段保长，你是个公事人，请你评个理。周家两爷子两次三番来我家躲红军，是他自己来的，还是我康家请他来的？接他来的？还是用八抬大轿抬他来的？走了还要暗算我一头大肥猪，现在要我买棺材，道理从哪里来？”

再说，他不来，狗怎能咬到他？何况他是病死的，关我姓康的什么事？”

狗腿子灰溜溜地走了，死人还是周家自己埋。

段云奎的算盘落了空。但他并不罢休，千方百计要把我家整背时。

头一回，滇军过雪山关，段云奎借口运军火，硬拉了你爷爷的伏。无可奈何，把家里仅有的一条牛卖掉，外借两元加起，共送去十二块大洋，才将你爷爷放回来。

没隔多久，段云奎借口筹军粮，派我家出八斗大米。你爷爷气极了，但有苦说不出，又硬着头皮去向周小猫借债，划了五斗土地给周家作抵押。

苦苦熬了两三年，好不容易才把土地从周家手里取回来。

一九三八年夏天，段云奎来抓丁，把我们包围了。我跳田坎跑了，你么爷却被抓住。他把你么爷关了四、五天，就是不朝乡上送。结果，又从周小猫家借来一石包谷，送到他家里，才把你么爷放回来。

从此，为了躲壮丁，我和你么爷就钻进了老林，睡岩榭，盖树皮，吃尽了苦头。家里眼睁睁丧失了两个强劳力，土地一年年荒芜，生活一年比一年苦。但乡上、保上的买枪钱、子弹费，以及无穷无尽的苛捐杂税，接连不断，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。你祖祖本来就病重，加上接二连三的打击，一口气上不来，便含恨离开了人世。

按照你祖祖生前的嘱咐，要把他葬在大门对面的山包上。

那个山包包，本是一片荒地。只是到了后来，我们老鹰岩的苗家将它开垦出来之后，海螺堡富农张全支和周小猫才跳出来争夺。张说是张家的，周说是周家的，争了好几年，结果被周家占了。因此给祖祖埋坟的事，得去找找周小猫。我们说了很多好话，他才答应我家把人埋在小山包上。

谁知这时候张全支带着一伙人赶来，扯起那破嗓子吼叫：

“哪个苗东西敢把坟埋在我张家祖坟山上？当真吃了豹子胆！连招呼都不给我打一声，眼睛里还有我张某没有？要不是段保长来给我讲，我还不知道哩。”

我理直气壮地回答说：

“周家指的地，与你啥相干！”

“康少武，你好大的胆！”张全支大睁着眼睛，唆使几个人向坟地围拢来。

我虎地往一陀大石头上一站，大声说：

“穷弟兄们，大家都是老人的，我康少武与你们往日无冤，今日无仇，明理的请你们站开点，看哪个敢近前动一根毫毛！”

周围的乡亲们听我这一呼喊，个个手头紧捏着锄头、木杠，愤怒地盯着张全支，眼前顿时形成了僵局。

这时，只见保长段云奎皮笑肉不笑地走来说：

“老弟，为何事前也不跟我段某打个招呼？我太小总还算一保之长嘛！人家别保的找上门来多不好。”

“我能见到菩萨就磕头？招呼嘛，不是早有人代劳了。”

段云奎正要发作，张全支的破嗓门又嚎起来：

“康少武，这是我的地界，你放明白点！”

我反驳说：“你说这是你张家地界，请拿出证据来！”

“说得有理！”众人都帮着说。

张全支一时哑口无言，只好横不讲理地说：

“我张家埋有坟在这里。清白之人，决不容苗子沾污。康少武，赶快把坟迁走，用朱砂来填平坑坑！”

“不准欺负人！”众人发出了一声巨吼。

人声稍微平息之后，汉族老人张三叔走出人群，对着张全支说：

“地是穷人开，房是穷人盖，穷人一没敲诈勒索，整人害人；二没吃喝嫖赌，霸人妻女，哪件不清，哪点不白？”

张三叔的一席话，正好揭痛了张全支的疮疤疤，他把死鱼眼珠一翻，骂道：

“哟，你是个啥子人？忘了祖宗啦！帮着苗子说话，苗汉不分，黑白不明，真是岂有此理！”

“张全支，我问你，你我都是汉人，又是同姓同族，照理说，我们应为一家囉！可为何你住高房大屋，我立茅草窝棚；你吃大米白面，我却吃糠馊菜？”

一席话，问得张全支又哑了口。他想了好一阵，才结结巴巴地说：

“你，你，你，只怪你的命不好！……”

我截断张全支的话说：“苗山的树木根连根，苗汉穷人心连心，不是我们命不好，是被豺狼害苦了。”

“少废话，赶快启坟！”张全支一蹦老高。

“不能启，不能启！”人们又发出怒吼。

面对愤怒的人们，张全支直打哆嗦。

老奸巨猾的段云奎，怕坚持下去难以收拾，于是鬼眼儿转，同张全支咬了一阵耳朵，回过头来说：

“各位乡亲们，大家何必动肝火呢，有事好说好商量嘛！我同张大爷商量了一下，我看只要能依他三条，事情就好办。如果情愿，我就当个中间人！”

“有话就说，有屁就放！”人群中不知是谁冒了一句。

“好好好，我说我说。”段云奎打着手势：

“第一条，打块石碑立在中间，至于碑文嘛，由我负责写；第二条，办三桌酒席，酬谢张大爷宽宏大量；第三嘛，来了十几个兄弟，他们要抽鸦片烟，四十盒就差不多了。”

不等段云奎说完，人群又骚动起来，充满了不满的咒骂声。

我和你么爷同张三叔他们商量了一阵，感到很为难，答应条件吧，实在太欺人；不答应吧，又怕张全支逼倒启坟、闹翻了，到头来还是自家吃亏。既然张家已经软了口不叫启坟，就只好忍口气算了。何况在那样的世道，张家同周家、乡长同保长，本来就是一個鼻孔出气。

父亲说到这里，长长嘘了一口气。接着又无限感慨地说：

“为了办那三桌席，立那块石碑和付那四十盒鸦片烟钱，我家被整得精光，并且向段家借了一石五斗大米。段云奎那老狗时时刻刻打着我家那两石地的鬼主意，当我提出向他借粮食，他以为时机难得，便很快答应了。

从此我家背上了阎王债，借段云奎的一石五斗大米，第二年连本带利变成了三石，留本还利，第三年又变成了四石五……为了保住土地这命根子，我们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，直熬到穷人翻身当家作主的今天。”

父亲讲完了，可是我还久久地沉浸在无限悲痛和愤怒之中：血泪碑啊，血泪碑，你凝结着我们苗家多少血和泪！饱含着干人多少仇和恨啊！

苦难的苗家女

蔡文学

我母亲杨廷珍活到八十一岁，于一九七三年去世。她老人家在世的时候，常给我们讲：“今天我们住的高房大屋，吃的大米白饭，宰大肥猪过年，穿料子衣服，摆弄收音机，日子越过越红火，可不能忘记过去的苦难啊……”

龙美老林余家山箐箕凼，山连山，山套山，无尽的山上，覆盖着厚厚的森林。一条很小很小的山路穿进林子，弯弯曲曲横过一段溪流，爬上一个山坳，伸向拐角处山半腰的一个猪嘴窝棚。这个由许多根枯枝架成的窝棚，远远看去就象一个尖顶草垛。这就是我解放前的家。

那时候，爸爸租种了地主赵必辉紧挨林边的一点薄土，山林遮蔽目光，庄稼长不好，连年欠收，而地主的租子不仅颗粒不减，还要不断加租加顶。日子没法过了，爸爸恨不得多长出几只手来。他总是没明没夜地做活，放下锄头，又拿起捞刀去打柴，风雪漫天还要翻山越岭挖药材、猎野兽……这般累死累活，仍然维持不住一家五口的生活。就在这艰难的时刻，一天早晨，天大

亮了爸爸还没有起床。往天，这正是他放头排^①的时候。妈妈心想：“累够了，让他多睡一会儿。”还诓住我们兄妹不要哭叫。妈妈把饭摆好，去叫爸爸，可是怎么叫也叫不答应。用手去推，才发现爸爸身上烫得象红火炭，两个鼻孔张得很大，出气不赢，嘴角上还流出一些白泡泡。妈妈惊呆了，好一阵才“哇”的一声哭起来。爸爸到底缓过来一口气，扬起手抓住妈妈的臂弯说：“孩子他喃，我不行了，真不忍心丢下你和小小的儿女啊……”说着，他右手无力地滑了下去。妈妈紧紧抓住爸爸的肩头摇着，凄惨地哭叫：“孩子他斋，你不能死啊……留下孤儿寡母谁管啊……天啦……”四岁的大哥爬在床上搂住爸爸，二哥一头钻在妈妈怀里，一家人哭成一堆。哭声飞出窝棚，在山里迴荡，杳冥的苍天，茫茫的林海，冷酷的世道，有谁关心窝棚里穷人的死活呢！爸爸的眼睛亮了，留恋地、悲伤地环顾我们一眼就渐渐暗了下去。

爸爸一死，狠心的地主抽回了土地。妈妈把我成天背在背上，东一家西一家找零活做。财主们说我妈力气小，又拖得有奶娃，做一天活只管两餐饭，不给一个工钱。为了养活我们兄妹，妈妈常常一天只吃一餐饭，省下一餐来用菜叶子包回来给大哥、二哥吃。四娘母就这样苦熬着日子。

一天，赵必辉对我妈说：“杨廷珍，看在老主客的情分上，给你介绍个好活路，城里甘二老爷家需要一个人帮他，保你有吃有穿。”妈妈找不到一个地方商量，心想：“这样下去也不是事，总得奔，奔出一条生路来，去甘家就去甘家吧。”在一个风雪早晨，妈妈把我抱在怀里，把二哥用带子捆在背上，四岁的大哥手里拿着他舍不得丢弃的一张小弓走在前面，我们离开了这空

^①放头排，即歇第一歇气的时候。

无一物的窝棚。小路转拐处就是爸爸的坟。妈妈径直走到坟前久久站着，好不容易才下了决心，一掉头领着我们上路了。

二

我们穿过莽莽崇山，艰难地来到了甘家。在庭院里，大哥怯生地牵着妈妈的衣裳不敢离开一步。一个管家样子的人走出来，看见我们，皱了皱眉头说：“你就是杨廷珍？进来！”妈妈领着我们走上台阶。那管家连忙做了一个阻挡的手势说：“娃儿都留在外面。”妈妈迟迟疑疑地解下背上的二哥，望着管家说：“先生，怀里这半岁多点的娃儿也留在外面？她还吃奶啦！”管家不耐烦地说：“吃奶，吃奶！甘二老爷需要奶才偻你。孩子放下自有安排。蚕婆娘一来就找麻烦，拖泥带水……”妈妈回过头看看大哥，见他又饿又累，蹲在阶沿上，两只小脚都肿了。无可奈何，妈妈把我放在大哥怀里，说：“好好看住妹，我去一会就来。”说着同管家进去了。

自此我们在甘家住了下来。妈妈要服侍他家老少女人的吃穿，要打扫内院，每天早晚还必须把奶水挤在白玉碗里，加上白糖，端去喂那个吸血鬼甘二老爷。狠心的地主为了不让妈妈把奶水喂我，从来到那天起，就不准妈妈再同我们兄妹见面了。每天给我们一点残汤剩饭。见不到妈妈，我整天哭啊，声音都哭哑了。大哥喂我的饭，我不吃，直哭，大哥也跟着哭。白天，大哥要去做杂活，就把我放在后花园僻静的一角亭子里，免得哭声惊扰了主人要挨打。晚上，我们三兄妹在柴房里的一张破席上睡觉。烧锅的王公公同情我们，常悄悄在晚上舀点冷饭拿到柴房

来。一天黄昏时候，妈妈偷偷来到柴房，一下把我抱在怀里，抚摸着皮包骨头的小身子，泣不成声。大哥拉着妈妈的衣裳，二哥抱住妈妈的腿，都深怕离开。妈妈连声叫我们：“不要哭，不要哭，哭不得啊！”可她自己却禁不住大哭起来。哭声惊动了主人，那个管家用手帕捂住鼻子走进柴房来了：“嚎什么！杨廷珍，谁让你出来的，别不知好歹！”妈妈擦去脸上的眼泪，仰起头，眼里燃烧着怒火，望着管家说：“你看，孩子瘦成这个样子，半岁大点人呀，我当妈的怎能忍心啦，我们也是人呀。这碗饭我吃不了，我不帮了！”那个老不死的甘二老爷离不得天天喝人的血奶，不得不答应妈妈每天见我一次，从内院带半碗米饭出来喂我，但不准给我一口奶吃。妈妈拖着我们这样小的三兄妹，一时也不好找活路，只得又住下来。

岁月在苦难中一天天过去。一次，妈端了半碗饭出来喂我，见我只吃了一口就再也不吃了，眼睛眉毛皱成一团。妈挑了一口放在自己嘴里，吹哟，咸得叮口。妈想起来了：每次舀点饭，甘家那个大少娘总是恨眉恨眼的。今天她正在那里收拾盐巴。妈把我抱在胸前，一手端起那半碗饭，就去找管家。那里正碰上人多事多。妈妈怒不可遏，把饭碗往管家桌上一撂：“这是人吃的饭吗？一半饭一半盐，害娃儿一辈子啦！好歹毒的心肠呀！我不帮了。”那管家抬头看妈一眼，不阴不阳地说：“二老爷说，你不帮就自便。本来，你们还欠着一大笔伙食钱，看在孤儿寡母饶了你。”我们也没有什么东西可拿，妈妈只带着我们向烧锅的王公公辞了个行，就头也不回地走出了甘家大院。在朝门口，我们迎面碰上一个抱着婴儿的贫苦妇女，正象去年妈一样，疲惫不堪地走进甘家去。路上，妈妈牵起大哥的手，心疼地察看 he 做活时手

上脚上打破的血泡，自言自语地噙着：“我的血我的力全给了他家，孩子也折磨成这样，还说欠他的伙食，还说饶了我孤儿寡母，呸！”

三

妈妈竭尽全力孤身奋斗着，挣扎着，一心一意要把我们兄妹团在身边，亲手抚育我们，亲眼看着我们成长。可是，那些吃人的豺狼，险恶的风浪，却把我们一家人冲散了，天涯海角，各自逃生。妈妈在城里许家帮长工，大哥逃去贵州，二哥远奔金沙江边作淘金工人去了。我也有十五、六岁，便在龙美帮大地主赵林章家。

老烟鬼赵林章最狡诈凶残。为了他那口煮大烟的铜锅，我不知挨了多少打。才到他家那天，我正在灶房里洗碗，赵林章派人把我叫到他的烟铺前，半闭着眼睛躺在烟盘子侧边，慢吞吞地对我说：“小丫头，这打整烟具是个细活路，要轻手轻脚，要随时做到烟灯晶亮、铜锅铮亮。有了差迟，我敲断你的骨头。”

每天，我扫了地措抹了家俱，急着擦了烟灯、铜锅，又忙下米煮饭。他一家人坐在桌边大嚼了，我还在后阳沟喂猪。慌慌忙忙吃下点剩菜剩饭，我又得背上背篋去捋猪草。下午又是煮饭、喂猪，还要带小姐，服侍老烟鬼烧烟。一天，我喂了猪，正端起碗吃饭，赵林章把我叫去，指着铜锅问我：“今天擦没有？”

我说：“擦了。”

“我知道你擦了，用什么擦的？”

“细煤灰。”

“细煤灰？你看这上面好几道印子，照你这样擦，不几天就会擦穿。”说着就给我一顿打。

从此我不敢擦重了，再忙也得轻轻擦，慢慢擦。

有一次，他又把我叫去，劈头盖脑就是一棍子，边打边骂：“嘿，你这个贱骨头，说你伤了锅，你就随便擦擦做个样子。这不是还有指头大个花垢？弄清楚，一要亮光光，二要锅不伤。”

每天，赵林章这老烟鬼刚放下饭碗，连饭都还没有吞下去，便一仰身躺在烟盘子旁边，这下，就象瘫了一样地再也起不来。他用烟签子在骨盒里挑出豆大一滴烟，慢慢在灯罩口烤着；翻来复去地烤一阵，又在一小方光滑的打烟石上来回滚一阵，烟泡子烤大了，又在石块上滚小了，烤了又滚，滚了又烤。磨蹭老半天，他才细心地把它装在拳头大的烟斗上的一个小孔里，就着灯罩口“呼噜噜”一阵吸，烟泡子消熔着缩进烟斗里，烟子都钻进老烟鬼肚子里去了，从他鼻孔里只喷出很少一点烟雾。烧了一颗，又烧二颗，没完没了。一会儿，他对着烟盘子说声“要茶”，站在床前的我就得连忙倒杯茶放在烟灯旁边。他略略欠起身把茶一口吞下去，象是为了将正往外冒的烟子硬压回肚子里。一次，他放下烟枪赶忙端起杯子，里面是空的，这老烟鬼把眼一斜，顺手就将杯子向我摔来。我若早点把茶给他斟上，老烟鬼又嫌搁凉了，还是开口就骂、动手就打。这老烟鬼还有个怪毛病，就是烧了大烟之后还要吸丝烟。每当他烧完大烟，便闭眉合眼地躺着把那饿老鹳颈子扭过来，我就把丝烟装好，把烟袋杆塞进他那黑窟窿似的嘴里，吹燃纸媒挨在烟斗上，“骨噜骨噜”一阵响，乳白的烟雾从他鼻孔里象两条长长的蛆虫样爬出来。这老烟鬼一次要抽百十口丝烟。我腰酸臂麻、脚都要站痛。直待他把丝烟吸足，

翻过身打起了鼾声，我才能轻手轻脚地走出屋子。

熬到了第二年初，赵林章对我说：“你一年多的工钱，我给你买了两头小猪，就同我家的一圈喂。肥了，卖来够你缝套衣裳穿。”他说了就算，也不容我说话。从此，我每天既要服侍他一家人，还要经佑八头猪，活路更加累赘。春夏天，猪草还好找点，一入冬可就难了。八头猪一天要吃几大背筲，为了捋猪草，我在风雪里爬滚，手脚都冻烂了，条条血口痛得钻心。看那两头小猪崽渐渐长成大猪、肥猪，我心里盘算着：“卖得的钱给妈妈带去，让她老人家凑合着缝件棉衣穿。妈妈老了，天又是这样的冷。”一天下午了，我背猪草回来，不见那两头猪。我去问赵林章，他说：“卖了。”我说：“我不缝衣服。”赵林章白我一眼：“不缝就算了。”过了几天，我实在按捺不住，又去问老烟鬼：“卖猪的钱嘞？”他好象没有那回事一样，淡淡地说：“买大烟了。”我心里一冷，大声地冲着他：“做事要凭良心呀，那是我的工钱啊！”赵林章一下坐起来，恶狠狠地说：“你的工钱？你的工钱只值两头小猪，还抵不了你一年多的饭食。贱骨头不知理，哪有吃我的饭，喂你的猪的。”我有苦无处说，恨得直咬牙。

更使我早就不能容忍的是，老烟鬼那个狗崽子，二十多岁的赵廷生，贼眉贼眼，每当见了我就象黄鼠狼见了鸡似的。有天在穿堂里碰上，瞅瞅周围没人，他就伸手来拉，被我一侧身跑了。我把这事告给地主婆，她也不吱声。

想起这些，我下了决心，再也不能呆在这狗地主家了。我知道明走是走不了的，还会生出一些枝节。我想了想，便把猪草背筲一背，上了山。

天，正下着雪，阵阵寒风着地捲起，雪花乱飞，林子里发出

凄厉的尖啸声。我心中燃烧着怒火，不由得回过头去看看山脚下那个狼窝，那在风雪中显得更加晦暗的赵家瓦屋。他家的活路啊，硬是一天到晚、一年到头滴水不漏，不让人有一点空隙；他家的活路啊，把我的骨髓都榨干了。好狠心的地主啊！我眼前仿佛看到了赵林章这老烟鬼没完没了地烧烟，长长的蛆虫似的烟雾从他鼻孔里爬出来，我嫌恶地皱起眉毛，他忽然拿起杯子劈脸就向我摔来。我仿佛看到了癞皮狗似的赵廷生，闪着一对饿狼似的眼睛向我扑来。我摸摸腰间的镰刀，把背篋取下来向一条深涧狠狠地摔去。

黄昏时候，我赶到古蔺城里，在财主许家灶房里找到了正在洗刷锅碗的妈妈。两年不见，妈妈衰老多了，头上的白发越来越多，面部的皱纹越来越深，做起活来身手都不由自主地颤抖着；唯有慈祥的眼里，流露出不尽的对儿女的爱。

妈妈听我一说，连说：“你做得对，我们干人就是要骨气。”又安慰我说：“恶有恶报，赵家老小天要诛他，地不容他。”

财主都一样，许家不比赵家好。妈妈辛辛苦苦也只能顾上自己最简单的生活。经过人托人的介绍，我到了颜柳坝帮地主颜家，苦熬那艰难的岁月。

解放了，党的阳光普照大地，我们苗家翻了身，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我那在旧社会失散的一家团聚了。我那四岁就开始帮人的大哥蔡清荣现在担任了大队贫协主任。我已有两男一女，大儿陶树尧参军转业后，担任本大队党支部副书记。二儿和幺女都在学校读书。没有共产党，没有毛主席，没有党的英明的民族政策，哪有我们幸福的今天啊！

吃官司三下泸州

王典周

抗日战争胜利那年，我家搬到中沙烂田沟，租种赤水河周武庙的土地。到一九四七年，单靠种庙地，实在难养活一家十口，父亲才不得不硬着头皮，又租种了夏位三在沙沟那片十石六斗产量的水田，限定每年交五石三斗铁板租。

夏位三是当时赤水河一带有名的恶霸地主，又当着乡长，有钱有势，横行乡里，作恶多端。他有两个老婆，大妻子韦氏，小妻子张氏。早先，两大小争宠，经常吵吵嚷嚷。后来，眼见夏位三年老力衰，又为争夺家产各显手段。没有多久，夏位三一死，两大小就闹得更凶，各人争着下乡去收租。

秋天，高山的谷子刚刚打黄色，大妻子韦氏就来到我家打招呼：

“王典周，现在是我当家，租子一律交给我，到时我会亲自来收。其余的不管她啥子人，你们一概不理。”

大妻子前脚一走，小妻子后脚就到。她还没跨进门槛就是一阵尖叫：

“王老二，你做的这股地方是我的私房钱买的，三天由我来收租子。我把话说在前面，免得以后扯皮。”

我女人没好气地说：“哟！看你说到哪里去了。你们都是主人家，哪个来收都一样。”

“反正我说了算。”小婆子补了一句，车身就走了。

看着夏张氏远去的背影，我女人自言自语地说：“看这个架势，会不会……”

我不以为然地摇摇头。

“不过，我们还是小心些才好。”女人的话音带着忧愁，又好象在提醒我。

那天，谷子刚打完，大婆子就带着一帮人来了。

我说：“别忙，你们两个都来打过招呼，是不是等二奶奶……”

没容我说完，夏韦氏就抢着说：“老二，张氏进我家门几年，好久过问过家务？你又不是不晓得。我是当家人，租子当然归我收。”

我怕以后出麻烦，便对她说：“既是这样，那又何必劳烦你，过几天我活路松点，给你送来就是了。”

“不必了，不必了！”大婆子边说边动手，指使来人，七手八脚，把五石三斗谷子全部背走了。

这婆娘手狠心眼多，我挡也挡不了，站在一旁干着急。但转念一想，管你韦氏还是张氏，反正我只认得你夏家，你自己上门背租子，还省得我一家老少少磨点肩膀皮。

当天晚上，在我女人的催促下，全家人一齐动手，将剩下的谷子分散，藏到草楼上。

第二天早饭后，夏张氏也带着一伙人追上门来。

小婆子一拢场坝，就指着骂：

“王典周，你为啥子把谷子拿给韦氏？夏位三临死还亲口说，这股地方要归我。你……你敢伙起来欺负老娘！”这泼妇做起

把眼泪一把鼻涕的样子数落我。

“我当佃户的，只认你夏家，认不得你韦氏还是张氏。昨天你家的人把租子全部背走了，你凭啥子又来闹？到底是谁欺负谁？”

“反正我先给你办了交涉，今天就要找你要租子。”张氏又刁又泼，横不讲理，仗着人多势众，把我家里里外外都抄翻，将剩下的谷子统统抢走了。我和弟弟卫华上前去阻拦，反遭了一阵乱棒。

我又气又急，当天就跑到赤水河，找乡上评理。乡上不闻不问，一推了事。我又不得不跑到夏家讲道理。镇上大多数人家受尽了夏家的压榨和欺凌，都纷纷站出来抱不平。张氏跑去找乡长，乡长想袒护她，但又怕众愤难平，只好装聋作哑。

恶人先告状。夏张氏为了报复我，便通过她娘家一个亲戚，到县城告了我一状，诬我“恶佃欺主。”

县司法处传人那天，我不在家，却把我弟弟王卫华拉走了，一关就是半个月。提审时，我弟弟将实情一一说了，法官当场判定，夏家应退还我家的谷子。

事情传来，全家人都高兴。弟弟回家的当天，我就去找夏家退谷子。哪知夏家不但不退，反而放出谣言，诬蔑我是个“恶苗头”，说我过去领头抗抽壮丁，现在又欺负主人。扬言不把我收拾掉，得不到安宁。不几天，我就被栽上“恶佃欺主”、“扰乱治安”的罪名，抓送古蔺县城，丢进黑卡①。

按照当时监狱规定，象我这样挨民讼官司的人，要自带伙食。

①黑卡：即牢房。

可是我家血汗被抢光，哪里来的伙食呢？只好跟着牢里的穷人打草鞋，换点伙食钱，我才幸免饿死。

二十几天后，我被带上公堂。堂上坐着好几个人，正中那个法官姓黄，眯着两只大眼睛，就象赤水河周武庙中那个“鸡脚神”^①一样。

我初次过堂，不晓得什么规矩。我正在东张西望，那“鸡脚神”忽然凶神恶煞地问：

“王典周，你恶佃欺主，知罪么？”

我猛吃一惊，随即冷静下来，定了定神，申辩说：

“法官先生，我没有罪，罪在夏家。”

“哼！你身为夏家佃户，为何抗租不交！主人家自己上门背租子，你反诬主人家活抢人，还胆敢追上门去胡闹，岂非恶佃欺主？”

“法官先生，当官要详情。我租种夏家的地方——十石谷子。按租佃契约规定，夏韦氏不等晒干，就亲自上门背走了该交她的五石三斗，可是小婆子又来估倒将我应得的谷子一齐抢走。有道理么？我按你们判的去找她家退粮，怎么叫胡闹？”我越说越气，声音越来越高。

一刹时，那法官脸色铁青，指着我说：

“王典周，你……你竟敢藐视公堂！”他随即大喝一声：“带下去！”

我又被丢进了黑牢。

牢里终日不见阳光，又霉又湿，臭气难闻，令人窒息。

^①鸡脚神：寺庙里用泥土塑的一个偶像，样子很难看。

有一天，我正闷得发慌，忽然听得狱兵喊出去两个人挑水。我正愁没机会出去换口气，于是就拉了一个同室的人一起走了出去。

那天碰巧，是给一个姓段的法官家挑水，我便乘机向他喊起冤来：

“我冤枉坐牢，求法官作主！”

段法官问我叫什么名字，我回答了。他又问我什么案子。当我谈到赤水河夏张氏时，他默了一会儿神，皱着眉头说：

“你尽打麻烦，我一个多月前已经判了，要夏张氏退还你的粮食。为何又跑来囉嗦？”

他听我说完前几天黄法官又判我的经过，段法官脸一沉，咬牙切齿地说：

“造他娘！趁老子不在，背倒老子吃肥了。哼，不依我判的就不行！”

我正纳闷，他突然对我说：“王典周，我放你回去！”

“放我回去？”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仍然站着没有动。

“快走吧！”他见我没动，又催了一声。

我说声“多谢法官”，回身就走。

回家后，在穷乡亲们支持下，我又去找夏张氏还我血汗。一直到十月间，夏张氏眼看县衙门对她不利，便又通过她一个在泸州做事的亲戚，到泸州高等法院三分院告了我的状。

冬月初四，接到三分院的急签，传我初八正午到泸州对案。说什么“迟缓受罚，不到从严”。

当时，全家衣食无着，日子非常艰难。拿啥子做盘缠？从烂田沟到泸州，单程四百余里，来回至少要走六天。不去吧，又怕

挨抗拒官府的罪名。亲戚邻居都为我捏着一把汗。最后我把心一横，绝不在地主老财面前输这口气！

我急急忙忙凑借了几块钱，另带几斤生漆、二十斤叶子烟和两升米。为了怕万一有个好歹也好给家里送个信，决定带上大侄儿做伴。

我叔侄俩匆匆忙忙赶路，第二天半夜赶到江门一停下来，浑身骨头就象散了架。第三天早晨，侄儿两只脚肿得象棒捶，连地都挨不得。穷人家十二、三岁的孩子受这种罪，我的泪水只好往肚里吞。

眼看限期逼近，我正急得不可开交，店老板出主意要我们赶快去赶木船，直接可以到泸州。

永宁河，水急滩多，奔腾咆哮，白浪滔滔。小木船象离弦的箭一样，在万山丛中飞奔，颠簸得使人头昏眼花。过了上马场，河面渐渐宽阔，水流减缓，行船慢了下来。到了大洲驿，水更平，行船比走路还慢，我心头非常焦急。没办法，我只得同侄儿分手，下船赶路。让他带上东西乘船后面来。好心的船老板看我们实在可怜，没要我们的船钱，我送了他几斤叶子烟。

我一下船，就顺着马路放小跑。一心只想着去赶第二天正午那个鬼门关，竟忘记了身边的一切，也忘记了饥渴，忘记了疲劳……。当我半夜三更跑到长江边时，渡口早已停渡。这时我才忽然觉得又累又渴。江风吹干了汗水，冻得我牙齿直打架。我久久徘徊在江边，远望灯光闪烁的江城，不禁默默地叹息：

老鸦无树桩，

苗家无地方，

拉罗享尽福，

苗家愁断肠。

冤枉官司害得苦，

不知何时才天亮？

那天晚上，我栖身在江边一家小茶馆的火炉前，不知几时迷迷糊糊入睡了。第二天，天刚五更，我被起来升火的老人从梦中惊醒，空中还是一片墨黑，我又向渡口走去。等了好久好久，天才慢慢睁开了眼睛。我孤苦伶仃地站在沙滩上，阵阵寒风袭来，我心头一阵紧缩。想起这背时官司半年来经受的折磨和苦楚，惦念着如今不知尚在何处的侄儿，眼泪唰唰往外淌。泪水滴在鹅卵石上，渗过河沙，汇入滚滚的江水，冲刷着我心头万般仇恨，冲刷着我们穷人诉说不尽的苦难、屈辱和冤仇……。

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三分院门口，守门的人不让我进去，说时间还早。

我等啊等啊，等得心头烦躁。钟楼的时钟已经敲了十二下，可是还没听到动静。我只好耐着性子等候。钟又敲了一下，两下，已是下午三点了，仍然没听到传呼。于是我就一直往里面走去。门卫换了班，把我拦住。我说明来由后，他便直接领我走进了大堂。

一个法警大声问我：“进来有啥事情？”

我说：“你们发下急签，要我初八正午到三分院同夏张氏对案，为啥到下午还没听到传呼？”

坐在堂上的一个白胡子老头问我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王典周。”我大声回答。

“王——典——周，”老头拖长声音重复念了我的名字后，便默默不响。旁边一个人赶快对他咬了咬耳朵，老头才“喔”了

一声，慢吞吞地对我说：

“原告尚未到案，你出去等候。”

那天，我耐着性子等着，直到天快黑了，才传下话来，要我先找个地方住下，等夏张氏到案再说。

我刚退出三分院大门，只见几个公事人搭讪着向我走来。一个四十开外年纪的对我说：

“乡巴佬，你这个样儿都想打官司？”

我忍耐着，冷冷地回答说：“遇到了，有啥子办法！”

另一个年青点的瘦个子说：“你这个乡佬坎懂啥子？如今打官司，一要膀子硬，二要票子多。如果这两样都没有，就要嘴会说。这三门，你到底有哪一门？”

我说：“一门都不门。”

他们听到这话，以为有点门路了。那个瘦个子赶快说：

“我们帮你打，你先拿点酒钱出来，官司打完再算账。”

我说：“对不起，我是一个干人，哪里来的酒钱？”

那几个人扫兴地散开了，边走边骂我“不识抬举”、“守财奴”。

侄儿很快赶来了。这以后，我每天都到三分院去守候。时间一天一天过去，我一天一天发愁。半个月过去了，夏张氏仍然没有到案。法官要我回家，听候随传随到。

我回到家里，才知道夏张氏趁我外出，到处制造谣言，说我打输了官司，三分院已经将我两叔侄丢进了黑卡……这期间，保商队长韦向伦又几次来家逼债，父亲实在无法，只好狠心卖掉了大母牛还债。我虽然一无所获回到家，可全家老少总算松了一口气。

第二年五月，栽秧时节，三分院忽然发下传人的急签。当时正是青黄不接的枯月，可是急签来了，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。实在无法，我只好将刚驯好的那条牛卖掉半边，换得二十元钱作盘缠，只身一人去泸州。

这次，又等了好几天，夏张氏才到。在堂上，夏张氏一口咬定，没有拿我一颗谷子。反诬我趁他男人刚死不久，欺负她一个妇道人家，抗租不交。还呼天号地要官家为她作主。

我听到这些话，差点把肺都气炸了。我几次开口反驳，都被法官压了下去。

终于轮到我来说话了。我一口气将前因后果诉了一遍，驳斥张氏编造的一派胡言，控诉她仗势欺侮百姓，压榨佃户的罪行，打得她哑口无言。

我说完了，公堂上一时变得清风雅静。过了好一阵，白胡子法官才打破沉默，支支唔唔地说：“案情复杂，待本院查清再判，退堂。”他说完话，头也不回，就退进屋里去了。

我气愤极了，说了声：“你们拿百姓的事情当儿戏！”接着就被当差的推出了大门。

第二次到泸州，来回又是空跑几百里。我花光了钱，流尽了汗，吃尽了苦，可是官府仅仅是“查清再判”几个轻飘飘的字，就把我这个穷佃户打发回了家。

因为卖掉了半边牛，缺乏耕力，加上我来回十几天，又误了抢水整田的季节，秧子没栽齐，造成当年大减产，日子就更加艰难了。那年冬天，在饥寒交迫和不尽的忧郁中，我的父母亲先后离开了人世。为生活所迫，哥嫂带着一儿一女投了娘家，一边侍候两个孤苦老人，一边给纳盘乡一家大地主当佃户。

因为夏家太欺人，加上人口减少，又没有耕牛，我们退还了夏家那十石谷子的地，在凄风苦雨中，度着难熬的岁月。

一九四九年七月的一天，没想到三分院又发签下来，传我到案。

我暗暗揣想：“两次下泸州，已经整得我家破人亡。这一回，除了白花钱，白费力以外，能有什么结果？俗话说：‘衙门八字开，有理无钱莫进来。’衙门总是维护有钱人家的。”我实在不想再去受那份罪。

好几天了，我还没打算动身，亲友四邻都为我着急。我们弟兄再三商量的结果，最后还是决定去。吃了将近三年的冤枉官司，家里唯一保存下来的只有半条牛。这一回我只好狠心又把这半条牛卖了。我硬着心肠告别了亲人，第三次踏上了去泸州的路途。

判案那天，夏张氏又没有到堂。去对案的就只有我一个人，还有就是那个白胡子法官，高高地坐在上面。堂上冷冷清清，连排列两旁的几根灯杆一样的法警也不见了。我一进去，白胡子老头问了问姓名，就判夏张氏退还我五石三斗黄谷。

接着，一个当差的递给我一纸判决书，叫我按了个手印，就喊退堂。

万没想到，这次竟这么顺当。我一出三分院，就朝一个朋友家里跑，我兴冲冲地叙述了经过。他说：“你晓得为啥要还你黄谷？”

“因为我在理。”

“你一向都在理，照理早就该判退还你，为啥一拖再拖到今天？”

“高一级的官儿可能要好点。”

“有啥好？你还不晓得……很多官儿都逃跑了……”

接着他告诉了我解放军快要入川的好消息。

我怀着无比激动和喜悦的心情，差不多象是一口气跑回了烂田沟。

我拿着三分院的判决书，跑到赤水河找夏张氏退还我的粮食。我想，这回夏张氏可不敢违抗了。可是那可恶的小婆子还是死赖不认账。我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对她说：

“你退也罢，不退也罢，总有一天，要叫你亲自给我送上门来……”

很快，古蔺解放了！共产党、毛主席把我们苦难的苗家救出了火海。在减租退押中，夏张氏跑上门来磕头认罪，要我去背粮。我狠狠地说：“哼！没想到你也有今天！”

冬月间，当我作为第八区的陪审员坐上审判台，亲自审讯夏张氏这群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鬼时，我的心啊，真是久久都没有平静。

佣人苦

侯良才

雪山关下绝草崖，
苗家世代服官差，
血汗流尽筋骨断，
死在路边无人埋。

我们家就在雪山关下面的绝草崖。听老辈子说，从我曾祖父起就种官地，年年服官差，曾祖父累死了，爷爷累死了，我爹又服了五年官差，才逃到烂田沟，租种大地主、古蔺和叙永两县的剿“匪”司令李勋廷的地。

在烂田沟被李家榨干了血汗，爹妈拖着一身病，又搬回绝草崖。

我刚满十五岁，就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壮丁册子，乡长保长三番五次来抓我的壮丁。我实无法在家里住下去，只好躲进深山老林，白天同乡丁保丁周旋，夜晚与飞鸟走兽为伴，整整躲藏了五年。

二十岁那年，六月初的一天，我由具保人领着，到了赤水河车站姓朱的站长家，在一纸“本人自愿来当佣人，东家管吃不管用。本人保证不偷盗，不懒惰。如有不是，重责勿论”的保证书上按了手印，从此开始了苦难的佣人生活。

东家是个矮胖子，四十来岁。早在抗日战争初期，就在这里

当站长。他脾气暴躁，为人狡诈，专横拔扈，对手下职员，开口龟儿，闭口杂种；对帮工、佣人，动辄拳打脚踢。他那个妖精太太是一个尖酸刻薄、好吃懒做的家伙。我一进门，他家五口的一切家务杂活，全都压在我身上。挑水、洗衣、扫地、煮饭、端茶送水、带小孩、倒马桶……无一不做。每天早晨，鸡叫我就起床，一直忙到深更半夜。

一天，我背着那两岁多的三崽崽做午饭，老大老二在天井里玩。突然二娃哭叫起来，我赶忙出去，只见他趴在地下，大娃已跑得无影无踪。我把他抱起来，边哄边给他擦流出来的鼻血。殊不知哭声惊动了正在隔壁打牌的老板娘，那女妖精跑过来，不问青红皂白，拣起一根棒槌就朝我脚杆上打，嘴里还不干不净地乱骂。

我在这家三个多月来当牛做马，挨打受骂，倒也没有人来拉我的壮丁，还是耐着性子干下去。

有一天赶场，我爹到车站来看我。爹坐在厨房里，一边帮助我择菜，一边问我来这里的景况。东家一进门，看见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头子坐在屋里，便把眼睛紧紧地盯着我，瓮声瓮气地问：

“他是哪里来的？”

“是我爹。”

“哼，随便把家里的人带进来做啥子？”

“我来这里几个月还没回过家，今天赶场，老人顺便来看我一眼。”

“哪个允许的？”

“又没有哪个规定不准。”我有点生气地说，“他又不是来找我吃要穿……”

没容我说完，东家横不讲理地截着说：“要是东西丢了，谨防我剥你的皮！”

我爹是个直性子，一听这话就起火，虎地一下站起来冲着东家说：

“你嘴巴干净点！谁家没有儿女？要不是我娃儿在你家干活路，我走错了也不跨你家门槛。”

“去，去，去！少在这里囉嗦！”

“嘿，我的儿子又不是卖给你。我们人穷志不穷。他到你家干了三个多月活路，你们放他回过一次家没有？我又登过你家几次门？”爹越说越气，在腿上拍了几下说：“灰都不得沾你一把！”气呼呼地抽身就走。

我含着眼泪在门口送别了爹，回到厨房时，狗东家还呆呆地站在那里，死泛白眼地盯我儿眼。

有一次东家去贵阳办事，半个多月没回来，女妖精同几个公子哥儿，白天黑夜在一起鬼混。成天要我侍候，端茶送水不消说，变着花样要吃这吃那，半夜三更还要“消夜”。他们的赌场摆到天明，就要我侍候一个通宵。

一天晚上，几个家伙打麻将，我忙到半夜，又累又困，实在无法支持，不知几时伏在案板上睡着了。

忽然，一阵脚尖把我从梦中踢醒。在昏暗的灯光下，女妖精那浮肿的粉脸上，两眼闪着凶光，嘴里嚎叫：

“拿给你吃饱了，倒晓得偷懒，躲起来睡大觉。生就的贱骨头！”

“太太快进来哟。”屋内传来了催促声。

“就来。”女妖精答应了一声，又吼问：

“叫你炸的油条，烧的豆浆呢？”

“就弄嘛。”我赌气地说。

“以后再是这样，看老娘不把懒筋给你抽了！”这婆娘又嘶叫了两声才走。

转眼到了春节，站长大宴宾客，接连闹腾三天三夜。我两天两夜屁股都没挨过板凳，累得伸不直腰，喘不过气，脑袋象要炸裂，他们还骂我动作笨。

第三天晚上，他招待从贵阳来的远客，已经吃喝了几个钟头，个个都灌得稀泥烂醉，还一个劲地催我烫酒、添菜、闹到鸡叫二遍，酒鬼们才去挺尸。可我还得给他们收拾那些杯盘碗盏。当端起一叠杯盘走上檐坎时，突然觉得天旋地转，眼前一黑就晕倒了。“噹”的一声，一只高脚玻璃酒杯掉在地上，碎成了渣渣。

响声惊醒了东家，他跌跌撞撞地赶出来，喷着酒臭，猪一样叫嚷：

“你，你安心毁我的宝贝！新，新年头上，坏，坏我的财喜！你就是十条命也抵偿不起老子的夜光杯！”接着就飞来一阵脚尖。

我挣扎着想从地上爬起来，一抬头，被他的硬皮鞋尖子踢中脑门心，顿时鲜血长流，眼前金星乱舞，一阵眩晕，扑在地下动弹不得。那天晚上，幸好隔壁的王幺婶起来说情，那姓朱的才住手。王幺婶用一团棉花塞住我的伤口，止了血。她母女俩又把我扶到床上。

一只高脚杯，差一点要了我的命，躺在床上四五天起不来。为了不替国民党反动派当炮灰，我在朱家忍受着无穷的折磨和凌

辱。

到朱家的第三年夏天，我染上了痢疾。几天功夫，拉得只剩一身骨架，走路都一步一喘，主人家仍一天到晚追着我干活路，又不给我医治，还口口声声骂我是装病偷懒。拉了两天红的，我实在起不来了，女妖精忙叫他男人把我拖上一辆过路货车，假惺惺地说：“今天，用车子把你送回去，好好养病，病好了早点回来。”一车身捂着鼻子对司机说：“快拉走！”那辆车子开到东门管，把我往路边一摔了事。

我爬到树荫下，悲愤地望着赤水河，骂着狠心的老板，想着我孤苦零仃的爹妈。我昏昏迷迷地躺了好一阵，醒来时，火辣辣的太阳刚过头顶。我下定决心，爬也要爬回家去。这东门管到我家还有很长一段路，不能就这样眼睁睁地倒下去。我走几步，歇一口气，实在走不动了，就倒在地上躺一会儿。天黑时，我终于爬到了绝草崖——我的家门口。

年迈的爹妈守着我哭了一通宵。老人每天扯些草药煎水给我吃，病一天天好了起来。

后来，我又回到赤水河车站老板家，不到一年，我妈也因病饿交困死了。

又过了一年，腊月间，父亲病倒在床。我的女人王素珍接连带来几次口信，要我回去一趟。老板定要我把他过年吃的办齐了才准走。腊月二十九那天，我的女人又打发邻居专门来催我，说爹病情十分沉重，只怕连三十都躲不过。我急得心头象猫儿抓，只得再次去向老板告假。

“你他妈的真囉嗦！早就给你说了，让你年三十就回去团年，一天都等不得吗？”这家伙根本不听我的哀告。

“他老人在家实在病得恼火！”邻居也帮我说话。

“你怕就死来摆起了吗？”老板满脸杀气，轰着我的邻居，“去，去，少在这里废话！”硬把他撵走了。

我象挨了一阵乱棒，禁不住哭出声来。

“你他妈的，人还没死，在这里嚎什么丧！不快点给我备办齐，晚上怠慢了客人，叫你有好受的！”狗老板恶狠狠地骂了一通走了。

我呆呆地望着我家的方向出了一回神，恨不得一把火把狗东家这间魔窟给爆了……

“侯老大，快冲壶水来！”女妖精的吼叫打断了我的思路。

那天晚上，我一直忙到鸡叫才上床，刚迷迷糊糊睡着，女妖精就叫我去倒马桶。我的眼睛还未睁开，又听得她在骂人：

“你胀饱了睡死啦！”

“你倒睡醒了，我刚躺下哩！”我没好气地答应着爬起来走进里屋去。心里有气，不小心，把尿水溅了点在女妖精的绣花鞋上，我急忙用衣袖去揩。女妖精正在擦胭抹粉时看见了，这比皂角刺锥了他的眼睛还要痛。左一个“你瞎了眼”，右一个“老娘要你的命！”夺过绣花鞋劈头盖脑朝我打来。我忍无可忍，顺手推了她一掌，女妖精乘势倒在床上，呼天抢地喊救命。她男人先假装睡死了，由她打骂我。这时，狗东西吼着“真的反啦！”跳下床，就去抓凳子，我见势不好，心一横，将马桶一举朝他砸过去，只听一声惊叫，我顾不得一切，跳出大门就跑。

我迎着呼啸的北风，怀着满腔的仇恨，惦记着重病的爹，艰难地向绝草崖走去。

抬头望，满目凄凉。正是吃“年夜饭”的时候，可是苦难的高

山苗寨的茅屋顶上，冰封雪盖，有的连炊烟都没有飘一缕。越是临近我家住的猪嘴窝棚，我越是感到心跳得厉害，情不自禁地加快了脚步。跨进家门，眼前的景象真使我大吃一惊。

两条板凳支起的一块破门板上，停放着爹的尸体，脚下点一盏忽明忽暗的孤魂灯。风雪扑打着窝棚，悠悠的灯光不停地摇曳。我的妻子素珍背着不满周岁的小女儿文英跪守在爹的灵前。惨淡的灯光映照出她那饱经风霜、历尽忧患的脸上的斑斑泪痕。见我进门，便放声大哭起来，悲惨的哭声，犹如一根根钢针扎在我的心上，我心如刀绞，大叫一声：“可怜的爹啊！你的儿子回来啦……”便一头栽倒在父亲的灵前。

……

屋里空荡荡的，冰冷的灶头上，安放着一口破沙锅，里边剩有一点点野菜汤……

大年初一清晨，苗寨里的乡亲们来帮忙，草草掩埋了我爹。

云遮雾锁雪山关，

冰封雪盖绝草岩，

虎狼当道难度日，

家破人亡恨满怀。

从此以后，我怀着满腔冤仇，同妻女一起苦熬着艰难的岁月。

过了两年，赤水河车站那个姓朱的站长调走了。为了谋生，我又到了车站，找到了一份下苦力的差事——下河挑水洗车子。这车站到河边是四十多丈高的陡坡，挑一挑水，汗水都要流一大碗。这项活路，虽然损筋累骨，却不再受人随意打骂凌辱，也能挣到几个血汗钱。我累死累活，省吃俭用，一个钱当两个钱用。

一直熬到一九四九年。

那年冬天，古蔺解放了。毛主席、共产党把我们干人从虎穴狼窝里解放出来。可是不久，那些不甘心灭亡的反动派、土豪劣绅，又打出各种旗号，拉起土匪队伍，盘踞了古蔺偏僻山区，疯狂残害穷苦老百姓，猖獗一时。刚建立起来的县人民政府暂时搬到了叙永县的正东。

我心里燃烧着仇和恨，巴不得赶快把那些棒客一个个杀死。一天，我搭上一辆汽车，跑到正东，报名参加了县大队。不久，我们部队开到么尼打土匪，歼俘了不少，我心里真高兴。休整时，我才想起妻子素珍还不晓得我的下落，于是请一个同志帮我写了一封信，并告诉她等着胜利的消息。

后来，听说坏人告密，那天被我们打散的土匪，没过几天就闯到我家里，进行了疯狂的报复。

一个匪徒用枪尖子点着我女人的头问：“你男人呢？”

“不晓得！”

“不晓得？把老子打惨了。我们的兄弟伙死的死，伤的伤，你不晓得？给我捆起来！”

几个匪徒七手八脚把素珍捆在坝子边一根核桃树上，顿时枪托、棍棒乱飞。

“你男人到底哪里去了？”又一个匪徒逼着问。

“不晓得！我又没有跟到男人走！”

“啪，啪！”几个耳光，打得素珍口鼻流血。

“你男人好久打回来？”

“不晓得！”

……

一个个匪徒象发疯的狗，又是枪托打，又是鞭子抽，素珍被打得半死。

这群疯狗又窜进屋里翻箱倒柜，抢东西，砸锅甩盆，仍不死心，回过头来又用冷水泼醒素珍，继续追问，可是连一句“不晓得”的话都没有了。

“先把这婆娘拉上山去砍了！”匪首气急败坏地说。

“还有这个小崽崽呢？”一个匪徒问。

匪首咬牙切齿地狂吠：“对，和尚跑了有庙子在。斩草要除根，连小崽崽一齐拉上山砍了算了，叫她男人去剿，剿……”

几个匪徒拖起素珍母女就往山上走。孩子、素珍拚命挣扎。这时，忽然从她衣襟里掉出一件东西。一个匪徒惊叫：“有信！”接着便抓过去一看，立即顿了一脚：“快，快拉去砍了！老子叫你等着胜利的消息……”

“哒、哒、哒哒”一阵急骤的枪声，惊得放哨的匪徒大喊：“打起来了！”几个匪徒象落了魂一样，撇下素珍母女俩，没命地窜进了密林。

当天晚上，乡亲们把素珍母女救走了……

么尼的剿匪任务完成后，组织上决定让我留在么尼工作，并把素珍的情况告诉了我。旧恨新仇一齐涌上心头，我坚决要求留在前线，继续剿匪，不杀尽那些害人虫，决不罢休。

在战场上，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土改以后，我转业回到家乡工作，先后任过武装队长，公社党委书记等职。

现在，我已是六十岁的人了。我一定牢记昔日苦，不忘血泪仇，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。

盐

王 银

“好个二郎滩，四面都是山。家家背盐巴，户户盐巴淡。三岁娃娃认不得自己的爹，十岁孩子还没有裤子穿。”提起旧社会，这当时流行在赤水河一带的几句话就在我耳边响起，它是我们苦难生活的写照，它包含着我们背盐人多少辛酸啊！

那个世道，财主勾结官府，独霸盐业，高抬市价，盘剥人民，财主的赢利象银水流，穷人的血汗象河水流。赤水河边这个小小的二郎滩就开有《四公号》、《新号》、《同佑福》、《集大成》等几个盐号。每天，成千上万担盐巴从合江溯赤水河上行，船载到二郎滩，然后靠人力运到马桑坪，再转至茅台，散往鸭溪、新场、遵义等黔北各地。二郎滩的穷人大都靠背盐巴维持生活，有的背到贵州黄平，来回两千多里。近的从二郎滩背到马桑坪，往返六十里，一天两趟，风雨无阻，若是只背一趟就不够糊口啊！

我懂事的时候，全家有二十二个人，租种地主李辉廷家土地。年复一年，血汗浇出的饱鼓鼓的粮食象水一样都流进了地主的仓里。记得是甲子年，地主逼租加上瘟疫流行，不到半年时间，我家便死去了十八口人，只剩下四娘、么爷、妹儿和我。狠心的地主见我家精强力壮的人都死了，剩下几个半条命的，榨不出多少油水了，就抽回土地，把我们一脚踢开。我们辗转逃到贵州回龙，住岩框，嚼糠菜，饥寒交迫，不久妹儿又被万恶的旧社会夺去了

生命，么爷帮人去了，四娘改了嫁，只剩下我一个人。后来，在一个隔房大伯和一些穷亲友的帮衬下，我结了婚，搬到二郎滩黄荆坝同岳丈住在一起。从此我就靠背盐巴过活，同背篋、拐耙、铁脚马朝夕不离。

我背了二十几年的盐巴，多数时间背二郎滩到马桑坪这一路。四更时候我就起床，孩子他喃已把饭食弄整好了。豆大的灯焰受不住败壁破窗透进来的夜风，闪烁跳动，半明半暗，照见小桌上一碗糠菜糊糊，一碗水盐菜，桌中心一个碗里放了一陀雀蛋大小的块盐。我先夹起那块盐巴，就着灯光仔细看看又蚀去了多少，然后小心地放进菜碗里，用筷子拨它滚几转，又赶忙夹起来放回原处。屋角大路上已传来人走过的声音，夹杂有铁器碰在石板上的叮叮声。我连忙几下吃了饭，接过孩子他喃递来的装有几个包谷粩的饭包，把铁打的象个小马鞍样的脚马套稳在草鞋上，揸起背篋，带上拐耙，开门上路。

到得二郎街上，只听人声嘈杂，几个盐号门前已排了长长的背盐人的队伍。我加入了“桐油壶”前的行列。由于对盐商的愤恨，人们把盐号《同佑福》叫成了“桐油壶”。桐油壶脏，桐油毒人。盐商多次禁止叫“桐油壶”，一再声明是《同佑福》，却始终没法矫正过来。闹到后来，有的竟在欠条上写着“今欠到‘桐油壶’……”盐商也无可如何了。等啊等，“桐油壶”老是不开门。行列中各人想着个人的心事。孩子他喃有孕了，我又喜又忧。有钱人家是“婆娘望坐月^①，男人望赶集”；我们穷人坐月就难了，莫说吃点好的，连粮食都没有啊。我每天背两趟盐，顾得吃

^①坐月，生小孩。

的顾不到穿的，有上顿没下顿。租点土地种吗？一无钱作押金，二来地主的凶残我也早受够了。孩子他喃打短工帮零活没有一刻闲着，见我又累又忧，常宽慰我不要发愁。“一根草总有一颗露水养”，“只愁不养，不愁不长。”这是她常对我说的话。我正想着，前面一叠声嚷：“开门，开门囉！”“桐油壶”的侧门开了，一个人提盏马灯从里面走出来，望了望门前的行列，走到中间台阶上站定，说：“不要闹，小声点，掌柜才睡下，不要触了霉头。”说完他走进去“啪哒”一声把门关了。朦胧中看不清眉眼。行列里有人说：“掌柜为啥子才睡下，准是打牌去了。”有人接过话茬：“别看掌柜那个风都吹得倒的样子，可有点坐功哩！”一个粗莽莽的声音象是杨二哥，接过去愤愤地说：“呸，他们横草不拿，竖草不拈，吃得好耍得好，还怕坐不得。莫说背，叫他跟我们走两趟，看看他还坐得坐不得。”你一言，我一语，人声又渐渐嘈杂起来。有的在叹息度日的艰难，有的在诉说这世道的不平，有的在交谈着家常，有的抱着手坐在倒放的背篋上抓紧打个盹。又过了很久，敏感的鸟雀一阵鸣叫，血红的太阳从吴公岩背后冉冉升腾起来。“桐油壶”的大门终于敞开了，人们一个挨一个地进去。几个、十个人中一个承头的去办理手续。账房先生查对了户头，填发运单，然后转到盐仓出盐。盐仓前乱哄哄的，委屈的要求，骄横的谩骂，义愤的质问，器物的碰击，种种声响交织一起。轮到杨二哥出盐了，只听“啪”的一声，杨二哥青筋饱绽的大掌狠击在柜上，怒目望着掌称的，高声质问：“你们还有没有一点人心，为什么用手去顶称砣？到那边交不够，脚价贴上也赔不起，叫我们喝西北风！”人们象决堤的水，涌向盐仓，纷纷叫喊：“心要放正，称要公平”，“耍了昧心称，断子

又绝孙。”掌称的抬头看了杨二哥一眼，笑嘻嘻地说：“啊，是杨二，好说好说，加你一砣。往后你早来早称，迟来迟称，不用跟他们一道挤嘛。”说着，随手搬起一块十来斤重的盐就放过去。人群突然静了下来。只听杨二哥一字千钧地说道：“你放灵醒，姓杨的不吃这一套。少了我不依，多了我不要。衙门里头好修行，你把心放正点。”掌称的突然一变脸，横眉瞪眼的高叫：“杨老二，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……”不等他说完，我们纷纷闹起来：“出盐喽，出盐喽。”待到称得盐巴，已是日上三竿时分。我背了一包，净重一百零五斤，急忙赶路。边走边盘算：“象这样运一趟可得斤多点盐的运价，狠命跑它两回，除去一家三口吃的，没病没灾，一天可省下二两多三两盐，能换到斤把大米，日积月累，孩子他哺坐月的时候，该能勉强应付得过来……”一路上背盐的人牵成线线，老人、小孩，男的女的都有，人们手拖拐耙，身背盐巴躬着腰走着碎步，紧走几步又连忙将拐耙往地上一拄，一扭身，背篋正落在平平的弯牛角似的拐耙角上。刚觉到早已紧缩得发痛的胸部一阵宽舒，为了赶路，又只得一躬身背起背篋，一只手带住拐耙角，让耙脚磕磕碰碰地在路面上拖起走。一串背盐人走过，留下一阵拐耙拖过的叮叮噹噹的声音。山里无穷无尽的路上，石板路面拄满了蜂巢般的圆眼。前面的人的步子渐渐慢了下来。这里已是庙子脑脑。路从赤水河边一壁悬崖上曲折盘过，坡陡路窄。侧目望去，一面是明崖直下，奔腾汹涌的赤水怒涛不停地轰击崖壁，浪花飞溅，咆啸如雷；一面是山崖紧逼，弄不好，背篋撞在崖上那就不得了。这时我已经感到有些饥饿了，想把带的包谷耙拿出来吃，又想到前面还要翻过沙青崖、吴公崖两架坡才到得了马桑坪，只得把裤带再扎紧些，咬紧牙关，攥紧拳头，上。

头上是如火的烈日，崖壁晒得烤人，我肚子又饿，背上百多斤爬坡，两腿打颤，心慌气短，汗落如雨。登上几步，我支起拐耙歇歇，捞起用麻线吊在腰带上的小弓样的竹子刮刮，刮去淌在额上、垂在眉毛上的汗珠，同时望着天边长长地出一口气——“啊…咳……啊…咳……”一时山上山下啸声不绝。

好容易到了马桑坪，在盐号上把盐一交，我的心沉下去了。原来是掌称的用了大称，背盐人个个都短斤少两，闹了半天还是没个了结，又要忙着背第二趟。到头来结算运费，许多汗又白流了。我拚死忘生，勤巴苦做，积两个钱的希望又成了泡影。眼看孩子他喃接近坐月子了，家里仍是没有一颗隔夜粮。我急得不行，找舅舅、姨夫借了两个盘费，把心一横，换个门路背长途。从二郎滩背盐到贵州新场，又返回茅台背盐去鸭溪，费时两个多月，走了三千多里路，流了不知多少汗，吃了说不尽的苦，回得家来背篋里只有几升包谷。孩子他喃见我折磨得只剩下皮包骨头了，撩起麻布前襟直擦眼泪，连说，“孩子他斋，孩子他斋，莫远走了，我们找一碗吃一碗搞惯了的，活人还怕拿给尿憋死了不成……”我找不出话说，心里又生着不知对谁的气。二十多年，天天背着沉重的盐块在路上走着，大毒日头下走着，漫天风雪中走着，家里却始终吃不上一餐饱饭，吃不上一碗有盐有味的菜。真正是“好个二郎滩，四面都是山，家家背盐巴，户户盐巴淡……”

正当我们在无边黑暗中、无底深渊中挣扎的时候，中国工农红军到了二郎滩。那是乙亥年的正月间。要是往年，正是那些盐商、地主家张灯结彩，杀猪宰羊过年节的时候。这年可不同，他们惊惊慌慌，夹起尾巴东藏西躲。虽说我们穷人“过年如过关”，没有活路做，家里又无存粮，度日艰难，但看见老财们那个大祸

临头的样子，我们都忘记了自己，心里着实高兴。心想：“你们平时作威作福，可也有这一天。”

正月十五，红军来到了二郎滩。那天我正生病躺在床上，“老财怕红军，这使我们开心。但红军对我们背盐巴的干人又怎么样？二郎滩来来去去过了许多次兵，无不奸淫掳掠、估吃霸踞，无不派款拉伕啊！”这样想着，我赶忙叫孩子他喃躲进后面山林。一面在自己脸上抹了儿把锅烟灰，把病装得更沉一些，提心吊胆地躺在柴棍架成的破床上，把秧毡拉来直盖到眉棱，一面尖起两个耳朵，留心听着屋前屋后的动静。周围一片沉寂，只对河两岸不时有几响遥远的枪声传来。过了好一阵，赤水河对面的麻坪大山上突然枪声大作，一阵紧一阵，足足响了一两个钟头。我正蹑手蹑脚地起来，打算开门看看，忽听路上响起了脚步声，又连忙躺倒。过了好一阵，孩子他喃兴冲冲地回来了，手里捧着一块七、八斤重的盐巴。她在床边坐下，象抱婴儿一样把盐巴紧紧搂在怀里，不等我问就说开了：“孩子他斋，孩子他斋，找烂茸哩^①！找烂茸哩！不拉伕，不欺人，和和气气，对我们背盐巴的干人格外好，对我们苗家更加好。”她抹去眼角激动的泪水继续说：“我先躲在猴子崖的林子里，动都不敢动，听到枪响，我用手捂住耳朵钻在草棵里。没多久，忽听得许多人有说有笑地从林边路上过，听声音有好多还是熟人。我分开草丛偷眼看去，嗨，他们大多是本地背盐的干人，有的用背篋背，有的用肩扛，有的用前襟兜，每人都有几斤、十几斤、几十斤盐巴，一路说说笑笑往家走，都在赞叹红军好。我正弄不清是怎么一回事，突然看见一个头发斑白的老大娘，

^①找烂茸哩，苗语，红军好得很。

手抱一大块盐巴，吃力地从下面一步一步地上坡来。我使劲揉了揉眼睛，‘那不是我妈妈？’我一下冲出林子扑向妈妈。妈妈在路边坐下来，把盐巴轻轻地放在身旁，拉我在她身边坐下，抚着我的头说：‘孩子，红军好，红军对我们穷人比爹娘还亲啦！世世代代有谁这样爱护我们穷人啊！家里揭不开锅了，早晨我去二郎街上弄点吃的，管他过兵不过兵我也不怕，反正吃的在肚里穿的在身上，一把老骨头了，拉伕也不会要我这个老婆子。今天的街上，看不见那些平日耀武扬威的人了，几家盐号紧闭大门，冷冷清清。街头巷尾，三个一群，五个一堆的尽是背盐人在摆龙门阵，整个二郎滩好象变成穷人的天下了。约摸两个时辰，从坡上大路冲下来一队军人，大多穿着青布制服，帽子上缀颗红五星，排头的边跑边喊：‘老乡们！不要怕，我们是工农红军，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，是穷人的队伍’。这队人脚不停步，从街上穿过，直插赤水河边，扑通、扑通跳下水就向对岸游去。对面山上响起了枪声。我们这面山头上突然也响起了枪。红军越来越多了。一个红军战士，怕只有二十来岁，瘦长个子，满脸和气，站在“四公号”台阶上给我们讲话。听的人越来越多。我只听懂几句：‘我们是毛主席领导的队伍，我们在家也是庄稼人，也是挑脚汉，也是背盐人。天下穷人心连心。老乡们过年过节，柜里无米，碗里无饭。今天我们要把这几个盐仓打开，把盐巴分给大家，过它一个闹热年。我们要彻底翻身，只有跟着共产党，起来闹革命……’人群轰动了，纷纷向盐仓涌去。有的挤过去紧紧拉住红军的手，泪流满面，多久都说不出话来。一个红军战士见我人老了，挤不拢，走过来叫我等一下。不一会，他抱起这砣盐巴转来了，对我说：‘老大娘，你老人家受苦了。本想多拿点，又怕你搬不动，你先把这砣拿回

去。’说着就把盐双手捧过来。我伸出双手，忘了接过盐巴，却紧紧拉住红军的衣袖，眼泪成串地掉在盐块上。那个红军扛着盐巴把我送上半坡。’听妈妈这一说，我拿起盐巴把妈送到家里，就连忙赶上街去。你看，这就是红军分给我的盐巴，他们还问我为啥不背个背篋去。”

我一挣身坐起来，伸手抱过盐巴抚摸着，“红军啊红军，天下真有这样好的军队！我们背盐人世代受穷受苦，磨骨头养肠子，一生一世驮着盐巴在路上走，哪一天哪一餐吃过一次够够的盐啊！哪一家哪一户自己又有过这样大一砣盐啊！”想着想着，眼泪糊地流个不住。忽听门响，舅舅杨寿庚匆匆忙忙闯了进来，见我这个样子，把手在自己腿上一拍：“哎，你怎么病成这个样子？红军正在赤水河上搭浮桥，我还说约你一道去帮忙哩！”我说：“等一等，我同你一路去。”跳下床就去舀水洗脸。不料人是晕的，天旋地转，走得东倒西歪。舅舅扶住我的肩头说：“你不行。我另外去约人。”说着，他就冲出去了。

舅舅这一去，一个多月后才回到二郎滩。他回来的时候，满脸带笑，手里牵着一头大水牛，一边抚摸着光滑的牛背，一边对我说：“浮桥搭好后，我站在桥头送红军大部队牵成线线地过去。红军直向我们招手，口里喊着‘老乡们再见，我们还要回来。’有的喊着：‘老乡们回吧，风地里不要站久了。’我实在舍不得红军，要求给他们带路，反正这一带全是我们背盐巴的脚迹窝。我同红军走啊走，越走越远，越走越舍不得离开。走到娄山关，打起大仗来了，红军怕子弹伤着我们，不让我们上去。但哪里挡得住。我们甩开膀子，横冲直闯，帮红军送弹药，抬伤员，看守俘虏。这一仗缴得的武器，捉到的俘虏，数也数不清。同红军到了遵义，

又绕走茅台，渡过赤水河，来到了石宝寨。一个红军干部对我说：

“老杨，这里离你家不远了，你回去罢，家里老小都在盼着你。你看需要什么，老实说。”我想了想，说：“如果有一头大水牛就好了。”嘿，不一会，那个红军干部牵起牛找我来了，对我说“这是没收恶霸地主的，是革命的胜利果实，分给你。回去代问老乡们好。”多少年了，我就朝思暮想有条牛，这下可有了。”说着，他又去摸摸牛的耳朵，牛“哞”地叫了一声，扭过头去舔舅舅的手。

红军去后，盐商、地主回来了，伙同官府大搞反攻倒算，我们又堕入了苦难的深渊，又成天背起沉重的盐巴在路上艰难地爬行。可是，有一点与过去不同了，就是在我们穷人的心里燃起了希望，我们懂得天下还有红军这样的军队，我们的苦难是有尽头的了。我们天天盼啊，盼红军回来。

解放了，当年的红军——中国人民解放军来到了二郎滩，我们苗家得到了彻底翻身。我们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入民主革命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。一九五四年五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群众信任我，先后选我担任了乡长、大队支书等工作。我一家人过着幸福的生活，大儿子王从光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；二儿子王从喜在部队工作；三儿子王从贵任生产队长；四儿子王从仁钢校毕业后分配在岔角铁厂工作。大女儿王从英结婚后住在贵州那面。我七十五岁了，看到儿孙们生活这样美好，想想过去，真是鲜明的对比啊！现在，二郎滩再也看不见一个背盐人了，供销社里雪花的盐巴价格便宜，随时都可以买到……

陷 害

马 丙 钦

旧社会把人变成了鬼，新社会把鬼变成了人。我们家也有这样一段经历。

解放前，我爹和叔叔马元兴，租种地主徐洪顺的土地，住在马蹄滩核桃湾。

一天，我叔叔拣柴回家，在半路上碰到徐洪顺。这条恶狼强装笑脸，阴险地对我叔叔说：“元兴，我们都是老主客囉，你干脆离开你哥那个烂草房，上我家来，把佃我那点地甩给你哥种算啦。”

和我爹从小在苦里生、苦里长的叔叔一听，早品出徐洪顺在骗他当长年，便不冷不热地回答说：“我马元兴没得那个福气，手杆细了，端不起你家的饭碗。”

“嘿嘿，看你说到哪里去了，我从来不会亏待人。”徐洪顺假笑两声，厚着脸皮继续说，“你上我家来，好好干几年，我给你另修一间房子，好成家立户过日子。”

“你真舍得花本钱！”

“我是替你打算啦。”

“你想我给你当牛！”

几句话就揭了徐洪顺的底，梓得他喘不过气来，满是皱皱的猪脸，青一阵，白一阵。我叔乘势又偿他两句：“我这辈子宁肯

跟我哥住破房子，也不上你家立大瓦房。你要我给你当牛，让你牵着鼻子走，别打错了算盘！”说完背起柴就走了。

有一年，毕节、大方闹旱灾，瓢儿井、海子坝那一带，被饥荒逼得没法的干人群起“吃大户^①”。他们成群结队跑过四川来，把徐洪顺和几户地主的粮背走了，肥猪杀来吃了。干人们走后，徐洪顺跑回来，串通几户地主，借机陷害我叔叔。徐洪顺四处嚎叫：“我们这里一定有内线。马元兴这个人，平时专跟大户作对，这回一定是他勾结人来抢的，抓住他就清得出个头绪来。”随即勾通保长，带着狗腿子，不问青红皂白，把我叔叔五花大绑捆去，吊在穿枋上，打得皮开肉绽，整得死去活来。

晚上，徐洪顺带着一帮人，押着我叔叔回家。一拢就声嘶力竭地喊：“起赃”！砸锅甩罐，乒乒乓乓，把屋里的土都刨了三尺深。

叔叔被拴在场坝的一根树上，鼻青脸肿，嘴边凝着血污，仍一个劲地骂：

“徐洪顺，你诬陷老子，会不得好死！”

正当屋里乱哄哄时，一个穷乡亲悄悄给叔叔解开绳子。我叔叔咬着牙关，冲出场坝，消失在黑夜里。

徐洪顺一伙棒客在屋里闹腾了大半夜，“赃”没起到，见我叔叔又跑了，他气得嗷嗷叫。但不甘心捞个水泡泡，临走时强拉走我家一大一小两头黄牛，我爸爸去阻拦，却挨了一阵拳头脚尖。

我叔叔逃出去后，由于伤势太重，又无钱医治，不久含恨死在马司地界上。

^①吃大户：解放前，灾荒年辰，贫苦农民被饥荒所逼，群起到地主豪绅人家自己找粮、肉吃，叫吃大户。

爹吞不下叔叔遭受的冤枉，常常叨念着要报仇。

一次，爹背粪点包谷，路上碰见徐洪顺，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。我爹一把紧紧抓住这老狗的长衫子：“姓徐的，你六、七十岁了，还血口喷人，诬害我兄弟马元兴，拉走我家两条牛。你报个盘出来，让大家评评理！”

徐洪顺经这突然一抓，脸都吓白了，好半天才支支吾吾地说：“启祥，你放开手，看你手上的粪弄了我一身。元兴的事，怨不得我啊！”

爹更激怒了，指着老狗的鼻子责问：“人是你叫捉的，牛是你贼牵的。今天你还喝血不嫌腥，吃肉不吐骨，装啥子糊涂！”

徐洪顺一看我爹的架势，顾不得体面，趁爹不注意，扯脱衣裳就跑了。爹顺手抓起一把粪就朝他打去。

不到一年，徐洪顺带着他的罪恶进了棺材。

爹在痛苦生活的折磨下，四十几岁的人，就成了弯腰驼背，瘦得皮包骨头，眼窝深陷，话少了，但心中埋着深深的仇恨，只要一见到徐家地主，他就不住口地咒骂。

徐洪顺的儿子徐仲恒，继承了他老子的家业，也继承了他老子的凶狠残暴。他认为我爹是他家的死对头，要把我爹撵走。我爹指着徐仲恒说：“我还没找你，你就找上门来了。你老子欠我家血债没还清，就是不搬。草再深，毒蛇也难久藏，总有一天要梭出来！马元兴被你家冤死，总要说个着落！这样屁都不放一个，就要我搬家？这笔债算清了，我马启祥屁股上两巴掌，灰都不沾你徐家一点就搬走！”

仇恨冲开了爹的嘴唇，一阵连珠炮打得徐仲恒哑口无言，干瞪眼，很久回不过神来。

一年，瘟疫流行。碰巧，徐仲恒那个不到两岁的小崽子得了急病，他就趁此机会陷害我爹。他造谣说：“马启祥是‘走阴鬼^①’，魂魄来捏住了我儿子的颈子，气都出不了。”他又唆使狗腿子四处散布：

“马苗子‘走阴’啦！”

“前天马苗子在岩洞里睡瞌睡，小少爷就在前天害了病。”

“那天徐家给小少爷照水碗，就看见马启祥的影子。”

“徐家请人打铁炮，火花就朝马启祥住的方向飞。”

.....

凡是徐家为他生病的小崽子做点啥子鬼名堂，徐仲恒都生拉活扯在我爹身上编造点应兆。

鬼话一遍又一遍，假的也被说成了“真”的。我爹就这样硬被徐仲恒说成“走阴鬼”。

一天晚上，徐仲恒那阴森森的院子里，象摆杀场一样。铁炉烧得通红，炉旁摆着烙铁，树上挂着绳子，地上放着鞭子，板凳上摆着一把亮铮铮的捞刀，簷坎上放着一排铁炮。被徐仲恒蒙骗来的、或被估倒赶来的干人，挤满了一坝子。徐仲恒请来的一个道士，戴着四方帽，披着黑道袍，手里拿着一条马尾巴样的毛扫把，口里叽哩咕噜不知念的什么“经”，说是要收“走阴鬼”。

我爹被绳捆索绑，由两个狗腿子推推搡搡押到徐家大门口。一个手提马鞭子的看门狗大喝一声“‘走阴鬼’来囉！”两个狗腿子就把我爹推了进去。

^①“走阴鬼”，地主阶级利用封建迷信，诬陷有的人在睡觉时，“魂魄”会跑出去捏别人的颈子或“魂魄”，被捏的人会生病甚至死亡。这个被诬陷的人就叫“走阴鬼”。

院坝里被徐家骗去、赶去的干人，好多都认识我爹。霎时间骚动起来。“那是马启祥嘛！”“那是个老好人，怎会是鬼？”“冤枉好人了！”……徐仲恒眼看要漏汤，气得双脚跳，扳命似地吼道：“大家雅静点，马上就要收‘走阴鬼’了！”不少干人趁此机会悄悄地走了。

我爹拚命反抗，破口大骂：“徐仲恒，你爹害死了马元兴，欠我家血债没还清；今天你又陷害我，诬我‘走阴’。你才是鬼，是吃人的魔鬼，坑人的妖精……”徐仲恒被我爹揭了痛处，连声大吼：“快，快把他的嘴巴堵住！”

那天晚上，我爹被徐仲恒用绳子吊，烙铁烙，捞刀砍，整得九死一生，等妈找人把爹从树林里抬回茅屋，爹已只剩下微弱的一口气了。妈妈守在爹的身边，一双眼睛肿得象对桃子。

徐仲恒这条狼崽子，比徐洪顺更狡诈。他暗地里请马蹄滩街上一个姓王的医生，给那小崽崽治病。那崽崽得的是小儿急惊风，吃了几付药就好了。从此，徐仲恒这狗东西逢人便说：“那天晚上收了‘走阴鬼’，娃儿的病才好了。”

谣言象长翅膀的乌鸦，四处乱飞。谣言象砍柴的捞刀，向我们头上乱砍。

在那人鬼颠倒、黑白不分、封建迷信横行的旧社会，人一旦被诬为“走阴鬼”，就成了瘟疫和灾难的替身。一些穷乡亲明明知道是徐仲恒坑害我爹，但怕被人说与“走阴鬼”打交道，不得不避着点，有时见了也不敢多说两句话。因此，我爹出去帮工也少有人雇他了，说话少有人理了。我们一家的生活陷入了绝境，生不得生，死不得死。

一天，我跟妈出去讨饭，走了好多户人家，没要上一口。当

太阳偏西的时候，一户庄稼人的老婆婆认识我们，无比同情地看了一阵，眼里闪着泪花，给了我们一大碗冷包谷饭，用手指了指我们回家的方向，话都没敢说一句，让我们走了。

回到家里，妈给爹诉说着，一家人愁得什么办法也想不出来。爹脸上布满了阴云，牙齿咬得咯咯响。突然，徐仲恒带着两个狗腿子跑来，还在屋侧边就大嚷大叫：“‘走阴鬼’，我的地方不能给你种了！”爹打了一个寒噤，没有开腔。跟来的两个东西也狗仗人势地吼道：“都死了吗？怎么腔不开，气不出？”

“马启祥，你这个‘走阴鬼’究竟搬不搬？”徐仲恒呲牙裂嘴地嘶叫起来。

爹一骨碌站起来，几步跨到门口，大声说道：“我就是不搬。”又指着徐仲恒，“你这条吃人的狼，专门害人的鬼。我这个好端端的苗家，是你给硬披上的鬼皮。你枉自披了一张人皮！”妈也上前去怒气冲天地说：“究竟谁是人谁是鬼，这件事定要整个水落石出。我看你才是鬼，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害人鬼！为什么在你害死我家马元兴之前没有说过走阴鬼，害死马元兴之后，突然诬害我男人是什么走阴鬼？说穿了，你们做贼心虚，想杀人灭口，想整死我们全家，掩盖你们的罪恶。我子子孙孙都要找你算这笔账。”句句话都直射徐仲恒的心窝。他见我爹妈满脸怒气，便说：“你们另外找地方做。我今天还有别的事。”回头朝两只狗一嗖：“走！”

不久，徐仲恒的亲家，地主李云安有个十几岁的儿子得了病，烧得一天到晚打胡乱说。徐仲恒跑去，乘机蛊惑：“该不会是马苗子那个‘走阴鬼’来缠住了吧！”又故意用话去逗引那小崽子说话，连声问：“你看见啥子没有？”

那小子烧得人事不省，含含糊糊地说：“看！看！看见了！”

徐仲恒又编出一派胡言：“是不是看见一个头发乱蓬蓬、弯腰驼背、胡子巴杈的苗子？”

小崽子“嗯，唉！”两声，不知是呻唤还是答应。

“是不是穿一身烂襟襟，腰杆上拴一根草绳绳？”徐仲恒有意照着我爹的样子去问。

那小崽子还是只晓得“嗯！唉！”

徐仲恒在腿上打了一巴掌：“没有错！硬是被马苗子这个‘走阴鬼’慑住了魂魄。”又掉头问李云安，“前两天马启祥从你家门口走过没有？”

李云安似是而非地说：“象是走过，还站在坝子边上朝门里望了望。”

“这就对了，肯定是在作怪。”徐仲恒硬把诬陷我爹为“走阴鬼”的事，同李云安的小鬼子的病联在一起。爹又被他们抓去，用黄荆条子毒打。随着又密谋策划一场残酷地收“走阴鬼”的法场。一些穷乡亲知道了，都感到无比气愤。我一个远房的老年伯伯气不过，站出来责问李云安说：“刀砍有个迹，斧劈有个疤。麻布襟襟，棉布片片，你们总要拿个把柄！不能只凭你们的嘴说马启祥是‘走阴鬼’，就把人弄来朝死里整。世间上哪有这样的道理？”

李云安张口结舌，答不上话。

我那老年的伯伯又说：“你们有钱人家，人害了病，不去请太医，硬说有啥子‘走阴鬼’，真是怪事！你咋个没说你们哪个绅粮是‘走阴鬼’？”

“对呀！难道人穷了就是‘走阴鬼’吗？”穷乡亲们怒不可

遇了。

妈牵着弟弟赶去，要找李云安拚命。李云安自知理亏，才不得不把我爹放了。他怕拖人命债，赶忙当着乡亲们推卸罪责说：

“这不关我的事，是徐，徐……说的……”

在那吃人的世道里，有钱有势就有理，我们一家再有天大的冤仇，又能到哪里去申诉啊！我们把遍体鳞伤的爹扶回家。被多次陷害、残酷折磨的爹，又气又恨，躺倒在床上，奄奄一息。不时喃喃地喊道：“徐家的仇，一定要报！”家里穷得舀水不上灶，靠挖草根、剥树皮吊命，又哪有钱去抓药给爹治伤医病啊！没几天，满腹含冤的爹，便离开了人世。

我爹被害死后，徐仲恒仍四处造谣：“核桃湾住着‘走阴鬼’的婆娘、儿女，还是不得安宁。”并三天两头喊我们搬家。我妈恨恨地说：“不搬，我们就是不搬。我的娃儿就是讨口要饭，也要长大成人，就是要把欠我家的冤仇和血债一笔一笔算清楚！”妈这些话，在我的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。

我们一家四口，全靠拣柴卖、帮短工过活，有时还得去讨口要饭。

有一年，寒冬腊月，大雪封山，家里一点吃的都没有，呼呼的冷风也象有意跟我们作对。我咬紧牙巴，光着一双脚，冒着刺骨的冷风，踏着厚厚的白雪，出门去讨饭。

东奔西跑了一天，破口袋里只有大半碗包谷和几个红苕。我心里惦记着妈和弟妹，赶快往回走。路过康田地主彭朝应家的门口时，忽然一个胖小崽伸出脑袋朝我喊：“嗨！‘走阴鬼’的小苗子！”恶毒的叫声，一下触发了积蓄已久的仇恨，我举起打狗棍就给那小崽子一棍。小崽子哭着惊呼起来：“快来人啦！‘走

‘走阴鬼’的小苗子打人囉！”

“汪！汪！汪！”从大门里先窜出来四条恶狗，围住我咬。我一根打狗棍对付不了几方，一条黑狗朝我半光着的腿子上一连就是两口，撕去了我烂裤子上一条布襟襟，鲜血顺着腿子流。幸好大门里跑出来一个赤着脚的帮工大伯把狗撵开了，把我从地上扶起，怜爱地叫我快走，但已来不及了。彭朝应跳了出来，板着脸孔，用拐杖指着我说：“‘走阴鬼’的小苗子也敢打人了？”话音刚落，举起狗腿就给我两脚，拐杖象雨点落在我的身上……

寒冷、饥饿，无情的毒打，我昏过去了。

不知过了好久，我才醒来，妈妈的泪水正一颗一颗地滴在我的脸上。听妈说，是那个好心的汉族长年大伯把我背回来的，他还送给我们半升米，说：“你们以后讨口，不要到地主家去讨哟！”

一年又一年，我终于长大成人。打短工、当伕脚、抬滑竿、背盐巴，样样都干，日子比以前好过些了，但“‘走阴鬼’的儿子”这个说法，竟成了我一家人的罪称，它一直象毒蛇一样咬着我们的心。

一九三五年初，太阳的光辉穿透了层层乌云，毛主席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来到了古蔺山区。

徐仲恒那帮恶霸地主吓得东躲西藏，却又四处散布恐惧，制造谣言，诬蔑红军要杀人放火，是洪水猛兽；谁要是接近红军，谁就会和碰上“走阴鬼”一样，交上了恶运，不死也会脱层皮。

这狗东西把红军和我们家扯在一起，我想这红军一定是好人。

红军走建新，过银盆，下马蹄来，又走万寿，过马司，上丫叉去了。我亲眼看到红军战士对穷人和苗家象亲人一样和蔼，问寒问暖，了解我们的苦难，不拿群众一块柴一根线，他们讲红军

是穷人的队伍；讲毛主席、共产党领导穷人闹翻身的革命道理。记得，一天有两个红军战士在我们家吃过一顿包谷饭。红军战士边吃饭边给我们摆龙门阵。当我们向红军说起地主诬陷我爹是“走阴鬼”时，红军说，世上哪有鬼神，那是剥削阶级为了愚弄人民，压迫人民，编造出来的谎话。比如说，恶霸地主说他有神灵保佑，当我们捉住他时，一枪还不是要了他的命。神灵保得住他不？不要信他们那一套。一席话，解开了多年的疙瘩，我心里热乎乎的，痛快极了。他们临走时硬留下半块银元。活生生的事实，无情地戳穿了那帮地主恶霸的谎言。

没几天，红军打下云庄——大恶霸地主曾百万的庄园，开仓分粮分盐的事，象长了翅膀，很快地就传遍了赤水河两岸。干人们欢天喜地，心中升起了脱离苦难的希望。

春风吹化了寒冬的冰雪，也吹开了我心上的迷雾；红军在我心中点起了一把革命的火。我和妈商量说：“我要找红军去。”

“去吧，找到了红军，就跟他们一起干，报我们家的仇，打倒了地主官僚，我们穷人和苗家才有出头之日。”我没想到妈会答应得这么爽快，第二天一早我就找红军去了。

听说红军在白沙，我一口气赶到白沙，但红军已经开走了。我打听到红军去的方向，又不停脚地踏着红军的足迹往前赶。走民乐，去观文，到镇龙山，奔铁厂……赶了十几天，始终没有赶上红军，我只得又回到核桃湾。但我的心中时刻都想着红军，盼望红军能快快回来。

不知怎的，没几天，我找红军的事，竟被徐仲恒和乡保长知道了。他们在暗地里设方打条想迫害我，幸喜有个穷乡亲听到风声，连夜赶来告诉了我，好心地叫我避一避。妈听见了有些不乐

意说：“我们家的仇还没有报呀！”

“大嫂，留得青山在，何愁没柴烧。徐仲恒和保长要向你们下毒手了，……还是搬动个地方吧。”

妈妈眼里闪着仇恨的光，好久没说话，最后才默默地点了点头。夜里，我们一家四口，满怀仇恨，悄悄地离开了核桃湾，拖着沉重的步子，到了陈坪的松林坡。

在漫长的艰难岁月里，残酷的压迫、剥削，多如牛毛的租税、差役，虽说累损了我的筋骨，但永远也扑不灭我心中复仇的火焰，磨不掉出头的希望：红军一定会回来，共产党一定会回来！我们穷人和苗家一定能得到翻身！

春风吹绿大地，红旗插遍山乡。一九四九年底，当年的红军回来了，古蔺解放了，苗家解放了。

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，我积极投入了清匪反霸和土地改革运动，在斗争会上，在诉苦会上，“走阴鬼”这个罪恶阴谋终于揭穿了。人民政府给我们广大穷苦人民报了仇，雪了恨，也给我们伸了冤。徐仲恒这个万恶的狗地主得到了应有的惩处。我这个“走阴鬼”的儿子真正翻身当家作了主人。

今年，我这个旧社会“走阴鬼”的儿子，被选为四川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，和广大代表一起商量国家大事，这是多么深刻的变化啊！这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啊！

难忘的童年

熊少成

每当看到孩子们背着书包，迎着朝阳蹦蹦跳跳地去上学，或是节假日孩子们同我们老一辈一起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时，我就象年轻了许多，跟孩子们一样，心里感到十分甜蜜。心想：在新社会，孩子们的童年是多么幸福啊！可我儿时的苦难遭遇，却又使我久久地不能平静。

五十多年前，我的老家住在土地湾，租种地主蔺子舟的土地。三石田土，要交两石租。他两口子都是烧大烟的“鸦片鬼”。地主婆冷氏，又刁又狠又泼，是出了名的“母老虎”。我爹是一个三天不说两句话的老好人，又拖一身病，家里全靠我妈一个人撑持。我还有一个十来岁的哥哥，一家四口，长年过着“糠菜半年粮，海椒当衣裳”的苦日子。还欠了蔺家五斗粮食的债。

一九二六年，我还不满三岁。后来听我哥说，那年头年干冬，接着又是春旱。我们租种的那点地，连育秧的田都找不到一块。唯一距小溪近点的那块田又是种的鸦片烟，快成熟了。这鸦片烟是“母老虎”定死了的。但眼看育秧季节就要晃过，要是再不播种，大春种不上，拿什么去交租？又怎么能还债？往后的日子怎么过？没有法子，爹妈只得忍痛把那块距水近点、约有一斗面积的烟棵铲了，戽了水，好做秧母田。哪晓得“母老虎”见了，比挖了她的祖坟还伤心，硬说我们要断她家的衣禄。她过足了烟瘾，成

天骂得白泡直滚，逼着妈赔她三石田土的全部产量，估着三天内要还清欠债。妈甩了她几句，她就把我家的衣物、傢什摔得乱翻翻的，并且开口闭口喊我们“滚！”爹妈满脸愁云，被逼得走投无路。

第三天早晨，起来没看见妈，我屋里屋外哭喊，爹也不知道妈到哪里去了。他一边咳嗽一边哄着我“别哭”，吃力地把我背起，喊着哥哥一路出去找妈。

好不容易才爬上后山，在我们种的最上边一块烟苗地里发现了妈。她斜躺在一堆烟棵上，面前一大堆划烂了的烟斗斗，手里握着划烟的小刀，半睁着的眼睛，象在发怒似地凝望着苍天，嘴角流出来的口水混和着烟汁早已凝结。我和哥哥悲痛地喊着妈，可是她再也没有答应我们。

妈死后，爹带着哥哥和我，日子更难熬了。爹又气又累，常常病倒，拖了几段时间，最后惨死在任家寨的屋簷下。哥哥虽说已十六、七岁了，但从小缺吃少穿，长得又黄又瘦，出外帮人当长工，只能混个半饱，怎能养活我呢！为了求生，我孤单单地拖着打狗棍，挎起讨饭篮，出外逃荒要饭去了。这时我才八岁多点，漂流在贵州的赤水、仁怀、东皇殿、清池和四川的叙永、古蔺一带。

讨口要饭的非人生活，使我尝够了辛酸，受尽了折磨。

甲戌年的腊月间，我正在贵州的土城一带讨饭。接连下了两天鹅毛大雪。我实在饿得难熬，没等放晴，就钻出乱草堆，挎着讨饭篮，偏偏倒倒地讨吃。那割脸的寒风象有意跟我作对，一阵更比一阵猛，象要把几片破麻衣给我撕去。我走了一阵，远远望着半山腰有一茅屋，心想，赶快到那里讨点吃的，烤一会儿火，

暖和暖和身子。可是腿越来越不听使唤，眼前一黑，我一头栽倒在路边，试了几次都没爬起来，心里着急死了。难道就这样冻死饿死在荒山雪地上吗？不！我要活下去。不知怎的，“母老虎”逼死我妈前前后后的情景，一下浮现在眼前，埋在幼小心灵中的仇和恨给我增添了力量，我一定要勇敢地活下去。我使劲跪起，借着打狗棍的支撑站了起来，眼里燃烧着仇恨的怒火，怒向群山问道：“山啊，你再高也有个顶；苗家的苦难啊，就没有尽头吗？”呼呼的林涛好象在一个劲地回答我：“啊！啊……”

停了一会儿，我拄着讨口棍又上路了。谁知还隔那茅屋百十步远，一个周身穿得胀鼓鼓，象条肥猪崽的小子，在那敞坝边堆雪人，一见我这个衣衫褴褛的讨吃的，便“嗖！嗖”两声，两条大黑狗狂吠着象箭一般向我射来。这时，我跑又跑不动，躲也躲不开！幸好手里有根打狗棍，只得背靠石壁打三方，吓得哇哇叫。可那狗崽子却哈哈大笑，又高声侮辱我：“小苗娃！小讨口子，你打我家的狗，看老子揍你哟！”我恨得咬牙切齿，多想冲过去，揍他几棍！但眼前要跟那两个畜牲搏斗，累得我喘气不赢，眼看招架不住了。这时来了一个过路的庄稼人，年纪在四十左右，一身衣裳比我的好不了多少。他边吼边抓起雪团就朝恶狗打去。撵走了那畜牲，他才怜爱地说：“孩子，你怎么上这保长家来讨吃哟！今天，要是我迟来一步，那些畜牲把人咬死了，他家都不会出来吭一声的。快跟我一路下山去吧。”可我哪里还有力气走啊！眼眶里滚出串串苦涩的泪水，有气无力地说：“大伯，我已经两天……没……没吃东西了……”话没说完，就晕过去了。当我浑身感到一阵暖和，苏醒过来时，那个衣衫褴褛的汉族大伯还守在我的身边。一看，这里是一个避风的岩洞，洞里有一堆干草，

我正睡在草上，离洞不远烧起了一堆火。那个不知姓名的汉族大伯，满脸焦急，见我苏醒过来，眼里闪着泪花说：“孩子，你就在这里歇着吧，我还有急事要赶路。”说着他从腰杆上解下一个布口袋儿，“这里还有两个冷包谷粑粑，你暂时填一下肚子吧。”我不知该怎么感激他，张了几次嘴，都没说出一句话来。他摸着 我瘦骨嶙嶙的头和手说：“孩子，以后讨吃，千万别去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家，到穷户人家去讨，还能讨上一口半碗。”说着把冷粑粑放在我手里，匆匆赶路去了。

岩洞外，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林子。林中积满了白雪，北风呼呼呼叫，卷着雪花乱舞，搅得天地灰蒙蒙。我在火边烤了一个包谷粑，几口咽下去，觉得肚里仍然空空的，于是又拿起一个，可心里却告戒自己：忍着点吧，要是明天讨不到，又吃啥呀！翻来复去看了几眼，才下了狠心，把粑粑放到讨饭篮里，用那个缺碗紧紧地扣住。

夜里，我不敢闭眼熟睡，尽管在洞口烧了一堆火，也还得提防着吃人的野兽。豺狼豹子常在周围山林中嗥叫，使人毛骨悚然；山羊、野兔的叫声，使人背心里一丝丝发凉……

过了几天，天放晴了，好多天不见的太阳露出了笑脸，山风也没有那么刺骨了。我这个已过了两年讨饭日子的苗家孩子，满过了十岁。我日夜盼着快些长大成人，那时我就能干活，挣钱吃饭，要去向“母老虎”讨还命债，报仇雪恨……我挎着讨饭篮，拄着打狗棍，走在山路上美美地想着。猛然间，一阵急骤的枪声在不远的地方响起，打断了我的思路，赶忙找了个岩洞 隐蔽起来。

枪声，一阵密，一阵稀，不知过了几个时辰，才渐渐平静下

来。吓得四处乱扑腾的小鸟儿，又啾啾喳喳地在林中跳米跳去觅食了。我刚打算走出岩洞去讨点吃的，两个端着枪的兵过来了，我心里一愣，啊，兵！赶快躲开的好。前不久，就碰到一群兵，把一个比我大一点的讨饭孩子捉去给他们挑东西。我一转身又退回岩洞。可是，我早被那两个兵发现了。他们还在十几步远就问：“什么人？”声音不大，也不象上回碰到的那样凶，但却很威严。我仔细一看，样子很和善，帽子上有一颗五角星，眼里闪着机警的光走过来。我胆子大了些，但手里仍紧握竹棍回答：“讨饭的。”他们见我这个样子，便提着枪走过来，和蔼地说：“小兄弟，别怕，我们是红军。”他们扫了一眼岩洞，又看了看我那空空的讨饭篮子，其中一个抹了把眼泪问我：“小兄弟，这就是你的家吗？”

我疑惑地望着他们，没言语。上回碰到的兵凶神恶煞，动辄打人骂人，今天为什么这两个兵说话和和气气？见了我这个小讨饭的还抹眼泪？

“我家也有一个这样小的兄弟讨饭去了……”抹泪的那个兵小声说，好象是对他的同伴讲，又象是自言自语。

“小兄弟，你饿了吧？走，跟我一路下山去吃饭。”另一个说着，我听不大懂，只是望着他同情的目光出神。

“你在这里放哨，我带他去吧。”抹泪的兵向他伙伴说，回头又对我说：“小兄弟，我们走吧。”

“不去，我会去向穷人讨。”我倔强地回答。

“我们就是穷人的队伍呀！”

“穷人的队伍？穷人还有队伍？”我可不懂了，大睁着眼睛问。

“有啊，就是毛主席、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。”

“毛主席、共产党是哪个？”好新鲜！我赶忙问道。

“就是领导干人闹革命的。红军就是打土豪恶霸的……”

“要打‘母老虎’不？”一听说红军是打土豪恶霸的，我也不管他们晓不晓得就大胆地问开了。两个兵一时没弄清楚，但看我眼里噙着泪，闪着仇恨的光，便又问我：“你说的‘母老虎’是哪个？”

“逼死我妈的地主婆！”

“要嘛！红军就是要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，打倒那些吃人的地主老财，打倒贪官污吏！”

“就是要让穷苦兄弟都过好日子……”

两个兵说了一长串，我听得倒懂不懂，心里却充满了喜悦和希望，觉得顿时长高了一长节，拖着棍子大声说：“走，我领你们去收拾那些吃人的豺狼！”

……

我随同一个红军战士下山去，吃了饱饱的一顿饭。晚上又在铺着谷草的地铺上，甜蜜地睡了一夜。

第二天，红军要出发了。他们叫我回到家乡去。我哪里有家呀！他们前脚走，我后脚跟。从贵州的土城过赤水河，到太平渡，去扎西，走茅台……追不上前面的，我又跟着后面的，只要是帽子上有红五星的我就跟着走，帮着红军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。当红军打开地主豪绅的粮仓、盐仓，分粮分盐给干人时，我也去帮忙递送。那时，我真说不出来有多么高兴。后来到了可贝，住了几天。一天早晨等我醒来，红军已无影无踪了。我慌了，爬起来一看，身边放着一小口袋米、两件叠好的干净衣裳，衣袋里还有

两块银元。我摸了摸米袋，捧着两块白花花的银元，眼里淌着热泪，心里喊着红军、毛主席、共产党，伤伤心心地哭了一阵。我抹着眼泪，把两件衣裳一捆，银元揣在贴心的衣襟里，将米袋一背就追赶红军去了。

一连三天，我也不知赶了多少路，脚都走肿了，始终没看到红军的影子。可是红军、毛主席、共产党闹革命打土豪，却在我心里刻下深深的印记。

红军走了，我又四处流浪。

一天，我来到赤水河边的一个渡口，一个身披蓑衣撑渡船的老大爷，见我瘦得皮包骨头，很是同情地叫我上船。过渡时，他问我从哪里来，到哪里去。我充满希望地说：“找红军去。”

“啊！”老大爷一听说红军，便满脸喜气地说：“红军好啊！”

“老大爷，你见过红军吗？”

“见过啊！”

“你渡过他们吗？”

“渡过，渡过。”老大爷的眉毛眼睛都笑了。

“河那边王家烈的‘双枪兵’到处糟蹋人，要去讨吃可艰难哟。”他接着告诉我，眼里顿时燃起了怒火。

“不怕，找到红军就会好的。”

“他们过河走了好久了，你还能找到吗？”

“会找到的。”我坚定地回答。

老大爷见我倔强的样子，轻轻地说了声“好嘛”，随着揭开鼎锅盖对我说：“这里还有一碗冷饭，暂时对付一阵子吧。”

我凝望着老大爷，只是说：“不。老大爷，还是留着你自己

吃吧。”

“孩子，你就吃了吧。”老大爷深情地说着。我端起饭香喷喷地吃起来。船到河心，只见老大爷饱经风霜的红铜色的脸上一阵紧张，使劲地几橈划过了急流，船儿很快就平稳地到了对岸。我深深地向老大爷道谢，离开了渡口。

一连几天，我又不知走了多少路，沿途果然见到那些“双枪兵”到处整得鸡飞狗跳，一片兵荒马乱景象。碰到穷苦的老年人，就打听红军的消息。我苦熬了两年，稍长大些了，怀着“红军总有一天要回来”的强烈愿望，想一边帮人干活，一边等着。有一天，我在一条山路边上，看见两个蹲包谷草的中年人，便有意地停下来歇口气，试探着问问：“大叔，你们要雇人干活吗？”他们停下手中活，又打量了我一番，轻轻地摇了摇头，为难地说：“我们都是帮人家干活路哟！”

“啊，你们的老板还要雇人吗？”

“小兄弟，如今能雇人种庄稼的少得很。我们这样精强力壮的汉子，象牛一样干活，都只能给饭吃，不给工钱。唉，你……”他叹着气把话吞回去了。

我的心凉了。要帮人干活也难啦！

又过了些日子，我走在一个长满小树丛的荒坡上，又渴又饿，忽然发现树丛中的刺藤上结满了黄泡，真使人喜出望外。我放下讨饭篮，就去摘来直往嘴里填。

“孩子，那种黄泡吃不得哟！”突然的喊声，把我吓了一跳。一看，原来是一个放牛的老公公正在向我招呼。我呆呆地望着他出神，手里捏着几个黄泡舍不得丢。他走拢来看见我的讨饭篮，叹了口气，又十分关切地说：“孩子，这种黄泡有毒。快丢了！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在我们这山里，这种泡叫‘蛇不尝’，黄亮亮的，样子好看，要是吃了，过不上半个时辰，肚子就绞痛。你吃了多少？”他说了黄泡的厉害，又焦急地问。

“没吃好多。”

“还有办法。你别走了！”说着急急地朝树丛中走去。我觉得一阵心慌，嘴里涩苦苦的，很不好受，便坐在草地上。哪知才坐下去，汗珠就直冒，肚子里哗哗响，象刀割一样痛。我想这下完了。幸好老公公气喘吁吁地回来了。他手里捏了一把不知什么嫩叶子，看我痛苦的样子，没顾得说话，就把一个指头伸进我嘴里，在喉头一抠，我便“哇，哇”地吐了起来，直吐得眼睛发花，才觉得好过一些。老公公又忙将那把嫩叶子使劲搓揉了几下，扯一砣塞到我嘴里，说：“快吞下去！”又酸又涩，我接连咽了几口。老公公又把我的讨饭碗舀来山泉水，让我喝了一碗。一会儿，心里顿觉舒畅，肚子只有点儿隐痛了。

这时，老公公一身破衣裳都汗湿透了，布满皱纹的脸上有了笑容，缓缓地说：“这一下不要紧了。”

“老爷爷……”我万分感激，刚开口喊一声，我说不下去了。

他坐在我身边抚摸着我的头，说：“孩子，不要紧了，会好的。”

这位放牛的汉族老公公姓宋，已经七十岁了。亲人被姓万的财主逼死完了，现在还帮财主放牛还债，住在离财主家不远点的一个窝棚里。当摆谈到红军时，老公公跟我一样坚信：红军总有一天要回来的。只是不同意我去漫天瞎找。于是，我丢掉了打狗棍，每天帮宋爷爷去放牛，给他拣柴，背水。宋爷爷待我象他亲

孙儿一样，把我长长的头发剪了，又把他的衣裳给我换上，给我讲人世间的不平事……没几天，我被姓万的财主发现了，他派狗腿子跑到宋爷爷窝棚里来，假惺惺地说：“宋老头，你也可怜，叫这个野小子一起给东家放牛吧。东家供饭吃。……”

“光供饭吃？”宋爷爷截住话，有气地问。

“这年辰，能供饭就不错了。”

“我欠东家的债，这孩子可没欠东家的债呀！”宋爷爷难过地看着我说。

“小孩子做得了多少事？只不过给你减轻点担子。东家有碗饭给他吃，也免得你每天口中挪。”

我听狗腿子这么一说，才晓得宋爷爷每天带给我吃的杂粮饭，是他饿着肚子挪出来的。没等宋爷爷开口，我就答应了：“要得，我去放牛。”

从此，我成了万家的放牛娃。每天，我跟宋爷爷比公鸡还起得早，天才麻麻亮就得把那二十多头黄牛、水牛赶上山去放牧；太阳不落山，不准赶回牛栏。要是有一头牛的肚皮没胀得象鼓一样圆，我就得不到饭吃，有时还要挨几鞭子。

这年秋天，我患了一场可怕的痢疾，两天工夫就拉得起不了床。狠心的财主不仅不给分文抓药，还骂我偷懒不去放牛。好心的宋爷爷每天扯些草药回来煎水给我吃，很快就好多了。可我还没有完全好，宋爷爷又染上了。他年纪大，才拉一天就起不来了。我急得团团转，没有了主意。后来按照宋爷爷说的样子，我在山上扯些草药，熬水给他服，但病情总不见好转。可恶的管家仍然每天逼着我把牛赶上山去。我惦记着宋爷爷，不敢放牧远了，好悄悄地跑回窝棚看望老人家，或递一口水，或做一点什么。一天，

太阳刚偏西，我把牛群赶到阴坡，就朝窝棚跑，快拢了，不料碰上那管家，他厉声喝道：“大白天朝屋头跑啥子。”

“回去看看宋爷爷。”

“你怕他死了吗？”

“他的病这两天更恼火了！”以往我见了这条恶狗似的管家，总要躲着点，今天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力量，边回答边朝窝棚跑。

狗东西蹿过来一把揪住我，一对眼睛咕得象铜钱大，吼道：“还不转去放牛！要是二东家晓得了，不打断你的脚杆。”一推，差点把我掀倒。

我撑着虚弱的身子不动，眼里燃烧着怒火，真想扑上去咬他几口才解恨。

管家的狗眼一转，装作一本正经的样子，说：“你去看一下有啥用？快转去放牛。我就是去请太医给宋老头看病。”说着又动手赶我。

我被他逼得没法，只得回到坡上，天还没黑尽，我把牛赶回栏里，就往窝棚跑，还隔十几步远就喊着“宋爷爷”，可没人答应。我几步跳进去，又连喊几声，忙把松明点燃。呀！在惨淡的松光下，宋爷爷深陷的双眼睁得大大的，盯着窝棚顶，我一下扑过去，一声接一声地呼喊：“宋爷爷，爷爷……”轻轻地摇着他的肩膀。宋爷爷仍一声不响。我把他柴棍棍样的手杆抬起来放平，试了试鼻孔，还有点气，不知该怎么办才好，只哭着喊：“宋爷爷”。宋爷爷这时好象听到了我的喊声，嘴唇微微动了两下，可没有声音。他眼角滚出两颗晶莹的泪珠，忽然张开了嘴，发出微弱的声音：“孩……孩子，红……红军……要，要回……”话没说完就咽了气。我直哭得天昏地暗。

我满腔悲愤跑去告诉东家。那万老二正在跟管家一起拨拉算盘，冷冰冰地说：“大惊小怪地叫啥子！死了拖去窖了就是嘛！这老东西欠我的债还没有还清哩！”他头也不抬，用叶子烟杆指着账簿对管家说。

宋爷爷死后，我仍住在他的窝棚里。有一天放牛回来，我躺在乱草上，想得很多。第二天起来，我跟往常一样，不露声色地把牛群赶到山上去放，过一段陡坡时，让那些畜牲挨一挨二地朝前面走，我从后面将一根削得溜尖的斑竹签子使劲往一头牛的尾巴下一戳，那畜牲“哞哞”地惊叫着，往前猛蹿，一头撞一头，接连撞了好几头下坡去了。我把竹签子丢到刺巴笼里，飞一般翻过山梁，涉过溪流，一口气跑了十几里，才停下来歇口气。在一块包谷地里啃了两个生包谷，又往前赶。连夜连晚跑了几夜，我也说不上跑了好多路程。

一九四五年，听说抗战胜利了，我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回到家乡，意外地碰到了我失散多年的哥哥。一九四七年，我们才佃了一家富农的土地来种。这时，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地打内战，地主老财、乡长、保长更加凶残地敲榨勒索，盘剥老百姓。我弟兄俩跟许许多多干人一样，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。我们更加盼望红军快快回来。

一九四九年，中国人民解放军来到了古蔺，当年的红军真的回来了。

一解放，群众就选我担任了农协主任。在人民政府领导下，我和群众一起，积极地参加清匪反霸的斗争。有了毛主席、共产党，我们干人报了仇，雪了恨，分得了土地，又走上了互助合作，人民公社的金光大道。

我盼红军快回来

古占清

一九三四年腊月间，红军打到遵义的消息，象长了翅膀一样，飞快地传遍了赤水河北岸还是冰天雪地的古蔺山区；红军打土豪、开仓济贫的故事，象一阵阵春风，吹遍了古蔺的山山水水，村村寨寨。就连我们这个偏僻的小村里，穷哥们只要一避开大绅粮张见奎的耳目，就要凑到一起兴高采烈地议论一番。我家的茅草窝棚和穷得经常烧吊锅的王绍成家那间小土屋，无形中成了穷哥们经常摆谈的地方。全村就只有大绅粮张见奎家的大门常常紧闭。

眼看年关一天一天接近，“红军要攻打古蔺”的风声也一天比一天紧。穷哥们心中暗自高兴，可张见奎家的男女老少却一个个惊恐万分。半个多月来，张见奎和他的管家胡狗少有出门，最近几天连面都不露了。只听见张家紧闭着的高墙深院里，成天“乒乒乓乓”响个不停。张见奎这老狗在搞些啥名堂呢？大家都觉得奇怪。

一天，张见奎忽然传话，要全村的佃户到他大院里听“训话”。我那时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，张家的狗腿子说，象我这样大的娃娃也要去。

我跟着爹走进了张家大院，只见院坝里已有了二十多个穷乡亲。张见奎坐在院坝正中的一张黑漆方桌旁边。他一双猫头鹰眼

睛不停地转动，翘起猪嘴正在说：

“……………各位佃家，据闻，共军已过乌江，不日将攻打古蔺。共军所到之处，杀人放火，共产共妻，危害庶民……实为我等痛恨。尔等乃我多年佃户，张某深为关切。现经全乡绅粮聚商，共谋御敌，速建碉堡四座，各配牛儿炮一门……到时，尔等悉听号令，克尽职责，守护乡土……”他一边说，一边口沫乱飞。咳了两声，又说：“御敌乃当务之急，碉堡不日动工，尔等应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不得有误！”

听了张见奎的一派胡话，穷哥们议论纷纷，鄙弃地看了一眼，便四散离去。我似懂非懂，末了“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”这句话倒是听明白了的。

我闷闷不乐地跟在父亲背后回到家里，爷爷问张见奎到底“训”了些啥子？爹愤愤地说：“要我们穷佃户修什么碉堡！抵抗‘共军’”。

“抵抗共军？这老狗！川军来，联防队来，烧杀掠夺，他为啥屁都不放一个？如今一听说红军要来，他偏偏要‘训话’，又是造碉堡，又是打刀造枪！”

“是啊，老狗还要我们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”

“啊……”爷爷话到嘴边又噤了回去。

过了几天，张见奎的管家胡狗突然把我爹叫到张家去。

张见奎躺在安乐椅上，正在“咕噜咕噜”抽水烟。见我父亲一进门，他扬起头把我爹盯了一眼，劈头盖脑就是一句：

“古志儿，你是出钱，还是出力？”

“我家老的老，小的小，年近三十了，还没找到年饭米呢，哪来的钱？”

“没有钱？”张见奎死死盯着我爹的脸，阴阳怪气地说：“没钱？活宝可以变嘛！”

“活宝？”

“我说的活宝，就是你那两条牛！”张见奎补充说。

我家祖孙三代共六口，爷爷七十几岁了，冰雪寒天还只穿了一件麻布襟襟，妈只围了块破麻裙，爹和我穿的是用玉米壳壳编的坎肩，我的两个小兄弟，就一年四季都打着光屁股。除了一间茅草棚外，唯一的财产，就是爷爷帮了十二年长工，省吃俭用积攒的一点钱买了一头老水牛，前年冬天下了个崽崽。没想到，张见奎这次对我家起了黑心。

“那可是庄稼人的命根子啊！”我爹又气又急，声音都变了样。

“哼！你要命根子，共军来了我就没有命根子囉！”那老狗猛地从安乐椅上跳了起来，逼向我爹，顺手打了我爹一耳光，凶神恶煞地骂道：“狗还晓得效忠主人，我看你这个佃户，眼里还有人吗？限你三天之内，交五十块大洋来！”说完，又给了我爹一耳光。

我爹恨得两眼喷火，拳头捏得咕咕响。

一天晚上，爷爷他们都睡了，我和爹坐在柴火堆旁，为五十块大洋发愁。忽然胡狗背了一大背东西，慌慌张张地闯了进来，匆匆地说：

“古志儿，我传张爷的话，共军已到白沙，明天就要过麻城。修碉堡的钱暂时不收。张爷要你把这背东西给他藏好。要是丢了，当心你的老命！”

爹揭开一看，原来是腊肉，还有一钵鸦片烟，吓得颤抖着双

手说：“胡哥，这，我可担当不起呀！……”

“你不担当，未必我来担当？你种张爷的地，还敢不服管？”

“哪有种地必须藏东西的道理。”我忙插嘴道。

“娃娃家，懂啥子，少多嘴。”我爹吼我一句。转身对胡狗说：“拿走吧！我实在担当不起。”

这胡狗原名叫胡够，本来就不是一个好人，自从当了张见奎的管家后，越发凶恶。在穷人面前充主子，在主子面前却象条哈巴狗，于是人们都喊他胡狗。他见我父亲硬不接东西，便收起那付凶相，咧着嘴笑嘻嘻地说：“古志哥，你不想想，硬不干，要是他把土地抽回去另外招佃，看你一家怎么过？好了，好了，现在我俩商量商量，你看藏在哪里稳当点？”

爹还以为胡狗是好意，犹豫了好一阵才说：“只有藏在菜子岩上。”

“要得，要得，事不宜迟，那你今晚上就动手。”胡狗说完，就急急忙忙消失在黑夜中。

胡狗走后，我说爹不该答应。

爹叹口气说：“得罪不得啊，我们租种着人家的地。孩子，快去把那口大锅捆上。”

“做啥子？”

“到时候你就明白了。”

我和爹连忙摸黑上山，将东西放在菜子岩，扣上大锅，盖上乱草，就急忙忙往回走。这时，我眼前突然有个黑影一闪，就钻进了密林。我忙说：“爹！有人。”

“哪里？在哪里？不是看花了眼吧？”爹紧张地问。

“当真有人，在那棵青桐树背后。”

“那你照样朝前走，我从那边过去看看到底是谁？”

按照爹的吩咐，我继续朝前走，不一会儿，传来了爹的声音：“啊，是胡狗，你也来这里？”

突然喊名叫姓的问话，象倏地一声巨雷，胡狗惊呆了。过了好一阵，他才支支吾吾地说：“我不放心，才来看看。”

爹“啊”了一声，没有再说什么。

东方发白不久，红军真的来了。队伍拉成一条线，好多好多啊！

我和爹都躲在对门山上树林里，透过密林仔细盯着村里的动静。因为我们隔得近，所以红军的一举一动都看得清清楚楚。只见人家户的院子里、檐坎上，到处坐满了人。除了张家大院外，没人进干人的家。我家门口有不少红军，有几个背靠背象在打瞌睡。快晌午了，仍没见有什么杀人放火，也没见什么抢东西的事情发生，悬起的心渐渐平和下来。我说：“爹，我看这些兵和那些川军、联防队象有点不同哇！”

爹没有立即回答我，只是说：“是象不一样，不过，看看再说。”

一会儿，红军开始做饭了，锅是他们自己带来的，我家屋檐下本来堆得有柴，他们一根也没动，都到背后山上去捡。

我总觉得奇怪，就对爹说：“我下山去看看。”开始爹横顺不准，还说：“世上的兵我没见过好的。”我说：“你看嘛，这回来的兵不同啊。”爹才勉强答应，不过还是要我隔远点。

我绕到家背后，只见红军帽子上缀着个红色的五角星，衣领上挂着两面小红旗，一个个有说有笑，打的打草鞋，补的补衣服，有两个还在读什么书。有个络腮胡的高个子，胸前拴块白围

腰，又是挑水，又是煮饭。不久，饭熟了，散发出诱人的香气。我坐在一个土坡坡上，看得入了神。忽然那个高个子叫着“小鬼”向我走过来，脸上堆满了笑容。我怯生生地想往后退，别的几个红军又在一边向我点头，没有一点恶意。于是我胆子大起来了，一步一步向红军走去……

开饭了，高个子红军舀碗喷香的大米饭塞在我手里。看着白白的米饭，眼泪一下模糊了我的视线。十几岁了，我没吃过一顿白米饭，我也没见过爷爷和爹吃过这样一顿白米饭啊！我激动地对红军说：

“红军，好人啊，苗家的亲人！”

“我们都是干人，是一家人。红军打倒蒋介石，打土豪，分田地，解放全国受苦人……”

我心里高兴，情不自禁地唱起了苗家的山歌：

不是画眉不唱歌，

不是苗家不打话。

不是蜂儿不采蜜，

不是亲人不爱他。

我和红军一块吃，一块住，一起摆龙门阵，半天工夫，我好象成了大人，明白了好多事情。

傍晚，我上山把爷爷、母亲和两个弟弟都找了回来，就是没有找到我爹。

第二天，红军开走了，我们一家和许许多多穷乡亲把亲人送出寨子，一直送了老远老远。

爹回来了，听我给他讲完红军对我们一家的情景。爹惊异地问：“世上真有这样的军队？”

“是的，已经有了。他们还要回来，要为苗家报仇，要分田分地给我们种。干人要当家作主。这个军队是毛主席领导的……”

爹象看到了希望，看到了光明，激动地喊了一声：“毛主席！红军！”

红军走了，可是红军从此在我们穷人心里扎下了根。几天来，“红军好”成了我们松林村里谈话的中心，王绍成的那间小土屋更热闹了。“红军是毛主席、朱总司令的队伍！”王绍成手舞足蹈，越说越扎劲：“这红军是神兵下降，个个长着飞毛腿，日行千里，夜走八百，专打豪绅恶霸。有了这样的神兵，我看要改朝换代，干人扬眉吐气的日子快来啦！”说得人人眉开眼笑，讲得个个哈哈震天。

这些流传也被绅粮张见奎知道了。红军走后的第三天，他和胡狗跑到我家恶狠狠地说：“你们到处讲什么红军好，我看好个屁。”

我对他说：“红军对于人就是好！”

“干人！干人！老子还要叫你干！干！干！”张见奎阴险毒辣地说。接着瞪起鼠眼，咬着牙问：“我的东西呢？快给我交出来！”说完扭头就走。

胡狗这回站在旁边，一声没哼。随即露出一丝狡猾的好笑，也跟着他主子走了。

我和爹急忙往山上跑。走拢一看，东西不见了，大锅被掀翻在地上。爹惊叫了一声“我的天哪……”就瘫软在山坡上。

天上，乌云密布，眼看风雨要来临了。

挨晚，四个乡丁背枪挂弹，拿着绳索上门来，不问长短就把

爹和我一齐捆了，押到麻城乡公所关起。外面大雪纷飞，屋内寒气浸骨。幸好我们穿着红军送的衣服，我和爹紧紧地挤在一起，才稍微暖和一点。

天刚开河口，张见奎提根拐杖，在几个乡丁的簇拥下走了进来。

“古志儿，把东西交出来！”他瞪着眼说。

“东西藏在哪儿，胡狗也知道，为啥子单问我家要？”我直杠杠地答了一句。

“哼，老子交给你家的，就要问你家要。”

“我们没有拿！”我高声叫喊着。

张见奎恶狠狠地说：“你们今天一个红军好，明天一个红军好。东西到哪里去了？不交出来，叫你知道锅儿是铁铸的，我的棍子也是铁打的。”说着举起那根哭丧棒向我打来。

“住手！”爹大吼一声，一把抓住拐杖。同时无比气愤地说：“蜜蜂是酿蜜的，苗家爱它；画眉会唱歌，苗家喜欢它。红军是干人的队伍，所以干人都说红军好！”

“啪，啪！”一个凶狠的狗腿子猛地打了我爹两耳光，一边打一边问：“红军好不好？红军好不好？”爹逼视着乡丁说：“红军不好，你们好？你们坏事干得好！”

乡丁举起枪托，高叫：“还说不说红军好！”我和爹同声说：“红军好！毛主席好！”张见奎勃地伸出他的右臂，在空中舞了两下：“反了！苗人反了！”

关到第八天，爹带信找村里的王绍成，请他想想法子救我们出来。

王绍成是汉族干人，家里很穷，为人正直、豪爽，能言善

辩，常为千人打抱不平。

王绍成接信后，便去张见奎家，“张爷，绍成我来求你一事。”

“请坐，有事好说。”

“听说古志儿两父子触犯了您，被抓关押？”

“他盗我东西，还煽动乡里，讲什么红军好。”

王绍成微笑着说：“盗你东西？好的说不坏，坏的说不好，嘴能封得住？事实不饶人啊！”

张见奎听出味来，脸上青一阵，白一阵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那……那我的东西？”

“东西？胡狗难道没有责任么？”

“你……你……关你屁事！”张见奎动火了。

“大路不平旁人铲，干事情总得讲个理嘛！”王绍成冷冷地说。

张见奎大叫一声：“非赔五十块大洋不可！”

“五十块？你不嫌少？不管怎样，人我保了。”

“人算你保，五十块大洋就找你王绍成要！”张见奎吼着说。

我们出来后，张见奎三天两头追要五十块大洋。正月十五那天，张见奎花天酒地过完了大年，又打发人来叫我父亲。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，拖着沉重的步子，走进了张家大院。夜，静静的，张家大门口，亮起了一盏孤灯，门上的虎口张开血红的大嘴。父亲抬头看了一眼，不禁打了个寒噤。

张见奎躺在安乐椅上，见我爹进去，喷着酒臭问：

“古志儿，五十块大洋办齐了吗？”

“我身上的几根老骨头已经榨不出油了！”

张见奎呼地一下弹了起来，伸长脖子问：“你那活宝变了
吗？”

爹的头上象响起了一个炸雷，头一阵轰响，眼前一黑，差点
跌倒。“张见奎，你心肠毒啊！挽圈圈、编套套，还是想活吞我
的两条牛！”父亲心里骂着，嘴上还希望有点转机：

“牛是庄稼人的命根子啊！你行行好吧！”

“放你们出来，不就是行好了吗！你不出款，又不赔钱，重
新关起那还不容易吗？”

两个乡丁象听到主子唤狗一样，汪汪地叫道：“把这龟儿捆
起！”

这时，管家胡狗从里屋钻了出来。他假作求情地说：

“古志儿会把五十块大洋办齐的。张爷，今晚饶了他吧！”

回到家，爹急得团团转，妈气得坐在草凳上哭。爷爷打起火
把，走到牛圈，摸一摸心爱的牛儿，倒在牛栏上，长吁短叹。

我满腔怒火地对爷爷和父亲说：“不要哭，等我拿刀去把张
见奎杀了，看他还要不要？”

爹急忙说：“要不得，杀了，你往哪里走？”

“当红军去！”

爷爷说：“不行啊，人家财粗势大，暂时忍一下吧。”

爷爷和爹明知道张见奎对我们干人热爱红军，恨之入骨，也
晓得张见奎早就想把我家两条牛吞掉，但奈何他不得。如果这五
十块大洋不交，他一要撵我们走，二要把地收回，往后的日子就
更无法过了。只得忍痛把两条牛一齐卖掉，得了五十二块大洋。

钱准备好后，爹告诉了王绍成。王绍成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古志

哥，你不该卖两条啊！”爷爷说：“一条牛卖的钱不够数哩！”王绍成想了一想，说：“钱只能给他二十五块，剩下的你留下做牛本。”

爹忙问：“那能脱手吗？”

“到时候，你们听我的就是了。”王绍成沉着地说。

我们父子同王绍成一起去到张见奎家。

王绍成提起装大洋的小棕口袋，大摇大摆地跨进张见奎的屋子。张见奎一见，便把那双眼睛死死盯着小棕口袋。

王绍成把袋子往桌上“咣当”一放，在一个圆凳上坐下。

张见奎按捺不住贪馋的心情，急问：

“五十块大洋办齐了吗？”

王绍成说：“干人爱牛如命，张爷爱钱如命，哪有不办的道理！”

“那就把钱拿来，你这个担保人就没事了！”张见奎想早点收场，把人撵走。

“钱给了你，你就不会找我了。可是古志儿一家，没有牛，种不下庄稼，能忍心么？”

“那我管不了！”

王绍成从座位上站起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张爷，今天我把话讲明白些，这明明是个冤案。冤案，冤案，一家一半。大洋只能给你二十五块。”

“五十块大洋，一个不能少！”张见奎跳了起来。

“那好，钱我带走，人交给你。干人没法活，命总有几条。到时候，我王绍成就叫众乡里给这父子二人申冤就是了！”王绍成说完，提起棕口袋，车身就走。

爹对王绍成把手一挥说：“绍成哥，你走吧！我们没钱，可有命啊！”

事情发展到这步，张见奎知道王绍成为人厉害，说得出就办得到，只好改口说：

“好、好、好！看在王绍成面上，让二十五块。但要讲个条件。”

“什么条件？”

“从今以后，不准煽动乡里宣扬红军。否则，就是通共反匪，送官问罪！”

“红军好还是白军好，干人有目共睹，红黑分明。红军爱干人，白军欺压干人；红军公买公卖，白军估吃霸欺；红军秋毫无犯，白军奸淫掳抢。如此事实，你虽能把人的嘴巴封得住，能把人心封得住吗？你要送官问罪，全村干人都说红军好，你能把这么多人都送官？都问罪么？”王绍成不慌不忙地说。

“住口！快，快把那……那二十五块大洋拿来。”张见奎又气又急。

王绍成“哗啦”一声把钱倒在桌子上，张见奎伸手就抓。

王绍成用手一挡说：“且慢！我王绍成东奔西跑，为你调解，家里锅儿揭不开了。对不起，张爷，要‘借’几个钱买点粮食。”边说边数了十二个毫子放进自己衣袋里。

张见奎干瞪着眼，嘴巴颤动了几下，说不出话来，忙把剩下的大洋赶快往面前一撂，数了数，只有二十四块了。他口吃地说：“你……你们滚，滚！”

“别忙——”王绍成拖长声音说：“人是铁，饭是钢，在这里说了大半天，肚皮饿得咕咕叫，还要麻烦你煮顿晌午饭吃。”

我爹万没想到王绍成还提出吃饭问题，心想只要给二十五块大洋脱得到手，就好了。便说：“我们——”话没出口，王绍成接过去说：“对啦，他们两个人被你关了八、九天，肉都掉了几斤。人拖倒了，你那地方也做不好，所以还得麻烦张爷煮块腊肉给他们补补。”

只见张见奎鬼脸一变，见风来个面上光，把尖嘴一咧，随即挂着假笑说：

“乡里乡亲，主客多年，嘿嘿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”随即就叫管家安排。

胡狗走出去一会，王绍成向我唠一唠嘴，我悄悄到厨房一看，取的肉正是菜子岩上藏的，肉上被刺划破的痕迹还在。可张见奎是不会认账的。再说还种着他家的地，明知是被张见奎暗算了，也只好忍气吞声吃这个哑巴亏。

看着这些不平的事，面对张见奎这些吃人的狼，我们更加想红军，盼红军，苗家的心紧紧地和红军连在一起。我们经常望着红军远去的方向，吹起动听的芦笙，盼红军很快地回来。

一九四九年，终于盼来了当年的红军——中国人民解放军，盼来了毛主席、共产党，盼来了一个红彤彤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。

斗“黑狗”

杨正发

“我昨天才交了修路费的呀！”

“我老大上个月才去了，怎个又要老二去？”

“保长，我们家男人都去修路，这庄稼怎么种哟！”

“我们一家老小吊命粮都没有一颗了，哪里还拿得出粮交去修路呀！”

……

海螺堡一片凄怆、怨恨的喊声。这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。

那时，国民党反动派前方不抗战，在后方却高喊为了打日本，要加紧修通川滇路。那些乡长保长在地方上，以“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为国效劳”作幌子，趁机敲榨勒索，大发横财，整得村村寨寨鸡犬不宁，怨声载道。

我十九岁那年，也被狗保长韦吉周逼上川滇路去当民工。川滇路上更是一片凄惨的景象。当时流传着这样一支歌：

川滇路啊，穿丛山，

提起修路真伤惨。

男的被逼修路去，

妻儿老小去讨饭。

十个去了九不回，

死在路旁没人管。

乡长保长发横财，
穷人血汗全榨干。

川滇路啊，坡坎多，
千人修路苦情多：
一天两顿沙子饭，
皮鞭赶做牛马活，
地当床铺天作帐，
盖的树叶草坨坨，
谁能熬到路修好，
不死也脱几层壳。

指定我们保的民工修筑的这段路，在雪山关前，全是悬崖绝壁。人们都说：“雪山关，雪山关，雀鸟难飞过，猴儿不能攀。”这里工程特别艰巨，成天雾濛濛的，气候恶劣，风霜雨雪，变化多端，一年当中有三、四个月大雪封山。在这段路上当监工的是保长韦吉圃。这家伙阴险毒辣，十分凶横。他常身穿黑绸大褂，脚套长筒黑皮靴，一根乌黑的马鞭时刻不离手，黑漆漆的三角脸上，嵌着一对豆豆眼，长年充血发红，一张嘴又尖又长。民工们说他是眼红心黑狗嘴长，还给他取了个“黑狗”的绰号。在筑路工地上，“黑狗”每到一处，不是踢这个几脚，就是抽那个几鞭，随便骂人更是常有的事。更恶毒的是，他在一天两顿饭里加沙掺糠，从中尅扣口粮。民工们就更活不下去了。

见到这种情形，我常愤愤不平。

一天，全保民工在杨吉安、李照方二人带动下，纷纷议论开了。“‘黑狗’太可恶，去收粮时用大斗，在这里给我们做饭，却

用小斗。”

“还有，民工本来一月一换，可是他龟儿子却说：‘要换，除非死来四脚朝天！’你们看，他的心肠有多歹毒。”

“去告他龟儿子一状！”不知谁说了一句。

“怕惹不起，告不翻啊！”

我说：“惹得起也惹，惹不起也惹，反正现在这样下去也活不成！”

就这样，我们趁“黑狗”不在的时候，全保大多数民工联名，向摩尼区署递了张状纸。

几天后，区署派人来传讯，要我和杨吉安立刻就去。吉安大哥有些疑虑，小声对我说：“正发，区丁咋个没叫‘黑狗’去呢？”我说：“区长可能要先盘查盘查实情吧？”于是，我们也没有多说什么，便随区丁一块儿到区署去了。

将到区署门口，却看见“黑狗”的崽子一手抓住一只大母鸡，一手提着两瓶酒钻了进去。我心里一沉，“难怪区丁不传韦吉周，原来他龟儿先派人来了。”

区丁把我们带进区署后，隔了多久，区长才迈着四方步子进来。

“杨正发、杨吉安！”区长装腔作势叫了两声。

“哎！”我俩同声答道。

区长板起面孔，闪着狡黠的眼光说：“你们告保长韦吉周尅扣民工口粮、专横跋扈、欺压民工，可有证据？”

“保长韦吉周大斗进，小斗出，在饭内掺沙加糠，名收三餐粮，只给两顿吃，这不叫尅扣口粮吗？”我说到这里，吉安哥接着说：“他不顾民工死活，想打就打，开口就骂，这不叫专横跋扈、欺

压民工吗？要证据吗，我们联名上告的几十个人都是人证……”

“哼！”区长凶相毕露，脖子上鼓起青筋厉声说：“你们煽动闹事，破坏筑路，岂有此理！”

见到区长这付蛮横模样，根本不听我们说话，百般袒护“黑狗”，还给我们安上莫须有的罪名，我十分愤恨，连讥带刺地顶了过去：“我们是干人，没有肥鸡婆，也没有老窖酒，又没有钱，当然没有理了！”

区长一听，恼羞成怒，扯起破嗓子连吼：“快撵出去！出去！”

区丁把我俩推出了区署。

回到工地上，干人们都关心地问这问那。他们听了，个个咬牙切齿。“黑狗”呢，这一下更神气了，逢人便“嘿嘿”地好笑，“哼！告我，老子的保长照样当！能把我怎么样？”

“黑狗”对民工们的鞭打、尅扣，比以前更凶更狠；雪山关前的惨叫声、呻吟声，从早到晚，终日不绝。

韦吉周这家伙寻事生非，无事找岔，猖狂地对民工进行报复，这就更加激起了我们的愤怒和仇恨，不满的情绪就象一包炸山的火药包即将燃烧爆炸。大家商量一阵，决定：既然祸已经惹下了，我们的日子横顺都不好过，不如干脆告到县衙门。

也有人担心说：“这官司恐怕难打赢囉。我们干人无钱无势，咋个去打啊！”

我一口接过说：“不管打不打得赢，我们不能坐着等死！”

“对！对！告他狗杂种！”几个人同声喊道。

很快，我们又向县衙门递了一张状纸。同时联络所有的干人，大家团结起来，反对“黑狗”打人，反对尅扣口粮，上下配合。几天后，县里果然来人，把“黑狗”带走了。后来县衙门宣布韦

吉周停职一个月。狗保长被停了职，大家也高兴了一阵子。

不久，“黑狗”又重新上台当了保长。那时，我已从川滇路回到了乡里。韦吉周对我恨得要死，专门拉我的壮丁，派我重重的捐款，整得我不敢回家。

深秋的山区，阴雨绵绵，灰暗的云层象大黑锅扣在寨子的上空。老天也好象有意和我们干人作对，跟我这个有路不敢走，有家不能归的人过不去。白天，我只能透过密密的林子望望我那矮小的茅屋；饿了，摘几个野果充饥；渴了，捧几把清泉水解渴；晚上，我只能跟蛇虫作伴。睡在湿漉漉的野草堆里，还要提防野兽的袭击。“黑狗”还经常搜山，派人扼守道口，总想捉拿我。这个吃人的疯狗，非把我置于死地不可。

一天晚上，细雨濛濛，秋风瑟瑟，天也愁眉不展。忽然，婊在急匆匆地爬上山来，脸上布满阴云，眼里闪着泪花，哽咽着说：“我近来常常感到精神恍惚，行动也不很方便，看来快临月了，家里别说大米，连包谷都没有一点。怎么办呢？”她的每一句话，就象一根根针一样，扎得我泪花直漩。这时不由得想起我父母离开人世时，我才十二岁，弟弟八岁。婊在呢，也仅仅只有九岁啊！那时她母亲死了，她爹在外面流浪讨口去了。如今我们有了孩子了，可是他还没有出生，就活不下去了……我想得很多，可是事情又逼着赶快想出办法来。我想家里唯一能变点钱的，仅有一头猪，看来只有把猪卖了买点粮食。这样，我才不得不趁这风雨黑夜悄悄地回家。不料“黑狗”早已带着一伙人把我的房子包围得紧紧的。我怒极了，将随身带的一把斧子握在手里，对我家穿鞋的说①：

①穿鞋的，即婊子。

“我找这杂种拚了！”她却一把抓住我说：“不行啊，他的人多，你这是找死！”有家回不了，我把斧子狠狠地一下砍在一根树子上，仿佛这根树就是那杂种“黑狗”。

韦吉周把屋里屋外搜查遍，发现我不在，家里也没有啥子值钱的东西，竟把我那头猪生拉活扯地抢走了。

我的妻子气得发抖，仍紧紧地把我拉住，生怕我按过去跟“黑狗”拚命！我两眼喷火，强压心中的仇和恨，回头看看妻子沉重的身子，咬着嘴唇，一声不响。心想：现在与“黑狗”硬拚，也不是办法，但也不能老是东藏西躲啊！这样下去，恐怕我那间破烂茅屋也会保不住。不禁自言自语起来：“不如先下手为强，叫他‘黑狗’也知道我杨正发的厉害。”

“你说啥子？”嫪在吃惊地问。

“我想写张‘飞黄’^①来警告‘黑狗’。”

“惹不得哟！”

“他晓得是哪个写的。”

“谁会给你写？”

是呀，我是一字不识的黑眼睛。嫪在这一问，倒使我很快地想起与我一起修路的马怀宣。他是苗家，又识几个字。联名告韦吉周也有他，找他一定能行。我很有把握地说：“这个我有办法。”

我对嫪在安慰了几句，让她先回家去。

我一口气跑去找马怀宣，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。他一听，唉呀一声，说：“你这‘飞黄’就等于‘告示’，从来只有官府才出‘告示’哟！”那时我还不不懂“告示”的意思，便急急地说：“管

^①“飞黄”，即白头帖子。

他官不官，府不府，这回就写我们千人的‘告示’吧。”马怀宣没多说什么就同意了。

第二天，天星桥头的石碑周围聚了一堆人，渐渐地，人越围越多。人丛中有几个识字的在念：

韦吉周，黑心狼，
千人提起恨断肠。
派粮派款乱抓丁，
修路贪污扣口粮；
敲榨勒索花样多，
黑夜还要抢猪羊。

“黑狗”“黑狗”再猖狂
定要剥你的皮，抽你的筋，
还要烧你的房！

此佈！

千人

民国二十八年九月

人们边念边听，霎时间就纷纷议论开了：

“这些说的是真的。”

“韦保长迟早要倒霉。”

“这‘黑狗’作恶多端，该整一整才好！”

“嗨，还真有不怕死的！”

“说一说有好大的用？”

“应该喊‘黑狗’这家伙来看看！”

说也凑巧，那天“黑狗”也赶场来了。这家伙老远就看见桥头有一堆人围着石碑，比手划脚，嘻嘻哈哈，议论不休。他心中

狐疑，忙喊跟在身后的一个保丁去看看。那保丁急急忙忙挤进人群一看，嘴巴一张就闭不拢，连忙钻出来跑到“黑狗”跟前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保……保长，告……‘告示’。”

“是省府的，还是县府的？”“黑狗”不介意地问。

“是……不是……”保丁“是”了半天还是没说出口来。

“黑狗”狼嚎般地叫道：“真是无用的东西！连个‘告示’都看不清楚！”他嚎着，提起鞭子气咻咻地向人群窜去，人们围得水泄不通。他吆吼着：“滚开！滚开，让我看看！”听到这声怪叫，人们才发现是“黑狗”，暗自笑着闪开了。“黑狗”眯起一对充血的“二五”^①，盯着石碑上的“告示”，立刻面色铁青，脖子上青筋鼓胀，呲牙裂嘴，扬着鞭子跳了起来：

“这一定是……是……杨……干的！给我抓……抓起来！”这一叫，反使更多的人跑来看热闹，把那小桥挤得满满的，连那里的田坎土边都站满了人，有的还哈哈地笑出声来。“黑狗”象挨了一顿棒棒，叫唤了一阵，这才赶忙命令保丁去把“告示”撕掉。可是那保丁横撕顺扯都弄不掉。“黑狗”越看越着急，牙齿咬得格格响，豆子般的汗珠从他三角脸上不断地滚下来。他“妈的”一声窜过去，伸出爪爪抓起来，也只刨了几条路路，还是没撕下来。又掉头声嘶力竭地一阵吼：“不准看！不准看！”可是谁也不理，大家更笑个不停。这家伙简直象一条受伤的野狗，“汪汪”叫着，一下窜出人群，本想跑到水田边去抓把稀泥把“告示”抹掉，谁知心慌意乱，“扑通”一声栽到田里去了。等狗腿子把他拉起来时，已是满身稀泥，水水汤汤，流流滴滴，狼

①二五：即眼睛。

狈透了。老远都还听到他妈呀娘的叫喊声。

“黑狗”在桥头看“告示”的事象一阵风似地飞遍了四乡。干人们觉得出了一口气，同时都提防那条疯狗咬人。

我也不得不更加警惕着。白天不回家，晚上，等到下半夜了才回去，不等天亮又钻进山林里。就这样，我昼伏夜出，与“黑狗”周旋，多少能帮助家里做点事情。

烂心烂肝的韦吉周自从看了“告示”，深怕进山吃亏，就是带着伞把保丁也不敢常出门了，便变着花样整我。他表面上再没有搜山查洞，但在我的茅屋周围仍经常派有盯梢的。家里该种的没种，该犁的没犁，穿鞋的眼下又上不了山，我又不能白天露面干活，真把人急死了。我只得咬紧牙，大着胆子，乘着月光，披着星星，犁田种地。在那夜深人静，鸡不叫，狗不咬的时候，往往就是我劳累奔波特别紧张的时刻。

一天晚上，我乘着朦胧的月光，冒着飕飕的冷风，过了午夜才开始犁田，聚精会神地想把那块冬水田犁完，不知不觉就天亮了。正待我赶快收工时，“黑狗”已经带起人把我包围了。十多个人，提刀拿绳，横眉瞪眼地站在四周嗷嗷叫，都不敢上前一步。在长期同“黑狗”的周旋中，使我什么时候都提防着。我原在田埂的东头放了件破麻衣，衣服下藏了把斧子。可是这时我已犁向西头，没等我把牛调转头来，“黑狗”叉着两腿，提着一把雪亮的马刀，高声吼道：

“杨正发，起来有话说！”

“有话？先把牛放了再说。”我边说边把牛叫转头，慢慢地犁向藏有斧头的方向。为了麻痹“黑狗”，我边犁边对牛儿唱起了苗家山歌：

“牛儿乖，牛儿乖，干人的牛儿出苦差。白天累了没吃饱，晚上没吃又下田来。牛儿吃草我吃糠，我们的命运天安排。牛儿好好等着我，杨正发去了要回来……”

“哼，真是个穷作乐，在保长面前，还哼哼唱唱的！”一个保丁歪着嘴说。

“唱！唱！唱你妈的没本经，还不快给老子起来！”“黑狗”又嚎开了。

“老子唱歌，关你屁事！”我随着几步跳上田坎，站在藏有斧子的破麻衣前的一块大石头上，厉声喝道：“姓韦的，要找我说话，就过来，这里宽敞些！”

“黑狗”顿脚挥手赶保丁，吆喝他们上前来，可是那些保丁乱嚷乱叫，一个个缩手缩脚，进三步，退两步，你推我搡，都不愿走在前面。我一看，心里好笑，嘴里也有话了：

“哈哈……你们要不过来，我可要跑囉。”

这个老奸巨猾的东西，虽说手里提着明晃晃的马刀，摆起一付杀气腾腾的架势，可就是不敢上前一步。倒是有两个不知死活的保丁，饿狼般向我扑来。刹时，我掀开破麻衣，高举斧子，大吼一声。

“来嘛，老子正等着你们哩！”

这下，有几个就站着不动，有的转身走了。那“黑狗”见了，也一心想溜。

我一阵大笑，胸中燃着怒火，也想到“黑狗”的人多，不宜硬拚，趁机牵起牛儿从小路站进了林子。

没过几天，媪在生孩子了。当我看到用破片片裹着的初生婴儿，看着虚弱的媪在，心里辨不出到底是甜，还是苦。我默默地

坐在屋里，媪在眼里挂着泪花轻声地说：“他斋，今晚野鸡可归‘窝’了。”

她见我长期来不管雨露风霜，都夜宿山岩，熬夜种地，拖得疲惫不堪的样子，意思是叫我今晚上就不要再上山去睡岩洞了。她从小和我在一起，不知为我操了多少心，替我担了多少风险啊。我深情地望着她，担心地说：

“山上的饿狼谁晓得什么时候来拉鸡或羊呢？谁料那‘黑狗’几时闯来呀？”

“我擦亮眼睛，你拿上打狗的棍就不怕了。”

她眼里闪着坚毅的光。媪在决心要为我放哨，要我把斧子放在身边，好好地歇歇。

“采花的蜂儿怕暴雨淋，抱儿的母鸡最怕黄鼠狼啊。”我担心她产后的身体：“坐在屋里也能听到野狗叫的。”

媪在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哔剥作响的柴火边，我便独自到里屋去了。

夜，深沉而宁静，一弯新月把那冰冷的白光撒在茅屋的小窗上。我和衣倒在床上，很快就呼呼地睡了。媪在一边积麻，一边细心地辨别着一切声音。她往快熄灭的火堆里加了两根柴，升起一缕黑烟，呛人鼻眼。就在这时，窗前发出沙沙的响声，媪在立刻放下手里的麻团，机警地出了门，借着月光，看到窗前站着两个黑影，忙问：

“哪个？三更半夜做啥子！”

“啊，大嫂，我们是西庆沟的。”一个沙哑的喉咙答话。

媪在上前一步，一见他们身穿短服，不象庄稼人的打扮，连忙追问：

“西庆沟的来这里做啥？”

“大嫂，我们是躲壮丁的，已经在山上两天没吃饭了。大嫂，做个好事吧，修功积德啊。”

嫚在一愣神，心里想道：“躲壮丁的为什么穿着整齐的短服？‘身穿二尺五，必定是官府’。再说，既然两天没有吃饭，那为啥说起话来还有这样好的精神？”嫚在断定这两个不是好人，便大声说：

“你们快走，我男人不在家，家里什么东西也没有！”嫚在一边大声说，一边朝屋里退。一个家伙跳过来拦住：

“哪里走？快把你男人交出来！”顿时，房前屋后有人在吼。嫚在一见敞坝头还有两三个提刀舞棍的。她想喊，又不敢喊；不喊吗，又怕我睡熟了出事。她情急生智，智出胆大，长声吆喝起来：“啊唷！你们这些人，半夜三更，拿着刀刀棍棍，要抢人吗，我们是干人，只有一头猪，早就被你们抢走了。要抓人吗？我男人不在家呀！”

“我们就是要抓人，快把你男人交出来！”

“不交出来，就把房子给她爆了！”

“把她捆起来！”

一个个狂呼乱吼……

从嫚在的问话起，我就惊醒了，屋外发生的一切早听得清清楚楚，我想：“再不出去，那几个家伙要动武了，才生了孩子的嫚在怎经得起那样的阵仗？”为了不易被人抓住，我两下脱去了麻布长衣和长裤，只围了一块烂布片片，赤条条地提着那把随身携带的斧头。还没跨出门，忽地几只电筒的电光一齐射向门口，我忙说：“嫚在快让我一下，不要怕。”我把嫚在让进屋，便脚

踏门槛，高举斧头，双眼喷火，大声吼道：

“我杨正发只跟韦吉周有仇有恨，与你们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你们要是不怕死，就上前来！”

这时，月亮躲入了云层，那几只电筒已吓得无光了，昏沉沉的院子里，一下子充满着嘈杂的声音。

“给我抓住他！”

“他手头有家伙！”

“当心他的斧头！”

“把斧头放下，不然老子要烧房子了！”

“杨正发，看你今天还往哪里跑！”

.....

我一言不发，充满仇恨的双眼睁得大大的，观察着院子里的动静。有几个声音虽然大，但站在门附近的几个黑影早就偷偷溜掉了。“黑狗”仍在惊慌地大声嚎叫，

“给我抓住他，卖了壮丁赏五块大洋！”

听着声音，弄清了方向，我满腔怒火，一个箭步飞去，抡起斧子使尽平生气力，劈头就给“黑狗”一下，只听“哎哟”一声惨叫。其他几个家伙都被这一叫声吓跑了。我便迅速地同嫜在回到屋里抱上婴儿，摸黑逃往西庆沟去了。

逃到西庆沟，我住在山洞里。用棕皮给孩子做衣，用野草为全家御寒。我也曾偷偷下山帮工，换点粮食回来拌糠加野菜度日。我一家仇恨在心，顽强地与苦难作斗争，熬过了漫长的岁月。一九四九年，终于迎来了解放。

渡过漫漫长夜的苗家，最爱那东方升起红太阳；深受豺狼虎豹威胁的人，最热爱救星毛主席和共产党。

我回到家乡海螺堡，正是走进了一个金光灿灿的新世界。毛主席给我们派来了亲人解放军，派来了帮助苗家闹翻身的工作队。我积极参加农会的一切活动，浑身觉得有使不完的劲。在清匪反霸中，我亲手抓住了白沙的匪首、恶霸地主、外号人称“大劈刀”的孙仲华，真是大快人心。领导上表扬了我，群众选我当代表到县里开会，县里还奖给我两支步枪，二十五发子弹。我大声高呼：感谢恩人毛主席！感谢救星共产党！是毛主席、共产党使我们懂得了革命道理，使我们祖祖辈辈的受苦人掌握了钢枪。在县里的诉苦会上，我控诉了罪大恶极的保长韦吉周，激起了到会代表的无比仇恨。

从县里回来，我担任了联防队长。肩上的担子重了，我的斗志也更旺了。我和联防队员一起，在上级领导下，密切配合解放军肃清匪特，打击坏人，斗争恶霸地主，镇压反革命。一次我们在捕捉逃犯、匪首孙吉成时，我负了伤，在党的亲切关怀下，得到解放军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料，很快好了，我又积极地投入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。

匪特一个个落网，恶霸地主一个个被捉拿归案，干人们家家分得了胜利果实……喜讯一个接一个地飞来，使人欢欣鼓舞。兴奋的事儿使我久久不能平静。想到韦吉周这条恶狼，还没有镇压，总觉得这桩事没有了结。在海螺堡一带，没有哪个对他不切齿痛恨。

一天，农协会主任从乡政府回来，他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，逢人便说：“好消息，好消息！明天乡上开大会，公审恶霸地主、保长韦吉周！”

人们奔走相告，山乡沸腾了。

“老头子，明天走时不要忘了喊我一声囉！”老大娘说。

“明天你可要早点烧锅煮饭囉！”老大爷笑呵呵地回答。

小咪朵、小咪采，个个欢呼雀跃，象欢乐的小鸟，张开翅膀，飞向苗山村村寨寨，传报喜讯。

受苦人互相勉励着说：打蛇要打“七寸子”，斗“黑狗”要揭彻底，数他的罪恶，诉我们干人的苦。

民兵小伙子、联防队员，个个磨拳擦掌，劲头更足，有的磨梭标、磨大刀，有的擦枪。

我和婁在兴奋得一夜没睡着觉，昔日的惨景，一桩桩一件件浮在眼前，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……天还没亮，我们就起床。吃过饭，婁在背上孩子，就跟左邻右舍的汉、苗受苦人一路到乡上去了。我披挂好武器，跟联防队员们交待了任务，就一起上路。

在公审大会上，成千上万双燃烧着仇恨怒火的眼睛，盯着那被押上审判台的“黑狗”。我和乡亲们一起在公审大会上，满腔悲愤地控诉了万恶的旧社会，控诉了喝尽我们干人血汗、无恶不作的地主保长韦吉周。

人民法庭判处了韦吉周的死刑。

我把多年的仇和恨凝聚在枪尖上，亲自枪决了这个坏蛋。

几十年来，我提着斧子想砸碎吃人的旧世道，想砍死逼得我走投无路的仇人韦吉周，都没有实现。

经过党的教育，使我懂得了一个道理：只有毛主席、共产党的领导，才能给苗家报仇雪恨，才能使全中国受苦人民翻身得解放。

火烧金宝台

侯良德

一九七六年秋。一天傍晚，我们家里来了一位老人，一身道地的苗家打扮：头包一张白帕，穿一身蓝色麻布衣，缠根腰带，脚上套着一双草鞋。他虽然满脸皱纹，可是一对眼睛却灼灼有神。乍一看，已经认不得了。仔细打量，又好象在哪里见过。

老人一坐下来，就立即问我：“品章伯伯呢？”

“已经去世了。”

“怎么死的？”老人哽咽着，沉痛地问。

“前两月患枯癆病死的。”

“现在家里有些什么人？”

“除我之外，还有爱人、孩子……”

他见我答话时流露出疑问的神色，不由得作了自我介绍：

“不认识我了？你我的小名叫老四呀！三十多年前……要不是你们一家帮助我，哪里还有我侯老四！”

“啊！你原来就是老四哥呀……”我惊喜地叫了起来。

望着他那炯炯有神的眼睛，我记起了年青时代的老四哥。

老四哥原来是石宝寨的人。他父母受尽欺凌和折磨，先后病死。他虽然只身一人，但保长还是要抓他的壮丁。在石宝实在住不下去了，一九四三年流浪来到我们岩头上。当时，他二十多岁，长得又高又大，且有一身好力气，特别是那对眼睛，平时充

满了和气，但地主豪绅如果把他惹毛了，一发怒，他那眼里就象要喷火。我爹见他勤劳，人也忠厚，又是同姓，便对他说：

“老四，你既然是一个人，又无家可归，要是你愿意，那就和我们住在一起吧！我这里没有啥子好，不过我有吃，你有吃；我有穿，你也有穿！”

老四一听很高兴：“伯伯，好啊，可就难为你了。”

这样，他就在我们家里住了下来。

老四哥无论是上山打猎，下地干活都是把好手。犁耙栽秧，挖土薅草，样样都能。背煤要背一两百斤，砍柴一早上能打一个来回。白天，他同我们一家上山劳动；晚上，回到家里，不是打草鞋，就是吹芦笙，唱歌跳舞，引得一帮年轻小伙子和小孩子，紧紧围绕在他的周围，有吹有唱，又说又笑，不但忘记了一天的疲劳，就连干人的一些辛酸和不幸，好象都减轻了不少。因此，全寨子的人都喜欢他。

山上有好树，田中黄金谷，可惹人眼红啦！

金宝台的地主“瘦脚猪”，看准了老四哥一身好气力，三番五次来给我爹说：“侯品章，你家拖累太重了，不如喊老四跟我当长年吧！”

我爹说：“这个事要取得他的同意，我作不了主啊！”

“老四，你的意见呢？”“瘦脚猪”那一对狡猾的眼睛，紧紧把老四哥盯着。

老四哥想了一阵后说：“当长年可以，但话说在前头，工价要说好，免得以后扯皮，先说断，后不乱嘛。”

“瘦脚猪”一心想得到这个好劳力，满口答道：“可以，可以。”并答应除供烟茶伙食外，一年给两斗包谷。

老四哥离开我家的前一夜，爹说：“老四，你要谨慎啊！我担心你玩不赢他的心计。‘瘦脚猪’心黑手毒，处处得提防着他点。”

“伯伯，不怕的！我肯信他把我磨成水吞了不成！”

说起“瘦脚猪”，我们晏家坝这一带没有哪个不清楚。人们说他是一个“池边洗手鱼先死，路过青山树也焦”的人。他成天盘算，敲榨穷人，狂嫖烂赌，无恶不作。

“瘦脚猪”和他的三姨太“山里花”都抽大烟，每天抽到深更半夜。老四哥除了白天劳动外，夜晚还要把他们侍候睡了，才能爬上马圈楼上去睡觉。但刚刚闭上眼，鸡就叫头遍了。“山里花”睡在床上便尖声叫喊：“侯老四，天都大亮了，你还不起来！”

老四哥擦着惺松的眼睛，推开棕毡^①，翻身起来，连脸也摸不着洗，就带上镰刀，背起背篋上山割草。这时，天上月牙高挂，三星还没偏西。一阵冷飕飕的寒风，传来了密林中豺狼的嚎叫。老四哥凭借朦胧的月光，摸着割草，露水把衣服湿透，锋利的镰刀有时还将手指削掉一块皮。但为了生活，还得忍痛割下去。马草割了回来，群鸟才开始唱歌，天才逐渐大亮。

听见解草的响声，“山里花”又在床上叫开了：“老四，离吃饭还早，你再去割一背猪草！”老四哥气都没歇一会，又背起背篋上山了。一大背猪草割回来，“瘦脚猪”还在床上大打鼾。

女长工把饭做好了，老四哥端去洗脸水、漱口水，两个大烟鬼才慢吞吞洗脸吃饭。

吃了早饭，“山里花”又布置一大堆活路。她时而这样吩

^①棕毡：用棕片编织的被盖。

咐，时而又那样安排：

“老四，你去把包谷磨了。”

“老四，你今天要磕碇舂米。”

“老四，趁天色好，你去对车坝背点好煤来烧。”

“老四，天怕要下雨了，上山砍点柴回来。”

……

砍柴割草，推磨磕碇，背煤种地……老四哥做了这样做那样，忙得脚不停手不住，干到天黑尽了才吃饭，做到半夜了还不放工。

日子一久，老四哥看穿了地主的黑心烂肠，心想：你狗狼养的这么凶，天不亮就喊老子起床，干了两趟活路，太阳当顶了才准吃早饭，一天忙到晚，夜深人静了还不让收工，你这样刻薄，我不收拾你才怪哩！于是，在山上劳动时，他就自编自唱地唱起了山歌：

赶场不赶水落窝，
爬坡不爬灯盏坡，
帮人不帮晏家坝，
肚皮挨饿活路多。

帮人不帮这家人，
这家活路磨死人，
太阳当顶吃早饭，
月亮当顶放工程。①

①放工程，即放工。古蔺一带的方言。

一天，鸡叫头遍，“山里花”又在床上叫开了：“老四，天都大亮了，你还不起来！”老四哥爬起来，带上工具就往家里跑。我爹正起来给牛加草，问他：“老四，你这么早？”

老四哥说：“伯伯，现在才啥子时候，狗日的‘瘦脚猪’就喊我上工了。”

我爹吃了一惊：“噫！真有这等事，牛儿都还让牠打个盹嘛。”

“狗杂种没良心，不把人当人。”

我爹气愤地往楼上一指：“他们不让你睡，你就回家来睡”。

“对，我也是这样想。”

老四哥爬上楼，一觉睡到天亮了才去割草。他随便割了点老草，捞几把嫩草盖在面上背回去。抓到马槽里，“瘦脚猪”的黄膘马闻了闻就不张口了。老四哥眉头一皱，随即将粗草铡细，撒上一泡尿。马儿肯吃了，但始终不长肉，而且光发脾气，常常踢脚打掌。“瘦脚猪”过去常是一人骑马出门，跑得顺顺当当的。现在喊老四给他牵马，还几次把他从马背上摔了下来。

有一次，“瘦脚猪”骑起马儿去赶锅厂坝，来到石梯坳，黄膘马脾性发作，大路不走横起往土内跑，“瘦脚猪”猛抽两鞭，马儿痛得胡乱跳，一下子把他从马背上掀了下来，跌得鼻青脸肿，浑身是伤，衣服也撕烂了。

老四哥割猪草，也不再割嫩的了。他想：你整得穷人太寒心了。

晏家坝附近有个山王坳口，四周是参天大树和密麻麻的刺笆林。这里是豺狼出没的地方，也不知那年那月，人们在坳口修了一座山王庙。附近还有一个枯井，一个岩洞。早先有个苗家妇

女，由于地主的迫害，曾经在这里投井自尽。岩洞成了土匪抢人的地方。土匪在山王坳口把过往行人赶进洞里，抢了财物才放走。正因为这样，人们说“山王坳有神有鬼又有野兽还有土匪。”谁也怕往那里去。山王坳口的陡壁上长满了黑压压一大片苦葛藤。老四哥不信神不怕鬼，他每天来到山王坳口的土坡上捋些苦葛叶，然后在背篋面上放几把嫩猪草，背回去尽量宰细煮熟，多放粮食喂猪。由于苦葛叶是苦的，粮食比往常多花一倍，猪却不见肥。

老四哥挖土，尽挖猫儿盖屎，一锄挖来盖两锄。丢下种子，长出秧秧，粪也懒得沤。草长深了，薅也不薅。遇上去对车坝背煤，地主要亲自过称。他快到家了，就在煤内藏上一砣大石头。由于老四哥机智，“瘦脚猪”虽有所察觉，但始终没有抓到把柄。

春去秋来，老四哥在“瘦脚猪”家一晃就帮了两年半。他身上的麻布衣服，由于日晒雨淋，穿林打草，肩挑背磨，已经成了几股襟襟，连胯都遮不住了。他只好去找“瘦脚猪”：“大老板，我帮你家两年半了，还没得一文工钱。你看我这身衣服，还是来时穿起来的，成了几股襟襟了。当初讲定每年两斗包谷工钱，你把五斗粮给我，我拿去缝件衣服穿，遮着身子也好干活路。”

“瘦脚猪”一听发火了：“妈的，侯老四，你真没良心，老子给你点饭吃就差不多了，你还要工钱呀！”

“我为啥没有良心？长年累月，白天黑夜地给你干活，有那样对不起你？工钱是当时三家对六面讲定的，是我给你家干活路应得的报酬，我为啥不该要！”

“你把我的马喂瘦了，骑都不能骑；猪也喂瘦了，粮食可花

得不少。你看你做的庄稼啊，草比庄稼深。老子没找你赔就是好的了，还提谈工钱。”

“照你这样一说，我算送帮你了？”

“不是送帮怎么样？你再这样干，找你的保人算账不说，老子送你到官府。”

“你把人当牛马使唤，干了两年多，还不给工钱，谨防刺巴卡喉咙。”

老四哥说完，仰起脑壳走了。

这一天，老四哥啥也不干，天黑不久就去睡了。

鸡叫头遍，“山里花”又照样恶暴暴地叫喊老四起床了。老四翻身起来，轻手轻脚抱了几捆麦草，放在廂房内上了大锁的粮仓脚下，点上一把火。看看燃着了，他才把廂房门扣上，径直跑到我家。

我爹又高兴又担忧，焦急地向窗外一看，天都快亮了，忙往楼上一指：“老四，你暂时藏在乾猪草里，等一会再想办法。”

天亮了，东方先是一片鱼肚色，接着就现出灿烂的霞光。我照常背上背筐去崖边割草。只见山那边金宝台那个方向的上空，烟雾腾腾，我从心里感到高兴。心想：老四哥真行。但又为他担着一把汗。特别是我想到他平时对我好，每次上山砍柴割草，总要给我带回一包野果果。如今，他干了这件事，要是“瘦脚猪”找到他，那就糟糕了！

想着想着，我没有心肠割草了。随便捞了几把，就匆匆往回跑。

回来，正好“瘦脚猪”找我爹来了，“侯品章，你担保的人呢？侯老四那狗日的到哪里去了？要不是发觉得早，恐怕整个金

宝台都被他烧光了！”

“没有来呀！”爹冷冷地说：“这个背时娃娃，怎么干出这等事来了！”

“瘦脚猪”没有问出一个眉目。忽然见我从外面回来，赶紧问我：“银华，你看见侯老四没有？”

我顺口说：“大老板，看见了。”

“你看见他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看见他往张口崖跑了！”

我们崖头上张口崖那儿，时有跳崖的事发生，人们寻短见，每每往那里跑。

“他对你说啥子没有？”

“他说他只有走这条路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是真的，他还说惹了祸事了，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惹了啥祸事。”

我爹听了，长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唉，这个娃娃为啥这样心窄，去走绝路啊！”

“瘦脚猪”接过话头，恶狠狠地说：“死了活该，要不死，老子决不饶他！”停了停，“瘦脚猪”又对我爹说：“真的死了，那就不说。不过以后收拾房子时，你们一定要来帮帮我！”

“瘦脚猪”晦气地走了。老四哥藏在楼上，不能露面，饭由我悄悄地给他送上去。

太阳开始偏西了。我爹喊着：“华家妈，你去拿两升莽子来推！”我们都清楚是给老四哥准备点东西好上路。

我妈推了莽子，把家里的一点猪油用来烙了十多个大莽粑，

用根绳子拴着。

我爹把老四哥叫下楼来，说：“老四，你在这里住不下去了，你拿着这点荞粑，远走他乡吧！”

老四哥一听，依依不舍地哭了：“伯伯，我逃出去要是饿不死，一辈子也忘不了你老人家。”

“银华，你在前面带路，当心点！”

我在前面走，爹走在老四哥身后。趁着朦胧的月色，我们一直把他送到羊角埡。爹首先开口说：“老四，这里已离寨子很远，我们不再送你了。在路上把细些，好生保重。到了什么地方落了脚，给我们带个信来。”

“伯伯、弟弟，我走了，以后有那样一天，我再来看望你们。”

月光下，黑越越的树林遮断了我们的视线，只听见老四哥有力的脚步声渐渐远去。

整整三十三个年头过去了，老四哥突然来到崖头上。我们一家人万分欢喜，拉着老四哥久久地交谈着别后的情况。

“唉，可惜我没能见到品章大伯！”

“为啥不早点来嘛？我爹在世时，经常提起你。”

“那年出走后，去到贵州，到处帮人，凭着我一身气力，东流西荡，到头来还是家不成家，业不成业。到处的财主都同“瘦脚猪”一样，那个世道是财主的天下啊！”老四哥陷在深沉的回忆中。“春雷一声，天翻地覆，穷人翻了身，大大小小的‘瘦脚猪’全都被打翻在地，受到人民的清算。哈哈，我这个老长工当了主人了。”老四哥爽朗大笑。“本来早就要来看望伯伯的。兄弟，你晓得我这脾气。大伙信得过我，把集体的事交给我，我恨不得

样样都办得巴巴实实，忙得团团转，实在抽不了身。行期一改再改，一拖再拖。这次都是那些小伙子一再催说：‘四爷还不到崖头上看看老长辈和小兄弟，难道要满过一百岁才去？现在脚还走得都不去，难道等走不得了才去？你的工作我们包下来。有了差错，你回来教育我们好了’。”

尽情地摆谈着，千言万语从我们肺腑里滔滔倾泻出来，凝聚成一句话：没有共产党，没有毛主席，就没有我们苗家幸福的今天。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，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旗帜，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贡献力量，是我们苗家的战斗誓言。

深山猎人

李正举

我们座落的这架山，大家都习惯地叫它崖上。它跟黄泥大山挨肩膀站着。过去，这崖上人烟稀少，松柏苍翠，灌木丛生，终年云雾弥漫；野猪、狗熊、豹子、豺狗、山羊、斑鸠、野鸡等等，飞的走的，大的小的野物都有。这崖上没有啥子可耕地，即令在陡峭的山坡上、林间榭头角埝有几块可耕种的土地，也是泥巴少石头多。一年种一季庄稼，由于野猪、狗熊常糟踏，秋来收不了几颗粮食。喂的猪呀、羊呀，也常被豹子、豺狗拖走。而现在，真可说是林茂粮丰，人畜兴旺，呈现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片好光景。我们苗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。那些危害人们的野物嘛，虽不说已断子绝孙，你要想看到一眼也很艰难了。

我家几代人都住在这崖上。除租山上的几块地，还跑到崖下的锅底凼租张海清家两石土种。庄稼每年收来交了租，就剩不了几颗粮食。不够吃，就只得冒着生命危险上山去打猎来贴补。我的佑^①和斋都是有名的猎手。因此，我从小就从老年人那里听到了一些有关打猎的法儿，比如：“围山打猎先放狗，安网设弩守咽喉；坐坳胆大心要细，举刀砍杀莫软手。”又如：“猪来要防嘴，虎来要防尾，熊来莫爬树，豹来莫后退。”还有一些有关飞

^①佑：苗语，即爷爷。

禽走兽习性的顺口溜：“山羊跑得快，豺狗声音怪；狐狸夜出窝，野兔怕下坡。”“神鸦雀，鬼斑鸠，画眉爱唱歌，野鸡只顾头。”这些，我几岁时就背得滚瓜烂熟。我十一、二岁起，就跟着父辈上山，分辨各种野物的踪迹和出没的路径，学着安网、设弩、放狗吆喝，觉得又新鲜又有劲，也练就一身穿林爬山、斗豹逮狼的本事。说起来还挺轻松，可在打猎的实际生活中，既要与凶猛的野兽斗，又要跟那些比野兽凶狠狡猾的地主、保长斗，我却吃了不少的苦头。那时，我们上山打猎，多数用的是梭镖、弩箭、捞刀、麻网等器械，既要有胆量，又要有体力和砍杀的本领。遇到野猪、豹子，你要是不把它杀翻，就有可能被抓死、咬死。

山中虎豹豺狼凶，世上财主保长狠。有一年，地主邱齐伯，从他团总老子那里，弄来两枝夹板枪和几匣子弹，跑到崖上来假惺惺地给我弟兄几个说：“你们李氏兄弟，为乡邻除兽害，大家称谢。我看你们用刀砍、箭射、网套，既吃力，又危险，特地给你们送来两杆汉阳造的子子火。这东西三五十步以外就能打死野猪、豹子。”他比手划脚地吹了一通，又以很内行的口气说，“你们没有放过这样的洋家伙。”我一听这小看我们打猎人的话，拦腰就给顶过去：“没吃过猪肉，我们看过猪跑。你不要从门缝缝里看人，哪个打山的不会放枪？”这家伙厚着脸皮不答理，还边说边把枪机拉得哗啦响，又叫我兄弟仔细看他如何上子弹，如何推弹上膛，如何勾枪机击发，如何退弹壳。他口水噼泼地说完了，颤抖着双手举枪朝天放了一火，挣得脸红筋胀的都没把弹壳退出来，当众丢了丑。我没顾他，顺手拖过枪来，一拉机柄，“啪！”弹壳跳到一边去了。他也不顾脸面，说：“对，对，就

是这样放的。好，这两杆枪就留在你们岸上使用，为邻除害。”他说完嘻嘻笑了两声才走。

我们苗家打猎人，从小练就眼睛尖，耳朵灵，腿脚快，跑得累得，也习惯使梭镖、捞刀、弩箭、麻网；喜欢挨近野兽砍杀搏斗，偶尔打飞禽才用火药枪。有了洋枪也不常用。

那年，秋后一个天气晴和的日子。我们李家兄弟，邀约邻近几个平时爱打山的人一道，乘天刚麻麻亮，便赶早吃完饭出发。有的扛梭镖，有的背弩箭、麻网，我搽一把连把带刀有四尺长的捞刀，唤了十几条猎狗，一阵风似地到了黑坳。

这黑坳挨近的几架山，林密草茂，豹子常在附近人家拖羊、拉狗、咬牛，野猪常糟踏一大片一大片的庄稼。周围的庄稼人不得安宁，常为这些畜牲伤脑筋。我们一到，先分头观察了一遍，辨认各种野兽新近留下的痕迹；选定了几处设弩、安网的地势，确定了守网的、坐坳口的、掌竿嗖狗吆喝的。互相提醒了要注意的事情之后，便分头行动起来。我和王雨堂守在相隔不远的两张网的旁边。猎狗汪汪叫着开始撵山。约莫过了半根香的时间，只听南山上两条猎狗抢起抢起地咬，这叫声告诉它的同伴，也给我们报了信息：已发现大的猎物。在另一架山上的猎狗，听见同伴的叫声，便飞也似地追向南山，边跑边叫。掌竿的远远落在后面，他一面嗖狗追赶，一面大声喊：“豹子出窝了！”这时候，十几条猎犬狂吠猛追，后面人的吆喝声紧随。老远就看到，一条连头带尾有一丈多长的金钱豹在林中奔命，那茂密的草丛直往两边倒。豹子朝我隐蔽的方向跑来了，我向老王轻轻地打了一声招呼，便双手紧握捞刀，一眼不眨地盯着那飞跑的畜牲，准备好随时砍杀。那畜牲被撵得慌，没顺着它常走的路径跑，却直往我隐

蔽地方窜来。我猛地跃起，举刀一吼，那东西偏了一下，从我身边一头栽过去，滚进了网网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我跳过去举刀就砍，可惜刀还没落下，它已滚出网外，张牙舞爪地向我扑来。我一蹲，脑壳刚好被畜牲的腋窝压住。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我举起鹰嘴捞刀，使尽平生力气，就往它肚皮捅。那东西负痛，大吼一声，掉头又往后面扑去，两只前爪忽地抓住了王雨堂的脑壳。我一返身，抡起捞刀猛砍过去，正中它的腰胯，我弟弟追来又补上一梭镖，十几条猎狗围着撕咬，没几下，这畜牲就被我们放倒了。这时我才松了一口气，忙去扶老王，发现自己的手杆也被抓伤，一块皮子被扯来吊起，血淋淋的，我也没管。

“正举哥！你的手杆！”堂弟惊叫着。

“不碍事。快撕块布来给老王包伤！”

一场恶斗，两个人受了伤，大家也无心再干了，便收拾起猎具，把那畜牲四脚一拴，抬了回去。我们把伤势重的老王先安顿好。刚剥下豹皮，准备卖了买药，不料邱齐伯跑来了，他啧啧几声，双手一拍大腿高声说：“嘿！子子火就是顶用。这样大的家伙一撞上就没命了。”大家没睬他。这家伙马上又换一副腔调说：“众位今天辛苦，这豹子肉就拿来犒劳大家，上山的见者有份，豹骨也值价，变钱医受伤的。”

“这不要你来安排！”我早就气不过了，把敷了草药的手臂一抬，打断了他的话。

“这豹皮嘛，本来也没有啥了不起，就暂时给我罗。”邱齐伯撩起长衫子，也不顾血腥臊臭，伸出爪爪翻看豹皮。一双贪婪的眼睛溜溜转。

“你倒想得安逸！”

“性命换来的，你来拣把把！？”

“我们要拿去卖！”

“哪有坐享现成的？”

在场的人都气忿地议论开了。我更按捺不住怒火，一捋袖子，横站在邱齐伯面前：“你凭哪点该得豹子皮？别把肠子想扭了不好装屎！”

跟他来的两个狗腿子，看看阵仗不大好，阴梭梭地站在一边，不开腔。邱齐伯却不甘罢休，仍然死皮赖脸地说：“你老弟才问得稀奇哩。凭我那两杆枪，这皮子就该归我！”

“我们是用刀砍的，梭镖杀的，没有用你那破枪！”

“好好好，就算是这样吧，把我的枪拿来。”那家伙见势不利，虽然喊声象打雷，话意却软了。

“给他搵出来！”我话音刚落，那两杆枪和几匣子弹就躺在地上了。

“算了，背起来！”他朝两个跟来的人一咧嘴，然后气急败坏地夹起尾巴溜了。那家伙走了老远，还悻悻地回过头来叫喊：

“你几个苗东西，等着瞧，看我邱某怕你们不？”

撵走了瘟神，两个兄弟把豹皮背到石宝寨去卖。那姓邱的是这周围有钱有势的人家。豹皮一上街，就被邱维固截住，说要买。卖货嘛，只认得钱，不敢说不卖给他邱家。这邱维固是邱齐伯的哥哥，虽各分守业，自立门户，但仍住在那条小街上。钱还没拿过手，邱齐伯撵上门去，说声“大哥，这豹子是我的枪打的，皮子该归我”，夺过皮子就走，边走边说：“谁要钱，叫他们到我手上来取”！两个兄弟回来，把这段经过一说，我气得脑壳轰轰响，准备带上捞刀和猎狗上门去要皮子钱，众兄弟和几个

一同打猎的把我挡下来。年长的大爷等我稍稍平静了点才说：“起先那东西，在我们这里不敢猖狂，吃了哑巴亏，挨了闷棒。现在你这样莽莽闯闯地跑去，岂不象山羊闯到他网里吗？”

“就这样白白地让他把皮子抢去？”我心中老是不平。

“他老爹是团总，有钱有势，谁都怕他三分。今天这口气，我们就忍了吧。留得青山在，哪怕没柴烧？”

我听着大爷的话，也觉得有点道理。这狗东西真比豹子还凶。伙伴们个个都恨得咬牙切齿。

第二年，我们上薄刀岭去打野猪。这薄刀岭有好几里长，也是打猎人常去的地方。薄刀岭下，住有一家大户，也不是个好东西，全家男男女女四十多口，当家的叫唐敬三。他仗恃家里人强马壮，在那一带称王称霸。去打猎的常受他的气，有了猎获物，他大小都要沾点腥，才让你走路。但薄刀岭不是他家的地皮，他把我们苗家猎人也无法。这回，我们一帮子人，在山上累了半天，没有打上野猪、豹子，却网套了一只又肥又大的山羊。往回走时，我们刚下岭来，唐敬三带着几个腰圆膀粗的大汉，挡着去路，高矮说我们打了他家的“镇山之王”，牛在山上放才滚坡摔死，要我们赔偿，而且从此不准再到那岭上去打猎。我们一路说了一大串好话，他生死不依，就是不让走。

一见那唐家的阵势，便知今天是有意刁难。我不由得火冒三丈，心里说：“苗家世代住高山，生来就是刚强汉，好话一句软三分，硬来宁折腰不弯。”怒目扫视了那伙一眼，嘴里冒出：“你弄醒豁点，自家不小心放牛，想到我们身上来打启发①，你这是

①打启发：即打主意。

蚊子咬菩萨——认错了人。”我车身对伙伴们使了个眼色，又说，“大家等倒。”随说话声，大家呼地把梭镖、捞刀往地上一拄，摆开了阵势，忿怒的眼睛闪着火星。我隔房的一个么兄弟，才十七八岁，长得结结实实，是一把掌竿吆喝猎狗搜山的好手，这次也跟了来，他看了我一眼就打起口哨，只见那几条常跳起来跟野猪、豹子搏斗的猎狗，箭一样射过来，围在他身边嘘；他又一声呼唤，它们一个个呲牙咧嘴，竖起尾巴，站在那里，准备随时向他指使的方向猛扑过去。

这时，唐敬三一伙的脚下象生了根，站在那里动弹不得。阵阵山风吹过，一个个的脸上还象滚豆子似地淌汗水。我从容地说：

“姓唐的，苗家喜欢直来直去，告诉你：五山之中的东西，苗家想几时上山上去逮它，就几时去，这不要你管！”

那几个大汉流着口水，动了几下嘴巴没说出话来；唐敬三脸都气青了，眼眼咕起，活象一条打人牛；但又似被人加了撑竿^①，站在那里不敢动。

打猎的同伴们吆喝一声：“走啊，我们不跟他们磨牙！”我手提捞刀，跟么兄弟一起走在后面。让大家走到前面去了，我才对那几个家伙说：“快去干你们的活路，要是想吃山羊肉的话，这个好说，等一会儿找个人来，提一腿去就是了。走！”我拉着么兄弟喊了一声，就再不理睬那一伙。么兄弟轻轻嘘了一声，几条猎狗象得了令，摇着尾巴，伸出红舌头，有的跑前，有的断后，跟我们一路走了。

^①加了撑竿：一般打人的牛，被人们用一根竹竿从鼻绳那里支撑着，这样，轮要想打人时，却不能运转自如，打不着人了。

没过好久，我们被甲长请去，在黑坳打了几天山，捕杀了两头大野猪。最大的一头足有三百斤重。当地一个名叫李若尧的保长，派了几个狗儿筋筋^①来，一拢就狐假虎威，蛮不讲理地说：“李保长说的，要抬一头大的野猪去，他家做大生！”

“癞疙宝朝天打哈欠——好大的口气。”一个猎伴挖苦地说。

“你说啥子呀？”

“想得倒安逸，我们打了野猪，他家做大生。”又一个不冷不热地说了几句。

“嘿，你石宝寨的苗呷，跑到我们中乐乡来打了野猪，不给保长送去，还歪呢！”一个大块头狗儿筋筋叫起来。

“你嘴巴干净点。我们苗家凭本事打山，是有人请来的，为啥子打了野猪要给你保长送去？”我也不客气地搭腔了。

甲长见我们吵起来，他怕得罪了保长，装出一副和事佬的样子，忙来劝解说：“他们是我请来打那些畜牲的。保长家要野猪肉做生，怕也是事实，光凭你几个嘴巴说，也不大合适。看哪个兄弟再跑一趟，请保长写个条条来。大家看，这样好不好？”

“管那么多干啥，我们先抬一头去再说！”又是那个大块头张嘴。

“嗨！你想来硬的不是？”我一挽袖子站过去。同伴们也火了，手持武器站了起来。

那几个狗儿筋筋见我们一个个气虎虎的，知道不好惹，便有点软了。甲长又从中说好话：“大家平和点，有话慢慢说”。他

^①狗儿筋筋：山里人对保丁的蔑称。

把那几个保长的人劝到另一间屋子里去安顿了，又回过头来对我们说：“众位，包涵点。我请大家来，是为团邻除害，不能擅自处理你们的猎获物。几百斤重的东西，背起走不方便，若要烫整干净，我这里柴火方便。”说完，“嘿嘿”笑了两声不响了。

“我们是要打整干净，背肉好走些。”我说了这么一句。随着就大家动手，没有多大工夫，把两头野猪烫整干净，砍成几大块，准备收拾起身了。两个狗儿筋筋汗淋淋地跑了来，手头拿张纸条条，气喘吁吁地对甲长说：“这是李保长亲笔写的条子，要一百斤肉。”我仔细一看，才看清楚就是那些狗儿筋筋中的另外两个。我想：“必定是先估倒拿，没得手，才照那甲长说的，跑去办了来。不管你是怎么的，拿钱我们就卖，凭张纸就要吃肉，可不行。”我拿定了主意。

甲长看过纸条，显得为难。他当然了解保长的脾气，也多少知道我们苗家打山人的性格。那几个狗儿筋筋看到有了条条，又神气起来。那个大块头的横肉笑成几堆，怪声怪气地嚷道：“这下还有啥说的，快把肉给我们，好扯回销！”

“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做生意买卖，有个规矩嘛！”我毫不退让。

两句话又弄僵了。

甲长又来转弯子，我们就是不改口。他左说右说，我只好回答：“只要你甲长负责拿钱或粮食，我们就可以拿肉。”他一听这话，就象被皂角刺锥了，手一缩，又几甩几甩：“我负不起这个责。”“那我们就告辞了。”我车身对伙伴们说，“我们收拾回家吧。”末了，我拣了一腿肉递给甲长说，“你也尝尝。”那些狗儿筋筋只好干瞪眼。

正要起身，又来了一个和气点的人，递了一张条子给甲长。那甲长强装笑脸忙向我说：“李哥，姚敬轩姚保长说要砍二十斤肉，至于钱嘛，我负责拿。”我一听只要二十斤，他又负责拿钱，这里我们又常来打交道，也就爽快地答应了，给他一点面子。在背篋里取一腿出来，还多了两斤，也没要他砍下来，随他把那个人打发走了。

经常打山，晓得野兽爱走哪些路；随时捕鸟，知道雀雀爱宿哪些树；跟保长、恶人多打几回交道，我们苗家猎人也摸到了对付的路数了。

抗日战争胜利的头一年，我们去洞坝打野猪。头天下午带起干粮去，在山上守了一夜，第二天又撵到太阳当顶，仍没有一点动静。看看太阳偏西了，我们才打到一只山羊，也算没白跑。大家的肚皮早松了，腰酸腿又软，无心再打山，就背起山羊往回走。路过保长汪伯伦家的门口，他跑出来挡住我们，杀气腾腾地问：“哪个叫你们来打的？”

“脚杆长在我的肚皮底下，想走哪里去就到那里。”我甩两句给他吃。

“张团总早就说过，不准在这山上打猎！”

“管你张团总李团总，这里没贴告示说不准打！”

“你这群苗叫是吃生东西的吗？怎么不讲理？”

“你不要出口伤人！苗家哪点不讲理！”

“只有你们那些绅粮、保长才不讲理！”

“五山中的野物，要哪个准许才能打吗？”

“从古开天辟地以来，都没得这个规矩！”

……

我们一伙猎人哄闹起来了，那保长退了几步。大家趁机拥了过去，理都不再理他。我们才走出百步开外，狗保长带着两个狗儿筋筋，一路吆喝，一路追来：“把山羊给我留下！”大家头也不回，甩开膀子大步走。几个家伙一直追了四、五里，累的口吐白泡泡，撵上来一把抓住山羊腿不放。

看来，你不惹他，他也是安心要生事的了。我向大家招呼了一声，都停了脚步。耨梭镖的“嚓”一声插在地上，背网的“扑”一家伙甩在身边，扛捞刀的从肩上放下来提在手中，个个怒火烹心，盯着追上来的几个东西。我们那些教乖了的猎犬，见主人不前进，跑远了的又倒回来守在周围，也忿怒地盯着汪保长一伙。我一手叉腰，一手扶着梭镖开了口：

“你们要干啥子？”

“山——山羊给我留下！”那姓汪的保长手提连枪，还在喘气就抢先答话，“那山是不准打的！”

“谁家的规矩？”

“张团总的命令！”

“没贴告示！”

“在乡公所讲过的！”他晃了晃手中的连枪。

“拿证据来！”我越说越火，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。

“把山羊背走！到乡公所去！”他向两个狗儿筋筋下命令。

“谁敢！”我一拍梭镖杆，两个狗儿筋筋忙把手缩回去，望着姓汪的，一动不动。

那保长举起连枪想要威风，我眼疾手快，梭镖“噹”一声把枪给挑飞了，厉声喝道：“苗家不怕虎豹豺狼，也不能让人随便欺负！”伙伴们早把那两个狗儿筋筋围住，他俩告饶说：“不关

我俩的事！”姓汪的面如土色，好一阵才回过神来。但他的嘴巴仍象打鱼雀的嘴壳——死了也梆硬：“姓李的，把山羊背起到乡公所去说！”

“解套网绳，把几个狗日的捆起！拦路抢人，送到区公所去！”我气得登了顶，嘴里冒出这串话，大家就要动手。

没想到这句话起了作用。

“你们要去打山，也该早点通个信，我也是个好闲者呀！”

“你也该早点把话说清楚嘛。”我顺水推舟，拣个人情做。

这时，两个狗儿筋筋一边乘势把连枪拣起，一边赶忙拣好听的说，巴不得早点离开：“汪保长也喜欢打山。下次要是再去，我们也来凑个数。”

我心里默神，怕这几个家伙要花招，手紧握梭镖，口里说道：“这个好办，下次来再请。今天我们要回去了。”

“要得，要得。”姓汪的顺势下楼梯，朝两个狗儿筋筋一咧嘴，就往前头走了。那两个在后面，脚跟脚地撵，隐隐听得一个狗儿筋筋在抱怨：“羊肉没得吃，差点惹一身臊。”几个家伙转过山嘴不见了，我们才往回走。

解放了，我们打猎人，再不受冤枉气了。

土地改革时我们又分得了田地。

一九五三年，人民政府把我们组织起来，并派来一个转业军人领导，农闲时就上山，直到一九五八年，方圆几十里的野猪、豹子等害人的野物，差不多被消灭光了，才少有上山去打猎的了。

抗 丁

张 银 阶

“二月惊蛰天，干人受熬煎。保长又在划圈圈，来把壮丁编。
有钱便放你，无钱就拿米。无钱无米把命抵，丢下儿和女。”

一听到这首《干人歌》，解放前拉丁派款的情景和寨子里抗丁斗争的事，就浮现在我的眼前。

解放前，我们马新寨住有二三十户苗家，都是些憨厚老实的干人。乡保长和土豪劣绅认为我们软弱可欺，一直把这个苗寨作为拉丁派款的好地方。他们采用欺哄吓诈等卑鄙手段，一次又一次来拉我们的壮丁。日子一久，我们看出了那些反动家伙的黑心烂肠，大家便团结得紧紧的，齐心反抗。所以那些乡保长就再不能在我们寨子拉走一个壮丁。

那年，由于风调雨顺，田头山上的庄稼都长得很好，到处绿油油的。夏天，正当薅草季节，乡保长却在四处抓壮丁，搞得人心惶惶，庄稼也无法种了。乡亲们看见外村有的被拉了壮丁，弄得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；但邻近的苏家坝一带，却没有被保长拉走一个人。这个事实，对群众的感触很大。挨邻有了榜样，我们寨子也就议论开了。一天，我么叔张华宣找到大家说：“今年雨水好，庄稼要是还按老习惯一家一户自己整，一来活路干不赢，嫩草都要拖成老王草^①；二来在地里，单人独马的容易被拉壮丁。

^①老王草：即很长的老草。

大家想想看，怎么办？”经么叔这么一说，大家都说是呀，于是大伙一合计，约定互相换工薅草，抢时间，赶场或干活路的时候，每人随身准备一把捞刀或一根青柄棒棒。保长在哪里拉了，只要吆喝一声，大伙赶快集拢到一块，古话说，寒霜打杀单根草，狂风吹不倒大森林嘛！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。

一天，我们十多个青年人在弯子头换工薅草。年青人凑在一起，一会儿打闹玩耍，一会儿又山歌对唱，很是热闹。闹着唱着，情不自禁地又唱起了《千人歌》。

低沉的歌声一停，么叔说：“这两天，听说龟儿保长真的在划圈圈，正在打我们的鬼主意，这个事大家都得把灯笼挂高点^①，耳朵放长点，多留点神！”

“怕什么？只要我们大伙心齐，他就不敢来拉，拉着了都要给他打脱。”我堂哥张树尧停下锄头，边说边拍了拍胸口。

“‘有钱便放你，无钱就拿米。无钱无米把命抵，丢下儿和女。’谁会那样老实，我才不是傻瓜。”说这话的是我嬢嬢家的上门女婿陶银章。么叔听了他的话反问道：“你有啥能耐不当傻瓜，听说人家就是要点名拉你！”

“拉我？第一，我是单丁独子。再说，我这捞刀可不是拿着耍的。他要拉人，就得拿条狗命来抵。”他说话时，摸了摸腰杆。

“不管怎么说，也不能麻痹大意，胆大心细不会错。”

正当大伙你一言我一语的时候，不知是谁忽然叫了一声：“拉壮丁的来囉！”

^①灯笼挂高点：这里的灯笼指眼睛，即是眼睛放尖点的意思。

大家抬头一看，只见环山路、后坝等几个方向都同时来了背枪的保丁。保长“望山猴”果真悄悄地带起人来拉丁了。

这个“望山猴”是王呐罕、母腰崖一带有名的坏种。他白天四处害人，晚上聚众赌博，赌输了，就到处拉壮丁，借机敲诈勒索。这只狡猾的猴子，多少摸着一一点我们苗家的脾性，这回特意组织了二三十个人，分三路来围困马新寨。

么叔见逃跑已经来不及了，于是对大伙说：“沉着点！”

只听“望山猴”一声吆喝，那一大伙人就把我们团团围住，然后扯起他那鸭公嗓子点名道姓地吼：“陶银章、张银阶……你们几个中签了，快点站出来，免得大家伤了和气。”

么叔给大伙递了个眼色，我们十几个人立即取下腰间的捞刀或青柄棒棒，横眉冷眼地说：“要壮丁，这好办！保长是晓得的，我们苗家，一无钱，二无势，一去就是汤巴打狗，有去无回！反正是死，你们捨得死一个，我们去一个；你们捨得死两个，我们就去一双；你们一个不死；我们一个也不去！”

那伙背枪的帮凶，一见这般阵仗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小声地说：“这帮苗子是说得出来就做得出来的！”尽管保长喝声不断，一个个就是站着不动。“望山猴”看见手下的人畏缩不前，拉开鸭公喉咙，气急败坏地吼：“你们要反了！你们要反了……”边说边往人圈子外边靠。

保长一溜，保丁们也跟着灰溜溜地散了。

豺狼总是要吃人的。经过一番策划，“望山猴”又施了一条毒计：不抓成群的，只抓分散的；把公开抽丁改成秘密抓人。

时隔不久，表兄陶银章去走亲戚，在路上被“望山猴”拉走了。么叔听说后，跑到鱼洞乡，找到国民党反动派来接壮丁的一

个姓马的连长，劈头就问：“请问马连长，政府抽丁是不是三丁抽一，五丁抽二？”

那马连长一看我么叔背阔膀粗的身架，身后又有一大群老乡，个个怒气冲冲的样子，不知要干什么，于是脱口说道：“三丁抽一，五丁抽二，是有这个规定。你有什么事？”

“既然如此，那么现在被拉来的陶银章是个单丁，又是我姐姐招上门的女婿，一子承挑二姓，保长为啥要强行将他拉来？”

一句话问得马连长哑口无言，话又说出了口，收不回去，周围又围了那么多人，一双双愤怒的眼睛都在质问。姓马的强打精神问：“确系单丁独子吗？”

“我们可以作保！”群情激愤了。

马连长担心惹出其它事来，愣了一阵说：“就让姓陶的先回去，待我们查明再找他。”就这样将陶银章放了。

有一天，寨子里的男子汉都到山背后干活去了。我因为没有鞋穿，在家里赶着打草鞋。看见寨子里来了一个讨口的。他拿着打狗棍，挨门挨户地乞讨。这个人鬼鬼祟祟，东张西望，向小娃娃打听：“寨子里的人到哪里去了？”

这个叫化子走后不到一顿饭的工夫，只见“望山猴”带起一伙人来到马新寨，直奔我家，一下就把我抓住了。我当时一是没有准备，一是打草鞋坐在地上，腰杆上套着草鞋绳，来不及进行反抗。我真悔恨自己过于粗心。这时，我才恍然大悟，那个鬼鬼祟祟的“叫化子”，原来是“望山猴”派来的探子。

嫂嫂一见我被抓了，拔腿就往后山跑。她边跑边喊：“快呀！张银阶被拉走了！张银阶被拉走了！”

喊声象一阵风，顿时传遍整个苗寨，家家户户都知道了。

这时，我么叔从古藺城里回来刚拢屋，听说我被捆起走了，急中生智，连忙打起话吆喝：“银阶被拉走了，大家快把撵山狗带起去追！”

正在家烧锅做饭的妇女们一听么叔呐喊，“嗖”起撵山狗就追了出去。在几声急促的吆喝下，寨子里跑出十多条撵山狗，猛追到弯子头，一下把保丁们团团围困。条条猎狗张牙舞爪，“雪獭”专咬脚杆，“黄宝”张着血口，跳起来专咬脑壳，“乌子”爬在一个保丁的背上乱撕，妇女们紧追上去。

正当“望山猴”一伙躲闪不及的时候，么叔和张树尧一个提一把梭标，带起一伙人也飞一般赶来。“望山猴”一见，虚张声势地恫吓说：“张华宣，你敢上来，老子手头的枪筒子认不得人！”

么叔眯起一双眼睛，往前走了几步：“你那枪要是敢打着我，你试试看？”说完，他同时打起苗话^①叫我不要跟着走。

我支起两脚站着不动。么叔带起来的一些人，手持捞刀、棍棒，一边跑一边吼：“把人放了，要不今天就叫你们死在这里！”保丁们看见寨子里的人来势勇猛，一个个拔腿就跑。大家便乘势簇拥着我，向回家的路上走去。

经过这几次抗丁斗争，我们渐渐悟出了一个道道：国民党反动派欺软怕硬。你给他来硬的，他就怕你；你要是软了，他非把你整死不可。正当我们同反动派斗争得十分尖锐、激烈的时候，地下党派老王同志来启发、鼓励我们说：“你们敢于组织起来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，这种革命精神是非常可贵的。但要想从根

^①打起苗话：即用民族语讲话。

本上解决问题，只有打倒国民党、蒋介石，我们才能有好日子过。”

在地下党的教育帮助下，我们同反动派斗争的劲头更大了。保长来拉丁，我们就抗丁；乡长来抽税，我们就抗税。渐渐地，团结的人越来越多，我们的觉悟也有了较大的提高，敢于和敌人一个钉子一个眼地作斗争，在斗争中，我和几个青年参加了党的组织。

一九四八年的一天晚上，表兄陶银章又被“望山猴”暗算拉起走了。我和幺叔在鸡叫时候才知道。我们分头喊起张银安、张树尧二人，每人带把梭标，冒着小雨赶到皮匠沟。幺叔估计，保长送壮丁，不走新兔，定走高峰寺。我们等了一阵，两条路都没有一点迹象，心里正在纳闷：“好怪呀！人往哪里去了呢？”派人仔细一查，原来还关在“望山猴”家里。幺叔便叫我和大哥张银安去后门把守，他和张树尧径直往前门走去要人。刚走拢，乡公所来接丁的乡丁一见就惊叫起来：“拐了，马新寨的一伙人来了！”

幺叔趁势厉声说：“你既然晓得马新寨的来了，那就快把人放出来，大家无事。家有三兄五弟的你们不抓，单丁独子却抓来抵差，这是哪里的规矩？唉，今天先把话说清楚，要是不把人放出来，那我们就白刀子进，红刀子出，给你们杀几个来摆起！”

听到幺叔的话，乡丁们颤抖着说：“我们也是替人跑腿，不关我们的事。”

幺叔怒气冲冲地说：“既然是这样，你们就站开点，谨防血溅到你们身上！”

“望山猴”愣了神，来的乡丁又不敢助他的威，他知道今天凶

多吉少，赶紧去关大门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陶银章在屋内听见我们的声音，胆子壮了，他一个箭步从“望山猴”身边飞了出来。从后面追上来的孀孀赶紧帮他把绳子割了，喊起话就和我们一路回寨。

稍稍安静了几天之后，“望山猴”跑到苗寨。他挨家上门，点头哈腰：“前两次来马新寨，我们仅是过路，弟兄们有冒犯之处，还望众位乡亲包涵！”

他见没人搭理，停了一会儿又厚起脸皮说：“我当保长跟其他人不同，主张大家平安相处，井水不犯河水。今后你们不要跑了，点名中签的各自去。乡卫乡，邻卫邻，和尚卫着出家人。这个鬼世道，谁都知道，多行点好，少造点孽。俗话说，岩鹰尚且不打窝下食，何况我为一保之长！嘿嘿！你们要是信得过，帮我去把差事顶了，我再用钱把你们买回来。我说话一定算数，一定，一定……”

“啊呀！保长为我们把心都操够了！乌鸦抹上石灰，也变不成白鸽；狐狸跳进河里，也洗不尽一身臊臭。”么叔有板有眼地说，“看你说的比唱的还好看，照你这样说，你又拉丁，你又出钱，放鬼捉鬼都是你，那不等于脱裤子放屁！”

“望山猴”遭到冷遇和群众的讥讽，还是不死心。他又来到我家，对我爹说：“你家张银阶也十七八岁了，各自去顶一回壮丁，我保得将军去，保得将军回！”

爹回答说：“‘感谢’保长的一片‘好心’，可是娃娃们大了，去不去要问他们自己。”

“好吧，那就劳神给他讲讲。我们下回来请！”

“望山猴”走了我才回来，听说他的来意，就冲着爹说：

“黄鼠狼给鸡拜年，一一没安好心。谁不知道他葫芦里装的是假药！”

不几天，我和哥哥张银安、张树尧在后山上犁土，狼心狗肺的“望山猴”果真上门来要人。他们一到我家就问：“你家张银阶呢？”

“在山上犁土，找他做啥？”我爹说。

“上回不是说让他去顶一回壮丁吗？我特意来请！”

“背起大枪‘请’壮丁，你说得真好！”我爹答了一句。

“唉，当公事人的也难哪！张大哥，你能不能喊他一声？”

“望山猴”假意叹息着。

“行！”我爹站在坝子边上，向山上高喊：“银阶，你回来一下，保长‘请’你！”

我听到喊声，往下一看，坝子里站着十多个人，张树尧也发现山上的林子里有响动，就打起苗话喊我跑。我跑了，保丁们窜出林子，一下抓着了大哥张银安。他们把他抓去关了一夜，看见脚是跛的，没办法，只好把他放了。

“望山猴”始终不死心，他四处放风，逢人便说：“你跑得过初一，总跑不过十五……”

我们得到了党组织的同意，决定敲一敲“望山猴”，给他一点颜色看看。

有一天晚上，侦知“望山猴”去到熊少清家。熊少清胆小怕事，不同意我们在他家处置“望山猴”。尽管是打起自家话讲的，但那只狡猾的猴子察颜观色，明白事情不妙，借口上厕所，悄悄从后山溜走了。

猴子虽然没抓到，但他却再也不敢到我们寨子来了。

十月间，收了庄稼，又该播种小春了。我们一伙换工干活的青年人来到地里，又情不自禁地唱起了《干人歌》：“十月小阳春，又要拉壮丁，若想不当丁，大家要齐心；只要有联络，哪个敢来捉，不怕龟子恶，捉到都打脱。”

我们唱着《干人歌》迎来了解放，又欢天喜地唱起了翻身歌。

今天我们唱着幸福歌，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，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谱新歌。

坚持斗争迎解放

侯成发

一九二六年，毕节一带天大旱，庄稼颗粒无收，我们一家十口，全靠挖草根、剥树皮、采野果吊命。父亲又病倒在窝棚里。我们是从四川搬去的，在那里人地生疏，生活几乎陷入了绝境。

一天，太阳象一个火球挂在天上，烤得大地冒烟，快晌午了，我们连一碗野菜汤都还没下肚。地主胡顺安的一个狗腿子，背一杆“吹火筒^①”跑来，还在坝子里就气势汹汹地说：“侯老大，胡大爷叫你们快点去，有要紧事情！”

“慌啥子！我们早饭都没吃。”我哥哥没好气地回答。

“少废话，快跟老子走！”狗腿子不耐烦了。

“有啥子事吗？”我么叔也开腔了。

“我咋个晓得！胡大爷只说叫你家几叔侄都去！快跟我走。”

伯伯、叔叔都是老好人，叹了一口气，跟着狗腿子去了。两个哥哥和我正准备上山挖野菜，父亲躺在床上不放心，叫我们跟着去看看。我们便急急忙忙赶去。

走进地主的大门，跨过天井，就看见胡顺安坐在堂屋中间，用长满黑毛的爪爪，正在嘀嘀哒哒拨弄算盘。他好一阵才抬起头来，眨着两只绿豆眼，盯着我们说：“只要你们听我的，嘿，我

^①吹火筒：即枪。

有钱赚，也有你们的好处。”说着离开座位，稍稍缓了口气又说：“我晓得，现在天干，你们的日子也很不好过。今天我找你们来，也是让你们能得点好处。四川那边的马蹄滩、养马司的粮价便宜，你们去那里给我背回来，到普宜一带卖。”我们一听胡顺安的话，晓得是叫去服苦役。伯伯、叔叔和两个哥哥都没开腔。

胡顺安的大儿子胡思权催命似地叫道：“从普宜到马蹄滩，来回一百八十里，每人背两斗才一百四十斤，三天打回转。现在回去准备，明天一早动身。”

“我们饿得肚皮挨着背，咋个背得起哟！”伯伯小声地说。

“我们不去！”叔叔补了一句。

“啥子？不去？”胡顺安在桌上一巴掌，跳了起来，指着伯伯、叔叔吼道：“不知好歹的东西！”

“我们就是不去！”我哥哥硬梆梆地顶了回去。

“要背要运，你家喂得有牛有马，牵去驮不得吗？”我二哥也火了。

胡顺安冷笑了两声，说：“嘴！你小子还给我铺排起来了。马，我要骑的，牛怎能在这大热天驮东西？”

胡思权没等老地主说完，就一嘴接过去，恶狠狠地说：“不去就立即把欠的租子交清，给我搬起滚！”

“包谷杆都晒焦了，我们拿啥子交租？”我两个哥哥怒气冲天叫起来。

胡顺安两眼儿转转，换了一付腔调说：“我这是照顾你们，去给我背粮，每天供你们两顿饭，免得在家里饿肚皮。其他的人想背，我还不让背呢！”

胡顺安软硬兼施了一阵，第二天由胡思权带着狗腿子逼着伯伯、叔叔和两个哥哥上了路。

一个月过去了，两个月过去了。

外出背粮的几个人音信杳无，在家的人，把心都焦碎了。

在一个凄风苦雨的黄昏，伯娘不知从什么地方探听到消息：原来伯伯、叔叔和两个哥哥去给胡顺安背粮回来，渡赤水河时，遇到山洪暴发，船被打翻，他们一下都被咆哮的河水冲走了。病重的父亲一听，顿时昏死过去。

父亲苏醒以后，叫我们扶着他，到胡家去讨命债。狼心狗肺的地主先装作不知道这事，后来又要起狗性：“我的粮丢了，还没找你算银元账，也是看在老主客的情分上。给我滚。”他一声吆喝，叫来狗腿子，把我们赶出大门。

那时，是旱灾荒年，一大家人，真没法活下去哟！

伯娘出走了，婶娘带着一个妹出姓了，父亲含着满腔悲愤死去。

胡顺安这条吃人的狼，在我们家破人亡的情况下，还说我们欠的租没交清，硬把我这个十二岁的孩子弄去给他当马伕还债。妈在家种两斗薄地，一年当中要拿半年时间给他家浆衣洗裳，砍柴打杂，也成了胡家的奴隶。

马是地主的牲口，我却做了马的牲口。每天，天不亮胡顺安就叫我起来，放牧、割草、洗刷，添夜草，整天忙个不停。稍不如他们的意，我就得挨鞭子。马儿长得油光水滑，我却瘦成皮包骨头。埋在我心底的仇恨愈来愈深，强压的怒火越烧越旺。

一天，天才麻麻亮，胡顺安就吆喝我快些备马，说他要到三锅庄去走亲戚。可是等到太阳老高了，他过足了鸦片瘾，才提着

拐杖出来上马。

我一上路，在心里狠狠地骂道：“看老子今天不收拾你！”我汗淋淋地牵着马，爬上了楠木菁大崖。

这楠木菁是一匹陡峭的悬崖绝壁，一条不到二尺宽的坎坷路，从半崖上穿过。两人对面过，非得在那崖壁向内凹的地方让一下不可，稍不小心，就会跌下百丈深涧。我牵马爬崖，正想找个好地势收拾他，说也凑巧，刚一转弯，便看见常与胡顺安狗咬狗的地主魏兴阶骑着高头大马从对面走来。今天，冤家路窄，都红了眼。魏兴阶老远就大声嚷嚷：“让开！让开！”胡顺安在马上闪了几下绿豆眼对我说：“不怕他，我们是下坡，走快点！”接着也扯起破喉咙嘶叫：“让开！”见这光景，这两条狗有一场恶斗。我一边牵着马往下跑，一边察看能够藏身的地方。那魏兴阶见势不妙，急忙勒马掉头。这时，我一闪身丢了马缰绳，贴着崖壁，随手就是一鞭，胡顺安的马猛扑过去。魏兴阶那匹烈马早蹶起后蹄，正中胡顺安的马脑壳。那畜牲一声嘶叫立了起来，没等胡顺安回过神，早把他甩了下来。我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。可惜，只摔断了一根脚杆，没有掉下悬崖，保了他的狗命。

胡顺安象没杀死的猪，叫唤了一阵，才丧魂落魄地叫我扶他上马，驮回家去。他那二小子一看，老狗摔得半死不活，抡起青桐棒棒就给我一顿打，还把我妈栖身的猪嘴窝棚一把火烧了。

从此，我跟妈在四川、贵州交界的地方，讨口要饭，帮长工，做月活，苦熬了整整十年。我成了家以后，扶着母亲，又搬回四川。用九十吊浸透我们血汗的铜钱，在古蔺县建新乡的糟房，租了地主潘王氏一块地种。

天下老鸦一般黑，世上财主一样狠。潘王氏这个母夜叉，三

天两头要我妈去给她碾米。米要碾得雪花白，没有一粒谷、一颗稗。每天还要给她割一背猪草，给她家喂猪。平白无故她都要扯起破响篙儿喉咙，骂得口吐白泡。没过一年，母亲一病就没起来。

我的妻子每天天不亮就要去给潘王氏烧锅做饭，倒屎倒尿，端茶递水，浆衣洗裳，一年到头，没完没了。

我同样成了她家的奴隶。凡是下力的重活，她就叫我去做。这母夜叉在柳沟收的租谷，每年都要我去给她背回家。从碾房到柳沟相隔十四、五里，规定我一天背三趟，一次要背一百二十斤。有一次我发高烧，还是估倒去背粮。因为身体支持不住，回来迟了一点，不仅不给饭吃，连水都不准喝一口，还破口大骂我偷懒。她那长得膘肥肉满的大姑娘，也帮着骂人，气都没让我歇一口，撵我出了门。

没过几天，母夜叉两娘母要到石蛋坡一个地主家去吃喜酒，要我和长工梅二顺用滑竿抬那一百多斤重的姑娘。我说没抬过滑竿，病才松一点，抬不动。母夜叉非要我抬不可。那一身死肉的妖精，喊魂似地催我们快些准备好滑竿。

一路上，她一会儿骂我们脚步重了，一会儿说我们走快了。我又气又累，肩痛腿软，更有意地时快时慢，左右晃动。那妖精一吵嚷，我就说：“你嫌坐起不安逸，就下来自己走！”梅二顺抬前头，也象听懂了我的话，只是一声不响地跟我暗地里配合行动，猛地跑几步又停几步，让妖精在滑竿里簸来簸去，任她叫骂，我们也装着没听到。来到龙打沟过小木桥，梅二顺前头下桥时我正在桥上，滑竿顺势往前倾，我趁势一侧身，头一歪，滑竿就从我肩上甩翻了，只听“扑通”一声，那妖精被摔进了河沟。河水

不深，好一阵才去把周身湿透了的妖精拉起来……

这回，我算出了气，又惹了祸。没过好久，母夜叉连顶首都没退，就把我们撵走。

我两口子一个背篋就把全部家什背到了沙沟，租种潘云光的地。

一九三五年一月间，“红军来了！”的消息，象春风吹遍了古蔺山乡。那些绅粮、官僚、恶霸，一个个鸡飞狗跳，惊惶逃跑。见这光景，我想：这红军一定是好人，要不，平常那些又歪又恶的财主、乡保长、恶霸怎会跑呢。

红军来了又走了。

可是“打土豪、分田地”，“跟着共产党，穷人闹翻身”等革命道理，在我们心里播下了种子，燃起了希望。

后来，在一个苗族地下党员的帮助下，我渐渐地认识了穷人为什么苦的道理。

一九四七年夏天，一个晴朗的深夜，我在鲜红的镰刀斧头旗下，宣誓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。从此，我找到了光明，走上了正确的道路，迈开了新的斗争步伐，浑身充满了力量。在党组织的领导下，我在当时的建新乡、龙马乡一带，点燃了斗争的烽火。

我利用砍柴、背煤、下地做活，或走亲戚、串门子等各种机会，宣传革命道理，讲穷人闹翻身的故事，讲国民党反动派疯狂拉丁派款的残暴罪行。不久，我就串联了一批苗、汉族受穷受苦的青壮年，组织起来自卫，抗丁抗粮。大家一起商量好，不管是做活路，还是外出，都三人一帮，五人一伙，好互相照应。对被胁迫去当乡丁、保丁的穷苦人，细心地做教育工作，让他们做“内

线”，给我们通风报信，共同打击地方上的豪强势力。

日子一久，乡、保长把我恨得要命。有一次，天还没亮，保长付斌宣带着几个保丁来抓我。他事先一点风也没漏，走在路上才告诉保丁们。一个姓何的保丁是个穷庄稼汉，听过我们讲的好几回革命道理，他就想不当保丁了，狗保长不准，我们暗地劝他就在里面配合我们进行斗争。这时老何要给我报信已来不及了，便对付斌宣说：“侯成发这个人，平时提刀弄斧的，三两个人近不得身，打猎的枪法又准，让我走前头去探听一下，大家好采取对策。”付斌宣点点头，忙答应说：“要得，你可要小心点哟！我们作好准备。”老何急急跑来给我透了风，等付斌宣一伙人赶来时，我早已经跑远了。

又一次，也是深更半夜，付斌宣带起保丁神不知鬼不觉地来捉我。早与我们就有联系的一个名叫骆章儿的保丁，快到我住的房子了，正急得没办法。老奸巨猾的付斌宣怕莽闯吃亏，便招呼大家停下来，小声说：“侯成发厉害，哪个兄弟先去打探一下。”骆章儿自告奋勇地说：“我去，你们埋伏在坝子坎坎下边，我去叫门，要是他动武，我就开吼，你们就一齐围上来对付；要是他不耍横，我就叫他到坝子边说话，那时你们就动手，量他会飞也跑不脱。”我早已被狗咬声惊醒，正在门后听动静，从门缝里隐隐约约地看见朝门口走来的是骆章儿。我一声不响地抽开门闩，骆章儿一把拉住我的手，急促地说了一声：“快往后山跑。”他随即帮助我爬上了石坎子，才过去把门打得咣当响，又大声呼喊：“快来呀！侯成发跑了！”等付斌宣一伙跑到坝子来，我已钻进屋后的林子里了，还听见骆章儿虚张声势地说：“好危险啦！侯成发好厉害，手头提一把捞刀，一开门就砍出来，幸好我闪开

得快，差点就砍在我的脑壳上。”付斌宜胆颤心惊地骂道：“算他今晚上跑得快。”几个保丁也早吓虚了，在一旁帮腔说：“保长，黑灯瞎火的，今晚上就算了。”等他们一伙人闹嚷嚷地走了，我又悄悄地回到屋里。

就这样，在大坪子、安家寨、倒角头、龙坪、大瓦槽一带，汉、苗族没被拉走一个壮丁。

我们一边抗丁，一边开展抗租的斗争。抗丁的胜利，更鼓舞着我们。一九四八年，秋收过后，地主潘云光上门来，恼起一张马脸，劈头就问我：“侯老二，现在啥时候了？”

“嘿，你不晓得？还没立冬嘛！”

“你去年还欠三斗租，今年的也还没给我送去……”

“今年收成不好，你再记上帐吧。”

“哪有一年不交，二年不交租的？”

“我又没说不交租。”

“那今天就给我背去！”

“年辰不好，你叫我拿啥子给你背去？”

“我一家人田没种一坵，土没做一块，吃啥子？”他想发作了。

“我又不是你的当家人，关我屁事。”

“你还想做地方不？”

“庄稼人嘛，怎不种地？”

“不交清租，你就另找主子！”潘云光威胁地说。

“你要拿地方去喂蚱蜢，也要得。”我跟他一颗钉子一个眼，顶他心窝子。

一听我这话，潘云光脸都青了，顿时哑了口，跨出门槛又走

回来，好一阵才气急败坏地说：“今年不交，每石租子要加三成利！”

“要得，要得。”我干脆利索地答应了。心里想道：“看你这‘烂肚皮’有多少烂点子。”

“好嘛。以后你就别怪主人家不讲情面囉。”潘云光恶狠狠地走了。

乡保长催粮派款，我就跟他来个籩子的两只拉手——永远不见面。他们闯到家里，除一间漏雨通风的茅草棚棚外，盖的是秧毡，穿的是破麻片，没有一样值钱的东西，还是没得办法。

在抗丁、抗粮斗争中，我们的组织发展壮大。由一个党员，发展到六个，建立了党小组。我们更加积极地组织和团结穷苦人，开展对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。

一九四八年底到四九年，解放战争取得节节胜利，地主和其他反动势力则勾结在一起，进行垂死挣扎。我们的斗争也更加艰巨和激烈。我们六个党员分散在群众中，象鱼儿在水鸟在林，把那些乡、保长，地主恶霸四处拉武装，打着五花八门的“救国军”旗号，自封“司令”“大队长”，到处设关立卡，残害百姓的种种罪恶了解以后，通过不同的渠道，源源不断地向上级党组织报告。

由于我们几个党员都不识字，所以每次送情报都得亲口向上级报告。反动武装四处盘踞，设关立卡，封锁严密，稍有不慎，就有可能失密。一次，我们到长坝子去送情报，从大瓦槽到长坝子，来回二百里山路，必须在黄昏时出发，第二天早晨赶回来。那是九、十月间，我们干了一天活，已经很累，为了及时向上级报告，把早准备好的两大碇草鞋往身上一背就出发了。冒着冷雨秋风，踏着泥泞小道，翻山越岭，取道狮龙插扎山坝，去长坝子。我们在黑漆漆的山路上，小心谨慎地往前赶，不料刚到狮龙

就被一伙匪徒拦住了。几个家伙一发现我们，就凶神恶煞地围拢来盘问，周身上下搜查，连裤带都解来查看，未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。一个左脸上有块刀伤的家伙厉声问道：“半夜三更，还在外头跑啥子？”

“我们干了半天活路才去赶场的，回来的路又溜，走黑了。”我们冷静地回答。

“把手伸出来看看！”另一个家伙仍不放心。

“我们是种庄稼的还有假？”说着把长满老茧的双手伸过去，“看嘛，有啥子好看的。”

那家伙摸了我们的手，仍未发现疑点，那个痞子丧气地大声喝斥：“滚回去，以后不准黑夜出来走路！”

“把草鞋给老子留下！”一个象狗吠的家伙，话音一落，早把我们的草鞋拖过去了。

我们完成了这次任务，第二天在地里劳动，想起都还好笑：情报在脑壳里，任你反动派有天大本事，也休想搜出来。那些感到末日来临的家伙，虽然十分疯狂，却也十分愚蠢。

一次又一次的胜利，鼓舞了我们的斗志，坚定了我们的信心，更加积极地为迎接解放胜利的到来而斗争。

春雷阵阵，一九四九年底古蔺解放了，千人们无不欢欣鼓舞。但马蹄、建新、龙马一带，还是土匪盘踞的地方。不甘心完蛋的敌人还在垂死挣扎，烧杀抢劫，猖獗已极。当时我们党小组还处在地下，斗争更加尖锐复杂。

“反共救国军”大队长、大匪首罗仲辉，平时就奸淫估霸，杀人放火，无恶不作，这时更猖狂地拖起几十个匪徒，经常在建新一带打家劫舍，一次就把大瓦槽二十多户苗、汉族人家抢个精

光。人们对他恨入骨髓。我们地下党的几个同志早就想收拾他了，经过侦查，发现罗仲辉这条狼，常窜到老房子他妹妹那里。我就常带着锅架、捞刀在老房子周围山上拣柴。一天，罗仲辉带着一个心腹朝岩洞方向走去，我就穿林攀崖跟着。罗仲辉爬上岩洞垭口，向白沙那边望了一阵，又钻了几户人家，就得意洋洋地往老房子走去。当又来到垭口上时，罗仲辉跟那心腹都停住脚，在那里比比划划，我在林子里屏住呼吸，看着他们的举动，尖起耳朵听听，只断断续续地听得一句半句。忽然，罗仲辉转身对他的心腹下命令：“你先去喊你罗二姨推点豆花，我们晚上吃了，不等天亮，我们出个远差！”

“到哪里？”他心腹狗腿子问。

“马蹄滩找潘云光、赢泽华两个大队长共同出力，去提庄房的枪。快去，到时候你也换一根好家伙。”两个家伙发出一阵狞笑下山去了。

他两个前脚下山，我后脚就回家。没等天黑，布置了汉族青年王忠辉埋伏在老房子附近，监视罗仲辉。我又同一个汉族小伙子赶到庄房，找到解放军的李连长，详细说了情况。李连长立即派了一个班的战士，由我当向导，去捉拿罗仲辉。

第二天，天刚麻麻亮，“叭嘎”一声，老房子的门开了。罗仲辉的狗腿子走到坝子边屙尿，小王沉不住气，想抓住他，不料被发现，那家伙惊叫一声，掉头就跑，“大队长，走水啦①！”小王追了上去。

“站住！”一个解放军战士高声喝道。

①走水啦，是一句黑话，意思是事情被人发觉了，不好啦。

那狗腿子已钻进大门去了。罗仲辉这个土匪头子听到吼声，知道不妙，但不晓得已被解放军包围，先从屋里甩出两个手榴弹。那战士眼疾手快，踢开手榴弹，一声“卧倒”，把小王按在地上，用身子掩护他。随着手榴弹轰响，罗仲辉就往外冲，那战士早勾动了枪机。这个作恶多端、顽抗到底的反动家伙，得到了应有的惩处。

斩了罗仲辉，建新一带的群众无不拍手叫好。

那个人称“烂肚皮”，长期喝穷人血汗的地主老财潘云光，也自封了一个“救国军”的大队长。他搜罗了一批地痞流氓，四处抢劫，残害群众。自从罗仲辉被打死后，好多天没见他活动，不知躲到哪里去了。

一天，我正在山上干活路，一个常和我们联系的庄稼人，气喘吁吁地跑来告诉我：“老侯哥，‘烂肚皮’带着一个烟厨子^①和一个护兵，一早窜到马司红水井那个姓付的掌坛师家里去了。”我立即跑到庄房，领着一个班的解放军战士，连夜赶到马司，捕获了这个吸尽汉、苗穷兄弟血汗的家伙，送到丫叉区人民政府。

在艰苦的斗争中，迎来了整个古蔺山区的彻底解放。

随着形势发展和工作需要，我先后担任过村长、乡长、公社书记，和群众一起搞土改，组织互助组，办合作社，走上人民公社的幸福大道。

日子越过越甜，革命越干越有劲。我今年已经六十四岁了，每天都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。我决心跟党干一辈子革命，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奋斗终生。

^①烟厨子：专门服侍地主、恶霸烧鸦片烟的人。

轿夫的歌

陶向荣

红岩脚，荒草坡，
苗家代代受折磨。
老板租子重，
劳役比毛多。
筋骨累断血榨干，
手捧芦笙心唱歌。
借它诉苦情，
不是苗家乐。

这是五十多年前爹用芦笙吹的一首歌，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。

那天晚上，有点朦朦月光，妈在阶沿坎上积麻线，爹从傅少凡家干活路回来，一声不响地喝了两碗包谷粉搅的粟糊糊，坐在门口的疙篼做的凳子上，叹息了一阵，捧起了芦笙。妈一边积麻线，一边用苗语轻声地和着芦笙哼。爹吹完了一曲，陷入了沉思。那时，我有十一岁了，听懂了爹吹的歌，很想接过芦笙吹一下，但见爹一脸愁容，又不敢伸手，只得悄悄地坐在旁边。我望着芦笙出了一回神，心想：快些长大吧，好替爹妈减轻点担子。想着想着，眨眼工夫，我就象长成了大人，抹了一把眼里的泪水对爹说，“斋，你累了。我来吹一调。”爹没有说话，看了我一眼，便把

芦笙递给我。

我接过芦笙试了一下音，就轻轻吹起：

红岩脚，荒草坡，

苗家后代不怕磨。

斗罗^①落下去，

苍罗^②出山坡。

财主老板心肠黑，

总有一天跑不脱。

跳起芦笙舞，

苗家要欢乐。

当我刚吹完那一调，妈忙放下麻线，拉着我说：“快搁倒，不要吹了。”

爹却睁大了眼睛，脸上挂着笑说：“吹得好，是我们猛家^③的性格。”

“好，好，好，早点睡了。”妈说着收拾起麻团，“以后可不要在外头乱说。我们连嘴都糊不住，还有闲心去跳芦笙舞？”

夜深了，我躺在床上好久都没睡着，想起爹妈的表情，总没想出个谱谱来，倒又编了一支歌：

红岩脚，荒草坡，

苗家汗水流满坡，

种出好庄稼，

为啥肚皮饿？

同是人生父母养，

①、②“斗罗”、“苍罗”，苗语，即月亮、太阳。③猛家，即苗家。

为啥老板不干活？

谁能回答我，

快快给我说。

三年、五年过去了，没有谁回答我。

那时，我家住在红岩脚，租种傅少凡的土地，十二石田土要交八石租；每年还要我们家出一个人，长期在他家服劳役。从挑水砍柴，喂牲口，种菜园，抬轿子，抬滑竿以及一切杂活，样样都要做。过了好几年，狗财主傅少凡嫌我爹妈年老了，干活手脚慢，抬轿子、滑竿走不得，逼着要我哥哥和我去顶替我爹妈，轮流给他家当牛马。

我十七岁那年，哥哥有病，给傅家服劳役的事，就全部落在我的身上。傅少凡有好几股地方，经常要去这里看，那里转，可从不走路，每动一步，不是坐轿子就是坐滑竿。他的婆娘儿女也一样，是骑在干人背上作威作福的吸血鬼。佃户家里种的蔬菜瓜果刚成熟，他要吃新，除了叫人送去，还要坐起滑竿去要。这些家伙坐滑竿、坐轿子，还各有各的整人法子。抬起走时，稍不如意，他不打就骂，真使人恨透了。

一次，我和一个长工抬傅少凡的婆娘。那长工是个抬滑竿的生手。他抬前头，一上路，便大步大步地跨，我是小碎步，合不了脚步，轿子一颠一簸，没走多远，那婆娘就吼开了：“你两个东西要去报丧吗？慌慌张张地做啥子！”话音未落，拐杖已打到长工的肩膀上了。

在爬上一个陡坡时，那婆娘说凉快，要下轿子吹凉风。我早就想歇口气了，谁知这东西下了轿子，还一个劲地斥责我们在路上走快了，脚下重了。长工忍气吞声，没开腔。我坐在一砣石头

上，摘了一片木叶，往嘴里一放，把恨变成了歌：

爬山豆，叶叶长，

这婆娘，象母狼。

坐在轿上打拐棍，

下轿歇气又嚷丧。

老子今天不怕你，

拿点苦头给你尝……

“噢！你苗东西还自在，走了，再不好点走，看老娘收拾你！”
我的歌还没完，“母狼”就恶狠狠地朝我叫。

我没理她，提过轿子，那“母狼”上了轿，又气咻咻地叫：
“回去！再朝前走，会把老娘抖死！”

长工把轿杠搁上肩膀不敢开步。

“你耳朵聋了吗？往回走！”

转去的路是下坡多，我们跑得更快。任她在轿子里嗷嗷叫，
我们还是一个劲地小跑。

有一回，我正在挑水，老板的大崽子要出去观山玩水，这花花公子非要坐滑竿不可。他平时就脚不停，手不住，一天到晚，到处乱窜。这回坐上滑竿，就要我们抬起滑竿飞跑，上坡下坡都不准停歇。我恨透了这崽崽，在路上偏偏走得又轻又慢，还用木叶吹起一支歌：

花花雀，闹山林，

财主崽，似猢猻。

坐上滑竿要飞跑，

上坡下坡不准停。

游山又玩水，

折磨穷苦人。

糊糊不早死，

难解心头恨。

“快点！你们脚上长疔疮吗？”

“你没生疔疮，就下来自己走！”我吐了木叶，硬梆梆给他一句，仍旧缓慢地走。

那糊糊两前爪一撑跳下地来，捋起袖子象要抓人，恶狠狠地叫嚷：“你们没吃饭吗？”

我把滑竿一放，原地站着，愤愤地说：“当佃户的就是没饭吃嘛！”

同伴见我满脸怒气，忙说：“少东家，你走几步，我们又抬嘛。”

狗东西见势不利，没吭声就前头走了。

又有一年，庄稼快成熟的时节。一天，傅少凡这老东西一早就对我叫嚷：“陶老二，快点收拾滑竿，趁天气凉快，我要出去看庄稼。”

“天还早哩。”我刚从家里赶去，一见他那样子，更是慢吞吞地答应。

“快点去催一声杨少云！”

一听这家伙是要我们两个苗族佃户抬，心里就打起了主意。

当我把老杨哥找拢时，简单地商量了一下，决定他抬前头。

平时，这老狗不管是坐轿还是坐滑竿，总是要我们四平八稳地慢慢走，不准歇气。那百多斤一砣死肉，沉沉地压在我们肩上。今天一上路，狗东西就不断叫喊：“慢点，慢点！我要仔细看庄稼。”还不时地用拐杖敲抬杆。

“天上明晃晃。”老杨哥在前面提醒。

“地下水幽幽。”我接了下旬，就使劲一簸。

“你两个东西在跳啥子？”老狗吼道。

“昨天下了偏东雨，一路上尽是水幽幽，我怕后面的看不到，踩虚脚，摔跟斗。我们摔了不打紧，要是摔倒你，怎么开交？”

“小心点就是了！”拐杖又敲了一下抬杆。

还没走好远，肩膀就磨得痛，左肩换给右肩，右肩又换给左肩。老狗在滑竿上摇扇打扇，一会儿坐直腰杆，一会儿又斜躺尸；一会儿左边观山景，一会儿右面看庄稼，东歪西倒，更磨得我们肩膀上冒烟，心里象针扎。

“天上鹞子飞。”我正满肚子气，老杨哥又丢了个信号。

“地上牛屎堆。”我乘势一跳，“唉呀，踩着牛屎差点摔倒了。”

老狗被猛地簸起来，又重重地落在滑竿的竹片上，一阵惊叫：“你他妈的怎么搞起的？”反手就是一拐杖，没打着我。

我心里又喜又恨，不禁和着缓慢的脚步，轻声地用苗语唱起了歌，老杨哥也在前面应着：

山鸡两只脚，

自由走山坡。

苗家两条腿，

财主给拴着。

啥时任我走，

再不受折磨？

抬到邓家坳口，下软脚坡，老杨哥不小心踩到青苔，打了两个趔趄。老狗惊叫着，两手死死地抓住两根抬杆，才没被甩出来，

拐杖和蒲扇早飞了。等老杨哥稳住桩子，老狗又叫开了：“手杖！手杖！停下来！”

我们脚一停，狗东西梭下滑竿，脸色铁青，逼着老杨哥去给捡手杖、蒲扇。这家伙手杖一到手就要威风，举起手杖骂道：“老子今天要不看庄稼，一脚踢你下坡去！”回头又对我吼，“过来抬前头！”

“歇口气嘛！”

“才走几步就累了？”

“今天路滑，不好走哇！”

“你硬是穷话多！快点！”

老狗一躬腰，塌到滑竿上就喊：“上路！”

我向老杨哥使了个眼色，一抛就上了肩。

“你慢点不行吗？”

“手提不起嘛。”

“哼！你两个东西再不规矩，小心你的皮子！”

到了庄稼地，我想：这下你该下来了。在一块田角头就停了脚步。老东西用拐杖点着我的脑壳：“站起干啥子？”

“到地头了。”我答应了一声。

“走！一块田、一块土地转。”

“先歇口气，喝口凉水嘛！”

“就渴死啦！一会儿看完了，找杨合洞烧茶喝。”

田坎路，土埂子，七高八低，一个人打空手都不好走，但老狗定要我们抬起走。我心里早就气不过了，这一百几十斤的东西压着，更是鬼火冒。我几次打暗号，想把老狗甩下来，老杨哥都没有回答。没转好久，火辣辣的太阳，晒得我们流油，破麻衣早被

汗水湿透了。我忍不住，又说：

“主人家，歇一口气吧，热得很！”

“慢走当歇气嘛，走！”老狗用蒲扇往前一指。

我心里窝着火，在一个转弯的地方，喊了一声：“么、二拐。”老杨哥在后随口就说：“两边甩。”我们一前一后便走起“龙摆尾”，有节奏地甩起来。

“慢点！慢点！转弯抹角的地方跑这么快干啥子？鬼追来了吗？”老狗又是叫嚷，又是敲抬杆。

我有意蹬掉路边一块石头，石头咚咚地滚下坡，我没好气地说：“再慢点，人都滚下去了！”

看看太阳已经偏西，我们以为这下可以抬到杨合洞的家去喝碗茶。但老狗又没命地催：“时间不早了，回去！”

我们又累又饿又渴，抬拢狗窝，喉咙干得直冒烟。老狗梭下滑竿，一边搧蒲扇，一边恶狠狠地说：“你两个东西没安好心，一路上整得老子好恼火，象有催命鬼在叫你们的魂。现在给我滚回去！”

今天累了半天，就这样撵我们走，有点不甘心，我站着不动。老杨哥叹口气，轻声说：“我们走吧！要不，另外的活路又来了。”一句话提醒了我，才赶紧收拾回家。

从这以后，傅少凡很多次出去都没叫我去抬，我也落得少受罪，可苦了其他抬轿的佃户。

那段时间，在他家干其他活路，我特别小心，随时都提防他找我的岔子。心想：这一辈子你都不要我抬才好哩。我总是装作没事的样子，经常含着木叶唱歌，骂那狗东西，

山有崖，路有坡，

地主老财真可恶。
他坐滑竿摇蒲扇，
轿夫汗水流成河。
坡要剜，崖要凿，
老财不死总是祸。
不要天爷长眼睛，
要靠千人法儿多。

我暗自高兴，哪晓得傅少凡早打出了鬼主意。

那年我爹妈在家，辛辛苦苦喂了一头肥猪，准备过了冬至把它杀了，卖一些肉换点粮食，留下一点过年。谁知冬至刚过，傅少凡就派狗腿子跑来我家说：“陶老二几个月没抬轿子滑竿，老板找别人抬，花了钱，该你们付，我今天来收。”

“又不是我不抬，为啥要我付钱？”我一听就火了。

“他没抬轿嘛，干了其他活路的哟！”爹满有理地说。

“这个我不管。叫我来收钱，只晓得问你要。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没有？把过年猪吆去，不就行了？我看你们还是规矩点。”

“租没少交一颗，粮工没少一个，有哪点不规矩？”

“你不要跟我磨。拿条猪去抵，比搬家划算。”

爹听了后面这一句，心都凉了。傅少凡历年加顶、逼债，都是先派狗腿子来说一说，如稍有不合，老狗就要亲自出马，跑上门来硬逼。每年喂猪，我们都没吃上一片肉。爹左思右想，又不得不忍痛把猪吆去，喂那条老狗。

没过几天，傅少凡这老狗在他门前喊着我：“二爷四方八面托人拣了一付大补药，要一个乌骨大阉鸡来煨。”

“我又不是乌骨鸡。”说着，我挑起水桶就走。

“站住。你话都没听清楚，跑啥子？”我把背朝着他，看都不看一眼。

“我晓得你家年年都喂得有一个好乌骨阉鸡。”

一听老东西的话，就知道他不怀好意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。这只阉鸡是给我爹炖药吃的，心里有气，话也就冒得快：

“你不晓得上街去买吗？我们今年没喂鸡！”

“乱说，那天我还看到！”

“我不晓得！”答了一句就走。

结果，我们那只阉鸡还是被他的狗腿子抓去了。

万万没想到那回抬老狗去看庄稼，收拾了他一下，他便变本加厉地整人。我心里怨气多，常常吹起木叶骂一通。

红岩脚，荒草坡，

傅家财主是狼窝，

猪也拉，鸡也拖，

害得千人命难活。

那年月，天下老鸱一般黑。父亲拖着一大家人，无能为力搬到别处去，咬紧牙关在红岩脚下受熬煎。

我满二十一岁那年，傅少凡的狗崽子娶婆娘，要我去抬大花轿。从红岩子到古蔺城郊的麻湾头，来去一百多里，要我们一早出发，午时抬拢。傅少凡这老狗比他自己娶婆娘还忙，头天晚上就逼我们把轿子整好，要披纱，挂红，绑彩带，拴纸花，还要人坐上去，让我们抬起试一试，看整牢靠没有，一直闹了大半夜。刚刚打了个迷糊眼，又催我们快快起来。天才蒙蒙亮，就喊赶快动身，并特地喊着我们说：“你几个要是在路上走慢了，误了拜

堂的时辰，我再找你们算账。”

冒着冷清清的晨风，随着一大串接亲的人，闹轰轰的上路了。我们抬着空轿子，又多是下坡的送脚路，虽说也出了几通大汗，还不觉得好累。

一拢麻湾头，我们就急着打回转。可是那姑娘却迟迟不肯上轿。那些吹唢呐的把“离娘调”奏了一遍又一遍，几个人好不容易才把那新娘子扶上了轿。我们总算松了一口气，提起轿杠，往肩上一搁就走。

回转时，多数都是上坡的挣脚路，接亲的打空手，走起来都喘不过气，可是他还不断地催我们快点走。过了头道河，来到“五斗种”这条大坡下，我们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，接亲的、送亲的仍然不准稍歇一下，说什么新姑娘坐的花轿在路上不能沾地，要是放下轿来歇气，冲了地脉龙神，会不吉利。

这“五斗种”，弯弯曲曲，随山势往上拐，一眼望不到顶。平时打空手或背东西，还可以爬一节坡，歇一阵气。这次抬大花轿爬陡坡，就格外费劲。走前头的，轿杠要往后梭，必须曲肘，用两只手死死抓住杠头，稍不留神，轿杠就会从肩上滑脱，抬后面的就更恼火，全部重量都栽到后面来了。这回我抬的前头，来到半坡，两手又酸又软，汗水直钻眼睛，又松不到手去擦，没看清地面，一脚踩翻一块小石头，连打趔趄，差点滚下坡去。那新娘在轿里惊叫唤，送亲的舅子在后面滑竿上见了，就大声武气地吼：

“偏偏倒倒的干啥子？吃醉了吗？”

“就是累了！”我没好气地说了一句就站着不动。

“快走！”

“慌啥子，要歇口气不？”

我换了一下肩，长长出了一口气，抹了几把汗，又往上爬。虽说是秋凉时节，也使人闷得难受。等爬上“五斗种”，连裤腰带都没得干的了。

我心里默神，上了坡，该会慢慢走，缓缓气。哪晓得接亲的在前面跑得更快，送亲的在后面催得更急，也叫得更响。我们的气，找不到地方出，只把轿子颠来簸去，解解心头恨。

走到灯竿坡，真是过了鬼门关，又到阎王殿。这灯竿坡一上一下，下坡脚杆闪，上坡腰更酸。又饿又渴，还要一个劲赶，赶好不容易才拾拢红岩子。倒了那新娘，把轿子提到一边，连动也不想动了。

我喝了几大碗冷茶，肚子叽哩咕噜叫，饿得心头慌。

执事的喊了开席，我在一个席上入座了。座上都是一些穷客人。开始上菜，大家端起了酒碗。不料傅少凡马起一张狗脸走来，一把抓住我：

“你不去帮着端菜、烫酒，还来坐席，下来！”

狗东西边吵边拉边推，我顿时火冒三丈，站着不动。几个好心的穷客人忙劝解，把老狗隔在一边。

厨房里帮忙的近邻把我劝开，带到厨房里去，胡乱吃了一一点东西。眼看天已黑了，我感到一身痛，不想动，靠在门前一根大树下生闷气，随手摘了一片木叶吹起来：

财主娶儿媳，

千人累断气。

财主一桌席，

千人一年米。

吹起木叶歌，
唱我轿夫曲。
燃起心中火，
烧红天和地。

……

解放了，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，我这个长期给地主老财服苦役的轿夫，再不去抬轿子、滑竿，受人欺凌折磨，翻身作了主人，过上了幸福生活。我敞开胸怀唱起了翻身歌：

红岩脚，杜鹃开，
翻身苗家唱起来，
放声歌唱共产党，
毛主席来了幸福来。

一解放，我就在村上、乡上、公社担任干部，现在六十二岁了，还在大队担任党支部副书记，和群众一起大干社会主义。我心中更有唱不完的歌：

画眉爱唱歌，
哪有我歌多，
唱了苦歌唱甜歌，
欢歌唱醒红岩脚。

如今我们红岩脚，一片欣欣向荣。红岩脚下公路环绕，梯田层层，银渠道道，农田基本建设搞得热火朝天。看今朝，想过去，我的歌又飞出了心窝窝：

往日红岩脚，
荒草盖满坡。
千人流血汗，

地主比狼恶。

如今红岩脚，

变成米粮坡；

农业现代化，

越干越红火。

绒屯，^①

党的光辉照前程，

苗家高唱进军歌，

跟着领袖华主席，

继续长征谱新歌。

绒之绒。

^①绒，好的意思。绒之绒，好得很的意思。

我当地下交通员的时候

马杰良

古蔺县有个小地方叫长坝子。这里地势干燥，特别缺水，土地十分瘦薄。我的老家就在这里，世代租种地主的土地。解放前，爹妈一年到头累死累活也交不清租子，全家七口人，生活十分艰难。

甲戌年红军长征经过古蔺的时候，我已经七岁了。那年农历腊月廿六日，我同几个小伙伴在屋子旁边耍泥巴，正要得高兴，忽然看见赶乐用场的人们铺山盖岭地跑回来，边跑边喊：“红军来了！红军来了！”我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赶紧跟在大人后面去看看。

不一会儿，只见一队头戴红五星帽，身穿灰军服的士兵从大路上插了过来。他们一边走一边喊：“干人不要跑！干人不要跑！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，是穷人的队伍，不要怕！”

“啊！红军……”

当天晚上，红军就住在我们长坝子。他们说话和气，买卖公平，不随便到人家屋里去。大伙儿睡觉就挤在阶檐坎上。寨里的墙壁上到处写满了“打土豪，杀贪官，为了穷人把身翻！”“中国工农红军是工农的子弟兵！”等标语。红军的一言一行，一下子就把我们苗寨的人们吸引住了。

我妈去给红军做饭，他们很高兴，一个红军战士还拿了几个银

毫子给她。红军打开老财的粮仓，把粮食分给穷人。我家也分得几斗粮食，过了一个愉快年。爹高兴得满脸堆着笑，逢人就讲：

“哎呀！哪晓得红军这样好！专门为穷人办事，真是难找啊！”这时候，当地的两个青年学生周锐和周钧两弟兄，也在穷人中间到处宣传红军打倒土豪劣绅，北上抗日等革命道理。干人们都说：“红军就是好，不象前不久从这里经过的川军、黔军那样，一到就烧杀掳抢，无恶不作。”从此，红军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难忘的印象。

一九三八年，周锐和周钧从外地回来了。他们为人正直，乐于调剂穷人。周钧见我爹憨厚老实，常常同我们一家接近。每逢赶苗场，打山羊时，他俩都来参加。

一九四二年，我已经十四五岁了。这时，周家两弟兄办起了瓦厂。周钧对我爹说：“马大哥，你家五个娃娃，生活艰难，不如叫小马去帮瓦厂撵牛儿踩泥巴，这样可以减轻一点负担。”

我爹听了，说：“好，那就感谢你们了！”

“你放心吧，不会亏待他。”

我来到瓦厂以后，看到他俩跟穷人一起，吃饭同一桌，有酒一样喝。因此，我也就老实实在地干活。

一九四八年，周家两弟兄发起在印合山修街，我又转到修街工地上打杂。乡公所不时喊起人来拉丁，搞得人们提心吊胆，不得安宁。一天晚上，周钧对木匠师傅周义新和我们一些年轻人说：“周师傅，人多力量大呀！修这条街，不是这二十多个徒弟一齐动手，单凭你一个掌墨师，那就无论如何也修不好。你看，一个人折一支筷子，一折就断了；折一把筷子，怎么也折不断。同样一个道理，乡保长要欺负穷人，只要我们联合起来，他就奈何不得，是

不是？”周师傅听了直点头，我们也都觉得有道理。我直杠杠地说：“你说得对，衙门老爷要拉丁派款，敲诈穷人，我们只有联合起来同他干，才有出路！”

隔了不久，周钩要我送一封信到广橙沟去。我心想：他是个好人，和他交往的一定不是坏人。说不定这是一封很重要的信哩！我一边想，一边去弄个夹背背起，还特意找了根小竹杆，在一头打通了节子，把信卷成细条放进去，然后塞上木塞，糊上泥巴，当作打狗棍拄路。

经过水落窝街上时，乡丁盘问我：“到哪里去？”

“到古蔺赶场！”

乡丁不信，要搜身。没有找到任何东西，便十分生气地对我吼道：“胡说，你腰无半文，赶什么鬼场？”

“我是去亲戚家借点粮食过六月。”

乡丁不再说话，把下巴歪了一下，放我走了。到了广橙沟黄思安家，他见我从竹竿里取出信件时，又惊又喜：“小马，你可是个有心计的人啊！”

受到黄思安的称赞，我忍不住喜滋滋地笑了。

送信回来后，周钩弟兄俩同我更加接近。平时只要有空，他们就给我讲穷人为什么穷，富人为什么富，以及怎样才能不受剥削压迫，人人都有衣穿有饭吃等道理。

那年夏天的一个晚上，月光明亮，周围显得格外宁静。周钩把我单独喊到一个操场坝，小声地对我说：“小马，你在我家住了几年，你觉得我们对你怎么样？”

“你们对我好啊，看得起我们苗家。你俩都是好人，信得过。”

“好哇！你信得过我，我和你商量一件事。有人劝我干革命，你看行不行？”

“干革命？”

“干革命就是参加共产党，联合穷人起来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。你敢不敢干？”

这时，我脑袋里翻滚得厉害，忽地记起红军过长坝子时的情景。红军不就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吗？对穷人那样好，对老财那样恨。于是，我肯定地说：“干得，我敢干，我要求参加！”

“那好，要干我们一起干！”他停了一下，又再三对我叮咛：“要好好记着，这个事，嘴巴一定要牢，千万不能乱说呀！要是让人知道了，那是要杀头的！”

“我保证不说，娘老子也不讲！”

第二天晚上，泥木石工都睡觉了。周钩约我到印舍山大庙里，对我说：“小马，经过组织审查，认为你已经有了—定的觉悟，决定吸收你参加中国共产党。”

我这时全身热乎乎的，心胸感到无比宽广。我想起了许许多多干人在死亡线上挣扎，也想起了我们苗家的重重苦难，记起了听到的许多革命故事。为了迎来一个光辉灿烂的明天，我决心为革命勇往向前。

入党宣誓后，周钩对我说：“小马，从今以后，你就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了。你要努力学习，积极完成党交给你的一切工作任务。”

“是的，一定努力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。”

这时候，我爸妈和周围一些邻居都好心地说：“都二十岁的人了，男大当婚，应该回来安个家。”我说：“还早呢！”

那年冬月间，上级来指示，周锐和周钧要到贵州的金沙、毕节等地去联系工作，临行时，嘱咐我：“在家好好接待来往客人，凡是比这个的，都是自己人。”他说时用手比了一个“八”字。又说：“要保障他们的安全，护送他们平安过境。”

有一天，从外地来了一个人，一身农家打扮，象个庄稼人，我以为是来找活路干的，就对他说：“你找谁？这两天可是没有活路干哟！”

“你是小马吧，我听周先生谈过你。”他说完话，又用手比了一个“八”字。

“啊！先生……”

“我姓石。来见见周先生，不知在不在家？”

我也向他比了联络暗号说：“周先生不在家，你有事可对我说说。”

当天晚上，我安排石先生住下。他问起我的家庭情况和周钧弟兄的去向，我都一一告诉了他。最后，他谈到去苏家坝的道路时，担心地说：“这一路还清静吗？”我说：“到苏家坝，走茅坡、石夹口是大路，但茅坡的陈家和罗家都是地头蛇，又各人拖有武装。石夹口是个咽喉地，经常有保安队检查来往行人，要通过很不容易！”

“另外还有路吗？”

“小路可走扎山坝、十一坝，只是要多转二十多里路。”

“那好，明天去苏家坝，你就引我走小路好了。”

第二天吃了早饭，石先生对我说：“小马，你走前头，多留心一些！”

我走前面，他在身后跟着，始终保持一段距离。走拢土地坝，

碰上两个仓皇跑来的农民，一打听，原来是乡公所带起人来十一坝拉壮丁。我赶忙退回来：“石先生，前面在拉壮丁，怎么办？”

他听后，不慌不忙地说：“你考虑一下，还有没有第三条路可走？”

“石夹口行不通，十一坝也过不去，走哪里好呢？”皱着眉头想了一阵，我记起往年曾去徐家坝请过一次医生，便对石先生说：“有路，我们还可以走徐家坝。”

我们一起退了回来，转走核桃弯，来到龙桥寺，忽然碰上了保安队下乡收粮的狗丁，凶神恶煞地盘问：“啥子人？到哪里去？”

我装着很着急的样子说：“我是印合山的庄稼人，家里有人病了，到徐家坝请徐三伯去看病！”

“后面那一个呢？”狗丁指着 I 身后不远的石先生问。

“他是我的邻居，徐三伯老了，要是走不动，好在他家借乘滑竿抬哩！”

纠缠了好一阵，见我们空着两手，又见老石象个挑抬下力人，才放我们走了。到了苏家坝，天色已经黑尽。

以后还接待过几位同志，我都一一护送他们安全过境。

一九四九年二月闹春荒，长坝子一带到处都是讨口要饭的饥民，一个个饿得象崖藤。

“今年这个春荒怎么过啊？”人们都在叹息。

这时候，麻柳滩一个姓吴的老财，喊起三十多个脚子贩运大米到云南扎西去高价出售。当他们在印合山歇宿时，我和乡亲们发觉了，就去找周钧：“现在大家生活这样困难，他们当绅粮的不顾穷人死活，贩运粮食到云南去投机，我们准备给他挡下，用来解决目前的灾荒，你看行不行？”

周钧考虑了一下，又跟大家商量一会，表示同意，并再三说：“要告诉乡亲们，一不准打骂脚子，因为他们帮人卖力，都是穷苦百姓；二要充分利用国民党政府公布的政策，大力宣传不准粮食出境，作到有理有节。”事情就这样决定了。当天晚上，我就四处通知穷人，作好准备。

第二天一早，住在印合山挑运粮食的脚夫们吃过饭，费力地上路了。走了三里路，来到黄泥塘弯弯。这边早已埋伏在树林中的农民揸着背篋，搵起拐把，一齐站了出来，挡着去路：“你们看布告没有？早就规定粮食不准出境。你们胆敢违抗政府法令！要把粮食背到哪里去？”

有的喊：“下力的干人们，这事与你们无关，来去可以自便，但粮食一定要留下来！”

姓吴的老财吓慌了，赶忙去找周钧。

周钧说：“哎呀！现在正是春荒。政府有布告哩！说是粮食不准出境呀！这个话叫我如何好说？”

“我知道周先生乐于助人，你就帮忙出面替兄弟求个情！”老财还是不死心。

最后，周钧说：“这样好了，粮食至少留下一半，乡亲们是否同意，我还要同他们商量。”大家一听，搵起麻袋就装，东背走一袋，西背走一袋，一下子就把几石大米搬得光光的。

贩运粮食的老财，眼见连口袋也没有剩下一条，急得跺脚：“哎哟，你们这样干，把老本给我整光了，这怎么办啊？”

我说：“怎么办？你家里还有嘛！粮食我们借来吃倒，下半年秋收，一定如数奉还！”姓吴的老财，只好哭丧着脸，自认晦气地走了。

一九四九年夏天，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。在这黎明即将到来，黑暗快要过去的时候，敌人不甘心失败，仍在作垂死挣扎。军统特务张树良在古蔺上台当县长以后，他的亲信王明德随即到大村当了区长，宪兵连长王金岛到复陶乡也当上了乡长。此外，敌人还派遣了大批军警喽囉，遍设盘查哨口。泸州保安大队长萧正南也带了五百多名武装匪徒到了大村、东新一带，把李家寨我党的地下组织也破坏了。整个古蔺被搞得乌烟瘴气，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。

一刹时长坝子与各地失掉了联系。周锐特别关心李家寨支部的负责人余辉同志的安全。为及时了解情况，他喊我同他一路赶紧到李家寨去。

余辉同志往年曾来过周钧家里。他是个贫苦的读书人，是个很有才干的党的干部，很能吃苦，善于接近群众。他编写的《干人歌》我还背得：

“正月是新年，干人好可怜，没得柴米来过年，只好打嚙连。心想走他乡，到处去沾光，没得水礼难想方，两眼泪汪汪。

……”

这一类的歌，流传在古蔺人民中间，激起了不少饥寒交迫的农民起来斗争，也激励了不少有志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

我怀着不安的心情，跟周锐走小路，爬山岭，钻刺林，淌河沟，终于来到李家寨余辉同志的家里。一打听，余嫂子说：“老余已到贵州金沙去了！”

一块石头落了地，我们放心了。随即来到大村街上，一面喝茶歇气，一面打听情况。码头上的“袍哥”看见周锐衣着整齐，走上前来和他搭话：“先生贵姓，在哪个码头？”

周锐看了看，沉静地说：“兄弟姓王，现在县府工作。”

“啊……”

“是……”

我看老是谈下去，就会没完没了，怕出麻烦，连忙起身催促：“王先生，时候不早了，我们往学校那边走吧！”

“好，好，就走！”周锐边答边站了起来，同我走了。

回到长坝子以后，接连得到上级通知，解放军正在进军西南，要党的地下组织把当地国民党军队、反动地方武装和乡保情况掌握起来。组织上派我和王少恒两人到苏家坝去送信，我们连忙将信件塞在腰带里就上路了。

为了安全和争取时间，我们仍然走小路。没料到国民党七十二军的一部份人从湖南、贵州败下来，正住在十一坝。直到抵拢了，才知道这里也有敌人的哨口。一个哨兵用枪挡着王少恒吼问：“什么人？”

“老百姓，过路的！”

“检查！”

我一看，事情发生得突然，要销毁信件已经来不及了。趁敌人检查王少恒，还没注意我的时候，顺手把腰带上的信件捏成一团，丢在草里，然后迎了上去，说：“先生，我老人死了，去给姐姐家里报信！”

敌人要我们自己解开衣裤，让他搜查，没有找出可疑的东西，才放我们走了。一离开敌人，我们赶紧绕路往回走。

周锐听了我们在路上的遭遇后，安慰我说：“只要信件没有落到敌人手里，人又安全回来了就是幸事。现在你们必须立即从另一条路到苏家坝去。”

周锐重新写好了信。我抬起头，一下看到了墙上挂着的芦笙，连忙取了下来，把信卷成纸筒，放进一根笙管里。

这次，我同王少恒一道转走天生桥，刚到云峰寺，忽然碰上了一队“自卫队”，躲避已经来不及了。我给王少恒使了一个眼色，便从容地走了上去。

一个家伙问：“什么人？”

“老百姓，赶苗场去！”

有的问：“小伙子，你们赶苗场，换不换腰带呀？”

“赶苗场，当然要换腰带囉！”

有的又喊：“小伙子，你吹一调芦笙给我们听听好不好？”

“好！”

我抱起芦笙，王少恒摘了一片木叶，一起跳到路边的一块空地上，连吹带唱，吹了一段《过山调》。他们听着弯着腰杆，咧着牙巴直是笑。

我趁势把芦笙一收，说：“老总，对不起，我们还要赶路，要是换了腰带，二天一定请你们喝酒。”

我俩边说边走，一直把信送到王呐啐老王同志的手里，才算松了一口气。这次虽然多走了几十里路，任务总算顺利完成了。

第二天回来时，听说七十二军那伙人已经迁往石夹口，我们又赶快去十一坝，把丢在草里的那个纸疙瘩找了回来。

形势对我们越来越有利，国民党反动派的末日到了。为了迎接解放，上级通知，要组织人员、武器，准备配合解放军解放古蔺。周锐和周钧召集大家商量，准备到水落窝去找乡长张杰夫借枪。我把信送去，张杰夫一看，不阴不阳地说：“无缘无故地借枪，那么好借！”

我一看，这家伙不进油盐，只说了句：“这个事，你倒要好好想想，恐怕到时候，不是向你借枪，而是要你交枪！”说完就走了。

我回来汇报后，周钧说：“这家伙死到临头了，还那么嚣张，非要他交枪不可！小马，你明天和我一起去！”

第二天，我同周钧一起来到水落窝张杰夫家里。周钧在张家客厅里见到张杰夫后，开门见山地说：“张杰夫，解放军已经来了，想来你也知道。国民党反动派那么多部队通通都被打垮了，你这十多条枪还起得了多少作用？写信向你借枪，是给你一个机会，你还这样执迷不悟！”

他一听，周身直打哆嗦，脸一下刷白，好一阵开不了口。我趁势掏出手枪在桌子上一拍：“国民党反动派垮台了，你真要一起殉葬吗？只要你老老实实把枪交出来，人民还可以宽大处理。何去何从，你自己考虑。”老狗一听，牙齿直打颤，连连叫唤：

“晓得，晓得，只要多加关照，我愿意借枪，望你们给我定个时间，我人枪一齐送来。”

周钧听了答道：“好，三天后，你把枪送到长坝子，我们看看你对人民是否真有诚意。”

三天后，张杰夫的狗腿子带起一伙人把十多条枪都送来了。当他们看到大村和苏家坝等地的几百农民武装吹起军号，扛着红旗，雄纠纠地来到长坝子的时候，张杰夫的一伙人，一个个把枪一搁，就悄悄溜了。

在党的领导下，我们这支农民队伍直向县城插去，紧密配合解放军，解放了古蔺。

